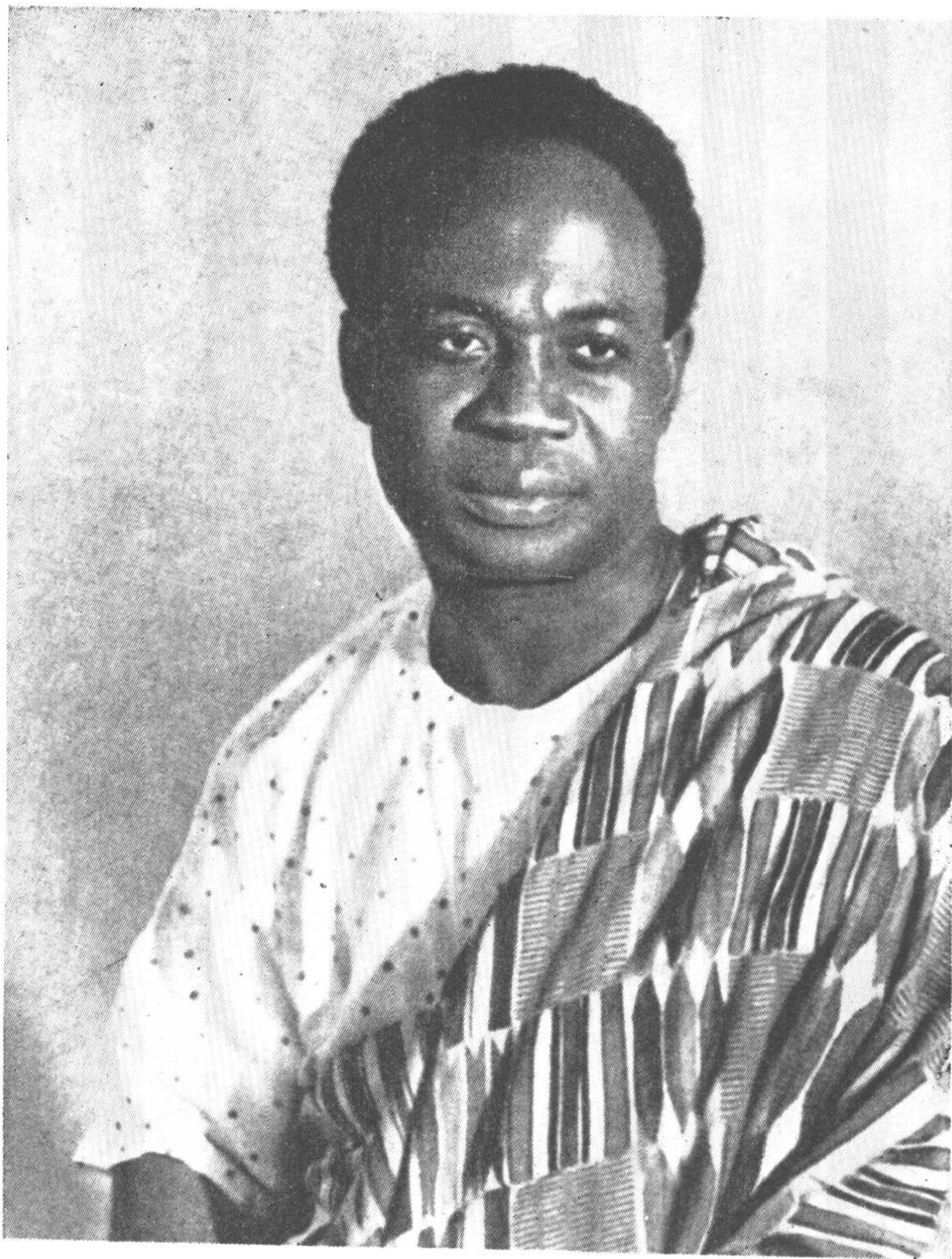


恩克魯瑪自傳

世界知識出版社





克瓦米·恩克魯瑪



無論誰現在握着我的手，  
缺乏一样东西，一切即将无用，  
在你进一步籠絡我以前，我用良言警告你，  
我不是你所想象的，而是个完全不同的人。

誰将成为我的追隨者呢？  
誰将签署自己的名字，作为爭取我的爱的候选人呢？

这道路是可疑的，結果是不定的，或者是有害的，  
那你就得放弃其他一切，只有我才是你应该遵循的唯一的绝对的标准，  
你的磨練甚至会是长久的，辛苦的，  
你一生中全部过去的学說，你周围所有的生活的习俗都不能不放弃，

因为我并不是为了在书里所写的东西而写了这本书，  
你也不会讀了这本书就可以得到它，  
那些欽佩我誇贊我也并非对我深知，

因为缺少我所提示过，而你尽管每次猜测却猜不中的那个东西，一  
切即成为无用，  
因此丢下我，走你的吧。

瓦尔特·惠特曼

(1819—1892)

## 序 言

1934年当我致函美国林肯大学教务长申请入学的时候，我摘引了坦尼逊“回忆”一诗中以下一句话：

世界如此辽阔，需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  
完成的事情却如此之少。

这句话当时是，现在仍然是对我的一种感召和督促。它使我下定决心来充实自己，准备为我的国家服务。

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料想不到，为了准备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进行的斗争，我将要在美国度过十年和在英国度过两年半的差不多流亡的生活。这一斗争进行了近八年之后，现在已经差不多取得了胜利。

我在美国和英国的那些年代是忧愁和孤独的年代，是贫困和劳苦工作的年代。但是，我对于这些年代从未感到悔恨，因为它们提供的背景帮助我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和政治哲学。当我在美国求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我被邀在几个黑人大学里担任讲师，其中包括林肯大学。这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它使我可以结束我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使我可以在一种我早已认为自己生活一部份的环境中，享受一种无忧无虑的舒适生活。但是，我不能把那种已经燃起而且一直燃烧了十年以上的民族主义火焰从我的意识中抛弃



掉，即使短短的几天都不能。

那时我的目标是争取黄金海岸的独立。黄金海岸过去是一个殖民地，而我一向认为殖民主义是一个外国强国主要为了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而用政治上的束缚使殖民地从属于自己的政策。如果殖民制度在许多地方引起了骚动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那是毫不奇怪的事。如果可能的话，很少有人不愿意使自己摆脱殖民主义统治。

在这个时期，我以很大精力来专门研究革命和革命的方法。我最感兴趣的人物是汉尼巴耳、克伦威尔、拿破仑、列宁、玛志尼、甘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我发现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吸取，还有许多思想对于我以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很有用处。

最初，我不能理解，甘地的不抵抗哲学如何能够发生效力。我认为，它似乎是极端软弱无力而没有成功之望的。那时我认为，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办法是武装反抗。我问我自己，如果没有武器和弹药，革命如何能够取得胜利呢？在研究了甘地的政策并以几个月的时间观察了它的效果之后，我开始看到，当这个政策得到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支持的时候，它就可能成为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办法。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获得政权一事中，我认识到一个坚信社会主义、能够实际运用甘地哲学的人所取得的成就。

黄金海岸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不是新的事情。它的根源是很深远的。1868年某些部落酋长曾联合起来成立了“联盟”来保卫自己，他们不仅抵抗有血统关系的部落阿散蒂人，而且反抗外来的政治侵略。自从1844年缔结了给予英国贸易权利的条约之后，黄金海岸日甚一日地陷于英国控制之下。

其后发生的一个政治团结和觉醒的伟大运动，是酋长们和受



过教育的非洲人为保卫黄金海岸的土地成立了保障土著居民权利协会。当酋长和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之间的分裂日益扩大而该协会因而瓦解的时候，后者聚集在一起并得到其他西非殖民地中受过教育的兄弟们的支持，成立了英属西非国民大会。这是西非民族主义的最初的标志。但是，由于它缺乏群众的支持，它在1930年就瓦解了。

这个组织瓦解后，在黄金海岸政治上所留下的真空，终于为黄金海岸的商人和律师这一类人所组织的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所填补。当我认识到这一运动由于忽视群众利益而必将失败的时候，我在1949年脱离了它并组织了人民大会党。

我看到，要想彻底解决殖民地问题，我国人民必须取得政治自由，因为只有人民获得了政治自由，其他的民族才能够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尊重。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基础上谈民族平等。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府，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期望得到与独立主权国家的人民同等地位的待遇。自由地治理自己，无论治理得好或坏，都比受别人的治理好得多。

正是在组织人民大会党的时候，黄金海岸的工人和青年人在政治上重新觉醒起来了。参加过1939年爆发的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回到了黄金海岸；在他们有机会拿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加以比较之后，他们就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任何路线，只要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准备采取。人们对英国直到当时为止所采取的殖民政策普遍感到不满，对于英国极力鼓励部落封建主义的间接统治政策尤其感到不满。其次，俄国革命及其后果也发生了它的影响，它传播了工人的团结、工会运动、自由和独立等思想。在亚洲所发生的事件，也促进了非洲的政治觉醒。



人民大会党不只是一个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件十分好的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先锋政党做它的领导和指导的话，它就不可能有目的地进行工作。而且，当统治国给予自治权力的时机到来的时候，如果它能够把政权转交给一个具有正当组织的、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政党、而不是转交给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话，它将更愿意这样做。一切真正愿意前进的人都聚集在我的周围，我既抗拒了机会主义份子，也抗拒了反动势力，并力图使人民大会党成为实现人民意志和愿望的民主工具。1951年，我们通过自由选举取得政权。三年后，以及后来在1956年，全国人民又给予我们以同样的信任。

当时的首要目的是取得政治独立，我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组织本身必须采取两种形式。第一个阶段是“积极行动”的阶段，也就是非暴力方法与有效的、有纪律的政治行动相结合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同现存的殖民政权发生公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是对于我们的组织的实力的一种考验。由于非暴力是它的特征，而且殖民国家方面在实力上占有优势，在这一阶段中取得完全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少的。

第二个阶段是“策略行动”的阶段，策略行动就是类似斗智的行动。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必须明确而有力地说明我们的运动的思想。我党的思想可以表述如下：没有政治自由，任何种族、人民和民族都不能自由地生存并且不能在国内和国外受到尊重。

一旦取得了政治自由之后，就会面临一项更加重大的任务。所有的附属国在教育、农业和工业方面都很落后。应该随着政治独立而来的，并且借以维持政治独立的经济独立，要求人民付出一切努力并动员全部的智力和人力。一个国家，如果原先是一个附属



国，在获得自由后想存在下去的话，它就必須設法在一个世代中完成其他国家用三百年或更多年代所完成的事业。实际的情况是，除非它以噴气式的速度前进，否則它就要落后，并因而使它所努力爭取的一切都陷于危险的境地。

对于新近取得独立的国家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过份复杂的制度。因而，它需要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即使是实行一种建立在社会正义和民主宪法基础上的制度，在独立后最初的时期中，可能也需要采取类似极权制度的紧急措施来支持它。如果没有紀律，真正自由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无论如何，这种制度必須有一个执政政党可以依靠的、忠实、誠懇、努力工作和負責的文官制度的基础。同时也必須加强武装部队以巩固国防。

黄金海岸已經以这种方法赢得了自治。但是，如果这种独立沒有同其他非洲殖民地的解放連接在一起的话，它将是不完全的。加納現在参加了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摩洛哥、苏丹和突尼斯等独立国家的行列。但是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仍然处在多至六个欧洲国家的統治之下。

我国的例子一定会鼓舞和加强那些仍处于外国統治之下的人们。我是抱着这个信念而写出我过去的生活經歷的。如果这本书在任何方面有助于自由事业的话，那么它就完成了它的目的。

克瓦米·恩克魯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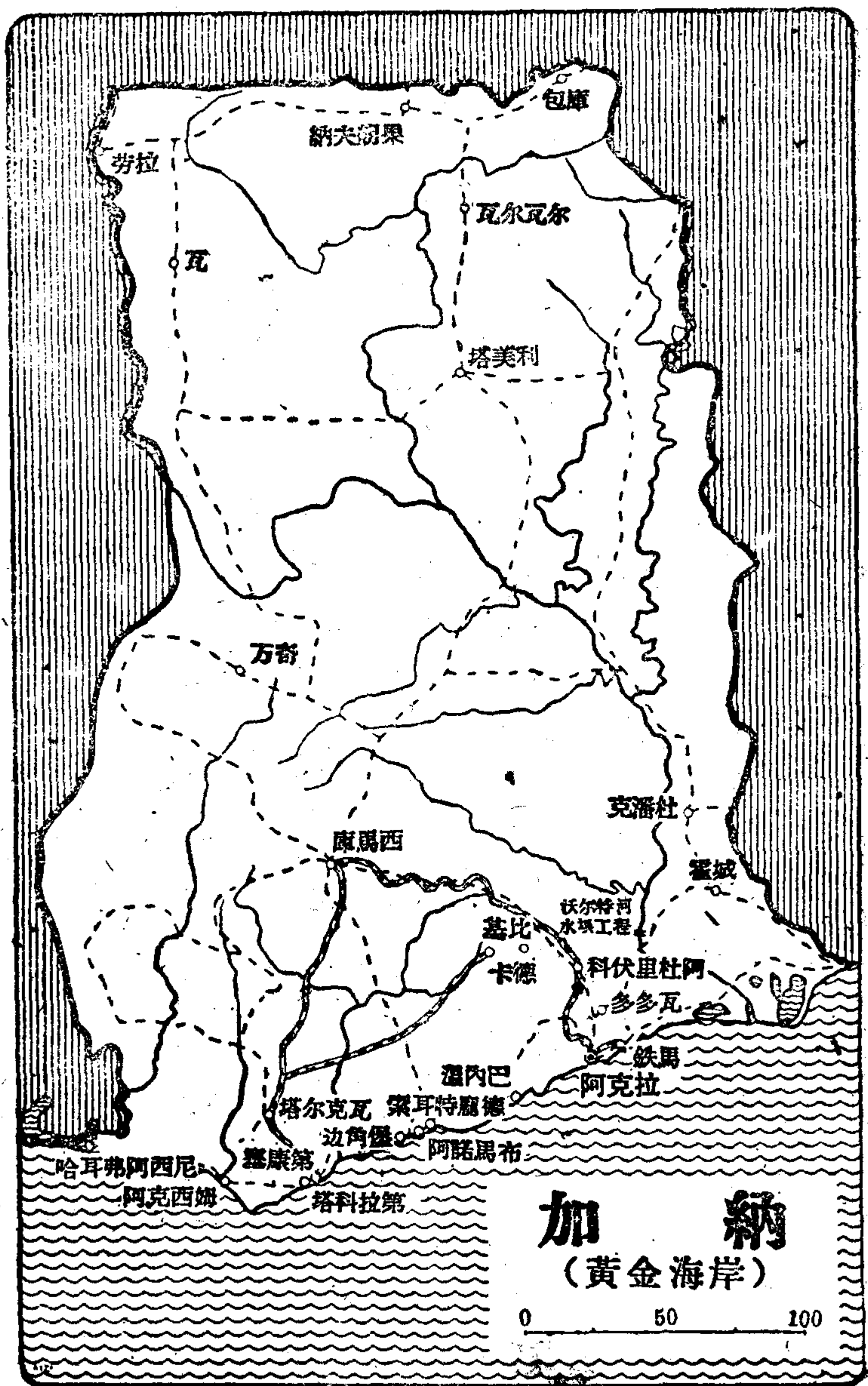
1956年10月于阿克拉



## 致 謝

我衷心感謝我的私人秘書埃里卡·鮑威爾，這本書大部分是由我口述，她筆記的，她花了很多業餘時間整理這本書的草稿。如果不是她經常勸我尽可能地騰出一點時間來寫，如果不是她那樣堅持不懈地辛勤工作，這本書是不可能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並出版的。





本书地名参考图





## 目 录

第一章	出生和童年.....	1
第二章	阿契莫塔和教書的年代.....	15
第三章	美国.....	27
第四章	艰苦的时期.....	38
第五章	在倫敦的日子.....	52
第六章	回到黄金海岸.....	68
第七章	逮捕和拘禁.....	83
第八章	分裂的扩大.....	92
第九章	我党的誕生.....	106
第十章	积极行动.....	115
第十一章	审讯和下獄.....	128
第十二章	政府事务领导人.....	142
第十三章	策略行动.....	152
第十四章	美国之行.....	161
第十五章	总理和宪法改革.....	174
第十六章	对利比里亚的国事訪問.....	184
第十七章	决定国家命运的提案.....	193
第十八章	1954年的大选.....	213



---

第十九章 阿散蒂問題.....	221
第二十章 寻求休息.....	229
第二十一章 “联邦”問題.....	247
第二十二章 調查委员会.....	261
第二十三章 托管下的多哥.....	266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考驗.....	271
第二十五章 胜利的时刻.....	287
附录一.....	298
附录二.....	315



---

## 第一章 出生和童年

关于我出生的唯一明确的事实似乎是，我是在9月中旬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出生于恩济馬的恩克罗伏耳村。

恩济馬位于黄金海岸的西南端，面积约有一千平方英里，东面延伸至安科布拉河，西至塔諾河和它的礁湖。它的人口约有十万人。由于白种人最初是在阿波罗神的节日抵达恩济馬地方的，因而许多年来欧洲人称之为阿波罗尼亚。

在黄金海岸的偏僻地区，和西方的习俗不同，没有人肯费心记下出生、结婚和死亡的日期。这种事件只有在它成为纪念日的時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按照部落的习惯，母亲们只是计算子女出生后所经过的民族节日的数目来估计他们的年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经过多少民族节都没有人知道，因为人们对于年龄是不很关心的，在那些和平的社会里，时间是不重要的。

恩济馬的民族节称为肯塔姆(Kuntum)。根据我母亲的计算，在我出生后曾经历过四十五次肯塔姆，这样算来，我出生的年代是1912年。

另一方面，在我嗣后加入羅馬天主教会时为我举行洗礼的牧师，记载我的出生日期为1909年9月21日。虽然这不过是他的揣测而已，但是我在官方文件上一一直应用这个日期，这不是由于我

相信它的准确性，而是由于就官方手續而言，这种办法遭受反对的可能性最少。直到最近，我才了解到这个揣测确实是非常接近事实的。

由于最近我在恩济馬度过了一个短短的假期，我有机会重游了某些我童年时代游玩过的地方，并且追思往事。当我和几个友人坐在哈耳弗阿西尼的海岸上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都落到了“巴卡納号”生锈的残骸上。“巴卡納号”是英非汽船航运公司所有的一艘货船，于1913年失事后，一直停在海岸旁。

在我的记忆中，“巴卡納号”事件是很久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一个事件，以致于直到那时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在说明我的年龄方面它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的一位友人问我当时所发生的事，并问我是否还记得那件事。虽然我在那时一定只有三、四岁，但是我現在还能够清楚地记得人們告訴我这件不幸事件的情形。

1913年8月27日夜，“巴卡納号”载运石油由尼日利亚返回联合王国的途中在迪科斯克夫和哈耳弗阿西尼之間遇到巨大的风浪而陷入困境。尽管船长竭力使船轉向海洋，但是“巴卡納号”在巨浪拖引下离浅滩越来越近，最后它的螺旋桨陷入沙土中深約五英尺。次日，“艾巴尼号”和“瓦里号”两船駛到該地并努力試圖把它拖入海中，但“巴卡納号”却絲毫沒有移动。船长理查德·威廉斯于是下令放弃該船。水手和少数的旅客安全地登上碎浪艇后被送到岸上。载送船长到其他一艘輪船去的碎浪艇顛复了，他被淹死。他的尸体从海里打捞出来后埋葬在哈耳弗阿西尼的中心。現在墓碑虽然已經腐蝕，但是大部份的銘文却仍然可以辨認出来：“船长理查德·威廉斯淹死在海浪中，1913年8月28日，年四十岁……天黎明了，幽灵逃散。”



但是，我更加清晰地記得流传的关于沉船原因的故事。故事說，河神阿馬·阿朱耳为了想去看望邻近的阿維安尼阿魯安努河的神，布置了这次不幸事件，以便获得一只船由他使用。这种迷信說法为下述事实所加强了：“巴卡納号”的确被向距离河口越来越远的方向拖送，最后它终于到达河口，直到現在它仍然停在河口，巨大的生鏽的船身牢牢地陷入沙灘之中，它已完全被遺弃了，周围只剩下毀坏了它的浪潮。尽管它的桅樁已經撕毀和折断，船身已經裂开，但它仍然是很壯觀的。

事实上，哈耳弗阿西尼的人們至今仍然在說，他們在夜間有时看見一只船的灯光——他們相信那就是“巴卡納号”——它正在向阿維安尼阿魯安努河駛去。

我的母亲証实說，那时我是一个很小的孩子，而那个事件是在我母亲将我从恩克罗伏耳村带到哈耳弗阿西尼去同我父亲一起居住之后不久发生的。因此，假定我出生的那年是1909年，那一年离9月中旬最近的一个星期六就是18日。因而，很可能我是出生在1909年9月18日，星期六。

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在恩克罗伏耳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鼓声四起。那不是为了庆祝我的誕生，而是为了不久前死去的我祖母的葬礼。就阿肯部落而言（恩济馬人是阿肯部落的一部份），人們对葬礼比对誕生和結婚要重視得多。为死者举行的仪式是假定超自然的世界是存在的，因而为了使死者在那个世界不失去任何生活上的安适，就用黄金、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陪葬。死者的亲属和友人在最初几天中不断地豪哭。在死后的第三周，举行一个追悼本氏族所有死者的仪式，开始时向神灵致祭，在拂晓前結束时举行竞技，跳舞和宴会。

因此，在恩克羅伏耳村那特殊的一天里，村中的人對於我的誕生是沒有什麼興趣的。但是，人們告訴我說，在我的家里，那天發生了很大的騷動，因為我生下來後過了很久時間還未表現出任何生命的跡象，因而我的母親認為我已經死去，她已放棄了對我的一切關心。這事聽來也許象是很冷酷无情的，其實不然，因為阿肯人深信，如果一位母親由於她子女死亡而悲痛的話，就意味着她將成爲一個不再生育的人，而這對一個非洲婦女來說，正是她可能遭受的最惡劣的命運。

但是，我家的那些逐漸離開葬禮的女親屬們不願意這樣輕易地罷休。她們決心使我活過來，並且開始尽可能地用鑿鉞和其他樂器做出很大的聲音，同時來回搖動我，甚至把香蕉塞在我的嘴里，想使我咳嗽而呼出氣來。她們終於引起了我的興趣，她們的工作完成了，把我這個星期六出生的一面嚎叫一面踢蹴的嬰孩交給我焦急的母親。

阿肯人非常重視嬰孩出生是星期幾，因為這決定了他的純精神的靈魂。他們相信，一個男人有三個靈魂：一個是婦女傳給他的血統靈魂（或者叫做莫伊加），並且認為這就是氏族的靈魂；一個是托羅，男人傳給的靈魂；另一個是奧克拉，即純精神的靈魂。为了不致對於奧克拉發生任何錯誤，按照男嬰兒出生的星期的日期給他起一個特殊的名字。在星期日出生的男孩叫做克威西；如果他出生在星期一就叫做科德喬，等等。星期六出生的男孩就叫做克瓦米。關於一個嬰兒的出生還有其他迷信。例如，第一個孩子被認為是不很聰明的，第三個孩子是早熟和頑固不化的，第九個孩子帶來好運，第十個孩子帶來惡運。有時，由於非常害怕第十個孩子的出生會帶來惡運，因而這個嬰兒很可能在出生時或在很小的時



候被宰杀。

虽然我可以說那是合乎习惯的，即由于我出生在星期六因而我的名字叫做克瓦米，但是，我是我母亲第一个和唯一的孩子，因此按照传统的說法，我没有一般孩子那样聪明，这确是很令人沮丧的。

恩克罗伏耳是一个典型的西非洲的村庄，村中有用泥和树条修成的房屋，以及用竹子围成的院落。地面很高而且石头很多，它的一边经过一个陡峭的悬崖往下通到一个河流，另一边则通到一片沼泽地带。我同我母亲在那里居住，直到我差不多三岁的时候，我们就离开那里到我父亲那里去，他在哈耳弗阿西尼当金匠。

哈耳弗阿西尼距离恩克罗伏耳村约五十英里，位于法属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交界的地方。塔诺河和艾伊礁湖（塔诺河流入该湖）被作为两国的边界，这对于恩济马人来说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因为人们已经在湖的四周修建了许多渔村，而现在他们却被分割开了。这件事引起了人们很大的不满，因为当他们从边界的一边到另一边的时候，他们要遇到海关当局、语言和其他的阻碍。

许多人仍然步行绕道海岸走那条较长的道路。甚至现在，每天仍然经常看见头上顶着重荷的妇女以很快的步伐走上她们的七小时的路途。当她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她们仍然走得很快！现在也经常能看见载重汽车沿着这条道路行驶，但是只有在潮水很低的时候，才能行驶。

在我童年的时候并没有载重汽车，实际上甚至象样的道路都没有。那一次我同母亲离开恩克罗伏耳村前往哈耳弗阿西尼的时候，我们必须沿着海岸并且经过伊西阿马步行前往。旅程需要约三天时间，必须在途中的村庄里过宿两夜。在其他几次的旅程中，

當我們常常一起走進叢林而不能夠在一天中走完旅程的時候，我們就露宿在森林里。我還記得，我幫助母親拾碎木柴和枯葉來点火以避免野獸的襲擊。同所有的小孩一樣，我自己對於野獸的襲擊毫無恐懼，因為我完全信賴我的母親。

她是我的一个最好和最热心的保护者。虽然她允許我有很大的活動自由，而我也從來沒有感到受她的束縛，但是當我需要她的時候，她总是在我的身邊，而且我們之間不需要說什麼，她就很巧妙地知道了我的需要。她似乎從來沒有說過任何話來指揮別人，但是她的儀態、她的安詳而果斷的舉止似乎具有某種力量，使她凌駕在大多數人之上，而且使她自然而然地處於領導的地位。

我父親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極為和藹可親，並且為他的子女感到自豪。我雖然可能是一個最任性最頑皮的孩子，我却從來不記得我的父親曾打過我一下。事實上，我只記得我的母親有一次曾確實很厲害地打了我一頓。那次挨打是因為我不能根據自己的願望來做某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就向為全家準備的一鍋燉菜里吐口水。

我們家庭的人口很多，因為，雖然我是我父母唯一的孩子，但是我的父親按當地風俗所娶的其他妻子生了許多子女。一夫多妻制當時是完全合法的，即令在今天，男子按他的經濟能力娶尽可能多的妻子，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在事實上，一個男子的社會地位越高，他能娶的妻子就越多。無論這種生活方式對於相信一夫一妻制的人們來說似乎是多麼不合習慣和不能令人滿意，而且我也決不是要為男性辯護，但是，一般公認的事實却是，男子是天然的一夫多妻主義者。非洲人所做的事，只是承認了這一事實，而且使得男人們一直做的、並且只要男人存在的時候他們無疑將繼續做的



一件事成为合法，或者使这件事得到社会公認而已。有一件事实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同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比較起来，在这个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离婚事件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因为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比起来，在这里，离婚要容易得多。由于下述的任何理由都可以結束婚姻关系：通奸、不孕或缺乏性能、酗酒、性生活的不适应、妇女的好吵鬧、同婆婆不合、以及发现同族婚姻的情况。

一个氏族的所有成員都被認為是血亲。人們認為，如果同一氏族的两个人結婚，則整个氏族都将受到神的懲罰。以我父母的情况为例，他們屬於同一部落，但是我的父亲是阿索那氏族的人，而我的母亲是阿囊那氏族的人。由于世系是按母系传下去的，和西方婚姻的关系不同，我不屬於我父亲的氏族，而屬於我母亲的氏族。我父亲的世系是由他的姊妹的长子传下去的，而后者是阿索那氏族的一个成員。

我們全家大概有十四人，除了我們本家之外，似乎經常都有亲屬同我們住在一起，因而我們的小院落通常总是挤滿了人。按照非洲人的风俗，任何亲戚，無論关系是多么疏远，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来到你的家里，并且按照他的願望尽可能长时期地居住在你的家里。关于他的到达，居住期限，以及最后离去的日期，都沒有人加以过問。这种好客的习俗有时被严重地滥用了，因为如果家族中一个成員的生活比較富裕的話，他通常都发现自己的院落里住滿了男男女女，这些人都自称同他有一些很远的亲戚关系，并且准备由他供养，直到他的錢用光时为止。

我的家庭在一起生活得很和睦，我記得很少发生爭吵。家里的妇女們通常每周輪流作飯和伏侍我的父亲；同时她們在田地里做活或者做些小买卖以補助家庭的收入。我們孩子們的生活是非

常美好的，什么事都不用做，成天地玩耍。我們的活動場所很廣闊，而且變化多端，因為我們的家距離海和礁湖很近，而且也可以在附近未開發的叢林中得到游玩的樂趣。

然而，我們並沒有玩具。我記得，有一個和我們一同玩耍的孩子的父親賺了一些錢，這個孩子有一天推出來一輛兒童腳踏車，他從此每天在沙灘上來回地踏着那輛腳踏車。我們非常羨慕他，並且希望他能讓我們騎一下他的車子，但是他的占有欲很強，他很少讓車子離開自己的眼前。然而，現在可能是他在羨慕別人了，因為他的父親已經死去，非但沒有給他的家庭留下一文錢，而且也沒有留下任何謀生的辦法。

可能是這輛腳踏車却促使我的異母兄弟們用他們所找到的兩個鐵環自己製造了一輛所謂的腳踏車。關於這件事我記得最深刻的是，他們把我差不多看成一個神聖的福神，雖然他們全都想首先騎這個新鮮玩意兒，但是他們却把我放置在車的坐位上，並且緊緊地扶着我，怕我受到傷害。

當我回想起他們一向對待我那麼和藹和關心的時候，我有時懷疑，他們是否在內心深處認為我是一個被嬌養壞的小傢伙。他們可能非常害怕我會跑回家裏去，向他們非常尊重的我的母親去哭喊，因而他們很注意不使我感到任何的不滿。的確，我母親很少拒絕給我任何我要的東西，而且我也無疑地利用了這一點，但是我相信，她總設法不使她對於我的撫愛表現得太明顯，因為每一次當她照顧我們吃飯的時候，她總是最後才把我的飯給我。我一直堅決要睡在她的床上，直到我自願決定和我的異母兄弟們一起去睡的時候為止。我記得，當我父親到我們床上睡的時候，我是經常很生氣的，並且堅持要睡在他們當中。有好幾次我父親設法向我解



释說，他同我母亲結了婚，但是我向他說，我也同我母亲結了婚，因而我負有保护她的責任。

和大多数成长中的兒童不同，我不大想吃东西。事实上，我的母亲經常因为她必須費事地强迫我吃东西而感到很煩惱。她发现，我时常在夜間餓醒，因而她形成了一种习惯，把一点烤熟的香蕉放在我的枕头底下，这样，如果我在任何时候餓醒了，我就能够吃完香蕉再繼續睡覺。我在白天很少吃飯，只在傍晚游戏完后回家的时候才吃为我准备好的食物。我的父母对于这一点从来沒有怨言，而且当他們看到尽管我吃的飯很少而且不正常，但是我的身体却长得很好的时候，他們就不再担心了。

虽然有許多兒童我可以同他們一起游玩，但是我感到最愉快的是自己单独游玩的时候。我經常单独的游蕩，一連好几个小时，靜靜地观看着鳥和森林中的小野兽，傾听着它們各种各样的鳴叫声。但是，我有时不满足于仅仅坐在那里注視它們；我很想触摸和撫愛它們。因此，我不久就設計出一种捉捕它們的工具——不是杀害它們，而是把它們带回家里当作心爱的小动物。有許多次，我回家时带着一只松鼠、一只小鳥、一只老鼠或者一只土蟹。我記得有一次我拒絕跟我母亲走一段路程，除非她允許我把一只心爱的小鳥帶在身边。由于我紧紧地抱着那只小小的鳥籠，我想我不是把那只可怜的小鳥悶死了就是把它吓死了。無論如何，我們还没有走到五英里远，我就突然发现我那只宝贵的小鳥已經死去。这使我非常难过，以致于我的母亲沒有办法安慰我，結果她沒有別的办法，只好帶我回家。

我曾經听过許多关于鬼的故事，因为在部落社会中，鬼神之类的东西起着很现实的作用。我对这种故事并不感到害怕，我还記

得有一次我自動地靜坐了十分長的時間，希望我能夠死去，唯一的原因是，死了之後我就可以加入那些占有特殊地位的鬼魂的行列，那些鬼魂可以穿過牆壁和關閉的門戶，可以坐在人群里而不被看見，還可以大搞惡作劇！

我不知道我這種想作鬼魂的願望是否表示存在着一種心靈力量。我的母親曾經屢次敘述以下的事件。在這件事發生的那一天，我正被綁在我母親的背上（小孩被綁在母親背上是非洲的習俗）和我母親一起做一次我們時常做的旅行。很碰巧，她在途中必須涉水走過一條小河，在我們將走近河中心的時候，我突然激動地喊叫說，我站在一條魚的身上啦，我母親雖然對我突然大聲喊叫很吃驚，但是使她更為驚奇的是，她極為詫异地發現，她的一只腳的確踩到了一條魚。事件的結局是很愉快的，她捉到了這條魚，我們當天晚上就用它來佐膳。

不熟悉我的人們一定會覺得我是一個離奇和執拗的孩子。很少人會相信，我這個常把手指放在嘴裏邊，事事躲在人後，或者連續幾小時見不着的孩子，當我被激怒的時候卻能夠象機關槍那樣激烈地罵人打人，並且使用雙手雙腳和每一片指甲來捍衛他認為正當的想法。曾經有這麼兩個人從我的面前很恐懼地逃走了。

第一個人是一個警察。他在值勤的時候，責備我的一個異母兄弟，因為他在沙灘上做了一件淘氣的事。當他抓住我兄弟的臂膀的時候，我忿怒起來，並且開始用沙子來打他，我打得這樣緊張和這樣猛烈，以致他放开我的兄弟逃走了。他把這件事報告給我的父親，我受到一次嚴厲的斥責，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我看到我父親的眼睛中閃爍着一種高興的神色。

第二個人是一個同我的異母姊姊戀愛的人，他到我們的



院落里来向她求婚。最初,我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到我們的家里,后来在大家很兴奋的情况下有人告訴我說,他来到我家是要把我的姊姊带走去結婚。我象一个着了魔的人一样地大嚷大叫起来,并且踢那个为爱情所苦恼的人,直到迫得他不得不从我們的院落逃出去!

但是,我不久就懂得了,一个逐渐成长起来的孩子的生活并不是整天玩耍;至少一个有我那样的双亲的孩子不是如此。我母亲自己虽然从来沒有受过正規的教育,她却决心在尽可能早的时机里把我送到学校去。可能是由于我母亲的說服力,我父亲也强烈地贊同这一点。即使我时常能够躲过我父亲,但是我知道,我母亲的主张一旦决定之后,我对它是毫无办法的。

我入学的第一天使我非常失望,因此我逃走了,决心永远不再回去。但是,我母亲对于我的强烈抗議充耳不聞,她每天早晨安靜而坚决地拉着我的臂膀把我放到教室里。最后,我認識到,我在这场战斗中已經失敗,因此我决定,既然我将要被迫留在学校里,我最好还是設法喜欢它,并且尽我的可能来学一些东西。使我很奇怪的是,我不久就发现我很喜欢我的功課,并且很願意到学校去,即使我們在老师面前总是恐惧和发抖,因为他坚定而积极地相信以下这句諺語——“不打不成材”。我不欢喜被迫去做我不欢喜做的事,因为我还没有习惯于这样做。我时常想,如果老师不在我們的面前,由我們自己来讀書而沒有人管我們,那么学校該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天堂呀。

各班級都在一个教室里,老师通常是分班先后教課。这对他一定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而且我們也沒有用任何方法来減輕他的困难。很幸运,我很喜欢讀書,我真是非常喜欢,以致于不久后

我唯一的恐惧就是，我父亲可能有一天会无力给我付学费，当时学费每月为三便士。为了这个缘故，我开始养几只小鸡，每只鸡我卖得六便士。用这种方法，我不仅能够帮助缴学费，而且我也有了买书的钱。此外，关于我父亲贫困的任何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记得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们所要求的任何东西，而且对于我，他特别肯花钱。

在我入学的初期，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可能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受到纪律处分。我们不喜欢老师，因为他时常用教鞭打人，我们时常认为他打人是沒有正当理由的。有一天，我们听说视察员正要到我们学校来，我们立即看到这是向老师报复的机会。我们聚在一起商量，决定在视察员视察的时候全天逃学。使我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我没有能够看见当视察员发现教室空无一人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尤其是不能看到老师脸上的恐慌和惊愕的神情。这一定使他很难堪，但是第二天早晨，他就得到了报复的机会，因为当我们刚刚露面的时候，他就在拿着教鞭等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被剥光了衣服，并且在光着的臀部上挨了二十四下鞭子。打得很厉害，以致在以后的三天中我简直不能够坐在教室的座位上。但是，无论这使我的身体和自尊心受到多么大的伤害，我完全知道我应该受到这种处罚。从那一天起我就懂得，要接受我认为应该受到的处罚，无论那种处罚使人受到多么大的耻辱。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受到一位罗马天主教教士的影响，他是德国人，名叫乔治·菲希尔。这位身材高大、严守教规的人似乎很喜欢我，并且在读书方面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事实上，他差不多成为我在求学初期的监护人，因而使我的双亲摆脱了他们对我的初级教育所负的极大部分的责任。我父亲不信宗教，但是我的母亲信

了天主教。通过她和菲希尔神父，我也受洗加入了天主教。

在当时，我对宗教很认真，并且经常去做弥撒。但是，当我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天主教的严格戒规使我感到很受压制。这不是因为我变得不那样信仰宗教了，而是因为我企求自由地信奉上帝和接受上帝的灵感，因为我的上帝是一个我个人的上帝而且我只能直接接受它的灵感。在这种个人性质的事务中，我认为不需要第三者的干预，而且事实上我愤恨第三者的干预。今天，我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教派的基督教徒，同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任何矛盾。

我害怕我的愿望可能受到天主教会的抑制，也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害怕让自己和女人纠缠在一起。在那个时候，我对女子抱着无法理解的恐惧心理。我记得，有一个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的女孩子，她经常在一个介于我家院落和邻家院落之间的小巷子里站几个钟头等候我。如果我恰巧走进小巷子的话，她总是走近我的身边并设法和我谈话。当她看见我只是象一只受惊的小野兽似的瞪眼望着她的时候，她可能认为我是怕羞了，因而她勇敢地向我耳语说，她很爱我。我很恐惧并且骂她，好象她伤害了我似的。我急忙跑回家里，把那个女孩子的邪恶行为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笑起来，她说，“孩子，你应该为这件事感到高兴。如果一个人很喜欢你，那她犯了什么错误呢？”

那个女孩子还是继续对我表示好感，而且开始把好吃的食品交给我的母亲送给我吃。当我一旦知道食品是那个女孩子送给的，我就拒绝吃。我的母亲要过好几天之后才能够说服我去吃任何东西。

我一直没有摆脱对女人的这一种感觉。现在，已不是害怕而



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感觉。那原因可能是害怕被羈絆住，使我失去自由或者在某种方式上受到控制。对于金錢和有組織的强制性的宗教，我也具有同样的感觉。在我的心目中，这三者在一个男人的生命中都不應該占有任何重要的地位，因为一旦这三者之一占了上风，人就变成了奴隶，而他的个性也就丧失了。

如果我傾听了那个站在巷子里的女孩子们的热情言語，很可能我会满足于在哈耳弗阿西尼同她一起度过我一生其余的岁月，在当地学校里教書，或者繼承我父亲的行业。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地发展下去。

---

## 第二章 阿契莫塔和教書的年代

在小学讀了八年書以后，我在哈耳弗阿西尼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我想那时我一定是十七岁左右；总之那时我的身材不很高大，因为我清楚地記得，为了在黑板上写字，我必須站在木箱子上。

1926年，阿克拉的国立师范学院院长訪問我在教書的那个学校。当他看到我当时的工作情况时，他得到相当深刻的印象，因而他建議我到他的学校去接受教师訓練。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轉捩点，因为第二年我就到他的学院去。最初，我这个沒有經驗的年輕人被城市生活弄得眼光撩乱，而且同大多数离开家庭进入寄宿学校的孩子們一样，是非常想家的。哈耳弗阿西尼的沙子路簡直象沙漠中的道路一样，但是我却認為它比阿克拉的川流不息的車馬、拥挤的街道和喧囂要好得多。

一年級大学生通常要受到捉弄和威吓。这种捉弄和威吓似乎已經延續了很長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我怀疑起来，受教育的价值是否真值得忍受这一切苦恼；这时有一个捉弄我的人开始和我談話，仿佛我是他們当中的一員。显然，我已經通过了考驗。以后，我被拖去捉弄那些后来入学的同學們，这时我才認識到我入学的最初阶段已經結束了。

这一年是我很愁苦的一年，当时我接到信息說我父亲逝世了。

他的一只脚上生了一个大疮，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求医，我的母亲把他带到一个附近的村庄里，但是在两个月之后，血液里中了毒，他在很短的时间內就死去了。

經過我的請求，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准許我回家，于是我立即动身。但是，那时的道路不象現在这样方便，旅程需要好几天，因而在我到达家里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經安葬了。

父亲的去世对于我是一个大悲劇。它除了使我的親屬們感到寂寞外，还把我的家庭拆散了。按照非洲人的习惯，在一个男人死后，他的妻子和兒女由他的繼承人負責贍养，而且他們就自动地搬到死者最近的親屬的家里去居住。因此，我的母亲离开了哈耳弗阿西尼，搬到安科布拉河口我姑父那里居住。

大致在这个时候，設在阿契莫塔的威尔士亲王学院成立了，在总督戈登·格吉斯堡爵士主持下举行了一个有會長們和政府官長們参加的盛大的正式開幕典礼。在會長当中，有声名狼籍的阿散蒂統治者庫馬西亨尼。在早些时候，他据說曾因为参加用活人祭神而被总督流放到塞舌耳群島。

但是，在那一天，所有非洲人最注意的人物是副校长助理和教職員中第一个非洲人克維吉耳·阿格雷博士。那时在我看来，他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卓越的人物，我对他怀有最深刻的爱慕。他具有旺盛的活力和热忱。他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好象是由他心底里激发出来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很伟大的演說家。我的民族主义最初是由他激发起来的。他对于他的肤色极为自豪，但是他强烈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他虽然能够理解馬庫斯·加尔維的“非洲屬於非洲人”的原則，但是他一直毫无犹豫地攻击这一原則。他相信，情况應該是这样：黑种人和白种人應該在一起工作。他所



发表的言論的主要論調和他所宣揚的基本精神，就是黑种人和白种人之間的合作。他經常解释他的主张說：“你可以用白鍵弹出一个曲調，你也能够用黑鍵弹出一个曲調，但是为了音調的和諧，你必須同时一起弹白黑两种鍵。”

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并不認為阿格雷的这种想法是切实可行的，因为我認為，只有黑种人受到和白种人平等的待遇的时候，这种和諧才能存在；也就是只有一个自由和独立国家的人民——拥有自己的政府的人民——才能够認為在种族或其他方面同其他国家的人民处于平等的地位。

在4、5月雨季开始的时候，师范学院放假了。由于我一直忙于使自己适应自己的新生活，我一直沒有能够設法賺些錢。因此，我不能够回到哈耳弗阿西尼的家里去，而不得不留在学校里，并且在学期开始前，做一切我能做的工作来賺些生活費用。在师范学院放假的那天晚間，当我站在寂靜无人的美术馆里同两个其他被迫留下的同学談話时，阿格雷突然走了进来。他生气勃勃，并且由于将在英国和美国度过他的假期而感到很兴奋。他停留下来同我們說了一会兒笑話，然后在他刚要离开我們的时候，他的心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說，“兄弟們，請你們为我祈祷吧。到目前为止，我曾經能够使你們感到飢渴，但是我却沒有能够滿足你們的飢渴。請为我祈祷，祈望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可以滿足你們的飢渴。”但是，他永远沒有回来，这就是我們听見他所說的最后几句话。在訪問英国之后，他到了紐約，在那里他突然生了病。一星期后，阿格雷逝世的消息突然传到阿克拉。

这一消息的突然袭击以及嗣后逐漸認識到我已永远失去了这一伟大人物的指导，使得我伤心已极，至少有三天的時間我什么东

西都吃不下。但是，在这个期間，我却发现甚至在腹中空空的情况下，我似乎都具有很充分的精力来繼續讀書。这一发现，对于以后我在美国和英国的年代是很有价值的，那时由于貧困，我有时不得不什么东西都不吃，而且不仅要繼續讀書，在假期中还要做工，以便賺一些錢来繳學費。

由于我对于阿格雷这个伟大人物和学者非常欽佩，我才第一次产生了到美国去进修的想法。我当时的計劃是，讀完师范的課程，然后再教五年書，并且努力儲蓄去美国所需要的旅費。

1928年，阿克拉师范学院与威尔士亲王学院合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校长是阿·格·福萊塞神父，他同格吉斯堡与阿格雷在建立該校中起了主要作用。我当时是一年級学生，并不是由他直接授課，但是我們大家从他的星期日晚間的講道中得到了很大的感召和鼓舞。他是这三个伟大人物中唯一仍然活着的人。

我們是在阿契莫塔受教师訓練的第一批学生。我認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作为一个受教师訓練的人，我和中学生住在一起，因此我們能够互相交換意見和互相学习。我从中学生那里学到了一点拉丁文和高級数学，以期能够在以后参加倫敦大学的入学考試，为了酬謝他們，我竭力向中学生們介紹我对于教育心理学和他們課程表中所沒有的其他課程的知識。

虽然我非常急于閱讀能够塞入我的头脑的尽可能多的書籍，但是我从来沒有变成一个苦学者或者一个書呆子。我喜欢交朋友，并且热衷于体育。我們有一位錫兰体育教师，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体育教师，而且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在他的指导下，我認真地練習了短跑，并且曾在各学院联合举行的运动会上参加一百、二百二十和四百四十碼的賽跑。我发现，运动是男子性格的一个

重要部分，这一点使我認識到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提倡运动的重要性。

但是，在練操方面，我却不能够使自己說同样的話。我非常不喜欢在早晨五点半鐘起床，并且来到院子里进行旅次行軍！我經常在到达时感到，无疑也表现出，睡眼朦朧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不会延长很久。不久我們就被我們的教練員——一个准有三百磅重的大块头——的高声吼叫所震动而立正起来。我的步伐总是不能够走得很整齐，这件事經常使他感到非常煩惱。我的两条腿經常要随着他的雷一般震蕩和顫动的声音而顛簸地調整步伐。在这个折磨人的時間里，唯一使人感到輕松的，是當我們“稍息”的时候听他的訓令。他的腹部非常大，因而每一次当他大声吼叫的时候，他的腹部随着声音的震动而上下摆动。这使我觉得非常可笑，因而我必須作很大的努力来控制自己不要大声笑出来。

对我來說，我的宿舍舍监所費的口舌可能是最多的了，因而他把我叫做“一个最难对付的人”是不足为奇的。对于这样一位严厉的教导人員來說，我一定是一个很难忍受的人。我并非很不願意遵守規定和章程，事实上我曾經拼命努力遵守它們，但是在我一生中一直感到，为了服从命令而要我抛弃一直在专心致力的事，是非常困难的。最使人恼火的一个規定是每星期日晚間的点名，然后到教堂里去作礼拜。每一个学生都必須来听候点名，如果缺席，則必須提出十分充足的理由。

在阿格里宿舍中，我們的舍监是一个最严格的人，他斥責我們的話簡直象鞭打一样。由于我害怕和他面对面地打交道并且忍受这种刻薄的話，因而我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要在点名时迟到。但是，有一次我没有成功。我借了別人的一輛脚踏車前往阿克拉，当



我以最快的行駛速度返回的時候，一个小女孩子冲到我面前的路上。我煞住車子，車向旁边轉去并且把我摔下車去了。这个女孩子跌倒在路上并且恐惧地叫喊着，但是很幸运，我还没有碰伤她。不过我不能够把她丢在路上叫喊，因此我把她送到她母亲那里，并且把我仅有的两个先令给她留下作为表示歉意的礼品。

我发现，我跌伤得很严重，我的膝盖的皮擦破了，并且流着血，但是我记得那个万分重要的点名，我跛行到車子的旁边，很困难地再度騎上車子，并且以我的擦破皮的和疼痛着的四肢所允許的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行駛。自然，当我到达阿契莫塔的时候，六点钟已经过了好久。由于那时所有的人都在礼拜堂里，我赶忙跑到我的床边，并且尽可能快的上床，我的耳朵倾听着脚步声，我的心和被敲的門环一样砰砰地跳着。

礼拜很快就结束了，舍监立即来到我的宿舍。我告诉他，我生病了并且尽力使自己显出生病的样子，但是他不是很容易說服的。他走开去找来了医生。医生发现我的体温正常，当他将要宣布我是装病的时候，我讓他們看我的伤口和擦破的地方。他們很勉强地允許我繼續躺在床上，因而我就能免于遭受舍监的几句痛罵，也逃掉了在一大片土地上除草的处罰。

我在阿契莫塔的时候，把許多空閑的时间用于除草和修理花园。事实上，这个校园今天的面貌主要还是由我和我当时的同學們修理的。在当时，校园里长滿了从来没有清除过的草丛，我們費了許多时间的非常辛勤的劳动才把它清除掉。我們有些人經常在假期中做这种工作，当时我們劳动的代价是每天一先令。这是我能够繼續留在学校里的唯一办法。

我在阿西莫塔的第三年时，我对于业余戏剧表演很感兴趣，并

且曾在一出名叫“科非到外国去”的小型戏剧中扮演主人公。剧本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学生到英国学医以及他在返乡行医时受到巫医們的阻碍。当一个巫师不能治愈一个患热病的人的时候，他們間的竞争状态发展到了頂点。人們請来了年輕的科非讓他碰一碰运气。当然，他医好了病人，这使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同时也向人民証明了，他的科学知識比迷信和巫术高明得多。

我对于部落的击鼓术和阿薩富的舞蹈很有兴趣，两者我都很喜欢，并且能表演得相当好。学校的芳蒂人和恩济馬人学生聚集在一起成立了阿薩富文工队。我們用了許多个晚上来自己娱乐并为围觀的人們表演。

尽管生活是丰富和活跃的，我們却没有忽視宗教。但是，在我到达阿契莫塔的时候，我已經在宗教問題上形成了不同于羅馬天主教會的我自己的想法。我坚决認為，做礼拜應該是自覺自願的事情，不應該是強制的，而且我不久就开始减少自己通常做礼拜的次数。这件事在監督我們宗教生活的人当中通常都引起了反应，我迅即被传唤到主教的面前，主教对我不合教規的作风提出警告。我十分坦白地向他說，我自己的信念就是如此，但是我将对这件事作更深刻的考虑。因此，虽然我不常去做弥撒，但我定时地在宿舍里进行默禱。这种行为使我的朋友們很生气，因为在默禱时我既不同他們談話也不听他們說話。

尽管我在紀律和宗教方面都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实例，但是在四年級时我却当了班长。在执行班长这个职务所需要做的各种工作时，我并没有遇到困难，因为同別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遇到困难，我发现他們都是抱着合作的态度，而且願意做我要求他們做的事。在这一时期，我对于演說的兴趣却日益增加。这是在

阿格雷死后不久开始的，当时我們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阿格雷学生会”来紀念他。这个会成了一个发表演說的場所，會員們經常准备演說稿来向其他會員发表。最后，它变成了一个辯論会。我十分喜欢这种辯論，而且总是不能自禁地要站在少数人那一边，无论我是否贊成他們的意見，因为我这样做会使辯論延长下去，而且使我有机会来发表那些否則我絕對不会想到的意見。我发现，我在开始时无論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結果我通常获得胜利，常常使許多反对我的意見的人改变态度，贊成我随便支持的观点。当时这对于我虽然只是一种游戏而已，但是却成为我最有价值的发现。如果没有这种“善辯的才能”，我的战斗在开始时就会失败，而且整个的斗争就会毫无成就。

我可能曾把对辯論的爱好扩大到阿格雷学生会的范围之外，帶到教室里去了，因为我記得，我的教师，监理会信徒赫伯特先生（现在是海明福德勋爵）曾不止一次地提醒我，我到阿契莫塔“是来受教育而不是来教育人的”。二十年后，当我有机会在阿契莫塔向学院的学生发表演說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赫伯特先生在离去了許多年以后已重新回到这个学校执教。当我的演說（题目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結束时，他走来向我祝賀，但是他以幽默的口吻說，虽然他必須承認他曾經教过我，而且他方才听見的話无疑是他給予我的基本知識的結果，但是他願意十分明确地表示，他对于我所表示的政治思想絕對不能負責！

回顧我在阿契莫塔的日子，我覺得那是我最快活的日子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日子是我曾經享受过的最后的安閑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可以沒有被扰乱之虞地讀我最喜歡讀的書，和我的朋友們在无穷无尽的各种問題上进行長時間的討論，或者在学



院周围的树林里闲步，独自思考問題。

1930年，我毕业了，我离开阿契莫塔的时间来到了。我鬱鬱地离开学院的校舍，嘴里仍然念着我們告别圣歌里的一句话：“四十个白天，四十个夜晚”。我的求学时代过去了，至少暂时是这样。进一步求学的斗争以及如何賺錢来达到进修目的的問題，直接摆在我的面前。我下定决心并且满怀信心，但是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当我向学院凝視的时候，好象有一块大石头塞在我的喉嚨里。

我重新振作起精神来。这不是感伤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同时我必須維持自己的生活。

尽管我在学院时同主教发生过意見上的分歧，却被派去担任艾耳明納天主教会初級学校的小学教师，我在那里教小学一年級。虽然我受过幼兒園教师的訓練，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較长时期地教授兒童，我很惊奇和感动地发现，孩子們跟我那末亲热。在放学之后，他們从来不急于离开我，我甚至經常在夜間同两三个孩子一起蹣跚在我的床上睡觉。起初他們的母亲时常到学校来，她們很担心，不知道他們到哪里去了，但是只要她們知道他們和我在一起，她們就十分高兴地把他們留下。

为了想改善教师們的境遇，我在艾耳明納时利用許多空闲时间去协助建立那里的教师联合会。我觉得，如果成立这种联合会的话，那将是改善教师們地位的最初步驟，使他們有办法来表达他們某些不滿情緒，并且使当局对此予以补救。

一年后，我升任阿克西姆天主教初級学校的首席教师。当我在那里任教的时候，我自己选讀了一些課程，以准备倫敦大学的入学考試，可是后来拉丁文和数学两課我没有考及格。这倒是一次很好的經驗，对于我后来必須通过林肯大学一年級的考試是很有

幫助的。我把讀書之余的空閒時間致力於組織恩濟馬文學協會和在阿克西姆地區成立一些掃盲協會，恩濟馬文學協會至今仍然存在。通過這一工作，我遇到了當時英屬西非國民大會秘書斯·魯·伍德先生。這個優秀的人物第一次引導我認識政治。他對於黃金海岸的政治歷史比我所遇到的任何其他人都知道得更多，我們在一起作了許多次長時間的談話。我告訴他，我決心設法到美國去。他完全支持我這種想法，並且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幫助我進入賓夕法尼亞州的林肯大學，這封介紹信現在我還保存着。

我在阿克西姆任教兩年後，就轉到艾耳明納附近的阿米薩諾的天主教神學院教書。這是一個新成立的學校，而且是天主教會第一次在黃金海岸成立這樣的學校來訓練自己的教士。我成為黃金海岸第一個被派去指導那些將從事這一偉大職業的青年人的初步學習的教師，這是一種榮譽。我認為，我在阿契莫塔時在宗教方面的任性行為一定已被寬恕了。他們可能認為這是最準確的吸引一只迷途羔羊返回羊群的办法，而從某方面來說，這一點是正確的。因為，作為這些初學青年的教師，我必須也遵守神學院的嚴格規則，因而我在阿米薩諾的生活是安靜和孤獨的。但是，同我過去反對清規戒律不同，我這時心甘情願地使自己服從這種規則，以致我變得幾乎很喜歡它。可能是由於嚴格地生活在這種宗教氣氛之中而使我的感情發生了變化，總之，的確是在神學院的這一時期中，我的宗教熱忱恢復到這種程度，以致我認真地產生了自己也要從事教士職業的想法。我希望成為耶穌會的一個牧師，而且這種想法存在於我的心中達一年之久。但是，奮發前進並且到美國進修的舊願望終於復活，並且在我的心中占了上風。我感覺到，如果我不是很快地採取行動，神學院的牆壁就會把我終身地關在裡面。

通过閱讀恩納姆迪·阿齐基韦在“非洲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我的民族主义大約也在那个时期恢复起来了。阿齐基韦是尼日利亚人，他的原籍是昂尼特夏。他本人是从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的。几年前他在阿克拉的黄金海岸教师联合会的一次會議上发表演說后我第一次会見他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他所感动，并且比以前下定更大的决心要前往美国。

当阿齐基韦忙于在黄金海岸鼓动新民族主义的事业的时候，塞拉勒窩內人华萊士·約翰遜由于組織了青年联盟而成为西非洲的第一个劳工組織者。很不幸，由于約翰遜写的一篇題为“非洲人有上帝嗎？”的文章（該文主要是关于意大利人在阿比西尼亚的暴行的报导）由阿齐基韦于1936年在“非洲晨报”上发表，他們两个人就被牽連到一桩危害治安的案件中。他們向西非法院上訴。以后又向枢密院提出上訴。但是，当他們的上訴被駁回的时候，他們就返回了各自的祖国。在上述一文中构成謀叛罪名基础的是以下几段話：

“就我个人来說，我相信欧洲人有一个他們所信仰的上帝，而且他們正在全非各地他們的教堂中替这个上帝行道。他們所信仰的上帝的名字叫做欺騙。他們所信仰的上帝的法律是：你們是強者，你們必須使弱者更弱。你們这些‘文明的’欧洲人，必須用机关枪来‘教化’‘野蛮的’非洲人。你們这些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必須用炸弹、毒气等来使非洲的异教徒改信基督教！”

“在殖民地中，欧洲人所信仰的上帝命令說，‘你們这些行政官員們要制訂危害治安法案来箝制非洲人的言論，制訂放逐法令以便把胆敢对你們的权威表示怀疑的非洲人放逐出



境。

“要制訂法令來奪取非洲人的金錢，使他們在經濟上不能自立。要制訂‘稅收法案’迫使非洲人繳納賦稅以供輸入失業的歐洲人來充當收稅的官吏。對於任何具有民族意識和鼓吹民族獨立的非洲人，要派遣密探在他們住宅的周圍看守，如果可能的話就用‘捏造的罪名’把他們逮捕，以便能夠把他們禁錮在監獄之中。”

雖然按照黃金海岸的法律這篇文章是妨害治安的，但是當時它至少是喚起黃金海岸人民的民族主義的一個嘗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歐洲人知道，非洲人對於歐洲人正在做的一切事情並不是閉着眼睛看不見的；它是最初的一縷煙火，它警告說，火已經被點起來了，它將成為永遠撲不滅的火焰。

### 第三章 美 国

1935年年初时，我明白如果我要到美国去的话，必须作更大的努力。虽然我已經把能够拿到的每一分钱都积蓄起来，但是旅費仍然不够。于是我想起有一位亲戚也許能够帮助我，他在几年以前已迁移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

我到拉各斯去。我不願意动用我那宝贵的儲蓄来付船費，就决定偷乘一艘从阿克西姆开往拉各斯的船。我混在水手群里溜上了船，整个旅程都和火伙們呆在一起，分享着他們的伙食，同他們一起忍受着鍋爐房里极度的悶热。这是我第一次坐海船，我从上船到下船一直暈得很厉害。因此到拉各斯的时候，我簡直不象一个人了。蓬头垢面、衣服襤褸不堪，好象我在一路上一直是在做工似的，所以船到拉各斯的时候，我没有受到盘問就上了岸。

这样一副髒相实在无法去見人。沒有办法，只好到市場上去买一条法兰絨褲子和一件衬衣。我躲在貨攤的一大堆衣服背后，急忙換上了新衣褲，把自己打扮得体面一些后再走出来。可是直到我到了我亲戚的家里才洗了臉，刮了鬍鬚。

我在拉各斯住了好几天，因为招待我的主人詳細地詢問我关于我們的許多亲戚朋友的景况。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亲切地給了我一些錢来补足我儲蓄不够的数目，还給了我回到阿克西姆去的

船費。我十分高興地向他道謝；我到美國去的願望終於可以實現了。

在這以前的幾個月，我曾經向林肯大學申請入學並已獲得准許，但是只有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兩個知己朋友才知道我的計劃。這時我極力設法完成各項安排。因為那時在黃金海岸沒有美國領事館，所以我必須先到英國去才能得到美國的簽證。由於我親戚的慷慨幫助，我得到了一百英鎊。另外一位親戚，恩薩厄姆的酋長，又給了我五十英鎊，我用這筆錢中的一部分買了從塔科拉第到利物浦的三等船票。從拉各斯回來後一個月之內，一切都已準備就緒，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動身的日子。

可是當我想到必須把我要離家的消息告訴我母親的時候，我的興奮情緒就低落下來。我知道她非常愛我，我離家出國將使她非常難過。因此我回家去和她一起住了幾天，但是直到我預定離開家的前一天晚上才鼓起勇氣向她說明。她顯然很震驚，但是沒有露出憂愁的樣子；我們倆通宵坐在一起談話。現在我已記不得那幾小時中我們所談論的全部內容，但是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母親仔細地一件件地告訴我在外時應該做的事情和應該避免做的事情。她還詳細地敘述了我祖先的歷史，幾百年前在我的祖先中首先遷移到恩濟馬來居住的是酋長阿杜庫·阿達伊，他的姊妹生了我母系的祖先。她還告訴我說，我有繼承我國兩個酋長職位的权利，那就是沃索菲阿斯的恩薩厄姆的酋長，和阿奧溫的達迪厄索的酋長。我把她所告訴我的一切都記錄下來，而且總是把它帶在身上，直到後來有一天這份記錄被我丟失在紐約的一條地下鐵道里。

第二天早晨，我把我仅有的幾件行裝放進一只小划子里，我準備乘着它渡過安科布拉河前往塔科拉第，這是我的第一段路程。



我朝上游望去，混浊的河水在打着漩涡，渐渐地消失在一大片丛树中，这时我看见我们村里的妇女和孩子们站在水深及膝的河里，默默地在洗澡或洗衣服。看到这样一幅非洲乡村生活的和平景象，我初次感到了思乡的痛苦。当我重新回到岸上的时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勉强地微笑着，向我母亲作最后一次告别。那时我看见她在流泪。虽然她竭力隐藏她的感情，但是这次最后的告别确是使她太难受了。我自己含着眼泪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我留下来的话，她只要说出来就是了。她站着不动，望着我有几分钟，她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求上帝和祖先来指导你吧。”

就这样，我和母亲怀着沉重的心情，互相挥手告别，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要在十二年之后才能够再见面。

在塔科拉第，我踏上“阿帕帕号”摩托船，被领到一个三等舱位。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感到孤独极了，坐在铺位上几乎要哭出来。但是，真凑巧，我忽然看见床上有一封电报。打开一看，是恩纳姆迪·阿齐基韦寄给我的，上面写着：“再见。记住要相信上帝和你自己。”这个电报来得这么巧，使我马上高兴起来。我开始一一回想自己所遇到的幸运的事情，并且提醒自己说，这就是我一向在计划并且节衣缩食所要达到的目的将得到实现的开始。

一路平安无事，只是遇到了一件难以忘记的事。我偶然认识了一位印度旅客，当船开到加那利群岛时，他邀我上岸到首府拉斯帕耳马斯去玩一下。我欣然同意，两人一起进了城。由于我对于祖国以外其他地方的生活一无所知，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他走进了一所旅馆似的房子。我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虽然我只要一杯开水——过去我只喝过开水——他却一定要向一个在暗处徘徊的老妇人要啤酒。啤酒拿来后即刻来了两个穿着睡衣的漂亮的西

班牙女郎。我把眼睛盯在桌子腿上，而且心里祈祷着，她們赶紧办完事，并且和她来的时候那样迅速地走开。但是使我极为恐惧和窘迫的是，其中一个人竟走过来坐在我膝上，而且开始摸我的头发和抱住我。过去我只是远远地看白种女人，现在一个白种女人这样接近我，使我完全不知所措。我大叫一声，跳起身来，把女人和啤酒都摔倒在地板上，踉跄地拚命跑回船上去。我那位印度朋友感到这件事非常有趣，他后来在船上不断利用这件事来开玩笑。

当船只到达利物浦的时候，乔治·格兰特<sup>①</sup>的代表、一个恩济馬的木材商人来迎接我。最初一个星期我住在旅館里，然后我前往倫敦去办理我赴美的护照簽證。这时我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和智穷力竭，我开始怀疑是否干脆放弃整个计划回家去更好些。但是，正当我对前途特别感到沮丧的时候，我听见一个情緒激动的报童（当他从一輛运貨車上拿下一捆刚出版的报纸的时候）叫喊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話，在广告牌上写着：“墨索里尼侵犯埃塞俄比亚”。我一切都明白了。那时我似乎感到整个倫敦突然向我个人宣战。在以后的几分鐘之內我什么事都不能作，只是盯着每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猜想那些人是否会理解殖民主义的坏处，并且默祷使我能够尽力参加摧毁殖民制度的斗争的日子早日来临。我的民族主义感情激发起来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准备而且願意尽一切力量来达到我这个目标。

我回到利物浦时，那位木材代理商邀請我同他和他的妻子住

<sup>①</sup> 乔治·格兰特是“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第一任主席，他被人們亲热地称为格兰特“老爹”和“黄金海岸政治之父”，他长期从事公众事业，貢獻卓越，他在1956年10月死于阿克西姆，享寿七十八岁。我在他临终前见到他。他那时脸上的表情和他努力要从病床上坐起拥抱我的举动使我深受感动。他已死了，现在我明白他那种姿势的意思是表示他能够活着听到宣布加納独立的日期而感到的欣慰。

在一起，他們俩都热情地招待和欢迎我，使我的苦恼減輕了一些。同时我也逐渐認識到西方世界的风俗习惯和我本国有很大的差别。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一面吃晚饭一面谈话的时候，那妇人对他的丈夫說：“呀，你別那么蠢了！”我吃惊得眉毛都豎起来了，焦急不安地等待丈夫回罵。但是他絲毫也沒有生气，繼續談着話。在非洲如果一个女人对他丈夫說“別那么蠢”的話，它所引起的后果是我不敢想象的。这样的話当时就可能被提出作为离婚的根据。当然，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今天我国的妇女可以沒有保留地說出她心里的想法，而她們的丈夫也只有听任她去說了。

在利物浦停留了两星期后，我趁坐丘納德白星輪船公司的一只輪船，启程前赴美国。这次旅途比上次从塔科拉第到利物浦时好得多，因为我交了好几位朋友。有一位朋友是一位荷兰青年，他那时是要到哈佛神学院去完成他的神学学业，后来他在整个留美时期中，一直都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有一次我們一同到紐約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教堂去做礼拜，那是我所見到的最大的黑人教堂之一。在那个礼拜天，那个教堂里挤滿了人，我們挤不进去，只得进入同大教堂相連的一个附屬教堂里去，那里另外一个黑人牧师在講道。他有声有色地向我們講述耶穌怎样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髑髏地的故事。过了一会，那个集会上的妇女們都深深地为他的話所感动，并且开始哭泣和叫喊：“那是耶穌哪！发发慈悲吧！阿利路亚！”那个教堂里当时的喧吵声一定和几百年前耶路撒冷的人群是一样的。

这种情况是令人很窘的。这里被一位欧洲人看到了黑人所做的一次极不庄严的礼拜。当我们离开教堂的时候，我开始为此向他表示歉意，但是他对我的抱歉感到很奇怪，反而誠心誠意地說，



这是他在任何教堂里所未见过的最美好的情景。他还說，如果其他教派也能够用这种方法做礼拜的話，那末它們的信徒就会增加了。那时我反而对他感到奇怪了，而且我相信正是这位青年人使我对神学感到兴趣。

我在将近 10 月底的时候到达紐約。倫敦和利物浦的經驗为我的赴美之行作了准备，否則我想由于过慣了我故乡的和平和安静的生活，紐約的那种使人震惊的情况会把我吓死的。我所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目瞪口呆。在那个花花世界里，我要化費很长的時間集中注意力来看一件东西，然后才能弄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感到那些高楼大厦把我团团围住了，那些大厦那么高，一定碰到天頂了。我感到永无休止的人流在把我冲过来、冲过去。我感到每次我想横过馬路的时候，总好象有成百的不耐煩的汽車駕駛人在向我揷喇叭。但是我却不感到孤独，也不感到害怕，因为我有一种惊险、激动和欢乐的感觉，仿佛我不知不覺地走上了正在演出輕松歌劇的舞台。

我在紐約，一个人也不認識，只是曾經同一位已从林肯大学毕业的塞拉勒窩內人通过信。他不知道我已經来到紐約，所以我自己雇了一輛出租汽車，叫司机开到他最后一次来信中給我的地址。幸好他那时正在家里，而且很热情地接待我。在哈列姆区我立刻就感到非常习惯，有时我真难以相信那个地方不是阿克拉。我非常喜欢再住几天，但是我只能呆两天。我的日程已經差不多迟了两个月，学期已經开始了，我急于要赶到林肯大学去开始讀書。在黄金海岸和在利物浦时我曾两次写信給林肯大学教务长申述我迟到的原因，但是只有等到我报到并且被批准入学之后我才能安心。

1854 年創办的林肯大学是美国第一个为黑人設立的高等教

育机构。它訓練黑人学生在美国黑人居民里进行工作和担任领导。这个理想及其实现，是长老会牧师約翰·米勒·迪基和他的教友会的妻子薩勒·克雷森·迪基所作的重大努力的直接产物。

我到达林肯大学的时候，我口袋里所有的錢总共只等于四十英鎊，一张二級教师的證書，和斯·魯·伍德先生写的一封信。我去見了教务长，說明我經濟困难的情况，說明我总共只有四十鎊錢，但是我准备做工来賺取我讀大学时所需的費用。他沒有馬上表示同意——他以前听到同样的話的次数无疑已經太多了——但是如果不收我，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我送回黄金海岸，而由于他心腸太軟，因此不会采取这种手段，于是他終於准許我入学。

我被列为試讀生，它的条件是，如果我在最近一次考試中成績优良的話，将被准許进入一年級。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我已經比其他学生迟到了两个月，但是經過了很大的努力之后，我参加考試，并且获得了奖学金。林肯大学規模很小；爭取学籍的競争是激烈的，我們大家都明白，偷懶的人是沒有容身之地的。学校的設備只能容納約二百名学生，因此誰的成績經常比二等还要差得多的話，就会被勒令退学，以便讓位給申請入学名单中下一个可能更自覺的申請者。被列为一等生或二等生的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那就是說每个学期学校可以补助他一笔學費。我很幸运地总是被列为一等生或二等生，因此我在林肯大学攻讀的全部时期，都得到奖学金的补助。虽然这只能补助我的費用的一部份，但是它对我是极其重要的。

当时有两种賺錢的机会是只限于給予奖学金获得者的。我們可以到圖書館当助理員或者到飯厅里当招待員。我碰巧得到了圖書館里的工作，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实际上当时無論怎

样令人厌烦的工作，我都会努力去做的。

后来，当我们的社会与经济学讲师为我们指定许多课外读物，叫我们去阅读并做报告的时候，我找到了另外一种赚钱的职业。有许多学生很害怕这种报告而且不愿意用他们的空闲时间来写报告。我当时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填满自己的钱袋，于是就从事替他们写报告，每次一块美金。我用这种办法赚了不少零用钱。

那时我仍旧很喜欢演讲，在一年级时我参加了一年级学生的演讲比赛，我获得第二名，并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很不凑巧，这枚金质奖章被我所认识的、但是很少有时间和她們在一起玩的许多女孩子中的一位拿去做纪念品了。另一女孩子拿走了我的大学生联谊会会的别针。那是林肯大学菲·贝塔·西格马学生联谊会会的徽章，该会的口号是“文化为人类服务”。做该会会员要经过令人厌恶的入会式，但在这之后他们却没有留下其他更有永久性的作为会员的标志，这使我感到很奇怪。在我的记忆中那次入会式就是长时间地忍受折磨和耻辱，我最忘不了的时刻就是他们象猎犬追赶狐狸似的把我追到田野里，我被他们抓住了，当众扒去我的长裤，把我打了一顿，然后绑住了眼睛把我推过一座篱笆墙。我必须承认这场考验差一点把我征服了。我想最能够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莫过于痛苦和困难了，因为一旦你通过了那种考验，你就加入了一个伟大的联谊会。我后来也加入了互济会，成为第三十二级的会员，我在美国整个时间都保持这种会员身份。

我和同学们相处，从未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而当他们选举我作为班上“最有趣”的同学，并把这事载入本班1939年纪念册时，我非常感动而且感到十分荣幸。

1939年我从林肯大学毕业，取得文科学士学位，主修的是经



济学和社会学。但是我不能马上取得学位，因为我还欠学校一些钱。我原来打算离开林肯大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系，但是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使我办不到，至少暂时办不到这件事。我又一次意气消沉下来了，但是正当我的前途看来最黑暗的时候，我收到了林肯大学神学与哲学教授约翰逊博士的来信，他邀请我回到林肯大学去当哲学助教。这是一个很大的光荣，但是这和我的计划是不符合的。然而实际上我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根据我所持的学生护照的规定，我不能在冬季“离开学校”。我坐下来思考了一番。这个邀请的确是在最恰当的时刻来到的。我当时正在穷极潦倒。那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安排。我终于接受了这个邀请，于是，在那年秋季，我作为哲学助教回到了林肯大学。

当了哲学助教之后，我发现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而这个工作并没有占去我的全部时间。按照我的想法，我必须每天二十四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很忙，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我利用空闲时间来阅读我能得到的关于现代哲学的每一本书。我阅读了康德、黑格尔、笛卡儿、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和其他人的著作之后，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正确性：法学、医学和艺术是学问的四肢，而哲学是头脑。

那年较后时期，我进入了林肯神学院，同时接洽好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学习哲学和教育，以获取硕士学位。同年七月间，我获悉华盛顿长老会发给我一百美元的奖学金。这真是好消息，而且来得真是时候，因为我可以用这笔钱缴纳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所读某些课程的学费。

1942年我在林肯大学神学院毕业，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列为全班第一名。按照惯例，在那年神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的责

任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选的題目是：“埃塞俄比亚将求助于上帝……”。那是未經准备而临时发表的一篇演說，我有点担心它不会成功。但是当演說完毕、教授們和毕业生們涌上前来同我热烈握手的时候，我知道他們是很欣賞这篇演說的。

在同一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教育碩士学位。那时候我已經担任了哲学、第一年希腊文和黑人历史的正式講師。黑人历史是一門很受欢迎的課程，教室里經常坐滿了人。我的听众表现出很喜欢听这門課程，我在同样的程度上也喜欢講这門課程。我喜欢的另一門課是社会哲学；这也吸引了許多学生来听我的課。然而我始終認為自己只是一个新手，因此在1945年，就是当我离开美国的那年，林肯大学的“林肯人”杂志給了我一个荣誉，把我选为“該年最优秀的教授”，这是一件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意外之事。

1948年2月，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哲学的文科碩士学位，在那里我是在小埃德加·辛格尔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的。随后我就开始准备参加哲学博士的考試。除了講課和研究外，我必須从林肯大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每星期往返三次，距离五十多英里，尽管如此，我努力在两年之內念完了考博士学位应讀的几門課程和通过了初試。我为了取得博士学位唯一还要作的事就是写論文了。

但是那时还有另一件事需要我付出精力去做。为了糊口，我在切斯特的太阳造船公司担任計数員，不論天气怎样坏，我每天从午夜十二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在那里作工。天气冷得那样厉害，有几次我的手差点冻在鋼上，而且虽然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但是仍然冷彻骨髓。我通常在早晨八点鐘回到住处，吃早飯，睡几小时觉，然后就开始为写我的論文搜集材料。

有一天早晨回家后，我照例吃了早飯，然后去睡觉，但是直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才醒过来，大约睡了十八小时。当我的几个朋友来叫我一同去船塢工作的时候，我的房东太太来敲我的房门，她没有得到回答，认为我已经走了。显然我是筋疲力竭了。不久我就得了肺炎。

那是一个严寒的晚上，我比平时更厉害地战慄着。到清晨四点钟，我感到非常难过，简直支持不下去了。我去看公司的医生，问他是否可以准我请假。我觉得只要能够回到家里去睡觉就不会生病了。但是医生给我试过体温之后，立刻就把救护车叫来，急忙把我送到切斯特医院。医院把我放在痒气室里，认为我的情况很危急。尽管如此，我一点都没有失去知觉，我的头脑是完全镇定和清醒的。当我卧病在床的时候，我终于找到时间来适当地回顾一下我的生活。那时我看到，象过去那样继续挣扎下去。企图利用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是愚蠢的事。此外，也许是因为我认识到我曾经多么接近于死亡，我当时希望和我母亲重新会面的愿望超过一切。在我能够起床的时候，我下定决心尽可能早地离开美国回家去。



---

## 第四章 艰苦的时期

我在美国的十年是愉快和不平静的，同时也是非常紧张的。如果那时我能够用全部时间来读书，那末生活就会舒适得多了。但事实是，我那时经常需要钱，因而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生活。

在林肯大学中第一个暑假到来时，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按照规定，学期终了时学生一概不能留在学校里。我到纽约去和一位塞拉勒窝内的朋友一起住在哈列姆区里。他的景况也不比我好一些，我们两个人立刻计划如何去找工作。我们自己以为找到了聪明办法。我们每天清早到鸡鱼市场以批发价格买进一批鱼，然后整天在街角上去售卖。我干这个工作特别不舒服，因为我对于鱼似乎有一种特别反应。虽然我的两臂、后来我的全身都布满了发痒的疹子，但是只要能赚到一点钱，我就会甘心坚持干下去。但是，干了两个星期之后，很清楚，我原来有的一点钱都快要赔光了，于是我决心不再作这种工作。这事在我们两人之间引起了一场争吵，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因为这样我不仅失去了工作，而且失去了住处。

我在哈列姆区第七号街徘徊，心里在寻思着我今后要到那里去住，这时我突然遇到了林肯大学的一个同学，他是英属圭亚那德

默腊勒（即佐治敦——譯者）地方的人。我把我的困难告诉他：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地方住。他安慰我說，“老兄；別发愁，我想首先我可以解决住的問題。”他解釋說，他認識一家西印度群島的人，他們非常善良和有同情心，而且如果他到他們家里把我的情况告訴他們的話，他們也許會幫助我。果真如此，当我講完我的經歷的時候，那家的婦女們眼睛里充滿了眼淚，讓我住在他們家里空着的一个小房間里，还告訴我不要担心房租，可以等我找到了工作之后再付。

通过这家一位做医生的朋友，我認識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位女朋友。她名叫伊迪思，是哈列姆医院的护士。我一定使她大失所望。我簡直一文不名，因此，除了带她去散散步和觀賞商店櫥窗之外，我不能使她得到别的娱乐。我一定使她有点厌烦了，因为那时我喜欢站在街头上听听馬路演說家的演講。我很高兴在傍晚时在那里靜靜地听，或者更为經常地向他們挑起辯論。可怜的伊迪思！她十分喜爱跳舞、看电影和生活中欢乐的事物。因此，她漸漸地离开我了，这是不奇怪的。

就在这时期，我在一家肥皂厂找到了工作。我想每天工作完毕时身上一定会散出玫瑰花或忍冬花的香味，但事实全非如此。它是我所做过的最骯髒和最討厭的工作。运貨汽車把各种动物的腐烂的内脏和脂肪全都堆卸在場地上。我拿着一把大叉，尽量把这些臭气熏人、令人作呕的东西装在一輛手推車上，然后一車一車地运到加工厂房里去。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是愈来愈能够忍受这种臭气，却反而时时刻刻地要极力掙扎着不讓自己呕吐起来。

两个星期之后，我自己几乎变成了做肥皂的好材料。做了一天工之后，我的四肢痛得那样厉害，每晚我必需用藥膏塗擦之后才

能够入睡，以恢复足够的体力来应付第二天的工作。我有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坚决地劝我不要再做这种工作。他说，如果我继续做下去的话，我一定不能完成我在美国的学业。

我接受他的劝告，开始寻找另外的工作。那时在美国找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时美国刚刚摆脱经济萧条。一部分人的生活非常困难，我有时看见男人和女人从垃圾箱里去捡食物的渣滓。事实上，要不是我的房东太太仁慈为怀的话，我也会落到和他们一样的地步。

由于我没有能够找到工作的好运气，我于是决定到船上去工作。为达到这个目标，我加入了全国海员工会，那是属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一个工会，产联在当时是美国最活跃的工会组织之一。因为在纽约就业的竞争太厉害，我就到竞争比较小的费拉德尔菲亚城去。在那里，我很幸运地在“肖尼号”轮船上找到了一个工作，这艘船是航行于纽约和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之间的克莱德·米洛里航运公司的船只。

从此以后，一直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我每年夏天都设法找到船上的工作。当我第一次申请工作的时候，那家航运公司的负责人员突然问我，“小伙子，你会侍候人吗？”我起先以为他要求我延期申请工作，当我犹豫着没有回答的时候，他提高声音说：“怎么，说呀！你会当侍者吗？”我害怕被拒绝，就肯定地告诉他我会当侍者。于是我就被派到船上当侍者去了。

我穿上了侍者的漂亮的制服。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来到了。餐厅里开始坐满了客人，侍者组长吩咐我，“去干活吧！”我感到象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毫无办法地在厨房里四下观看，想找一个人来给我做一个榜样。但是我却说过我会当侍者的呀！组长向我瞪着



眼大声嚷：“啊，把湯端进去！”我嘴里咕嚕着“湯，湯！”，并到处找湯。我找到了湯，但是我使自己完全漏了底，我把湯盛在一个平底的盘子里了。我一直沒有发现这一点，直到我小心翼翼地吧湯端进餐厅，把盘子里所盛的很少的湯放在我所看見的桌上沒有东西的第一个客人面前。我非常急于回到厨房去搬第二盘湯，因此沒有注意旅客們驚訝的脸色。但是当我回到厨房里，我发现侍者組长几乎要揍我一頓。他抓住我的衣領来回地搖我。他質問我，为什么我敢說会当侍者。当我喘过气来时，我連連道歉，恳求他不要对我太严厉，因为我实在非常需要做工。幸而他的面孔虽然是非常严肃而呆板，但是他却有着—付很軟的心腸。他連忙讓另外一个人穿上我的制服，并吩咐我在这次航程的其余時間中洗瓶罐。洗瓶罐是一种索然乏味的工作，但至少它不需要有什么工作經驗。后来我被提升做洗碟子工作。我非常小心地干洗碟子的工作，但是有一天，我从那个巨大的蒸碟子的蒸气装置里拿碟子的时候，有一个碟子破了，我的手被割破得很深，直到今天手上还留着一个疤。

我学会了一些关于餐厅的日常工作和各种食品的名称，在第二次的航程中，我被提升为职员食堂的侍者。职员們远沒有客人那样难侍候，所以我在被支使了一陣后，很快就摸到了这个差使的規律。最后我搞到了最美好的差使，那就是客艙的侍者。人們都想做这份工作，因为小費很多，并且穿一套漂亮的制服，还有一頂礼帽。但是，这份工作有时候也令人很窘。有一天有一个房間的电鈴响了。我敲門后，有一个妇女的声音叫我进去。我推开門，看見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几乎全身赤裸地躺在床上。我大吃一惊，沒等她說話就連忙退出来。电鈴又响了。当时我的黑脸仍然羞得通

紅，我再一次去敲門。這位婦女以帶笑的声音說我可以進去，說我不用害怕，一切都料理妥当了。我走進房間，一雙眼睛直直地望着地板，听候她的吩咐。当我听从她的要求抬起眼睛看她的时候，她已經把身体盖起来了。

这种生活对我是一种新的經驗。我对水手們的生活习惯毫无所知，有时听到他們談論的話和看到他們中間經常传看的色情書报，我十分驚訝。我們的船在南美洲各港口停泊时，他們总是劝我上岸去。有时我跟着他們一起去，只是为了消遣，同时为了不致使他們把我看作一个奇怪的人。但是在我經過拉斯帕耳馬斯的經歷之后，我对这种消遣就一直比較小心謹慎。不过我确是遇到了一個法国女人，她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人，每次船开到墨西哥的时候，我总是去看她。但是不知怎么的，她認為我曾經答应和她結婚。这也許是語言隔膜而引起的誤会。不管怎样，为了免得同她爭論，我向她說下次船来时我将长期住下去。我和水手們生活在一起不是沒有付出代价的！

当战争爆发而我的海員生活結束的时候，我的确很难过，因为除了那些輕松有趣的生活以外，工資很不錯，而且我們每天保證能吃到三頓飽餐。

在另一方面，除了船員之間存在的友爱之外，我时常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这不是由于缺少同伴，而是感到沒有人关心自己。有許多次当我走在維拉克魯斯或其他外国城市的街道上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很可能有人袭击我并把我杀死，而沒有人会十分想念我。我想人們甚至不会去設法弄清楚被杀的人就是我。

我也得到了这样的經驗：在我故乡非洲夜間露宿，虽然有蚊子咬人，却要比在美国城市中露宿舒服多了。我第一次和一个同学

一起到費拉德尔非亚城的时候，两人都沒有錢寄宿。因为沒有地方可去，我俩就走向火車站，坐在一条板凳上，想在那兒过夜。我們沒有考虑到在美国处处都有警察。半夜时分，我們从睡乡中猛然被警察搖醒，听到他用坚决但是并非不和气的声調說，“走开，小伙子，你們不許在这兒睡觉。”

当时我們四肢酸痛，眼睛困倦得睜不开，我們觉得这是我們受到的最残酷的待遇了。我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火車站，徬徨地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很幸运，这个公园不象倫敦的公园那样，大門沒有鎖着。我們找到了两条长凳，以为可以安然睡到天明。但是命运还是不济，我們刚闔上眼就下起雨来了。雨下得非常大，我們只有放弃我們的临时床舖，剩下的几小时黑夜一直同别的流浪者一起站在門道里躲雨。

自从那次以后，我想出了一个度过下雨的夜晚的办法。在紐約，有一天晚上，我被人从房間里赶了出来而且身上只有两毛五分錢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个办法。在白天，住的問題似乎不感到那么严重，但是当黑夜来临，街上只剩下象我这样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时，完全是另一种情景了。那时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用一个硬币买了一张地下鉄路的车票，坐上一輛来往于哈列姆区和布魯克林区之間的火車。我憑这张票整夜来回坐在火車上，尽我的可能去睡觉。在这一夜晚，我当然是很不安定的，因为每当火車到达終点的时候，我必須走出来換一节車箱，以免警卫看到我在同一个車箱里時間太久而发生怀疑。

貧穷和需求驅使人做出奇怪的事情来。我因为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同时因为可以得到一晚上的免費娱乐，我就时常去参加各种黑人的传教会和复兴派的集会。我唯一認真参加的是迪伐因神



父所领导的运动，而那只是因为加入这个运动可以得到一些特别的好处。我发现，当了迪伐因神父的信徒，就能够化五毛钱吃一顿有鸡的饭，而在别的饭馆里，一般要化两块或三块美金，还可以在某一家理发店化一毛钱而不是一块钱理一次发。对于一个穷困的学生来说，这足以引诱他来参加任何运动了，而我只要把手举在头上面，低声祝祷“和平”，就能够廉价吃饭和理发，那末我就不去关心迪伐因神父教派的动机如何了。

然而我确曾想到过一个念头。加入这个会有一个条件，就是谁都不准结婚，因为他已经和教会“结合”了。如果一对夫妇在加入迪伐因神父的教会之前，已经依法结了婚，那末他们只能在名义上保持结婚。我怀疑这可能是某些白种美国人出钱支持的消灭黑人的运动，因为除了关于结婚的禁例之外，我从没有看到任何人捐过钱，但是它从来不缺少经费。不管怎样，我当时对于迪伐因神父的恩惠，真是很感激。

我在林肯大学神学院攻读神学的时候，我用了很大部份空闲时间在黑人教堂里讲道。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被约定在某个教堂讲道，而且我很喜欢这样做。我从这里认识了許多朋友，因为黑人教堂比其他大多数礼拜场所更多地起着社会活动中心的作用。在费拉德尔非亚城一个浸礼教会的教堂讲道之后，我被介绍认识了波霞和她的妹妹罗曼娜。她们请我到她们家里去吃饭，从那时起，我们三人中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但是波霞成了我特别接近的朋友。她十分慷慨，有许多次当我没有钱的时候她给我零用钱。她教我懂得了什么叫“荷兰人请客”，那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均摊费用。我确实不配有这样一个钟情的女朋友，因为我依旧谨慎地对她很冷淡。我总是很愿意和她见面，但是我从未希望我们的

友誼发展成任何永久性的东西。我时常奇怪，波霞怎样能够长久地不离开我。也许她相信即使是最顽固的男人最后也会屈服。我记得有一天我想，她一定很懂心理学。我曾偶然同另外一个女孩子建立了平常的友誼，我第二次遇见她的时候我正要到波霞家去吃饭。我到达波霞家的时候，竭力做出没有事和平静的样子，波霞朝我看了一下，就责备我“欺騙”了她（她是这样说的）。我否认，但是她坚持这样说，她还说她甚至敢断定就在那天晚上我曾拥抱过另外一个女孩子。我想要瞒住她这个千里眼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坦白说出的确有一个女孩子曾吻过我，但是那没有什么，事实就是如此。于是她得意地说，“如果你现在先去把你领子上的口红洗掉，也许是合适的。”

很不幸，我愿意和妇女来往的事实，使得从外表看我的生活的人对我产生了许多误会。我从来不願意同一位妇女发生十分亲密的关系，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给予她足够的关切，因而不管是否她已经同我结婚，她迟早会渐渐地离开我。同时我也害怕，如果我讓一个妇女在我的生活中占据太重要的地位，我将渐渐地失去我生活的目标。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我的这种态度，曾有許多人把我說成是风流蕩子，一个没有性能的男子，甚至是閹人！但是了解我的人們認為我是很正常的，也許只是比平常人更能約束自己而已。

我住在費拉德尔非亚城时，我从宗教、社会和經濟的角度对黑人生活进行了紧张的調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长老教会交給我的，我为此仅在費拉德尔非亚一地就訪問了六百多个黑人家庭，在日耳曼鎮和里丁也訪問了許多黑人家庭。我非常喜欢这种工作，它使我了解美国的种族問題，而在南方，种族問題尤其严重。当我

把这种种族隔离的情况同美国的现代化和进步情况加以比較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我很清楚地記得我在梅森—迪克逊南北分界綫以南第一次遭到实际的种族隔离待遇的情况。那次我坐公共汽車从費拉德尔非亚城到华盛顿去做一次講演，汽車中途在巴尔的摩停下来讓旅客休息一下。我渴极了，我走进車站的休息室，向一个美国白人侍者討一杯水喝。他皺起眉头斜着眼睛瞧我，好象我是一个髒东西似的。他說，“喂，你喝水的地方是外面的痰盂”，他就这样地把我赶走了。我吃惊得不知所措。我站在那里直着眼睛望着他，因为我不能相信竟会有人拒絕給人一杯水喝，只是因为那个人的皮肤顏色不同。我在公共汽車、飯館和其他公共場所里曾經受到过种族隔离的歧視待遇，然而我觉得这次是太过份了。但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低着头，以我認為最庄严的态度走出来。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时候，我帮助成立了該校的一个非洲研究小組。我在那里又开始組織美国与加拿大的非洲学生协会。这实际上就是我在美国的政治活动的开端。我刚到美国时，这个会只是很少数非洲学生的一个集会，他們偶然聚会，但是因为缺乏組織性，沒有足够的力量来取得任何实际的成就。我作了一些安排，使得这个組織不仅接納学生，而且也接納在美国做其他工作的非洲人。我用这个方法把他們都聚集在一起。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当选为主席，后来我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我去英国的时候为止。

由于非洲同学的帮助，特别是阿科·阿杰伊（現在任我政府的內政部长）<sup>⊖</sup>和琼斯·夸特（現在阿契莫塔学院的附屬学校任职）

<sup>⊖</sup> 阿科·阿杰伊在 1957 年 11 月內閣改組后任司法部长，1959 年 1 月和 4 月改組后的內閣里任外交部长兼几內亚駐节部长。——譯者



的帮助，我设法出版了这个协会的机关刊物，名为“非洲讲解员”。我们通过这个刊物努力恢复民族主义的精神。

事情绝非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不断遇到尼日利亚会员和黄金海岸会员之间的内部冲突。尼日利亚人认为，在处于殖民地附属国地位的现阶段中，不能考虑全非或西非统一的问题，他们坚决主张我们应该让这些属地各自进行斗争，每个属地自己尽力去求得自己的解放，而不要同其他属地进行任何联系或合作。在另一方面，我和黄金海岸的学生们则深信，一个属地解放的问题——也就是说，由每个属地拟定和计划它自己的解放运动是没有希望取得最后成功的，除非把它和西非洲其他属地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我们相信，除非一个属地的自由运动最后和解放整个非洲大陆的泛非运动联系起来，否则非洲人和世界各地的非洲人的后裔都没有希望获得自由和平等。

西非洲统一的主张，后来变成了非洲学生协会公认的哲学观点，我当然是热烈拥护这个主张的。我们指导学生说，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土时，他们应该进行艰苦的政治工作，把各别的地区组织起来，而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他们应该同他们国内的政治活动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要用这种方法在他们自己国内保持统一，而且也要为西非洲各个地区之间的统一铺平道路。

当时我对于美国两种社会学的思想派系感到兴趣，一派是以福莱塞教授为首的霍华德派社会学家，另一派是以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赫斯寇维茨为首的社会学家。霍华德派认为在美国的黑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同非洲的文化联系，赫斯寇维茨所代表的另一派认为非洲人的遗风在美国仍然存在，而且美国黑人绝没有失去同非洲大陆的文化联系。我当时拥护，现在也仍然拥护后一

种观点，有一次我曾到霍华德大学去为这种观点进行辩护。

除了我上面已經談到的那些学术工作和各种活动以外，我利用時間尽可能地去了解美国的政治团体。其中包括共和党、民主党、共产党和托洛斯基派。关于托派运动，我曾会见它的领导人之一，克·勒·魯·詹姆士先生，我通过他学到了地下运动如何进行工作。我也同非洲事务委员会、非洲委员会、战争与和平目标委员会、非洲学生委员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调查研究特别委员会以及城市人联盟等等团体有过接触。我的目的是学习組織工作的技术。我知道当我最后回到黄金海岸时，我将遇到这个问题。我知道，不論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殖民地问题的方案，它的成功都是取决于所采取的組織形式。我集中注意于寻找一个能够解决全部殖民地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的方案。我閱讀了黑格尔、卡尔·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瑪志尼的著作。他們的著作对于我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馬克思和列宁对我的影响特别深，因为我确信他們的哲学能够解决那些问题。但是我想，在我讀过的一切書籍中，最能够激发我的热情的一本書，就是“馬庫斯·加尔維的哲学和思想”（1923年出版）。由于他的“非洲人的非洲”的哲学和“回到非洲去”的运动，加尔維在二十年代美国的黑人中間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南方的美国白人支持加尔維的运动，这点是有些諷刺性的。他們支持加尔維，并不是因为他們对于黑人的解放运动感到兴趣，而是因为他們想把黑人从南方赶走，而且認為这种办法会解决黑人问题。不幸我始終沒有能够同加尔維見面，因为他在我到达美国之前，由于被牽連在某种所謂欺騙案件之中而被美国驅逐出境了。他后来到了英国，1940年在那里逝世。

为了把自己在参加各种团体时所获得的某些經驗和哲学思想

写出来，并且为了在对付殖民地问题时能够最有效地运用这些经验和哲学思想起见，我开始写一本小册子，它后来题名为“争取殖民地自由的道路”。虽然初稿是在美国写就的，但是直到后来我在伦敦时才凑足了钱出版这本小册子。

我在简短的序言里说明我的观点是“不妥协地反对一切殖民政策”，并提出了以下的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

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殖民地人民的处境就是遭受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帝国主义国家需要殖民地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它们通过垄断资本的控制体系，消灭了当地的竞争，并利用殖民地作为倾销他们剩余的大量生产的货物的场所。为了使自己对殖民地的统治合法化，帝国主义国家硬说它们正在增进当地人民的福利。这种说法只是一种伪装，用来掩饰它们为经济需要而进行剥削的实际目的。非洲人民必需进行不断的斗争使自己摆脱这种剥削。

殖民国家的全部政策就是使当地人民继续处于原始状态并且使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殖民国家。殖民国家为了保证以更大的效率在当地加工处理殖民地的资源，它们发放贷款和进行投资，来改善内部交通和社会服务事业，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改善当地人的生活。那些巨大的企业联营组织施行着严格的垄断控制，有效地阻止了当地人分享资本主义利润，但是如果沒有当地人的劳动，这种利润却是不可能获得的。殖民地的全部历史都证明，它们只是帝国主义国家手中的工具而已，帝国主义国家互相竞争来夺取未开发的资源。这种情况使当地人民遭受经济奴役并且降低了他们的地位，当地人民



必需把自己从这种情况中解放出来。

一个屬地在被統治时无論是叫做殖民地、保护国或者托管地，那都是永远維持經濟剝削的帝国主义計劃的一部分。各殖民地不可能从它們所处的从屬的地位中得到任何好处；它們的社会进步和技术进步受到了阻碍；它們为了取得反对侵略的名义上的保护，在战时却必須为宗主国提供軍隊，而且，它們的政治自由永远不会自动地給予它們，必須由它們自己努力爭取才能得到。英国可以硬說它只是在这些殖民地能够进行自治之前受托管理，但是事实上如果英国放弃它对于殖民地的控制，却是不符合英国的利益的。然而，非洲人在白种人入侵之前是完全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應該允許非洲人重新管理自己。

在殖民地中，土地所有权的問題是因为殖民国家依照法律或者非法地夺取了宝贵的采矿权和种植权而引起的。英国人比其他帝国主义者費了更多的心思使这种夺取合法化，但是即使这种半合法的手段也不能掩盖这个事实，即他們沒有权利夺取本地人的天赋权利。

由于外国压迫者不断进行經濟剝削和政治压迫，非洲各殖民地就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运动的目标是爭取自由和独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須对殖民地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組織工作。因此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必須联合成一条共同陣綫，共同推进目前被抑制的人民的經濟进步和当地人民的事业。

今天重新閱讀这本小册子，并回忆到 1948 至 1951 年間黄金海岸所发生的事件，我毫不奇怪我的观点仍然未变。請考虑这儿

句話：

“認為英國、法國或任何其他殖民國家只是在它們認為殖民地有‘有能力’進行自治之前‘受托’管理這些殖民地，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並且是一種誤解。殖民國家決不可能自動地把它們已得的东西拿出來。同時，幻想這些殖民國家會自動地把自由和獨立放在銀盤子里端來送給它們的殖民地，那是最大的蠢事。”

到目前為止，很少有什麼屬地能夠就它們的情況對上述這幾句話提出異議。但是我們應該指出，凡是已經建立了反對殖民主義的政治組織的屬地，都已經迅速地獲得了勝利。

---

---

## 第五章 在倫敦的日子

1945年5月我离开紐約前往倫敦。好几位朋友到碼頭上为我送行。我不能够相信我真的要离开他們，要离开我居住了十年之久的国家。极其迷惘的心情使我在这次告别中沒有十分激动起来，直到后来，輪船駛出了海港，我看見自由女神象举着她的手，似乎在向我个人送別，这时我的眼睛才湿润起来。我心里想道，“你已經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認識了自由的真义，我一定要把你的福音帶給非洲，不达目的永不休止。”

五天之后，船抵利物浦。我已經不是那个热情的青年人了，不是那个沒有經驗的、开始进行一件离奇的冒险并且容易对西方世界的事物感到震惊的青年人了。在美国的十年使我发生了这种变化。

但是仍然有許多新的事务要学习。当我在萊姆街火車站等候火車前往倫敦的时候，我决定买一份报纸。我走到一个报童那里，沒有問价錢就付給他一个或者两个便士，他叫我自己去拿报纸。我拿起了我誤認為是一份的报纸。当我走开的时候，那报童却拼命从后面奔过来，大声喊道：“喂，你这人！站住！”我向周围看了一下，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我检查了一下我买来的报纸，发现我弄錯了，大概拿了有十份报纸。我已經习惯于一份一



份的大疊的美国報紙，因而絲毫沒有想到這裡的情況會是這樣。我忘記了英國在戰後實行的新聞紙的限制。我向報童解釋這一點，但是我想他不會相信我的話，因為他可能從來沒有看見過超過十頁或十二頁的日報。

雖然發生過這種意外的事，但是我很快就習慣於英國的生活。越住得長，我越覺得我很容易在那裡扎根。對於你所做的事沒有人來操心過問，沒有東西阻止你站起來抨擊整個大英帝國。事實上，我在倫敦的一件樂事是買一份“工人日報”（這是我唯一真正喜歡讀的報紙），然後和許多商人一起擠到地下鐵道里。在那裡，我時常在我的周圍閱讀着“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和“曼徹斯特衛報”的人們面前，故意引人注目地翻開我的“工人日報”，然後我就看到，許多雙眼睛突然集中到我身上。但是，那些頭戴常禮帽的紳士們的凝視並沒有什麼敵意，而且總是帶着覺得對方有些可笑的一種神情。

在英國我唯一認識的人是喬治·帕德莫，他是住在倫敦的一位西印度群島的新聞工作者，他寫的幾篇文章曾引起我的興趣和同情。他寫的文章使我深受感動，因而我從美國給他寫了一封信來自我介紹並且問他能否在我到達時到尤斯頓火車站去接我。我沒有收到他的回信，因為我不久后就離開美國，來不及收到回信，因此我不知道他是否會在車站上接我。我走下火車就在月台上焦急地到處尋找他。我們彼此幾乎在同時看到了對方，而且從最初的一刻起我就很喜歡他。我住在倫敦的初期曾得到他許多幫助，當我認識他越深刻、和他談得越多的時候，我就更為尊重他的正直人格和對殖民地問題的知識。

他最初帶我到西非學生聯合會的宿舍去；我在那裡設法找到

了一个房間。但是我一搬到那里去住，就知道这不是我久居的地方。那里的气氛是冷漠而严肃的，我知道那里一定不能容忍我起居沒有一定时刻的习惯。因此，我馬上开始寻找别的住处。这件事却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因为战后倫敦的房屋非常缺乏。而且当然有許多女房东是不願意接受有色人做房客的。有一个女房东为了表示歉意向我解释說：“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緣故，亲爱的，只是因为我必須先考虑另外的房客。”她至少还有些礼貌，把她的想法告訴我。我記得另外有一次我走在一条街上，看到一张大招貼，貼在一个靠街房間的窗子上，写着“空屋招租”。我抬起走痛了的脚，带着希望走上狹小的台阶，按了門鈴。过了几分鐘之后，大門打开了一条小縫，恰好能看到門里面有一双眼睛。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說話，那門就在我面前砰地关上了。我以为也許是发生了什么誤会，就再去按一次門鈴，但是这次連那双眼睛也沒有出現。

有一天我打定主意去坐一次公共汽車。我在倫敦人行道上徒步走了那么多路，我的皮鞋都快要破了，我心里盘算着，究竟是买一张公共汽車票还是修皮鞋的費用便宜。無論如何，那天早上我去乘公共汽車是很幸运的事，因为我走上汽車一眼就看見了阿科·阿杰伊，他是在美国时期同我一起办“非洲講解員”刊物的同事。我們不期而遇，彼此非常高兴。他告訴我他正在忙于攻讀法律，我告訴他我所遇到的那些令人沮喪的关于倫敦女房东的故事。但是我很快就拋开了关于那些恶婆娘的記憶，而兴奋地和他談論我們在美国的共同經歷和我們对于未来的計劃。阿科很友好地答应幫助我寻找住处。我不敢想象那些在門縫里窺視的眼睛在看到門外的两个黑人的臉的时候会表現什么样的神情，但同一个同伴一起找房子总要愉快得多。我只能租便宜的房子，因此就难找得

多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有几张大钞票在她們面前摆动的話，倫敦的女房东也会和大多数人一样变得灵活起来的。

有一天我們在塔弗內耳公园区来回地轉，我們沿着伯利路走去，决定到六十号門牌那里碰碰运气。我們敲門时并不抱很大希望，完全准备大門会在我們面前砰然关上。一个年輕妇女开了門，很有礼貌地問我們有什么要求。她注意地听完了我們的話，然后她說她不能馬上答应我們任何事情，她必須先和她的丈夫商量一下，她叫我們当天下午再去听回話。我們第二次去的时候，心里怀疑着我長時間寻找房子的事是否当真会就此結束。結果真是如此。我們被引进屋去，帶我們去看了一間大約十英尺見方的小房間，她說，不供伙食每星期付三十先令的租金就能占用整个房間。只要能有房間，我就很高兴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房間，甚至即使沒有家俱，我也会把它租下来的。這間小房間就变成了我在倫敦整个期間的家（从1945年6月到1947年11月）。房东一家人对我非常和气，并且很关心我。我很少在半夜之前回家，因为我习惯于一直工作到深夜。但是不論我什么时候回到家里，我总是知道会在灶上給我留下了一些吃的东西。为了答謝他們这种照顧，我坚持請房东太太把全部髒碗碟留下讓我洗。我經常每天洗完了碗碟才上床睡覺。

我到倫敦去的目的是攻讀法律，同时完成我考博士学位的哲学論文。因此我一到倫敦，就到格雷法学协会去登記，并且作好到倫敦經濟学院听課的安排。我在这里遇到了拉斯基教授，他在講授政治学，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門課。后来我又进入了大学学院，攻讀哲学。我放弃了我已經开始的种族哲学的研究工作（这是我原定的論文題目），并决定改写另外一篇論文，那是关于当时一



种叫做“邏輯實証主義”的新的理論的論文。我是在艾尔教授的指导下开始這項研究工作的。

此外，仅仅在几星期之后，我就积极地参与了倫敦的政治活动。

同我在美国时一样，我在倫敦也同所有的政治运动和党派发生了联系，我觉得英国共产党在它的領袖中有埃米耳·伯恩斯，帕姆·杜德和哈里·波立特等人，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加入西非学生联合会，后来我成为該会副主席。該会在进行了很多組織工作之后，成为一个有效能的团体，它一面照顧新来的学生(特别是为他們寻找膳宿处所和为他們安排在各法学协会或学院中登記注册的事务)，另外也鼓动向殖民部請願要求改善西非的情况。有时当学生們沒有錢繳納費用时，联合会就写信給他們的家庭要求給予經濟上的帮助，或者，当这样做无效的話，就竭力从联合会很少的經費中想办法帮助他們。有时他們会同某些房东太太发生爭执，而且因为出租房子的人很少，我們必須珍視同房东太太的关系；偶而也有人同女孩子搞出麻煩来，那个女孩子可能是他在皮卡得利大街或者托特訥姆法院路上偶然認識的。这个工作使我沒有一刻時間感到无聊，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

到倫敦一个月之后，我就同乔治·帕德莫，特·魯·馬康嫩(一位天才演說家)和彼得·亚伯拉罕斯(南非的黑人作家)等一起紧张地进行第五届泛非會議的筹备工作，該会定于那年10月在曼彻斯特的市政厅召开。乔治·帕德莫和我都担任了會議組織委員會的秘書，我們俩人日以繼夜地在乔治的家里工作。我們經常坐在他的小厨房里，木制的桌子上摆滿了文件，还放着我們时常忘記

喝的两三小时前煮好的一壶茶。乔治用他那个小打字机打字，他打得那么快，一张一张的紙从打字机上翻下来簡直象从印刷机上滚动出来的一样。我們发出成百成千封的信，寄往非洲和西印度群島各地的各种团体組織，說明这次大会的目的以及爭取各殖民地的解放时應該采取的政治策略。

會議如期在10月間举行，由杜波依斯博士和彼得·米利亚德博士共同担任主席。杜波依斯博士是美洲黑人学者，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創办人之一。米利亚德博士是英屬圭亞那人，也是当时在曼彻斯特行医的一位黑人医生。这次會議异常成功，有全世界各地的二百多位代表出席。會議听取了关于各殖民地情况的报告，那些資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解决非洲殖民地問題的办法都遭到了拒絕。會議一致通过了以非暴力的积极行动策略为基础的非洲社会主义原則。大会也採納了人权宣言中所闡述的原則，并建議各地的非洲人和非洲人的后裔組織政党、工会、合作社团、和农民的組織，来支持他們爭取政治自由和經濟进步的斗争。

會議通过了两篇向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发出的重要宣言，一篇是杜波依斯博士写的，另一篇是我自己写的。这两篇宣言申述了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的决心，譴責了資本的垄断以及利用私人的財富和产业謀取个人的利益。宣言坚决主张經濟民主是唯一真正的民主，并吁請各地的殖民地人民——知識分子、自由职业阶层和工人——覺悟到他們有責任从帝国主义桎梏中把他們自己和世界人民解救出来。

虽然这次会是泛非會議的第五届會議，但是它的主张、观点和思想意識都和以前的四届會議显然不同。前四届會議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都是中产階級知識分子和資产階級黑人改良主义者，

而这次第五届泛非會議出席者是工人、工会工作者、农民、合作社团以及非洲和其他地方的黑人学生。因为出席的人絕大多数是非洲人，會議的中心思想是非洲民族主义——即反抗在非洲实行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大会并採納了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它的哲学。

但是會議所以能取得这样大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出席會議的代表們是一些实际工作者和行动者，而不象前四届會議那样，只是一些满足于写論文却不能够或不願意积极参加解决非洲問題的人。正象加尔維主义一样，前四次會議并不是非洲当地人民觉悟的产物。加尔維的思想意識所考虑的是同非洲民族主义相对立的黑人民族主义。只有这次第五届泛非會議才为非洲民族主义提供了出路，并促进了非洲人的政治觉悟。实际上它成为一个“非洲人的非洲”的群众运动。

我和會議上的发言者本人沒有发生什么关系，因为管理工作已經使我太忙了。但是我記得有一天晚間，馬康嫩非常激动地私下来看我。他問我能否会見一个名叫拉菲尔·阿馬托博士的人。阿馬托博士是多哥人，被邀請在會議上发言，他跑进来宣布說他的旅行皮包遺失了，里面有几件值錢的东西。他認為，既然他出席會議是由我們負責邀請的，我們應該賠償他的損失。他當場就开列了遺失物件的名称和估計的价值，并把那张单子交給我。會議已經負了很多債，但是我決定我們最好还是付給他一些錢，尽我們的力量把这件事处理好。后来，通过阿希·尼科先生（他帶領一个代表团来抗議黄金海岸可可銷售局的設立）的关系，我們收到了黄金海岸“保障土著居民权利协会”主席捐助的五十英鎊。

會議在拟定了泛非民族主义的綱領之后就結束了。帕德莫、



亞伯拉罕斯和我就到倫敦去了，馬康嫩、約莫·肯雅塔（他後來被認為要對怯尼亞的“茅茅”反殖民運動負責）和米利亞德留在曼徹斯特，負責進行那里的泛非聯盟的組織工作。

這屆會議後設立了一個工作委員會，目的是推行會議所制訂的綱領。杜波依斯博士是工作委員會的主席，我被派擔任秘書長。工作委員會在泛非會議閉幕後不久在倫敦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決定泛非會議的總部應該設在倫敦，作為將來在各殖民地開展的各種政治運動交換情況的場所。我們開始尋找辦公室來作總部地址，但是由於經濟困難，我們沒有找到。

正是在這個時期，阿希·尼科、華萊士·約翰遜、班科耳·阿克帕塔、阿伍訥·倫納和科佐·博齊約來找我，並建議我們應該成立一個“西非國民大會秘書處”，以便特別在西非洲方面推行新的泛非民族主義，目標是召開一次西非國民大會，並且指導西非各殖民地（無論是英屬或法屬殖民地）實行爭取自治的政治綱領。

我被提名並擔任了“西非國民大會秘書處”的秘書長。因為西非洲的代表們要求在倫敦設立一個中心，以便他們可以從那里進行有效的指導來實行他們的政治綱領，我着手去尋找辦公室。不久我就找到了一個地方——格雷法學協會路 94 號的一個小房間，那時它是一位黃金海岸的律師科伊·拉比的辦公室。這個小房間成了我們的總部，它一定是全倫敦這樣大小的房間中最忙碌的一個。它很少有空閒的時間，因為這個地址一傳開來，它立刻就變成了全體非洲學生和西印度群島的學生以及他們的朋友聚會的地点。我們時常在那里集會，討論計劃，發表意見和訴說我們的不滿。

作為秘書長，秘書處的一切組織工作都落到我的肩上，因為我

們從來沒有一點經費，這工作很不簡單。我們的主要困難之一是嚴重的煤荒。因為我們不論什麼天氣什麼季節無例外地總是呆在辦公室直到午夜之後，所以煤在冬天是必需品。一個人對一種事業無論多么熱愛、多么忠誠，如果你的鼻尖上在結冰，手脚都凍腫了，人們不斷呼出來的氣把電燈泡的光芒都遮住了，那末你就幾乎不可能拿出全部力量來工作。因此在冬季的幾個月中，我們化了很多時間圍繞着倫敦走許多英里，去尋找碎煤塊，最好是能撿到商人重新裝滿了煤的煤洞旁邊的煤塊，或者是非常幸運地首先遇到卡車上掉下來的煤塊。

雖然我們的身体無法圍爐取暖，但是幾位英國女孩子的慷慨的幫助却使我們的心經常地得到溫暖。那些女孩子大半出身於很好的家庭，她們時常在傍晚來為我們打字，連續工作幾小時，而從來不要一點報酬。我們所能做的最多是把她們送上一輛出租汽車，如果我們碰巧有錢給她們付車費的話，或者，更多的情況是送她們到地下鐵道車站，向她們揮手告別。不過有一天我確曾同她們中的一位女孩子去看電影，因為我記得曾發生這麼一回事：當我們正要走進電影院的時候，有一個英國人對這位同一個黑種男人（不過這不是他的原字眼）一起去看電影的女孩子說了些惡毒的話。我所記得的下一件事是，那位女孩子打了那個人一記響亮的巴掌，叫他少管閑事，不要說那種無禮的話。因為我是全部事件的起因，我就建議我把她送回家後就走，但是她堅持我們繼續看電影。

英國婦女的這種行為給了我們很深刻的印象。她們充滿了熱誠和同情心，她們胸懷寬廣，她們不聲不響地、毫不驕傲地替我們工作而並不希望得到感謝或報酬。

西非国民大会秘書处成立后不到几个月，全世界各地都紛紛来信。工作的数量不断增加，我知道需要办一个刊物，作为秘書处的机关报，来传播那时我們所拟訂的一些計劃。我开始計劃出版一种名叫“新非洲人”的月刊。我設法凑集了五十英鎊，存在出版商手里，他答应第一期印三千份。1946年3月，第一期刊世了，副标题是“觉醒了的非洲人的呼声”，口号是“爭取統一和絕對独立”。出版后几小时之內就全部卖完了，每份三便士。由于一位尼日利亚学生班科耳·阿克帕塔的有力帮助，我通过該刊的主要論文宣传了非洲統一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并且攻击帝国主义和各殖民地中实行的不公正的法律。

当“新非洲人”在倫敦成为西非国民大会秘書处的喉舌时，馬康嫩和肯雅塔在曼彻斯特出版了一种名叫“泛非洲”的杂志，作为泛非联盟的机关报。但是不久后，由于缺乏經費，我們不得不停止出版“新非洲人”。事实上，我們拖欠印刷商的一百五十英鎊还是我回到黄金海岸之后由我偿付的。

在“新非洲人”停刊之前，我們曾利用它来召开在倫敦举行的第一届西非會議。关于这件事，为了使得西非洲法国屬地的非洲人也参加會議，我曾到巴黎去了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前往欧洲大陆。我曾听人說过很多关于巴黎的情况，預料将看到一些新奇的事。但是这个城市却很令我失望。当然，我并不是去玩的；我沒錢，時間也太寶貴，不容浪費在玩乐上面。我去会見了法国国民議会的非洲議員——阿皮提，利奧波·桑果，拉曼·盖耶，烏弗埃—博瓦尼諸位先生。我們进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拟訂了几項計劃，其中一項是关于爭取建立“西非洲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运动。由于我的訪問，阿皮提和桑果代表法屬西非洲来到倫敦出席了西非会



議。西非會議召開了兩次，會議決定努力在當時留學歐美的學生和其他非洲人中間傳播西非統一和民族主義的思想。

這時候，非洲學生的政治覺悟已經被喚起了，尤其是在倫敦，他們會面時，很少談別的，都是談民族主義的政治活動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在1945年，我到倫敦後不久，工黨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戰勝了保守黨。西非學生聯合會竭力幫助工黨獲取勝利，因為他們覺得這個黨對殖民地問題極為了解並且極為同情。該聯合會作了安排，請各位工黨人物向學生們作講演，通過講演，我認識了幾位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其中有阿·克里奇·瓊斯（後來任殖民部大臣）和里塔·欣登博士（費邊社殖民部秘書）。但是我很遺憾，我們寄予工黨的希望完全破滅了；實際上我們看不到工黨的殖民政策和保守黨的有什麼不同。因此，殖民地學生們決定出席工黨的一次集會，并向克里奇·瓊斯先生提出了很多質難。

成立英國有色人種工人聯合會可能是西非國民大會秘書處的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了。當我來到倫敦時，那時的情況是非洲人和有色人種工人分成兩個集團，一方面是學生，另一方面是非學生。非學生中間主要是海員，他們是在戰前和戰爭期間從非洲各屬地來到英國，而且由於各種原因一直仍然留在英國。他們大多數已失業，幾乎一貧如洗。我們的目的是幫助他們找工作，如果不成，就設法把他們送回家鄉。由於從事有關這些有色人種工人的工作，我時常要到利物浦、曼徹斯特和加的夫等地去，而且我所負的任務之一，是了解在英國的非洲人的生活狀況。他們中有些人的生活困苦到難以形容的地步。尤其是在倫敦東部的貧民窟中，非洲最簡陋的茅舍和他們所住的貧民窟比較起來，那簡直是宮殿了。不論他們怎樣努力保持清潔（因為非洲人大概是一切人種里

面最注意清潔的)，也不可能消滅虱子和老鼠。他們周圍鄰居們的骯髒更加重了污水溝里發散出來的臭氣。

由於生活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已經放棄了過正直生活的企圖。我時常同他們坐在一起傾聽他們講述他們的問題；有時他們同英國女孩子發生了麻煩，或者由於偷盜而犯了法。我有幾次不得不去訪問被囚在沃姆伍德叢林監獄的一些人。監獄里的生活比他們中間某些人原先所忍受的惡劣生活當然要好得多，但是他們的自由被剝奪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訪問在倫敦的黑人工人是一件使人悲傷的事，但是在有色人種工人聯合會成立後曾努力為他們做一些事情。因此他們感覺比較有希望了，並且開始努力改善自己的情況。經常去訪問他們，同他們討論他們的困難，並且設法解決他們的困難，這對於減輕他們的痛苦是很有幫助的。我還發現，只要及時加以干預，時常可以使一些糾紛不鬧到法院里去。當然，有許多是種族敵對情緒所引起的事件，如果兩方面都喝了几杯酒，就會打起架來。但是大多數的情況是，在我同他們談論了事情之後，兩方面都對所發生的事件感到抱歉並且願意同對方握手言歡，重新和好。如果把這種事件交由警察用罰款或坐監的辦法去解決，那末仇恨就會加深。

由於有許多關於有色人種工人的工作需要做，以致西非國民大會秘書處差不多以組織有色人種工人為中心工作了。而西非學生聯合會的工作則集中在學生方面。但是這兩個組織在某種程度上始終是交換非洲政治情況的場所。

留英的非洲學生和工人組織在霍耳本大廈舉行了一次群眾大會之後，我再次訪問了巴黎。這次訪問巴黎時，在同法國國民議會的非洲議員會談時，我提出建議在1948年10月在尼日利亞的拉各

斯召开一次“西非国民會議”并邀請全非洲的一切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参加該会。人們建議由我負責召集这个會議，而且他們馬上贊同了我向他們提出的召集會議的計劃。

我一回到倫敦，馬上就开始工作，推动各方面行动起来。我們在特腊法耳加廣場和海德公园举行游行和集会。有一个名叫芬納·布罗克威的工黨議員在这种場合下时常替我們說話。我們經常吸引来一大群人，他們是同情我們的，但是我相信他們認為我們是把事情夸大了。很显然，倫敦的普通人对于英国殖民地的实际情况是毫无所知的。

这时候，我已經停止了我的法学研究工作，主要是因为我沒有錢，同时也因为我埋头在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之中，沒有時間認真进行研究工作。我的論文看来也注定要成为一件沒有完成的工作，但是当时看来，論文之类的事情同喚起非洲民族主义的必要比較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了。因为我們必須采取迅速的和協調的行动，才能够希望完成我們为自己規定的綱領中的任何一小部分。

那时我真是穷得很！我时常到坎姆登区和托特納姆法院路的小飯舖里买一杯茶，如果有錢的話，再买一块甜面包或者一个面包卷，并且一連几个鐘头同經常到那里的各种人討論政治。那些小咖啡舖的老板大体上都是一些很正派的人，因为我記得他們从来没有赶我們动身。有一天，帕德莫和我正坐在这样一家咖啡館里討論問題。我忽然意識到有人在盯着我們看。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小女孩很注意地窺視着我們俩。小女孩突然很兴奋地叫道：“媽媽！它会講話呀！”那位可怜的母亲羞愧得脸都紅了，她連忙走过来要把她那个局促不安的女孩拉开。但是我們笑着对她說沒有关系。

支持西非国民大会秘書处的学生們組織了学生小組，定期在

总部开会討論問題，其中由我做主席的一个小組成了先鋒小組，我們自称为“圈子”。参加的人要繳費七个金鎊，而且只有大家确实知道真正是在为西非的統一和摧毀殖民主义而努力的人才能参加。我們拟訂了一份文件，它規定了这个团体的宗旨和成員的忠誠誓言与責任，这个文件作为“附录二”轉載于本書之后。

“圈子”的成員們开始訓練自己，使自己能够在非洲大陆任何地方开辟革命工作。他們好象是秘書处的特別工作組，他們指导着綱領的执行和西非国民大会总部的活动，他們領導大家召开會議和代表會議以及安排演講和討論。

有一天，我收到阿科·阿杰伊寄来的一封信，那时他已經回到黄金海岸去了，他問我是否願意回去担任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总書記。他解释說，該党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得知識分子的領導同广大的人民群众協調起来，由于他知道我在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活动，已向該党的执行委员会建議邀請我去当总書記。他还說执行委员会建議給我每月一百英鎊薪金和供給我一輛汽車。錢和汽車并不使我很感兴趣。但是我对总書記的工作确实是很感兴趣的。我認为这就是我一直等待的机会，那就是返回到祖国，用我在外国学到的組織政党的經驗，积极地为我国人民服务。

这件事超过了我的預計，使我不敢相信，所以我决定最好还是謹慎一些并且設法弄清楚黄金海岸当时的情况。为了取得時間，好讓我弄清楚关于这个运动的創辦人的真正的精神、动机和目标的一些情况，我给阿科·阿杰伊回信說，我正在考虑他的建議。但是不管怎样，当时我确实正在积极地为西非国民會議进行准备工作（事实上會議一直沒有召开），因此我有些不願意匆匆忙忙地离开，留下很多問題沒有解决。



恰巧托尼·麦克利恩，牛津大学的附属学校的教师，在黄金海岸住了几个月之后，最近已回到英国，通过他，我了解了黄金海岸当时确切的政治情况。他認識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几个倡导人，并且坦白地告訴了我他对他們的想法。从他告訴我的情况中，我得出結論，認為这个运动的倡导人的政治观点和黄金海岸人民的政治願望是背道而馳的。但是他告訴我，他認為其中有一个名叫威廉·奥弗里·阿塔的人，似乎对于黄金海岸的政治、社会和經濟方面的需要有一些概念。

对形势的这种估計，使我不得不認為，我参加这样一个几乎全部由反动派、中产阶级的律师和商人們所支持的运动是沒有好处的，因为我的革命背景和思想使我不可能和他們一起工作。

后来我接到了这个运动的一个倡导人杰·布·丹凱博士給我的信，他催促我接受这个工作。我向好几个人征求意见，但是他們似乎都不願意劝我这样做或那样做，因为那是一个难以預計的时期。它可以成为我們事业的起点，也可能成为我們事业的終点。因为我仍然不能决定应该怎么办，我就召集了一次西非国民大会秘書处的會議，把这問題向會議提出来。經過認真的討論，他們認為我最好还是接受这个职位。这很象是在长期的紧张訓練之后进入了实际行动的时期。無論你在訓練时期觉得对于应付紧急情况的准备作得怎样好，但是当你面对着真实事物的景象时，你突然又感到象一个新兵一样。但是我对于我将奉行的政策深信不疑，并且充分准备，如果我发现他們采取反动路綫的話，我就和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斗争。

这时事情既然决定了，我就写信接受了那个职位。我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給丹凱，說明我沒有錢，我大約需要一百英鎊做路費和

旅行开支。这笔钱后来由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主席乔治·格兰特给我寄来了，于是我立刻开始作动身的准备。

我还没有作好关于召开西非国民会议的安排，因此我决定在返回黄金海岸的途中，在塞拉勒窝内的佛利敦和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停留一下，以便作一些私人接触，为定于在翌年10月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召开的西非国民会议铺平道路。

我召集学生和有色人种的工人们开了一次会，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们，并且向他们告别。有许多人反对我离开，特别是有色人种工人联合会的许多会员反对我离开。但是我向他们解释，我们开始把我们计划的事业付诸实施的时刻到来了，这正是我们所一直等待的机会，而且我决不会忘记他们，也不会辜负他们。

1947年11月14日，科佐·博齐约和我离开伦敦到利物浦去。在利物浦，我在码头上出乎意料地遭到了当局向我找麻烦，因为虽然我不知道，警察局却已经收集了许多关于我在伦敦的政治活动的情报。他们对我出席共产党的会议很不高兴。经过了冗长的询问之后，他们终于很勉强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准许我上船。我感觉到，他们虽然愿意看到我离开，但是他们对于我到黄金海岸将要作的事都有些担心。我当时可以告诉他们我将作的事，但是他们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博齐约和我一起站在“阿克拉号”轮船的甲板上，默默地眺望着英国海岸离我们愈来愈远，逐渐隐没在远方。对于我，这不是一次愉快的离别。我非常喜欢我在英国的生活，我已经感到非常喜爱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但是在我再度到达英国之前，还要经历许多事件。

---

## 第六章 回到黄金海岸

我对于我的旅行计划是怀着很大热情的，我希望访问西非海岸每一个能够到达的口岸，但是我却忽略了这个事实，即我当时所搭乘的和以后将要搭乘的船，都是定期航行的船只，它们不可能为了一位三等舱旅客的便利而悠闲地沿途航行，使他能够上岸去传播泛非主义。因此，使我非常烦恼的是，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访问冈比亚，而是先访问英属塞拉勒窝内的佛利敦港。

当船只停泊在佛利敦码头的时候，我只拿着一只小衣箱就上了岸。上岸前，我向科佐·博齐约道别。他是一位教师，回到黄金海岸的公立阿金·阿布阿克瓦学院去任教，他曾很友善地叫我把我的行李（大半是书籍）放在他的行李一起。这时候华莱士·约翰逊已经回到了佛利敦，因为他自己住的房间很小，他设法替我介绍同他的朋友住在一起。约翰逊当时任西非青年联盟主席，这个地方的人对他很有意见。我认为首要的步骤是设法找出政治意见的分歧之处，然后设法取得一致的行动。因此，我要求同所有的政治领袖们进行私人的会晤，并且经过许多次讨论和发表意见以后，我们设法对于使这些塞拉勒窝内领导人如何组成统一战线和为西非统一而共同工作的问题达成了某种协议。

当我留在这个国家的两个星期中，我曾在威伯福尔斯纪念堂

向很多的听众发表过演说，在佛利敦和在保护地的好几次群众大会上演说，并且还在福腊海湾学院向学生演说。我做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接触工作，我认为我的访问是成功的。

我离开佛利敦后到达蒙罗维亚，这是利比里亚共和国的首都。这儿的政治气氛大不相同。我开始怀疑，利比里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是否会对于“西非会议”进行认真的考虑。当埃德温·巴克利和威廉·杜伯曼两先生以总统和下届总统当选人的身份访问英国的时候，我曾经会见过他们。这两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做国家元首的非洲人，他们给我很深的印象和很大的鼓励。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没有人对利比里亚说过任何的好话，我们还把它当做非洲解放的象征，因为它是唯一的非洲独立国家。事实上，当时人们认为一个国家遭遇的最坏命运，是成为一个象利比里亚那样的国家。我必须承认我在1947年时曾经认为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我在蒙罗维亚所看到的東西簡直沒有給我一点兒好印象。但是，五年以后当我再度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地方变化很大，几乎使我不能认识它了。杜伯曼总统对于早应实行的许多项行政、经济和社会改革，无疑地已经尽速进行了，这一切措施对于这个共和国的进步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不巧得很，当我在1947年访问蒙罗维亚的时候，当时的总统杜伯曼先生外出旅行，由于我搭乘的船只停泊两夜就要启碇，我就无法等他回来。我虽然很失望，但我设法会见了几位政界人物，同他们讨论了我的计划。他们给我的总的印象是，由于利比里亚是一个独立国家，派遣一个代表团出席一个仅仅由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属地的代表所组成的会议，对于它来说也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它可能派遣一个观察员。



随后我就搭船到黄金海岸的塔科拉第，这个地方是这只船下一次停泊的港口。我这次坐了甲板通舱，并且也用了假名字。我对英国警察的工作效率曾有足够的体验，我相信他们会把我在利物浦上船的消息以及他们认为我在伦敦时曾和共产党发生联系的不利事项的记录一起通知塔科拉第港口当局，而且我不认为我在中途会遇到麻烦。因此，我认为我认识我的同路的旅客和海员越少就越好。我没有泄露我的真姓名，而很随便地同其他旅客和水手们混在一起，我们在一起作了一次最有趣的旅行。

踏上塔科拉第港口就必须碰到移民局官员。我踟蹰地走到一位非洲籍的官员面前，我低着头把我的护照（它暴露了我的真实姓名）递给他。这时，我忽然觉得，写在护照上端的名字，好象变成了很大很大的字。当这位官员手里拿着护照很久不打开来看的时候，我抬起头来望着他，准备恶运来临。他鼓出了他的一对眼睛，惊奇地望着我。然后他慢吞吞地蠕动着嘴唇，悄悄地对我说：“您就是克瓦米·恩克魯瑪！”我点点头。我当时觉得，一切都完了。他招招手叫我跟他走，我就跟着他走去。等我们走到其他旅客和官员们听不到我们谈话的地方，他马上完全改变了态度。他热烈地和我握手，并且向我说，他们（非洲人）听到许多关于我的消息，说我正在回到祖国来帮助他们，并且说他们天天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到达。他向我说，我可以放心地走开，他将替我办理入境证件和其他手续，并且按照正当的手续把护照还给我。

我又站在我的故国土地上，这真使我兴奋。我打电话给鲁·斯·布莱先生（他住在塞康第，他是一位在恩济马开业的律师，又是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成员），他就立即开车子来接我，并且一直把我带到他在塞康第的住宅去。第二天，我就动身到塔尔克瓦，

住在我的好朋友阿卡·沃森的家里。

在我离开祖国的期间，沃森一直在照料我的母亲，我从伦敦写信给他，请他把我的母亲从恩克罗伏耳接到塔尔克瓦，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到恩克罗伏耳去看望她，那末我回国的消息一定会传播开，同时我又急需和我母亲同住一些时期，并且我还需要一个短期的休息。

我和母亲已经分别了十二年，这次初次见面，我想我们都会激动起来的。当我们见面的时候，至少我是如此，我看到她的眼力已在衰退，我忧悒地看到她已是白发斑斑，年龄使她失去了青春时的美丽。她似乎比我记忆中要瘦小些，也许这是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变得衰弱了。

见面时使她最初感到震惊的事是，当我向她笑的时候，她注意到我的牙齿。在我离开她出国的时候，我的两颗上颚门牙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裂缝。到了美国后我就发现这两颗牙齿使我很不方便，因为每当我公开发表演说的时侯，这两颗牙齿总影响到我的发音，特别是发“斯”音的时候。因此，我就下了决心把它们拔掉，换上两颗假牙齿。拔牙和换牙的观念对我母亲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当她看不到我的两颗门牙的裂缝时，她就开始怀疑我究竟是不是她的真儿子。她为了使自己安心起见，于是仔细地看我的双手，因为她常常说，在任何地方只要她看见我的双手，她就会认识我。我想人们会说，我的双手比别的男人纤细一些，而且十个指头是很奇怪的、上下一般粗。这就使我不能带戒指。

当她自己确实认清我就是她的返回故乡的游子的时候，她一直在大力控制的感情立即爆发出来，她把我一把抱住，我感到她浑身颤抖着，哽咽起来。随后，正如英国的4月天气一样，太阳忽然

显露出来，我們都欢笑起来。我們端过两只木凳子来坐下，馬上談起十二年闊別的情况，互道两地所发生的一切事項。关于我突然回到祖国的原因，她既未曾問过我，我也沒有告訴她，并且我也沒有同她談到我今后的政治主张。

当我住在塔尔克瓦的两周中，我休息得很好，并且也做了許多事情。这两周无疑是全世界的政治騷动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遍及中国、緬甸、印度、錫兰、巴基斯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而且它也影响了西非和在外国留学的非洲学生。尽管非洲还没有出現公开的政治騷动，但是若干地区在实际上却沸騰起来。例如，黄金海岸在当时被認為是一个模范殖民地，各方面都循規蹈矩。当时，世界上几乎沒有人認識到，这个平靜的国家不久就成为非洲的新生命和复兴的先鋒。

在黄金海岸，非洲的知識分子同总督和殖民政府之間的矛盾已經扩大了。当格吉斯堡政府时期，指定會長出席立法會議和建立“各省會長會議”这两个措施，曾引起了保障土著居民权利协会現在仅存的人士的坚决反对。

从格吉斯堡政府(1919—1927年)到和艾倫·伯恩斯爵士政府(1941—1947年)这一段时期中，这个国家有了巨大的政治觉悟。由于三十年代經濟危机的加深，这种間接統治制度，即官員們通过會長进行統治的制度受到了影响，黄金海岸的非洲人便开始認真地考虑他們所面临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由于当地人民有了政治觉悟，伯恩斯和他前任的格吉斯堡总督一样，着手推行他認為必要的各种政治改革。他指派了一些非洲人参加行政會議。虽然这种措施受到普遍欢迎，但是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却表示反对，因为他們認為那些被指派参加行政會議的

人，不是一些酋长便是一帮众所周知的殖民地政府亲信分子。各省酋长联合会議和阿散蒂邦联合会議所通过的一項制宪备忘录已經轉送給殖民大臣。但是，备忘录的各項建議却沒有被采納。1944年10月伯恩斯告訴立法會說，英国殖民部已經批准了一項新宪法，这个新宪法是他同各酋长与立法會其他非洲籍代表磋商后制定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伯恩斯宪法”。虽然有一些人欢迎这个宪法，說它是走向自治的一个重大步驟，可是有政治觉悟的社会人士不久都感到失望，并且着手进行煽动工作来废除这个宪法。

知識分子已經成功地进行了反对伯恩斯宪法的活动，現在开始計劃发动一个废除这个宪法的政治运动。他們从来沒有想到組織一个政党来进行上述活动，而且政党制度对于他們也是很陌生的。事实上，根据我的政敌的話來說，我的許多所謂罪行之一，就是我把政党制度介紹給这个国家。

1947年12月29日，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就在这个关头在索耳特龐德誕生了，“它保證用一切合法的手段，使控制和指导政府的权利在尽可能的最短时期內轉到人民及其酋长的手中。”

这是很有趣的事：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副主席之一丹凱博士起初竭力支持伯恩斯宪法，他自願接受了各省酋长联合会議的提名，代表他們出席伯恩斯立法議會。但是不久便发生了基比“仪式”的謀杀。当大酋长納納·奧弗里·阿塔一世爵士逝世的时候，那个被認為是他的兒子的阿基亚·孟薩遭到了残酷的謀杀。据說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員为了使他們能分享这个酋长的遺產，因而想謀害他。这种行为被錯誤地解釋为仪式上的杀害。这种仪式是酋长死时通常按照一种愚蠢的風俗举行的仪式，也就是屠杀許多无辜的



人以安慰會長的靈魂。這個謀殺案的審判結果，把幾位被認為與此案有關的大會長的兒子和家屬都判了罪，有的是死刑，有的是無期徒刑。這樣一來，伯恩斯和丹凱之間的關係就尖銳的對立起來。丹凱是奧弗里·阿塔的同父異母的弟兄，因而他就不再支持伯恩斯憲法，並且開始為着一個新的憲法而進行鼓動工作。

由於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從開始起就沒有得到群眾和某些會長的支持，這就不難看到它並沒有起很大作用。為了努力使它成爲一個群眾運動，我被邀請擔任該黨總書記。

恰恰在我離開塔爾克瓦以前，我曾在那里的天主敎學校裏舉行我在黃金海岸第一次的公開集會。我做了一次相當長時間的演說，把我在國外的經驗告訴了人民，並且告訴他們我為什麼返回黃金海岸來擔任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總書記職務。房間裏擠滿了人，這是我回國以來第一次的公開演說。從聽眾的全神傾聽和他們的歡呼中，我感覺到聽眾們是這個國家工人階級的代表，的確在準備支持改善他們生活條件的任何運動。

為了出席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工作委員會，我便從塔爾克瓦前往索耳特龐德。在我們最後着手進行工作以前，我受到委員們的热忱招待，他們並且向我發表許多歡迎詞。議程上第一個項目是任命我做總書記。大家都同意了這項任命。這項任命應該立即通過。但是，當討論到薪俸問題時，却有許多不同意見。當我發現這個大會黨（它本身沒有任何政治綱領或群眾組織）並沒有基金，而且也不想開一個銀行賬戶的時候，我馬上就認識到：每月支薪一百英鎊和供應一輛汽車的這種待遇，顯然只是用來做爲誘餌。由於每月支薪一百英鎊既然絕不可能，他們便採用了折衷的辦法，每月給我二十五鎊。我認識到即使是這個數目也使他們難於籌劃，

我便建議，只要他們照顧我的膳宿費用，我就毫無報酬地來工作。滿屋的人都以驚奇的眼光瞧着我。因為每人每年都賺兩三千鎊錢，他們一定在猜想，我不是古怪的人，就是用狡猾的方法企圖做一些過於高明而使他們猜不透的事。後來，當他們進一步了解了，這件事就變成一項笑柄，特別是有一位委員說我對於金錢毫不在乎，並且說我不懂得金錢的價值。但是，在當時，他們卻不能夠了解我。他們顯然不打算做一件沒有把握的事，因而他們不贊成我的建議並且堅決要我每月支薪二十五鎊。有無薪給對我無關重要的，我於是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因此，第二年1月，我便開始正式地就任了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總書記的職務。他們告訴我大會黨要作一切努力爭取廢除伯恩斯憲法，但他們卻沒有告訴我他們準備用哪一種憲法來代替伯恩斯憲法。

隨後兩個星期，我進行了成立一個辦事處的工作。我又開始找房子，終於設法租到了聯合非洲公司的一個舊辦公處，這家公司是英國在西非最大的公司。我設法找到了一個打字員，這個辦公室在幾天以內就布置得很好。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1948年1月20日召開統一大會黨的工作委員會會議。我在會議上向委員們提出我所擬訂的關於這個運動的組織綱領，請他們來討論。這個綱領包括下列各點：

#### “影子內閣

工作委員會應尽早地認真注意組織影子內閣的工作。內閣由特別挑選的人員組成，以便研究各部的工作計劃，這些工作計劃應在我國取得獨立前決定。這個內閣將使我們不致因為在預定日期以前突然提早實行自治而陷入毫無準備的狀態。

#### 組織工作

关于执行大会党綱領的組織工作将分三个时期进行：

第一个时期：

(甲)在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之下調整所有各种組織：即除了邀請各种政治、社会、教育、农民与妇女組織以及当地社团等以个人党员身份加入外，邀請工会、合作社等等加入本統一大会党。

(乙)在第一个时期中，另一主要工作是巩固已經成立的支部并在全国各村鎮建立支部。

(丙)本党应在殖民地、阿散蒂、北部領土地区和多哥地区各村鎮建立支部。应劝导各村鎮酋长或首領做为支部的贊助者。

(丁)凡本党支部所在地应大力开办本党周末学校。为达到自治起見，在上述周末学校中应即开始进行关于自治的全国群众政治教育。

第二个时期：

利用政治危机，着重在全国不断举行示威游行，以考驗我們的組織力量。

第三个时期：

(甲)召开黄金海岸人民的制宪大会，以草拟自治或民族独立的宪法。

(乙)組織示威游行、抵制和罢工运动——这是支持我們要求自治的压力的唯一武器。

这个綱領在原則上被通过——虽然有一些委員后来在沃森委員會上曾表示否認它——并且會議要求我全力展开組織的工作。

当我最初讀完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章程草案时，我对下述事实感到惊讶，即工作委員會只打算使它自己进行关于殖民地本

士的工作，在較少的程度上进行关于阿散蒂的工作。至于北部領土地区和外沃尔特多哥地区在他們的計劃內簡直沒有提及。

但是，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統一运动應該包括整个国家，当我的建議毫未受到反对而通过的时候，我感到意外的高兴。我的建議实际包括四个地区（北部地区、阿散蒂地区、殖民地地区和外沃尔特多哥地区）的各地区的組織計劃。他們可能感觉到，虽然我不能够希望获得成功，却也不妨来試試。

在随后的一个會議上，我們討論了本党的旗帜問題和这个旗帜的适当設計。出席的律師們爭辯說，挂党旗是违法的。他們长篇大論地引証关于這個問題的那部分法令，力图証明他們的論点。我完全不能同意，并且問他們，如果在其他独立国家中准許挂党旗，为什么要反对我們这样做呢？我用許多事实来支持我的主张，举出其他国家許多政党的名称，由于沒有人能够找出任何种理由来反对我的意見，这一天我获胜了。我們沒有碰到很多困难，便决定了我們的党旗應該是紅、白、金三种顏色。随后我建議我們的国徽可以是一只飞鷹来象征新生的加納。因为丹凱和他的两个親屬，威廉·奧弗里·阿塔和阿庫福·阿多，不同意这个国徽，我請他們提出另外的图案。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丹凱便提出他所設計的一个加納新国家的国徽。当我看到他的图案的时候，我簡直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图案中画着一只一个身体两个头的野兽，而按照非洲人的看法它象征着自私和不顧及別人的利益。这簡直和我所想象的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成立的宗旨毫不相符。幸而大家意見分歧，沒有达成協議，因而这只討厭的怪物始終未被采用。

当我就任总書記职务的时候，我从紀錄簿中發現全国已經成立了十三个支部。但是，在我进一步研究這個問題时，我却發現这



点完全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只成立了两个支部，而且它們并没有进行活动。为了在全国各地建立起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支部，我馬上就感到有旅行全国的迫切需要。这次旅行的結果十分成功，在六个月内我仅仅在殖民地地区就成立了五百个支部。我頒发党証，收取党費，并且采取各种方法为党組織筹措基金，因而在短期內，我就能够为工作委員會开一个銀行賬戶。

当时在黄金海岸組織和建立政治运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它需要作很多次紧张的旅行，而且在許多情况下道路是崎岖难行的。如果我有一輛比較坚固的汽車，情况也許要好一些，可是供給我用的老式汽車却很难能够完成一次旅行。这就是說我必須經常把車子交給司机，自己步行前进。有时候，倘若碰到一輛黑人貨車卡嗒卡嗒地駛过，我就設法去搭乘一段路，但是这种好运并不是經常碰得到的。在大部分時間里，我設法做出安排，以便能够在—个村庄里去过夜，但是有好几次，在天已傍晚、我深陷丛林走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睡在路旁。

在这些日子里，我所有的日常用品——两套衣服、两双鞋子和几件內衣——能够很容易地装在一小衣箱里。这使我的行动很方便，尤其是因为我在大部分時間里必須自己提我的衣箱。我周游了我国的每个角落，举行群众大会，进行接触，并且发表了几百次的演說。

当我发现人民的不滿和不安情緒时，我并不感到驚訝，因为当我在倫敦主編“新非洲”的时候，我曾經会見過許多非洲兵士，他們在大战时期曾在緬甸和中东服役。他們已經充分地認識到他們生活水准的低劣，因此当他們回到黄金海岸时，他們就迫不急待地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这种情况再加上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他們認識

到在今存的殖民地政权之下不可能享有政治权力)的失望情绪,成为鼓动民族主义的有利条件。导致1948年2月和3月危机的因素正是这种对政治和经济困难的认识以及战后的社会不安。

当我在塔尔克瓦同我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曾收到这个消息,说加族的一个小酋长尼·克瓦贝纳·博恩已经组织了一个全国规模的抵制欧洲和叙利亚商人的运动,以便迫使外国商店减低他们勒索的过份高昂商品价格。这个运动受到了全国许多酋长的支持,被一般人民当成了一种反通货膨胀的措施。尼·博恩曾在塔尔克瓦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我虽然未能亲身出席这次大会,但我却收到了关于集会情况的全部报告。我初次的印象是,尽管这个组织在它的计划上和方法上存在着缺点,但是这次集会至少是一种表达人民主要政治愿望的尝试。抵制运动不久就传播到殖民地地区和阿散蒂地区的其他城镇。这次运动大约延续了一个月,并且是和平地进行的,没有发生任何暴动或紊乱,后来便宣布停止了。

在尼·博恩最初发动这个运动时,我刚回国,甚至还没有就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书记的职务。在此后的一个月中,我在索耳特庞德又是那样地忙于成立办事处和组织党的各地支部,因此我虽然很同情这次抵制运动,但我却没有时间去参加。但是,我的返国和我几乎立即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及这次抵制运动都是紧接着同时发生的,因此虽然这些事件是巧合的,但是政府和我的政敌把我同这次运动立即联系在一起,这点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实上,大家都认为这次运动是我煽动起来的。

尼·博恩和在这次抵制运动中支持他的人都不是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成员,因此,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次运动同黄金海

岸統一大会党是沒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必須公道地說，在我們倡導自治的運動中，我們並不反對利用任何自發的不滿情緒，如果這樣做能促進我們政治目的的話。

1948年2月20日，我在帕拉迪姆劇場里向一個很大的集會發表演說，這是我第一次在阿克拉發表的演說。我必須從索耳特龐德駕車前往，可是我這一輛老爺車又照例地拋錨了。幸而過了一些時候，我們設法把車子開動了，雖然預定的開會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但总算把我安全地送到了帕拉迪姆劇場，這個劇場經常被用做舉行大會和集會的場所。我有一些着急，因為我想到，出席大會的人也許認為我不會前來，因而他們可能已經離開了會場，但是他們並沒有離開，成千的人以惊奇和期待的心情在耐心地等候着。我向他們演說的題目是：“我們時代的思想戰”。在我演說完畢以後，從群眾的反應中，我比以前更充分地認識到，黃金海岸人民的政治意識已經覺悟到那種程度，即他們為了自由和獨立而進行團結與鬥爭的時刻已經來到了。在那次大會上，丹凱支持我的演說，他向群眾說：“如果黃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所有領導人都使他們失望的話，克瓦米·恩克魯瑪是永遠不會使他們失望的。”

1948年2月28日，即宣布停止進行抵制運動的同一天，退伍軍人聯盟也舉行了一次和平的示威遊行。這兩個事件完全是沒有關係的，僅僅是碰巧在同一天發生了。由於我擔任黃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總書記職務的關係，我很熟悉這個聯盟，我當然知道這些退伍軍人的普遍不滿情緒。事實上，我原來就打算在適當時期把他們組織起來，以作為我們運動的一個輔助力量。我充分地理解到，他們打算舉行一次和平的示威運動，以便向總督申訴他們的憤懣，但是我和任何其他人都沒有能夠預料到，這次示威運動會得到

这样悲惨的结果。

当退伍军人的游行队伍走近克里斯兴斯博格十字街口（在这个地方有一条支路通往总督官邸克里斯兴斯博格城堡）的时候，纠纷开始发生。当时，他们已经离开了给他们规定的路线，当他们走到这个十字街口的时候，警察便命令他们停止前进，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和平的游行，因而拒绝停止前进。这样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冲突，担任指挥的欧洲人警官便命令他的警察开枪。结果，当场杀死了两个退伍军人，另有五个非洲人受了伤。

当这次开枪的消息传到阿克拉商业中心区的时候，正是自从停止抵制运动以来成百成千的非洲人第一次来到街上购买物品的时候，人民对这件事当然义愤填膺。整个的城市在几分钟之内就陷于骚动状态。非洲人开始袭击欧洲人和叙利亚人店主，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他们早些时候所宣布的办法来减低他们的物价，而减低物价是停止抵制运动的一部分条件，于是便发生了暴动和抢劫并且继续了好几天。

当我听到阿克拉的骚动消息的时候，那天我正在索耳特庞德向党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我马上召开了一次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上决议让我立即前往阿克拉。我一到那里就召集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阿克拉支部领导人员举行会议，然后我亲自到城里各处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我以前认为那些报告夸大了事实，但是，实际上，骚动情况和损坏程度却被低估了。暴动和抢劫看来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许多建筑物、包括联合非洲公司和联合贸易公司的大商店都被纵火焚烧。这次骚动的结果，死了二十九个人，受伤的有二百三十七个人。

我看到，局势很紧急，于是召开一次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来讨



論一份電稿，我們決定把這份電報打給當時的殖民大臣克里奇·瓊斯先生。我認為，我們只需要打出一份措辭簡明中肯的電報來表達我們的希望，可是丹凱的想法不同。結果，發出了兩份電報，長的一份是丹凱草擬的，短的一份是我自己起稿的。在這兩份電報里，我們代表人民和各地酋長要求立即派遣一位專員前來，把行政移交給由酋長與人民所組成的一個臨時政府，並由他親自參加立即召開制憲大會的工作。雖然我認識到我們是不能期望僅僅靠這份電報就可以摧毀在黃金海岸的英帝國主義，但我卻認為這是一個不可錯過的好機會。

當我在阿克拉的時候，我聽到一個謠言說，警察正在搜捕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的六個領導人。幸而有兩位贊助大會黨的婦女給予我掩避的地方，一直到我能夠離開阿克拉的時候為止。她們日夜不倦地警戒着，並且始終如一地照料着我。我隨身帶着一架小打字機，跟她們在一起過了好幾天。事實上，當我隱藏在那所屋子的時期中，我擬定了大部分計劃，這些計劃後來規定在“人民大會黨”的黨綱中。

但是，我不久就感覺到，如果我長期滯留在那所屋子里，也許會危及這兩個婦女的生命，因此在總督宣布緊急狀態和在那些電報安全地發給殖民大臣以後，我就離開了阿克拉，前往索耳特龐德。

---

## 第七章 逮捕和拘禁

在我回到索耳特庞德的时候，我接到联合非洲公司叫我們迁出办公室的消息，我們的办公室是向它承租的。我虽然一直沒有搞清楚这次突然的逐客令究竟是由誰指使的，但是从当时所发生的各項事件来看，我非常有把握地認為政府参預了这件事，因为它相信我和阿克拉騷动有联系。

因此，第二天我就搬到边角堡，并且設法在希望山找到了一个适当地方。在以后的一周中，当我正忙于重新安排新办公室的时候，我又收到消息說，政府正在試图搜捕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六个党员。人們所称的“六大巨头”是指丹凱、奧弗里·阿塔、阿庫福·阿多、阿科·阿杰伊、奧貝澤比·兰普泰以及我自己。

就在那天晚上，我忽然被两个欧洲警官和两个便衣警察叫醒了，他們粗暴地命令我起床并跟他們走。在这次深更半夜的惊扰中，当我仍然睡眠蒙眬时就受到严格的搜查。他們发现了两件东西，从他們重視这两件东西的程度和其中的一个从我身上搜出它們时所发出愉快的狞笑来看，这两件东西使他們对我的怀疑得到証明。其中有一张是我在倫敦时有人給我的一张空白的共产党党証，很久以来我一直忘記了这件东西，另外是所謂“圈子”的文件。这两件东西都被他們沒收了。他們要求我說明，我为什么要把共

产党党証放在衣袋里。他們問道：“事实上，你在那时是不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我老老实实地告訴他們說，这张党証并没有意义，并且向他們說明我从那里得到这张党証。我說，当我在英国的時候，我和各党各派从极右的到极左的都发生过联系，我的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識，以便我一旦回国时采取在尽可能最好的路綫上来組織我自己的民族主义政党。他們对我这番話沒有回答，却叫我带上帽子。我告訴他們說：“我从来就不带帽子。”当他們做手势叫我跟着他們走的時候，我站在原地，并且問他們憑着什么权力来逮捕我。当然，我并不怀疑，他們在逮捕我的時候把一切手續都已办理妥当，但是即令如此，我还大致地看了一下那张使人厌恶的对我頒发的文件：“1948年驅逐(弗·恩·克·恩克魯瑪)令”。这项命令是在1948年3月12日頒发的，并由当时的总督杰勒耳德·克里西爵士签署，全文如下：

- “为保护公众安全和維持公众秩序起見，我充分地認為应根据1948年紧急条例(总条例)第29条的規定〔这项条款是根据1948年紧急条例(总条例)(修正)(第2号)列入的〕[Emergency(General)(Amendment)(No.2)Regulations, 1948]，对于弗朗西斯·恩威亚·科菲伊·恩克魯瑪，別名弗·恩·克瓦米·恩克魯瑪发出驅逐令；我現在执行上述条例第29条所授予我的权力并根据这项条款发出这项命令，我命令将上述弗朗西斯·恩威亚·科菲伊·恩克魯瑪，別名为弗·恩·克瓦米·恩克魯瑪逮捕和监禁并且在監視下尽速地将他送到黄金海岸境內由我以后发布的指令所指定的拘禁地点。

“我現在根据本命令进一步命令并要求上述弗朗西斯·恩威亚·科菲伊·恩克魯瑪，別名为弗·恩·克瓦米·恩克魯瑪”

瑪，从他被送到我所指定的地方之时起，在本命令繼續有效时期中，应在所有時間內：

“甲、停留并住在我所指定的地点，不得离开或外出；

“乙、在各方面切实遵守我随时頒布的那些指令和要求。

“本命令可称为1948年驅逐(弗·恩·科·恩克魯瑪)令，并于1948年3月12日开始生效。”

看来，他們的手續办理得很妥善，因此，当我認識到我不得不跟他們到他們要我去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走下了楼梯，四名警察紧紧地跟在我的背后。

幸而我沒有进行任何抵抗，因为当我走到楼下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的面前有一队穿着制服的警察，每个人都把枪口对准着我。这种情景使我大吃一惊，我不禁向后倒退了几步。我認为我就要被枪毙，于是轉过身来問其中一个警察，他們究竟想怎样对待我。这时他把两颗手榴弹抛到空中玩弄，就象玩弄橡皮球一样，同时用那种令我十分厌恶的态度和語言来侮辱我。他說了許多話，其中的一句話是，如果我認为我将来能够做黄金海岸总督的話，他們很願意讓我看一看他們是用什么方法来对待这种人物。在随后很短的沉寂中，这时他显然在挖空脑筋地另外再思索一些話來說，我泰然自若地說：“你的話說完了嗎？假使如此，我們就走吧。”于是我就被推入一輛警車，坐在两个警官的当中，車子向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开去。我有一两次非常怀疑，这輛警車是否会在一个偏僻无人的地方停下，在那里，甚至沒有人会听到我临死时所說的話。我感到非常煩惱的是，我在深夜被拖下床来，于是我开始打起瞌睡。

警車似乎行駛了几个鐘头以后，終于停下来。我从車子里被人拖出，我发觉我已来到阿克拉飞机场。在这里我看到我的五个



同伴，这件事使我高兴一些，因为在这以前我以为我是唯一被捕的人。不久我們被押上飞机，飞到阿散蒂的庫馬西，我們在那里受到严密的监禁，系獄三日。

这一切都很突然，恍如一場恶梦，除了最初的恐怖情緒外，我的知觉变得有些迟鈍和麻木。當我們被关在庫馬西的監獄的时候，我們的情緒很低沉，丹凱大声哭泣起来，他說他“对于这件事永远不会寬恕他們”。

當我們在監獄的时候，我們举行过好几次會議來討論我們可能遇到的問題，即是否会指派一个調查委員會來調查最近騷亂的起因。我們甚至擬訂了一个关于影子內閣和黄金海岸未来宪法的計劃，以应付伯恩斯宪法万一被抛弃时的情况。

在我們被这样紧密地囚在一起的时期中，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和其余五个人之間存在着意見分歧。我很痛苦地感觉到他們对我失去了兴趣，因为每逢我們討論問題的时候，他們五个人总是故意支持一項与我相反的意見，我所提出的意見他們都不能接受。他們似乎一致認為，我們这次被捕和苦难的整个悲劇都是由于我的过錯造成的，他們开始坦率地指出，他們悔恨当初曾邀請我来担任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总書記职务，这还不够，他們甚至开始埋怨阿科·阿杰伊曾經把我介紹給他們。

这种意見分歧終于使我自己和工作委員會发生决裂，这是十分不幸的，但是就我而言，使这种分歧千万倍地严重起来的是，我惊异和痛苦地突然发现，存在另一个建立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这个运动的某些最重要的人物都在某些方面受到基比謀杀案审讯結果的影响，而这一点就是促使他們加入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原因。

在我們被監視的第三天，我們在凌晨突然被人喚醒。他讓我們馬上把東西收拾好，準備在上午三時離開那里。稍後我才發現這次突然遷移的原因。很明显，當阿散蒂青年們聽到我們被囚在庫馬西監獄的時候，他們就在克羅博·伊杜塞（現任不管部長）<sup>⊖</sup> 英勇領導之下，計劃襲擊監獄并救出我們。這個計劃的可能結果是無人知道的，因為當監獄當局知道了這個計劃時，他們立即把我們一聲不響地遷走了。

我們乘坐大汽車離開了庫馬西，大概旅行了八小時後便到了北部領土地區的首府塔美利。在我們抵達塔美利的時候，關於我們的情形和北上的消息已經傳布到了那里，而且成群的人聚集在一起來看我們。不過這群人都很悲痛，男男女女都在哭泣。情況好像是，我們是在最後地走向絞架。但是，撇開別的事情不談，單單看看我們的模樣就一定會引起人民對我們的同情心，由於旅途風塵過大，我們完全象被塗了一層污土，以致無法辨識我們的面貌。

我們被押到市郊一幢平房裏，在守衛下過了三天。然後我們被分散開，分別囚在北部領土地區的不同地方，當時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們所去的地方。我被送到的地方是勞拉。我被囚在一間很小的屋子裏，日夜都有衛兵看守。生活是非常孤獨的，但是奇怪得很，我却感到很安適。我能够在一個地方安靜而且無人打擾地生活一段相當長的時期，這還是十三年來的第一次，而且我在最近由於這次苦難而跟我的五位同伴發生爭執以後，把我跟他們分開真是謝天謝地。至少我可以獨自思考，而且我所擬訂的各項計劃也不致於立即受到占多数的這些人的否決。他們准我讀書，但是這

⊖ 克·伊杜塞在1957年11月內閣改組後任內政部長，在1959年1月和4月改組後的內閣里任運輸交通部長。——譯者

些書和收到的信件都要首先由地区监察官检查。报纸是不准看的。

如果說我在被拘禁时期中是完全孤单的，那也完全不是事实，因为每天晚上都有一只狐猿定时地来看望我。这种特产的小动物經常在薄暮时出現，并且通宵地陪着我。有时我从睡眠中惊醒发现这个可爱的小东西睡在我的身旁。它的友爱使我很受感动，当天色薄暮的时候，我总是在期待着它慢慢地走进屋来。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一个医生的，他把它訓練成一只人們所喜爱的小动物，当时他正出外休假，因此这个小动物显然跟我一样地感到寂寞。

在这种有些令人感到孤独的监禁的六个星期左右以后，一天晚上，地区检查官走进我的小屋，叫我收拾东西，准备明天早上到阿克拉去。第二天早上，有一部卡車来接我。这輛車到各处載上其余的五个人以后，把我們送到塔美利，从那里我們乘飞机前往阿克拉。到达阿克拉以后，我們被安頓在飞机場附近“里斯本旅館”的增建的房間里。那时，我們发现那些未遭逮捕的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員們已經聘請了一位美国律师丁格尔·富特先生替我們向“調查委员会”提出控訴。这个委员会是总督命令成立的，主席是埃肯·华森，其余的委員为基思·墨萊博士（現为基思·墨萊爵士，当时系牛津林肯学院院长），安德魯·达耳格利希先生（著名的工会主义权威）和殖民部的埃·格·汉罗特先生（他当时任秘書）。他們是在1948年4月到达的，他們被任命“調查并报告黄金海岸最近暴乱情况及其基本原因，并就他們的調查所发现的各項問題提出建議。”

該委员会的第一項工作是要求释放我們，以便他們可以見我們。事情就这样安排了，于是我們在大約八个星期以后第一次再度呼吸到自由空气。

我們每个人分別被传訊到这个委员会，提出口供并回答問題。我記得很清楚，华森先生問我在美国和倫敦曾攻讀什么科目。当我回答他以后，他把双眉一皺，轉过脸向該会的其他委員說：“先生們，我耽心我們在这里将有陷于困境的危險。”

最有趣的事是，除了斯·埃·阿卡先生外，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执行委员会各委員都矢口否認，我曾經向他們提出的关于統一大会党組織的建議。經過盘問以后，其中几位承認我曾向該执行委员会提出上述建議，但是他們又說，他們同这个建議从来沒有发生关系。他們总的企图是希望使人相信，我仅仅是統一大会党的一个雇員，因而他們对我的一切行动完全不能負責。因此，一切重担都落在我的肩上了。

这个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工作，并于这年6月发表了它的报告。报告說，在政治局势方面，委員們的結論是，1946年的伯恩斯宪法已經过时，并且他們建議由非洲人自己草拟一个更民主的宪法来代替伯恩斯宪法。他們一致認為，必須准許人民行使某些政治权力，以滿足他們的民族願望。他們并且建議，應該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考虑新宪法的草拟工作。

关于这个委员会对我本人所作的評論，最好还是引証报告的原文：

“从工作委员会紀錄簿提供的內部文件来看，在克瓦米·恩克魯瑪先生于1947年12月16日返国和就任总書記职务以前，統一大会党实际上并未进行工作。

“恩克魯瑪先生从事过各种不同的活动。他曾在美国和英国受过种种不同的教育，并且在这两个国家里，似乎曾經在各种政治組織中担任过重要职务，这些組織的宗旨是提倡一



种进步的非洲政策。虽然他的供詞是比較謹慎的，但是，当他在英国的时候，他似乎和共产党发生过关系，并且似乎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只有政治上的权宜办法才使他的这种思想模糊起来。在倫敦的时候，他尤其主持了西非国民大会秘書处，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促成所有西非殖民地的統一，而且这个机构現在仍然存在。这个机构似乎是西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先驅。

“在有才能的西非人士中，恩克魯瑪先生似乎是一个群众演說家。然而，他在我們的面前却表現得很象統一大会党的一个謙遜而馴服的雇員，他使他个人的政治信念屈从于他的雇主們所公开发表的那些信念。从內部文件中，我們不能接受这种对他的地位的較低的估計。正如紀录簿中所記載的，他受到的热烈欢迎反映在工作委员会的一位委員对恩克魯瑪先生的热忱邀請，这位委員曾說，讓恩克魯瑪‘象对他自己的組織一样来利用这个組織’。由此可見，这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在目前，他占据了这种集权机构所有党書記所占的地位，即真正的权力地位。

“在恩克魯瑪先生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有可能成为一个叫作“圈子”的秘密組織的章程。这个組織的成員必須宣誓忠于恩克魯瑪先生个人，如遇不忠时則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恰恰在我們調查的这次騷乱发生以前，有一項工作綱領曾分发到各处，恩克魯瑪先生在这項綱領里大胆地建議一項計劃，這項計劃对于研究那些遭受共产主义奴役的国家的伎倆的人們是很熟习的。我們不能接受工作委员会委員們的天

真的声明，即这项文件虽然已经分发，但是他们并没有读过它。我们相信他们是读过的。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工作委员会在恩克鲁玛先生的热忱与大力推动的鼓舞之下，是在急于夺取政权，而且现在是在不择手段地达到这个目的。

“虽然从他的供词上来看，恩克鲁玛显然并没有对他的西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明确目标真正有丝毫背弃，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统一大会党却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与他脱离关系。

“克瓦米·恩克鲁玛先生从来就没有放弃他的西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目的，也没有放弃他的为着这个目的而同外国发生的联系。”

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当局把“苏维埃”这几个字插进去完全是他们的凭空想象。在关于所谓“圈子”的文件中，我从来就没有使用这些词句。毫无疑问，当局既然决心把我规定为一个“应该受到监视的人”，于是他们就认为有必要使用“苏维埃”这几个名词来表示黄金海岸和整个非洲受到共产主义的极大威胁。

1948年12月，继华森委员会之后，英国总督指派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后来称为“柯赛制宪委员会”，由法官柯赛先生（现为亨利爵士）担任主席，所有四十名委员都由英国总督指定。但是，这个委员会却没有包括社会上一个最重要阶层的人士。那就是工人（包括农民、矿工、小商人在内）和工会运动人士。社会广大阶层的人士发生了不满情绪，这点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认为，由于主要的人士受到排斥，人民真正的政治愿望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这种不满情绪变得如此尖锐（下章将予以叙述），以致我不得不采取行动。

---

## 第八章 分裂的扩大

当我回到索耳特庞德的时候，我虽然租妥了新办公室，但是我发现办公室的管理工作方面却作得很不好。因此，我就去找工作委员会，请求他们从委员中指派一个委员会前来调查，并就改善办公室管理工作方面提出建议。他们在这方面似乎很愿意帮助我，并且立即指定奥贝泽比·兰普泰和威廉·奥弗里·阿塔组成一个两人委员会。

他们趁着我前往出席一次党会议的时候来到了索耳特庞德。当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位极为气愤的工作人员主任前来看我，他把所有经过情形告诉了我。他说那两位委员对于办公室管理问题似乎完全没有兴趣。他们立刻调来档案并调阅所有的通讯，他们急急忙忙地一页一页地翻来翻去找他们所需要的文件。当他们拿走他们所需要的文件时，特别是当他们没收他已经打好等我签字的某些信件时，这位在旁观看的主任被吓得发呆了。这些信件虽然没有丝毫不妥善之处，但是由于我在几封信中使用过“同志”字样，他们可能认为这就是确实的证据，证明我是一个共产党人。

另外有一封信为他们所没收，并且使他们感到很大的不安。这封信是一个统一大会党党员寄来的，他在信里告诉我，他有办法使统一大会党可以取得各种超自然的力量，并且说如果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和他进行接触的话，他将准备运用他的力量来达到这

个目的。我对这位先生的答复是，如果他有这种力量的话，我认为他最好亲自到统一大会党工作委员会去提出他的建议。

不久，我受到了工作委员会的各种指责。正如我预料的一样，他们对于“同志”这两个字感到十分害怕。在他们看来，这两个字显然就是共产主义的同意语。

他们问道：“这难道不是证实他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证据吗？”我除了对他们的无知表示吃惊外，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等待着，听他们另外要说的话。

他们对于我对第二封信的回答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在我回信以前，应该先把那个人的信提交给他们去看——事实上也是说，我的行动是越权的。然后他们就提出我们秘书萨基·谢克的薪金问题，指责我从大会党的公款里每月给他四镑薪金。事实很明显，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把我赶走。

当他们倾泄出他们的最后愤懑的时候，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说，他们坚决反对我成立加纳学院，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事先同他们商量，这是一种越权行为，而且成立这样一个学校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不符合教育部的章程的。

我大吃一惊。

“你们是否想告诉我，我没有和你们商量这件事呢？你们是否也认为成立加纳学院，对于你们大部分人个人来说和对于整个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来说都没有益处呢？”我着手提醒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记忆。

当我和我的五个同僚在北部领土地区被拘禁的时候，有许多大、中学校的学生为着同情我们曾经进行罢课。结果，他们被开除学籍了。当我被释回到索耳特庞德的时候，这些被开除的学生的



家長來見我，竭力請求我替他們的孩子想想辦法。

我曾提醒工作委員會，在我向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以後，他們就組成了一個委員會，我也作為一個委員，來研究這個問題。這個委員會草擬了一項備忘錄，我們把它提交工作委員會，在備忘錄里我們建議，成立一個學校來容納這些不幸的學生，或者想辦法讓他們轉到全國現有的各中等學校去就學。

我繼續說，“由於你們對這些建議漠不關心，你們表現得非常清楚，你們不關心這些學生的處境。你們竟然忘記這些學生是因為在你們受到非法審訊時，對你們表示積極同情而使他們自己陷於目前困難境地的。”

我告訴他們，這純粹是為了保護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的聲望，而他們的行動卻危害了它的聲望，因此我個人才採取行動的。

“你們不要發生這種誤會，認為我這樣作是為了我個人的利益。相反地，這種行動使我在金錢、時間和精力方面都受了很大的損失。”

現在，我已經向他們談到我想談的問題，我於是決定把成立學校的進一步事實詳細地告訴他們。

我曾設法在邊角堡的麥卡錫山租到奧德菲勒大廳，每月租金為八先令。學生們就被安頓在這裡。然後我聘請了三位教師來教這些孩子，這三個教師也是由於同一原因而被革職的。因為缺乏經費，他們同意在學校基金未籌妥前不要酬報。從我的二十五鎊月薪中，我拿出十鎊來購買一些煤油桶、包裝箱和木板，作為第一批學生的桌椅。這批學生的文化程度是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我向工作委員會的委員們說：“可惜得很，你們沒有參加那次開學典禮。如果參加的話，你們會深受感動的。只有大文學家查爾

斯·狄更斯才能够巧妙地描绘当时的情景。但是，谁也没有注意那些光秃秃的木板、煤油桶和包装箱。阳光照耀在这些愉快的学生和教师的脸上格外显得灿烂。请你们相信我的话，他们会成功的，学校也会扩充，因为这个学校是建立在勇敢与决心的巩固基础之上。”

1948年7月20日上午的情景，我记得多么清楚。我没有准备地讲了约十分钟的话。事实上，我那时的大部分演说都是事先并无准备而临时发表的。正如我在我讲话开始时所说的那样，那是一个很简单的非正式的开学典礼。除了教师的少数朋友和一些闻风而来的学生家长以外，没有邀请任何人来参加典礼。当时我鼓励他们说：“当这个学校在将来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的时候，那将是邀请公众来观礼的时刻，请他们来看看一个教育事业的创办情况，这个教育事业在将来书写我国革命高潮时期的历史时、可能证明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我解释说，这所加纳国立学院的任务是解放我国青年的心灵，以便使他们做好准备来解决我国当前的许多问题。

我继续说：“在整个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事业在开始时往往都是规模很小的。”我举出布克尔·特·华盛顿创立土斯基吉学院的情况作为一个实例，这所学校从一名学生发展到数千名学生。

我接着说：“在创办加纳国立学院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负起了一项重大的责任，时代正在变化，我们必须随之变化。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最好的西方文明和最好的非洲文化结合起来。人类成就的奇迹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所谓受外国统治的人民中一旦出现了觉悟的知识分子，这些分子就变成反对外国统治斗争的先锋队。他们就成为争取实现最主要的愿望与抱负——那就是自由地呼吸他们应该呼吸的自由空气的愿望——的骨干。如果在

我們的學校和學院里我們不能找到廣闊的胸懷和崇高的愛國精神，那末就人類而言，我們還能够在別的地方找到它們嗎？

“今天，非洲人已經認識到他們自己的能力。教育與文化的落后狀態乃是歷史條件造成的。”然後我就呼喚現在的和未來的學生們，男生和女生們（因為我希望這所學院將是男女同校），要認識到懶惰是一種罪惡。我說，“開動腦筋吧！發奮學習吧！不斷努力工作吧！我們空前地需要思想家——大思想家。我們需要實行家——大實行家。如果在國家困難的時候你們不能夠幫助它的話，那麼你們所受的教育還有什麼用處呢？”

我說，“儘管我們在開辦的時候，一切條件都很差，但是我卻替你們帶來一個充滿希望和鼓舞人心的音信。我對你們的囑咐是，你們自己以及同你們的教師在書桌上和在黑板前要融洽無間。我希望有一天在黃金海岸所有的四個地區設立一系列的加納學院，最後則成立加納大學。”

我最後說：“我以黃金海岸人民的名義，以人類的名義和以萬能上帝的名義，要求你們邁步前進，使我們建立一個在西非合眾國中的自由和統一的黃金海岸。”

的的確確，加納學院繁榮壯大起來了。一年以後，學生的數目增加到二百三十名，另外還有一千多人申請入學。由於這個學院的成功，我後來就在全國創辦了十多所國立中等學校與學院。

但是工作委員會對於我以統一大會黨的名義所完成的事業，一點也不高興。他們對於整個事情繼續不斷地抱著強烈的不滿態度。

他們的不滿態度一直沒有改變，他們建議我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並且建議給我一百英鎊買一張單程船票到英國去，去干我的原

来工作。

我駁斥了这种建議并且再度否認了他們的指責，我告訴他們說我認为这些指責是捏造的。我的行为发生了一些作用，委员会的一些委員开始搖动起来。他們害怕，如果把我从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中赶走，这个运动可能会完全垮台。他們自己也不能漠視这个事实：我个人已得到了声势强大的群众的支持，而且他們正在开始認識到我是这个运动的存在的关键性人物。因此，他們建議不把我赶走，而建議我来担任司庫职务。我接受了这个职务，因为这个职务非常适合我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工作委员会的目的完全失敗。就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群众來說，工作委员会的意图显然是非常不合邏輯的。他們認为：如果我不适于担任总書記的职务并且沒有能力处理大会党的事务，为什么却認为我适于担任司庫工作呢？此外，他們对于丹凱的話至今記憶猶新，丹凱曾說过：“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都使你們失望的話，克瓦米·恩克魯瑪却是永远不会使你們失望的。”群众爭辯說：如果丹凱在塞康第和阿克拉两次群众大会上能够十分勇敢地說出这种話，他又怎样能够紧接着就譴責同一个克瓦米·恩克魯瑪呢？更使工作委员会感到苦恼的是，群众向統一大会党的办公室寄来了成百封的电报和信件表示抗議。

工作委员会对我感到非常头痛，但是毫無疑問，他們害怕对我的某些怀疑的真实性，因而他們的行动是那么慌张，而且在免除我的职务的尝试方面遭到彻底的失敗。例如，他們当时一定听到了某种謠言說，我的报纸即将問世。

在我担任这个运动的总書記的整个时期中，我曾极力向工作委员会說明举办一种报纸作为这个运动的机关报的重要性。他們



不听我的话，他们的借口是，那会把我們牽連在叛乱案件中。我个人則認為，任何解放运动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宣传工具来向人民群众宣传它的政策，这个运动是不能够成功的。因此，我就以主动創辦加納学院的同样办法，計劃出版一种报纸。

我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購買了一部“克罗珀”式的印刷机，有一位阿克拉印刷商答应我把这部印刷机安装在他的奥斯科报刊印刷所。我的报纸“阿克拉晚报”創刊号在一位助理編輯和四个印刷工人协助下，終於于1948年9月3日問世了，这一天正是工作委员会解除我的总書記职务的那一天。

“阿克拉晚报”一开始就成为这个运动的先鋒，这个运动的主要的宣传者、鼓动者、动員者和政治教育者。这个报纸每天都在唤起人民为他們的自由而斗争，使他們認清腐朽的殖民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猙獰面目。最初，由于缺乏經費，我們每天只能出版单张的报纸，内容包括某些特写、一篇社論、一个“鼓动者专栏”和一个人們最害怕而且談論得最多的“漫游者”专栏。“漫游者”的内容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到处都是它的耳目，并且它毫无犹豫地揭露它想揭露的人。据说，有一位医生曾說，誰想和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房里进行私人談話而不被“漫游者”报导出来，那是十分不可能的事。我还記得，有一位訪問黄金海岸的美国記者曾打算出資一千鎊来和这位“漫游者”会面。

人們对这个报纸的需求非常大，以致群众迫切地等待着購買我們那部小机器所能印刷的份数有限的报纸，因而每份报纸都象紙币一样地传来传去。經銷处不断提高报纸的价錢，一直到每份时常卖到六便士。甚至那些不能閱讀的人們，也会成群地围着一个識字的人，由他从头到尾地念給他們听。一部份标题所使用的簡明詞

句很快地就变成了家常话。“我们宁愿冒险去争取自治，而不愿在平静中受奴役。”“我们有权过人的生活。”“我们有权管理自己。”

尽管报纸销路很好，但是我们并没有赚钱，因为从销售中得来的一切钱都被用来支付工资和购买纸张与其他必要的设备。我们拒绝登载任何广告，因为害怕那些登广告的人会试图影响这个报纸的政策。归根到底，那些登得起广告的人大多数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方面的商人，而他们自己无论如何是不愿意同我们报纸联系在一起的。

当工作委员会看到“阿克拉晚报”在进行政治鼓动方面已经起了很大作用的时候，他们自己便创办了一份名叫“加纳政治家”的周刊。这个周刊在出版后几个月便停刊了，接着他们又创办了“国民时报”和另一种报纸，名叫“谈话大鼓”。但是，这些报和“加纳政治家”周刊的命运一样，不久都停刊了。然而，事实证明，“阿克拉晚报”却获得了重大的成功，因而1949年1月我又在塞康第创办了“早晨电讯报”，由克瓦米·阿弗里叶任编辑，同年12月又接着在边角堡创办了“每日邮报”由科非·巴科任主笔。巴科现任我的国务秘书并兼任执政党议会党团监察人(government chiefwhip)。

当我把“阿克拉晚报”的工作已经推动起来，而且由于在我被免去统一大会党总书记职务后引起了国内紧张局面，我便决定于1948年9月6日前往法属象牙海岸和法属几内亚去休假。这是一次工作中的休假，我访问这些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上次乘船返国时虽然路过这些国家，但没有机会登陆，因而再度前往访问。我当时认为西非的统一仍然是一件极端重要的事。我再度会晤了我在伦敦时期的许多老朋友，他们这时已是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这次旅行是一次很成功的旅行。

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阿克拉晚报”发生了经济困难。因为这个报纸一直没有能够把租金付给那位印刷商（即使双方曾经协议，在我们从销售报纸中获得足够的钱时立即付给他租金），他决定接管全部财务，因而我们就没有钱来支付印刷工友的工资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另找新址，我们终于在马街找到新址，这个地方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报纸的馆址。

在这个国家里流行着这一句话：假使你想知道真相，你就应该读“阿克拉晚报”。然而不幸得很，我们说的话太坦率了，不久我就发现我自己受到了关于诽谤案的控告，要求我赔偿的数目达一万镑之多。控告人都是公务人员，包括警察局长在内。我并不耽心。我没有财产可以没收。除了两套衣服、几件衬衫和一双鞋以外，他们得不到任何东西。当时，在这个国家里还没有破产法。

人民群众在这件事情上全心全力地支持我，他们来援助我，并且设法募集了足够的钱来应付警察局长和其他几个坚决要求立即付款的人的要求。其余的人则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偿付。但是，在我就任总理职务以前，有一些曾经以诽谤罪向法院控告我的不甚显要的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唆使甚至催促来干这件事的，这些官员显然希望把我拖累在这种巨额债务和诉讼之中，从而使我被制服，而且和我的“阿克拉晚报”一起同归于尽。嗣后，丹凯也以诽谤罪向法院控告“阿克拉晚报”，因为它刊载了一篇有关于基比仪式谋杀案的文章。他虽然得到损失赔偿，但他并不满足，他还购买了 this 报纸的版权。幸而我们抢先一步。当时的海德印刷公司立即转让给海耳印刷公司，海耳印刷公司便以新的名称“加纳晚报”继续出版原来的报纸。

但是，最使工作委员会感到恼火的事是，我负责创立了一个青

年讀書會，这个会后来同阿散蒂青年协会和塞康第的加納青年协会形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青年运动，它的名称是青年組織委員會。

自从我們被拘禁在一起期間，在我自己和統一大會黨委員們之間最初發生意見分歧以來，我已經知道我們迟早終于會分裂的。因此，我便決定進行適當的安排，以便在發生這種分裂的時候，我將會得到群眾的充分支持。我把奧蘇（阿克拉的一個區）青年召集在一起，組織了一個青年讀書會。由於當時我還擔任大會黨總書記的職務，我忙得不得開交，我雖然指導這個讀書會的工作，但我自己卻不想擔任該會的主席，從而使自己受到束縛。因此同意由科姆拉·伯德馬（現任財政部長）任主席，那時我和他都住在阿克拉。我們定期地在伯德馬家里舉行會議。

青年組織委員會的目的並不是進行反對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的活動，而是使自己成為民族運動的一個小組。這個會的宗旨是促進民族運動。但是，工作委員會的委員們卻極力反對這個組織。他們認為由於這個會的綱領是“現在實行自治”，青年們過分地抨擊了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的“在尽可能最短時間內實現自治”的綱領。但是他們反對這個組織的基本原因是，這個組織是由人民中比較沒有權利的、或者激進的階層組成的，而且它表達出人民群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願望。這個組織是同他們的保守精神完全抵觸的。

他們認為（而且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這個青年組織是由我負責的。這件事加強了他們罷免我的決心。可惜他們露出了馬脚，因而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內的青年組織委員會的支持者和工作委員會之間發生了公開衝突。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當時那些完全控制民族運動的人們都急于要把我趕走，因為我代表著這個運動的激進的進步階層。



由于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即将爆发，于是我决定到恩济馬作一次短期旅行，在家乡的和平环境里，我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我精神上的宁静。我当时知道：必须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机正在很快地来到，控制权很可能将操在自己手中的时机也正在很快地来临，因而我认识到计划我今后的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回家期间，伯德馬曾在国王乔治五世纪念堂举行了一次青年组织委员会群众大会。通告上说我将向这个大会发表演说。我对此事一点也不知道，当会期日益接近的时候，组织大会的人们越来越焦急，害怕我不能及时赶到阿克拉，而使群众失望。因此，伯德馬不顾一切地在会期前夕驾驶了他的旧车子离开阿克拉，尽速地向恩济馬进发。当他抵达安科布拉河等候渡船过河的时候，恰巧在这时候我站在对岸正要上船。渡船工人抱怨说，对岸有一个急性子的人似乎在寻找什么人。最初我没有注意，但是在河中央时，我忽然听出伯德馬在喊我名字。我立刻大声答应，这使渡船工人大吃一惊，我想他一定认为，我们两个人是没有受到管束的疯子。这时已是早晨四点鐘了。

为着不浪费任何时间，伯德馬连忙把我推进他的车子里。当他不顾车子已经那样破旧而急速掉转头以最大速度行驶的时候，他开始把大会的情形告诉我，并且说，我出席这个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到达阿克拉已是下午三点一刻了，正是大会即将开始的时候。会场里挤满了各界的欧洲人和非洲人。我向他们讲的题目是“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大约讲了两个鐘头。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集会，由于会场收门票，我们给青年组织委员会收集了二百鎊基金。

不久以后，我们又作出安排，訂于1948年12月23日起至26

日止在庫馬西举行一次“加納青年大会”。全国各界青年都被邀請出席这次大会。

但是，在大会即将举行的那一天，政府在广播中宣布說，因为恐怕这次大会可能会扰乱社会治安，警察方面已下令禁止开会。由于这项消息宣布得很迟，許多人已經动身前往庫馬西，因此我們就召集了已經到达的人，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秘密會議，會議进行了一整夜。在这次會議上，我們起草了“加納青年宣言”，这个宣言是在“走向自治”的标题下发表的。这个宣言規定了宪法的形式。青年組織委员会認為这个宪法形式可以作为当月即将召开的“柯賽委员会”的討論基础，并且为了这个目的，把一份宣言送給該委员会。

当时會議还决定，我們應該向英国殖民部拍发电报，抗議当局禁止大会开会。我們認識到要想从庫馬西或者从黄金海岸境内任何地方拍发这种电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馬上跑到三百多英里以外的法屬多哥的洛美去拍发。当我们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們发现那里已經知道了关于我們的消息，因此从洛美拍发这个电报，也同样是不可能了。因而我們只好把抗議書用航空寄出。在归途中，我們雇的出租汽車在离开阿克拉还有九十英里的地方抛錨了。我們当中那些对于机械方面有点皮毛知識的人，都努力显示身手，經過在路旁長時間等候以后，引擎居然发出一种有希望的声音。这部車子好象还听话，馴服地移动了几碼路，后来却劈劈拍拍地发了一陣大脾气，又站着不动了。經過这样几次以后，駕駛員决定說，現在唯一的办法是要小心翼翼地对付它。这就是說开动低速档蝸步地爬着走动。这几乎是我生平最累人的一次旅行，走了八个小时才到达阿克拉，我們都精疲力竭了。

我們拟定在耶穌“复活节”的三个星期以前召开青年組織委員

会的另一次大会，以便使青年作好出席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复活节大会的准备。我們本来很可以使自己免去这次麻烦的，只是因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在索耳特庞德举行复活节大会的时候，它并没有按照规定的議程进行工作，工作委员会委員在會議中首先集中他們的注意和精力于要求立即辞退我的私人秘書，理由是他的任命沒有在事前征得他們的同意而他的薪給又是从党的經費开支的，其次是拒絕恢复我的党的总書記职务。这次大会不欢而散，而且早已散布在工作委员会和青年組織委员会之間的仇恨种子这时更根深蒂固了。

早在1949年6月，青年組織委员会在塔尔克瓦举行过一次特別會議，全国所有的青年組織都出席了。在这次會議中，討論了三个夜晚而且一直开到次日清早。大会討論了两个問題：对于我被免除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書記的职务是否應該默認，以及把青年組織委员会改組为一个真正的政党的时机是否成熟。关于第一个問題，最后做出決議，对于我被免职一事表示反对。第二个問題是比較困难的。青年中的比較年輕的人們，以科非·巴科和薩基·謝克为首，反对另行組織政党，因为他們坚持認為留在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内，青年組織委员会終会夺取主动权的。另外一派是以科佐·博齐約、科姆拉·伯德馬和丹克尔·蔡武（当时他是一位忠心的拥护者，后来变节了）为首的，他們主張，目前情况下，青年組織委员会應該立即完全脫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并組織一个独立的政党，以便从該党手中夺取群众的政治主动性。

于是他們把这个問題交給我。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我的最后决定。我指出，从我对工作委员会委員們在政策和心理方面的丰富體驗中認識到，如果不尽早地組織一个政党来領導人民群众的

話，那将会造成很大的灾难。我們規定在1949年6月12日成立这个政党。

对于这个政党的名称进行了許多次討論。多数人建議把这个党称为“加納人民党”。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这个名称是会被采用的。由于人民群众早已把我的名字同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我觉得这个新政党的名字中如果没有“大会党”这个字样，那将会在人民心中引起怀疑，他們会認為那是一个具有新的主义和新的創辦人的新政党。因此，为了爭取群众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都同意，无论如何也必須把“大会党”这几个字包括在党的名称里。我們最后同意的名称是“人民大会党”。

然后我們替“人民大会党”拟訂了以下六点綱領：

- 一、以一切合乎宪法的手段为黄金海岸各地酋长与人民“現在实现完全的自治”而进行无情的斗争。
- 二、为废除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而發揮强有力的、自觉的政治先鋒队作用。
- 三、使殖民地地区、阿散蒂地区、北部領土地区和外沃尔特地区的酋长与人民取得并保持完全的統一。
- 四、为我国工会运动的利益爭取改善就业条件而努力。
- 五、为适当地把黄金海岸改建成一个更好的国家而努力，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将有权作为自由的人民生活和管理他們自己。
- 六、尽一切可能来协助并促进一个統一和自治的西非洲的实现。

我們就是根据这个党綱来創辦“人民大会党”，并且为未来的斗争而开始組織起来。



---

## 第九章 我党的誕生

紧接着塔尔克瓦大会以后，青年組織委員會的委員們立即赶到阿克拉，以便于星期日（1949年6月12日）在阿倫納廣場举行一个群众大会。当时我們已經知道，工作委員會也有它自己的行动計劃，因此我們必須比它搶先一步。我們在塔尔克瓦开会的时候，工作委員會同时也在索耳特庞德开会，他們在会上决定要把我从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开除出去。他們采取这个步驟並沒有和党的普通成員进行討論，他們企图在我得到机会宣布我党成立以前，先公布他們的決議。我获得消息說，他們已經发出了一个新聞稿，准备在星期一的报纸上公布。由于我們的迅速行动，我們完全占了他們的上风，以致使他們完全沉默下来，并且始終沒有公布开除我出党的消息。

于是，1949年6月12日的这个星期日，我在大約六万听众面前宣布“人民大会党”的成立。毫無疑問，这是在阿克拉举行的空前盛大的集会，虽然那时正值雨季，但那天阳光却灿烂地照耀着。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当我站起来答謝兴奋的群众所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欢呼时，我心中十分感动。

在我的演講中，我历述自从我回到黄金海岸以来进行政治斗争的全部情况；提到創辦加納学校和学院的情况；提到“晚报”为着

它的生存而克服許多阻撓进行斗争的情况和把全国青年組織起来成立青年組織委员会的情况。我指出，青年組織委员会和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基层群众之間并不存在任何冲突。事实上，这两者的成員同样是那一些人，因为凡是申請加入青年运动的人，必須首先成为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党员。如果有什么冲突的話，真正的冲突乃是青年組織委员会和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工作委员会之間的冲突，因为前者要求“現在实现完全自治”，而后者要求“在尽可能最短的时期內实现完全自治”。

我向他們引述了1949年5月24日“泰晤士报”的一段消息，这段消息报导說，黄金海岸民族主义政党的司庫是“一个真挚而苦干的狂热者”，他已經发动了一个青年运动，并且鼓动要在本年內实现自治。

我接着就对所以要求“現在实现完全自治”的理由予以闡述，指出当时工党正在英国执政，这对于我們的要求是比較有利的。如果明年保守党重新上台，我們爭取独立的斗争可能会受到镇压。我引用丘吉爾的話来支持我的論点，丘吉爾說过：“我就任英王陛下政府的首相，并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解散。”

我提醒人民，我們的国家是我們自己的，我們不願意繼續过奴隶生活，遭受剝削和压迫；只有在完全自治的情况之下，我們才能够发展我們的国家，使我国的人民能够享受現代文化的福利和安乐。我向他們解释，我們必須用一种积极行动的綱領来支持我們的自治要求，那就是要进行合法的鼓动、报纸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并且在非暴力的原則下运用罢工、抵制和不合作办法。我劝告說我們不要施用外交手腕和計謀。我向他們指出：英国本身是一个运用外交策略的老手；我們的坦白和坚定的态度会更加受到英国

的重視。我們如果采取合作和妥協的政策會使我們要求立即自治的鬥爭遭到失敗。

我宣稱：“如果我們要想拯救我們的國家不再繼續遭受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那末現在已經是我們必須採取一種明確的行動路線的時候了。為了防止青年組織委員會（它正在準備採取行動）和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的工作委員會（它正要出來壓制這個進步的青年組織）兩者之間繼續發生糾紛，青年組織委員會已經決定採取一條符合於我國各地酋長和人民的政治願望的行動路線。”

群眾瘋狂似地歡呼起來。我費了很大的努力才使他們平靜下來。我繼續說，我們決不容許對於立即實現自治的要求作出讓步，並且說，如果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我們就不用害怕或為我們將要採取的重大步驟擔憂。由於群眾預計到我接着所要說的話，他們又大聲地歡呼起來。

我說：“在一切政治鬥爭中，有時會出現一些千載難逢的時機，這種時機往往難於辨識，但是一旦錯過，關係就重大了。在這種時機中我們必須去冒險，而普通人民就是我們從事這件工作的力量源泉。

然後我以更嚴肅的語調來說話。我接着告訴他們，我們政治鬥爭的當前危機已經使我處在很困難的地位；並且告訴他們說，我面臨着三個重要問題，而且我必須立刻知道在這裡開會的人們的願望如何。

我問他們：“在我們政治鬥爭的現階段中，我能不能卷起鋪蓋離開我們親愛的加納呢？”

“不！不！一定不能！”群眾們憤慨地叫喊起來。

“或者，我能不能留在这里而把我的嘴封閉起來呢？”

“不能！不能！要說話！留在这里张开嘴說話！”他們叫喊着。

“那么，我能不能脫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面前发抖和畏縮的那种领导机构，而把我的命运同我国各地酋长与人民联系在一起，共同爭取現在实现完全自治呢？”

从那个拥挤的阿倫納广场发出了一致贊同的呼声，这是我所需要的最后的鼓励。当时，我深信無論发生什么事，我已經获得了人民的全力支持。

当群众呼声略为安靜下来而能够听到我講話声音的时候，我馬上对群众給我的支持表示感謝。我宣告說：“現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訴你們，由于目前的政治紧张局面，青年組織委员会已經决定把它自己改变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党，其目的是为促进現在实现完全自治而斗争。”

然后，我代表青年組織委员会，以各地酋长、人民、統一大会党群众、劳工运动、我們英勇的退伍軍人、全国青年运动、普通人民、我們的孩子們和尚未出生的新加納的主人翁，以及于1948年在克里斯兴斯博格十字街头壮烈牺牲的阿杰特酋长和他的同志們的名义，并且以全能上帝和人类的名义，向大会群众宣布了“人民大会党”的誕生，这个党从这天起将在公認的政党制度下，为解放我們亲爱的加納而不断进行斗争，在为全国各地酋长和人民贏得完全自治以前，决不停止斗争。

沸騰的欢呼終于停止以后，接着是一片寂靜。大会上，我們每个人在那个时刻都深深地感动了。我們已經决定由我們自己来掌握我們未来的命运，并且我相信，在那几分鐘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忽然自覺到我們已經承担的重任。但是，从人們的面部表情上，我沒有看到遺憾和怀疑，我看到的只是决心。



在随后的星期四，6月16日，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工作委员会和追随它的残余分子在帕拉迪姆劇場举行了一次會議。当奧貝澤比·兰普台在他的演說中指到我的时候，他却用“外来人”这个字眼，并且在会上說，他不了解为什么形成阿克拉居民多数的加族人民，会讓他們自己受一个外地人的领导。这种話使那些参加會議的人們受不了，这次集会在对他不利的喧囂和紊乱中結束了。陈腐的部族主义的基础第一次遭受了无可弥补的打击。

当工作委员会鼓起勇气，面对事实，即承認青年組織委员会确实已經改組成为具有一个明确政策和一個与他們不相同的綱領的独立政党的时候，其中有少数右翼的委員表示焦虑。他們便邀請了一位塞康第的律師、一位美以美教會的牧師和另一位犹太教會的牧師來設法解决我本人和工作委员会其他委員之間所發生的糾紛。这些調停人开了会，对于分裂的起因和后来組織人民大会党的种种事实作了多番考虑以后，他們建議應該恢复我的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書記的职务，同时人民大会党仍应存在，但須作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之內的一个先鋒政党，因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認為它本身是一个民族运动，而不是一个政党。

我虽然答应接受這項建議，但是工作委员会其他委員都反对這項建議。結果除了主席乔治·格兰特以外，这个委员会全体委員集体辞职。工作委员会这种不民主的行为証实了我以前的忧虑。在这些人辞职以后，我立即劝告格兰特召集一个特別代表會議。7月里，这个会就在索耳特庞德举行。除了受权出席的代表和工作委员会的前任委員們以外，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四、五万人。工作委员会的前任委員們害怕可能发生什么事故，便邀請警察前來維持秩序。

这个代表會議同意了塞康第調停人的建議，并且要求选举新

的工作委員會的委員以补足因辞职而出現的空缺。工作委員會的前任委員們極力反对举行这种选举，他們認為他們是自动辞职的，因此代表們首先應該建議恢复他們原有的职务。这个問題造成了僵局，于是便选定了两个新的調停人来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次被选为調停人的是两位會長，他們建議：應該恢复我的統一大会党总書記职务，但是人民大会党应予以解散。

不顧这一切对我将发生什么影响，也不顧事实上这一定会引起拥护我的人們的反对，因为，他們是不准备接受任何妥协的，我仍然表示同意接受他們的决定；但是必須有一个条件，出席會議的代表們应当选出一个新的执行委員會跟我在一起工作，以执行會議將决定采取的政策。果然不出所料，工作委員會的前任委員們都反对我的建議，因为他們看得很清楚，他們已經失去了大会的信任。他們害怕的是，如果举行一次选举，那将会批准他們辞职，并且将会选出一个进步的新工作委員會来代替他們的地位。不久后，代表們对主席和工作委員會的前任委員們都投了不信任票，他們的害怕就都証实了。

紧接着我便接到一张便条，要我到会场外面去。在那里我遇到了一群情緒激昂的群众。

他們一見到我，就叫喊起来：“辞职！来領導我們，我們將在一起斗争到底！”

我立即認識到，他們是真摯而有决心的。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他們需要我来領導他們。我已經激動了他們的內心，而且他們也已經表現了他們对我的信任；我現在决不能使他們失望。我便很快地下定了决心。

我說：“我決定領導你們！我決定今天就来領導你們。”

我赶回会场，并且宣布我已经决定辞职，不仅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并且还要退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代表们当时就象会场外的群众一样欢呼起来。

我站在一个讲台上，四周环绕着急切期待中的听众，我索取了一支笔和一张纸，垫在一个人的背上，写出了我的正式辞职书，然后向群众宣读。立即引起了反应，他们的欢呼声简直是震耳欲聋。当时有一位支持我的妇人跳上讲台，带头唱出“慈光向导”之歌；从此以后，在人民大会党的集会上多半都唱这首歌。

由于精神紧张和情绪激昂，听着这首歌简直使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我用手帕掩住我的眼睛，在场的许多人也跟我一样。我受到群众这样热烈的爱戴，使我不得不采取行动，我已经奋身结束了一个战斗而又开始面临着另一个新的战斗。但是，这一新的战斗是我所迫切要求的，这个战斗必须以实现我对群众所作出的诺言而结束，他们对我的领导已经那样快地表现了绝对的信任。这一切忽然使我感到自己渺小而孤单，我流泪并不是出于悲哀，而是出于一种喜悦和决心献身的感情。我站在拥护我的人面前宣誓，我要献身于加纳的事业，必要时将不惜付出自己的鲜血。

这次大会标志着黄金海岸民族主义向右走和向左走的路线终于明确分开，标志着从英国帝国主义所实行的间接统治走向人民新的政治觉悟。从此以后，斗争将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动的知识分子和酋长，一方面是英国政府，另一方面是以“现在实现自治”为口号的有政治觉悟的群众。

由于人民大会党的成立，并从而把政党制度引入这个国家，这就奠定了议会民主的基础。全国各地展开了紧张的运动，由于青年们不懈的热忱和群众自动的合作，不久后全国各地，甚至在最辽

远的村庄里也都能看到紅、白、綠、三色党旗在粗糙的木質旗杆上飄揚。

党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是由八个委員組成的，由我本人担任主席。这八个委員是：科佐·博齐約(任書記)、克·阿·伯德馬、納·阿·韦尔貝克、克威西·普兰吉<sup>⊖</sup>、科非·巴科、克·伊杜塞和其他两人——丹克尔·蔡武和阿希·尼科，后来这两人都叛党了。自从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后，还互选了其他优秀的黨員为候补委員，这些后补委員要經過两年才有資格作正式委員，而且除非有了空缺，否則即使屆滿两年，他还并不能自动地成为正式委員。

人民大会党有許多成就應該归功于妇女黨員的努力。自从党剛成立的时候开始，妇女就是主要的实际組織人。她們跑遍了无数的乡鎮，进行宣传工作，而且对于促进党的团結和巩固方面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这些妇女的热情真是已經到了这种地步：当我身在監獄中而党組織正处于极其危急的时期，我听到在庫馬西举行的一个群众集会上，有一位自己改用阿馬·恩克魯瑪(“阿馬”这个女用名字相当于“克瓦米”这个男用名字)做名字的女黨員跑上講台，她在結束她的激烈的演說时，竟抓出一把小刀在她的脸上乱刮起来。当时，

---

<sup>⊖</sup> 克威西·普兰吉(他已逝世)是1950年6月当选为立法議会的第一个“人民大会党”的議員。在人民大会党早期的組織工作中，他在为全国青年获取选举权方面起了极有价值的作用。当柯賽委员会建議选举年龄应規定为二十五岁的时候，普兰吉認為这种規定是蓄意不讓青年参加政治活动。他在立法議会上用一項民主原則提醒了會長們，這項原則是“不选派代表就不繳稅”，他說，按照這項原則，全国青年在他們尚未达到二十五岁以前，他們将会拒絕繳付部落賦稅，于是他終於取得了胜利。



她的遍身沾染了鮮血，她還向在場的男子們挑戰來學她那樣做，借此表明：他們在為自由和獨立而進行的共同鬥爭中，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不久，我們設法弄到了幾部汽車，我們便在汽車上裝上了擴音器。此外還有“阿克拉晚報”、塞康第的“早晨電訊報”、和邊角堡的“每日郵報”，這些在為黨做宣傳工作和鼓動民族主義精神方面都起了急先鋒的作用。有些人罵我們是“游蕩之徒、無賴之徒和共產黨人”，他們並不能阻撓我們；我們的成功正是他們的失敗。我們所以成功，是因為我們接觸了人民，因而了解他們的心境和痛苦。同時我們並沒有排斥任何人。因為，如果民族運動要獲得成功，那就必須讓每一個善良的男人和女人都起作用。

## 第十章 积极行动

不久就看到，不仅是人民群众中充满了不安情绪，而且政府官员、各地酋长和知识分子中也充满了不安情绪。但是，他们不安的原因并非由于他们遭受到痛苦，而是出于他们的恐惧，他们害怕如果不采取行动来制止这种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和这种突然高涨起来的青年人和普通人的政治觉醒，他们将会受到痛苦。我在阿克拉6月群众大会所用的“积极行动”这个字眼，引起了我的政敌们的惧怕，当大家都知道我想领导党开展一个“非暴力的积极行动”运动的时候，我马上听到了谣传说，有人计划把我从阿克拉驱逐出境。事实上，当地的黄金海岸广播电台已宣布说，我已经被驱逐出首府阿克拉了。此后不久，我收到一封信，要我出席加族土邦会议（这是一个传统的机构），去讨论“本国不幸的不法分子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我带着我的两个拥护者前去，使我很惊讶的是，我发现在场的人们之中有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工作委员会的前任委员。拟定的会议议程始终没有告诉我。所有的发言都集中在一个主题上，整个会议的目的似乎是在谴责我把“积极行动”这些字眼传入本国，并从而产生了使用暴力之虞。

“你所说的积极行动的确切含意是什么？”他们问我。

我从容地、尽量詳細地向他們解釋，但是不出我的所料，我却沒有使当时在場的我的某些老政敌感到滿意。担任这次會議主席的是加族大會長加·曼契，他于是建議：我應該召集我的拥护者舉行一次會議，由我用我剛才所解釋的話向他們解釋積極行動的含義，並且在作完這件事以后再向土邦會議報告。我同意這樣做，並立即離開了那里。

我認為應該把這個問題用文字紀錄下來，作為一個正式聲明。因此，我拿起鉛筆和紙張，經過几小時便寫成了一本題為“我所說的積極行動是指什麼”的小冊子。我在小冊子里說，由於“積極行動”這個名詞一直被人誤解和誤傳為是一種暴力威脅，因而使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們感到慌張不安。我曾被招喚出席加族土邦會議，我在那里向出席會議的人解釋了這個名詞的真正含意。該會最後作出了一項建議，要我召集人們舉行一次會議，來作同樣的解釋。我否認我將被驅逐出境，並且對外國報紙所說的關於各地會長要求我在“柯賽報告”公布時不要製造困難這一項捏造的報導表示抗議。這個捏造的報導說，如果我拒絕這項要求，我將被驅逐到恩濟馬去。

我接着討論到自治的目的問題，並且肯定地指出：下一步驟乃是一個戰略問題；雖然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以及頑固的帝國主義者）都承認我們對自治的要求是合法的，但是，只有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我們才能成功。

我指出，現在有兩種方法可以實現自治，一個是用武裝革命的方法，另一個是採用合乎憲法和法律的非暴力方法。我引証了兩個例子，即英國用武裝力量擊退了德國兩次侵略企圖，和印度用道義壓力戰勝了英國帝國主義。我贊成採用後一種方法。但是，自

由是不会放在銀盘子里給任何殖民地国家送来的；只有經過艰苦和英勇的斗争才能贏得自由。由于殖民地的教育落后，大多数人 是文盲，因而他們唯一能够懂得的事情就是行动。

我解释积极行动就是：采取我們能够用来打击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力量的一切合乎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我們的武器就是：合法的政治鼓动、新聞报纸和教育运动，而作为最后手段的是，依据绝对非暴力的原則在宪法范围之内运用罢工、抵制和不合作，就象甘地曾在印度所运用的那样。

这个小册子接着說，政府似乎不喜欢听取我們的警告，他們似乎宁願我們向他們发动出乎意外的行动。但是，我們却宁願选择正义与公平和采取正大光明的行动。我們沒有任何隐瞒別人的事，人民大会党的党员作为一个民主組織的成員，拥有一切权利来准备应付任何意外的情况。

我又說，在爭取自治的其他各种道路尙未被堵塞以前，将不采取最后阶段的积极行动。我們願意首先研究“柯賽报告”。如果我們发现它對我們有利，那么就諸事大吉；如果對我們不利，我們將要提出我們自己的提案和建議。如果这些提案和建議遭到拒絕，那么我們將依照上述路綫来采取积极行动。

我們大家都要求自治，我們有合法的权利来自行决定我們所願意采取 的政府形式。我呼吁人們要保持鎮定而坚决的态度以等待柯賽委员会的报告公布出来。

經過在“晚报”館的“克罗珀”式印刷机上通宵工作，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鐘以后，我已設法把这个小册子印出了五千份。当天下午，我在阿倫納广场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并向群众宣讀了我的声明。然后我便向加族土邦會議报告說，我已經做到了他們所期望的



事情。

此后我立即到西方省作了一次旅行，目的是向比較偏僻地区的人民解释什么是积极行动，以及如何利用积极行动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我在各地都強調說，只有在一切其他办法行不通的时候，才采取积极行动这个措施。

1949年10月底，柯賽委員會的报告公布了。大家都認為它作为走向宪法改革的一个步骤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普遍的不滿情緒达到了这种尖銳程度，以致我决定必須采取某些行动。因此，当我旅行回来的时候，我便于11月20日召开了加納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庞大的集会还是这种集会的第一次，出席的有五十多个組織的代表。事实上，全国只有两个組織沒有代表出席（拒絕接受邀請的各法定的“地区委員會”〔Territorial Council〕除外），那就是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执行委員會和保障土著居民权利协会。后者在当时名义上虽然存在，可是实际上在全国事务方面却沒作任何积极活动；尽管如此，我原来仍然打算邀請他們出席这次大会。但是，由于該会主席对待我駐在边角堡的两位代表极其无礼，我就不得不撤回對他們的邀請。

我召集这个大会的目的，是在于集中公众对于“柯賽报告”的輿論，并促进人民采取有效的行动。大会決議：“‘柯賽报告’和英王陛下政府有关的声明是全国所不能接受的”，并宣称：“立即給予黄金海岸人民以自治，即以‘威斯敏斯特法’为基础，給予在英联邦內完全的自治領地位。”大会还拟訂了一份备忘录，列举出大会希望編入新宪法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組織。

以济布·达尔庫爵士和納納·奧弗里·阿塔二世为首的多多瓦的酋长們，不同意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张。我本想就这个問

題竭力和他們作进一步討論，希望达成某种協議，但是該土邦會議的某些成員、尤其是主席納納·奧弗里、阿塔二世所发表的講話，是用这样荒謬和含沙射影的下流語言，我認为已經沒有同他們取得和解的任何希望了。由于这次旅行沒有什么結果和會長們的不愉快态度，我很沮喪地回到了阿克拉，但我繼續促請政府对于人民要求召开制宪議會这件事予以考虑。

我召集人民大会党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會議，我根据該会的授权，于12月15日致函通知总督說，如果他的政府繼續蔑視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柯賽委员会报告的修正意見書上所具体表現的人民的合法願望的話，那么人民大会党将发动一个以非暴力和不合作为基础的积极行动运动，同时人民大会党將繼續这样做，除非英国政府考虑到加納人民的权利，讓人民召开他們自己选出的代表組成的制宪議會来討論柯賽报告，并且在可能时拟訂一个新的宪法。总之，我們准备摊牌。

同一天，我在“晚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激励人心的文章，題目是“积极行动时期日漸临近”。随后，我在阿倫納廣場的一次大会上提醒人民要准备采取积极行动。我告訴听众說：如果从那天起的两个星期以內，英国政府对于我們关于召开制宪議會的要求沒有什么作为的話，那末此后我們將随时采取积极行动。但是，我強調告訴他們說：那时不准发生劫掠或火烧房屋行为，不准发生任何种类的暴动、搗毀或扰乱行为；我們事业的成功将依靠我們斗争的非暴力与和平性質。

政府接受挑战，发动进攻，向我創办的、当然支持运动的各报編輯提出了一系列控訴。有好几位編輯被捕入獄，不久我本人也被法院传訊，由于塞康第“早晨電訊报”登載了一篇文章，我被控告

犯有藐視法令罪。那时法庭里挤满了人，还有几百个不能挤入屋子的人喧囂地聚集在外面。由于他們热情地、不断地示威来对我表示支持，大家都很难听得到法庭里的审問。最后判决我罰款三百鎊或四个月徒刑。幸而有阿克拉人民和許多黨員集合在一起，設法筹足了应付的罰款，我才能够繼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鼓动和斗争。

此后不久，我又作了一次国内旅行。当我在外旅行期間，气象工作雇員工会和政府之間曾經发生了一次糾紛。双方談判破裂，气象工人向工会大会发出呼吁，工会大会向他們表示同情，并表示乐意支援他們。工会大会同意：如果气象工作雇員工会的要求不被接受，它将宣布罢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罢工的威胁促进了群众对积极行动的拥护。当我旅行归来知道解决糾紛的一切努力已告破灭的时候，我曾設法进行調停，看看我能否促成和解，可是政府却不接受这个建議。但是，后来由于进行了調停，总算遂了我的初衷，使这一次罢工延期而沒有在那个特殊时期举行，因为万一那时采取积极罢工，就可能危及积极行动的成功。

当我不在阿克拉的时候，警察似乎在到处找我，因为要交給我輔政司魯·赫·薩洛韦(曾在印度服务)的一封信。在我回到阿克拉那一天的半夜里，这封信終於交到我的手里。信里邀我第二天早晨到輔政司办事处去見他。我立即召集党的执行委员会举行會議，并且向他們提出这个問題。他們一致同意我應該应邀前往。

第二天早晨，我和三位同事一起动身，在我同輔政司談話的时候，他們等候着我。我直截了当地談到問題中心，并且很清楚地說明了我的立場。

“这一切都很好，恩克魯瑪先生，”薩洛韦先生并不冷淡地說：

“但是事态发展到这一种地步，我必须找一个办法使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秩序。”

我回答道：“但是，就你们政府官员来说，所谓秩序就是意味着镇压人民群众，使他们受你们的摆布，听从你们的指示，和服从你们的指挥。现在全国人民都有了政治觉悟，谁也没有办法那样容易地哄他们再沉睡下去。人民要求泄出他们的积忿。”

“但是，你是否知道，你现在所计划的积极行动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骚乱而终于扰乱治安呢？”辅政司略停一下，让我深深思索这些话。“我想我应该这样来警告你：如果由于这种积极行动而闹了祸——万一有人被杀或受伤——那将由你个人负责。在你采取这种步骤以前，你必须慎重考虑。例如，拿印度来说，”他接着说。“印度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印度人习惯于忍辱负重，而非洲人却没有那种忍耐精神。我的朋友，记住我的话：在三天以内，这里的人民将会使你失望的——他们决不会坚决进行下去的。现在，如果这里是印度的话……”

我打断他的话说：

“萨洛韦先生，如果我到现在还没有使你搞明白，就必须让我说得十分清楚。倘若英国政府对加纳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拒绝予以考虑，那么除了实行我对人民所作出的诺言，并宣布进行积极行动外，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现在所要求的只是成立一个制宪大会，这只需要把全国分成为许多选区，举行普选，并让人民自行决定他们是否接受柯赛报告就行了。”

他说他很同情我，但是他却没有给我保证，说明政府方面将采取什么措施（即或作一次尝试）来考虑我的要求。我向他道别，并立即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向他们报告这次谈话的结果。他们全



全意地支持我。我同薩洛韦先生举行第二次会談的时候，我們方面有四个人出席。我从党里挑选了三个人，他們的意見不象多数人那样激进。我們談論到那个老問題，仍然沒有达成協議。

同一天，当地的广播电台宣布說，我們已經放弃了积极行动。很明显，由于政府官員認識到我同輔政司会談失敗可能产生的結果，他們便匆忙地采取各項措施，使群众遵守法律和秩序。我立即在阿倫納廣場召开大会，并向出席大会的群众充分地說明：积极行动絕對沒有被放弃。跟官方的希望完全相反。就在那周星期六的晚上，我們通宵地举行了执行委员会會議，會議决定：如果到第二天仍沒有得到輔政司的滿意答复，我們即将宣布采取积极行动。

薩洛韦先生的确送来了一封信。信上說，那一天，政府正在考虑这整个問題，并且說，因此必須暫緩采取积极行动。这天整个上午和一部分下午过去了。我們的神經很兴奋，气氛很紧张。工会大会原已在两天前的1月6日午夜开始罢工。到了下午五点钟，我認为不能再等待了，便在阿倫納廣場召开大会。我在会上向人民宣布，除了医院工作人員，自来水和其他公用事业部門的工作人員以及警察以外，从午夜起一律应举行总罢工。人民的反应是很迅速的。加納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已經开始了。

会后，我立即赶到角边堡、塞康第、塔尔克瓦和各矿区，我在各地正式宣布采取积极行动。当我于1月10日回到阿克拉时，我很懊恼地发现采取积极行动的人民的热忱正在消退下去。我的头脑中想起了薩洛韦挖苦我的話：“現在，如果这里是印度的話……”但是，这次热忱消退的原因是，殖民政府在利用广播电台作为宣传机器，在各个地区宣布說，大家應該象其他地区的兄弟們一样恢复工作。正如角边堡的“每日邮报”所描述的——它的編輯人員为此

受到迫害——这是“一个撒谎运动”。

当我看到阿克拉有些店舖已經開門，試圖恢復正常營業的時候，我覺得有必要作進一步的鼓動工作。因此，在1月11日清早，我離開黨總部（我住在那裡），穿著北部領土地區的服裝，徒步走到“晚報”館，準備重新發動一次運動。我還沒有走出三百碼的路程，這時就有一群情緒激昂的、各行各業的、擁護我的人群跟著我走。當我們向前走的時候，人們越來越多，等我們走到“晚報”館附近的馬街中段，這時人群已擁擠到這種程度，似乎再也插不進一個人，並且使一切交通都停頓了。為著疏散人群，我告訴他們都到阿倫納廣場去，我將馬上到那裡去和他們聚會。儘管如此，幾百個人還是追著我不放，情勢這樣緊張，以致我不得不鑽進一輛出租汽車到住在奧蘇（阿克拉的一個區）的我的一个朋友家裡。我在那裡大約休息了一小時，同時安靜地思索我的計劃。

然後我就到了阿倫納廣場，阿克拉全體居民似乎都聚集在那裡。我大概向他們演講了兩小時。大會結束時，政府的任何宣傳機器都再也不能使他們平息或控制他們了。他們的血沸騰了，他們要求正義。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獲得正義以前，他們決不罷休。不久，全市都感到緊張起來了，當天晚上七時，當局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實施宵禁，我們大家對於這件事並不感到驚異。

積極行動現在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所有的店舖都關上了門，火車停在車站里，一切政府機關都停止辦公，工人們都呆在家裡。全國的整個經濟生活陷入了停頓狀態。公共集會受到了禁止，所有黨的信件都被折開檢查。“晚報”、角邊堡的“每日郵報”和塞康第的“早晨電訊報”都進行鼓動，勉勵工人們站穩腳跟，並繼續進行積極行動。這時“晚報”受到了警察

們的袭击和封閉，報紙被禁止出版。我的其他两处報紙也遭受同样的命运。

此后，逮捕事件开始了，首先是庫馬西的，然后是塞康第的党的领导人被逮捕了。我的每个編輯都被捕了。“晚报”的編輯因为发表了一篇题为“駛向海岸”的文章，以扰乱治安罪而遭逮捕；“每日邮报”的編輯因为在該报登載了题为“撒謊运动”和“我們为自由講話”这两篇文章而受到同样罪名的控告；“早晨电訊报”的編輯以藐視法令罪而坐牢。

当积极行动差不多达到它的高潮的时候，我們收到了“各省酋长联合会議”的邀請，要求人民大会党、退伍軍人和工会大会的领导人到多多瓦跟他們举行会議，以努力寻求某些諒解并謀取与政府达成和平解决的办法。有消息說：政府与各省酋长联合会議是在企图逮捕主要支持者以便鎮压积极行动。在工会大会代表从塞康第动身以前，他們接到总部的通知，叫他們不要出席这个会議，因此他們就沒有前往。退伍軍人还没有到达多多瓦便遭逮捕了，当我和我的三个同伴安全地到达会議地点时，我們发现我們是到会的唯一的客人。

我再度向各省酋长联合会議陈述了加納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

“我們人民相信，我們要求举行制宪議会的选举是合理而正当的。我們將不接受那些不彻底的措施。柯賽委员会的报告对于我們全体人民來說是一件极关重要的大事，但人民群众却没有代表出席这个委员会。現在，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我們对于这个报告應該享有表示反对或表示接受的机会。如果我們的要求沒有受到考虑，那么我就只能告訴你們，积极行动將繼續进行。”由于我坚持了

我的立場，他們接着对我发表的言論是极端狂暴无礼的。

“这是很明显的，”丹凱說，“根据克瓦米·恩克魯瑪的想法，法律一定要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然后他又說：“我認为，那些反对合法的政府当局的人們必須准备为此付出他們的脑袋。”

随着这个卑鄙的會議以后，他們在“黄金海岸公报”上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攻击我和人民大会党；这个公报是由政府出版的，現已改名为“黄金海岸評論”。

就在这个期間，我在阿倫納廣場发表一篇演講說，如果各地酋长在人民为爭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不同人民合作，那么总有一天他們“将会光着脚惶惶逃跑。”

这时几乎每天都有警察来袭击党的总部，他們希望尽量地多抓住一些领导人。当他們搜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毫不介意地瞧着他們，因为我同他們一样清楚地知道，目前我是安全的。我是他們的最后目标。在我尚未遭到和我的同志們同样的命运以前，我必須首先注意他們在监牢里是否都安全。也許他們認为我会被吓倒，認为我会跑到英国政府那里，卑躬屈膝地为我的罪行請求寬恕。可是我的神經比以前更鎮定了，我完全可以同他們坚持到底。

1月17日，科佐·博齐約被捕了，他被拘禁在警察局里，我設法每天送食物給他。因为他是党的总書記，他的办公室受到了翻箱倒櫃的搜查，所有党的文件都被沒收了。

在阿克拉的街头上，叙利亞人、黎巴嫩人和英国人被派任为特种警察，拿着警棍帮助警察恢复秩序。其中有些人狐假虎威地作威作福，只要有人偶尔走近他們的面前，他們就把他打一頓。阿克拉变成了屠杀場。在这个时期，許多人失踪了，并且从此下落不明，当然还有許許多多的人受了伤。



当退伍軍人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和警察发生冲突而导致两名非洲警察死亡的时候，事态发展到了严重关头。政府随即加紧镇压，每天被捕的人数不断增加。1月21日的星期五夜里，我的大部分同志被他们逮捕了。事实上，我漏网也不过是偶尔碰巧而已。如果当时我被逮捕了，我深信，以当时的紧张局面再加上两名警察死亡而造成的紧张气氛来说，在他们企图进行最后一网打尽的猖狂行动中，我可能被他们打得粉身碎骨。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一天下午四时，我离开了党的总部去访问住在拉巴第的一位同志。在我到达他家时，我才知道他已经到几英里外他的农场去了，因此我决定等他回来。但他回家时已是六点鐘了，因为这时正是宵禁时间，我便不能离开他的家了。我的朋友借给我一张床毯，我便睡在地板上。这天夜里，我作了一场栩栩如生的梦。有一顶很大的黑伞就象一个庞大的帐篷一样渐渐落到我的身上，一直到把我完全闷在里面，大约把我窒息了五分钟光景；当时我感到呼吸困难而不断挣扎。然后这顶伞上升了，我醒过来，朦朧中似乎看见它在远处消逝了。按照非洲人的说法，这种梦是九死一生或逢凶化吉的预兆。

第二天早晨八时，我离开朋友的家，回到党的总部。我一走近那里，就看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已经彻底搜查过了；并且在耐心地等待我回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甚至把我私人的仆人尼亚美基和他的几个伙伴一齐抓走了，在警察局遭到毒打，他们希望这些人招出口供，说出我究竟躲在哪里。可怜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当有一位警官看到我的时候，他马上向我跑过来，他显然认为我要拔脚逃走。我的态度十分镇静，以原来的步伐向原来的方向

繼續走过去。当他抓住我的手膀告诉我已被逮捕的时候，他几乎有一种抱歉的神情。

“好吧，”我说，“但是先让我进去收拾我的东西。”


然后我被带进一辆装有无綫电的警車，我在車里听到无綫电广播說，一切都很平靜。它冷靜地宣称：“在逮捕的現場中沒有发生騷动，情况十分平靜。”我怀疑，难道他們忘記了积极行动是一个非暴力运动嗎？

在抵达警察局的时候，我第一次了解到，我已变成人們好奇心的对象。聚集在那里的群众，有非洲人，也有欧洲人，我相信他們是在期望看一个十分惊人的場面，看一看这种神奇的革命人物的最后落网。当一个普通模样的非洲人安詳地走出警車、不加任何反抗而走到警察局里面去的时候，这一定使他們感到有些失望。走进警察局，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再不用看到那种好奇的眼光了。

我被搜查了一遍，然后被带到警察局长面前，他向我宣告罪名。后来，我被押到詹姆士堡監獄，在我被提审以前，我一直被拘押在那里。

由于我預料我終將遭到逮捕，因此在我不久前旅行全国的时候，我曾向人民說得很清楚，万一我遭到逮捕，他們應該保持鎮靜并且不要举行任何示威，这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我被拘捕时，并没有发生騷动事件。

我想，“人民会支持我到底的。我永远不能使他們失望。”



## 第十一章 审讯和下狱

我受审讯的时间总有一个星期左右，在这个时期，我始终被押在监狱里。不过至少我能够同我的伙伴见面，并讨论我们的共同问题。但使我最为反感的是来来回回地把我拖到审讯室去，使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经常中断。有些不守纪律的狱卒使这种情形更为恶化，他们显然以能威吓和驱使这样多杰出的人物而感到得意。他们从来没有看守过这样多政治犯，因而借这个机会大显威风。

我只好听天由命，我曾经预测我将来可能遇到的种种遭遇，并准备接受这些后果。这完全是我所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当然，这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因为它意味着推迟达到自由的最后目的。但是，当我一旦刑满出狱，我就能够立刻重新担负起我所遗留下来的各项工作。我早就了解到，在殖民地的斗争中，当我们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得到公平审判的。因此，对于我的案件进行辩护的想法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因为不管进行什么样的辩护，我感觉当局不会允许我和我的同事免于判罪，因为在殖民制度下，司法和行政是两位一体的。

但是，有一些追随我的人，他们不了解当局如何对待革命运动中鼓动起义的人，一定要我找律师替我们辩护。虽然我知道这完全是浪费金钱和精力，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同事在未来的岁月中觉

得我們沒有进行过法律上的斗争。我感到，即使我們失敗了，我們力爭的事实可能会使他們在服刑期間觉得愉快一些。

要找一个非洲籍的律师出庭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英国找了两个能出席高級法庭的律师到非洲来。这两位先生尽他們所有的力量来帮助我們，但是我想，甚至他們从一开始也一定知道，和这样坚决的力量战斗是毫无用处的。我們的律师費共花了二千英鎊，我只好到处借款来付这笔費用。

我是准备好进監獄的，但是在听到关于我会受到很不相同的懲罰的傳說时，倒使我大吃一惊。根据这个傳說，在当局中有人想出一个巧妙的主意：在警察和退伍軍人的冲突中有两名非洲警察被击毙，而一直无法把罪名加于任何人，由于我是宣布“积极行动”的人，所以应该把我和这两个不幸的人的死亡牽連在一起。把我永远地去掉，会符合許多人的心意的，但是因为我与这个案件是毫无关系，他們的調查毫无結果，因而一直沒有把这个罪名加在我的身上。

我出庭向对我提出的各种控訴进行辯护，其中主要的是指控我煽动別人按照“积极行动”参加不法的罢工。根据执行推事的意見，这种行为不同于因行业糾紛而組織的罢工。他告訴我說，我所做的是力图威迫黄金海岸政府。

薩洛韦先生在那里充当英王的主要見証人之一。我坐在那里傾听长篇大論的关于我的活动的叙述，說輔政司曾对我提出警告，而我則不理这些警告而坚决进行我的計劃。我的答辯几乎不能叫做答辯，因为我除了否認我和工会大会以及气象工人的罢工有任何关系并根据我自己的和黄金海岸人民的观点來說明我所进行的运动外，我承認他們所叙述的事实是实际发生的事的一个相当准



确的记录。我被判两种徒刑，每种各为一年。但是他們对我还没有完。我被迫从阿克拉到边角堡去，作为“每日邮报”的发行人犯扰乱治安罪而受审。該报登載了一篇题为“一个說慌的运动”的文章，为了这篇文章我們的編輯科非·巴科已經进了監獄。

我一时忘却了我当时是英王陛下監獄的客人，而有点指望这次到边角堡去旅行会乘坐一輛还过得去的比較舒服的汽車。我不久就发现我的想法是多么錯誤！一开始，尽管我没有表示一点点抗拒，但是我的看守人显然不願意冒任何危险使我有逃跑的机会，因为我立刻就被加上手铐。然后，在我的一双手的腕部被夹連一起后，我被迫从后面爬进一輛旧的囚車，这种动作是許多老練的馬戏团員所做不到的。

只要一看到这輛車就打消了我可能作一次舒适旅行的任何念头。这时候，舒服的問題在我心中已降到了最次要的地位；我的思想中首先出現的問題是，一輛破旧不堪的車子怎么能够安全地完成这次旅程。但是，我很快又不去担心那輛車子了，因为每走一小段路，事情就越来越清楚，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在这三小时中，我斜着身子坐在一条硬板凳上，我的一双带着鐐铐的手很彊扭地被鎖在車子当中的一根木桩上。我最关心的車身，象是在大风浪时在海上航行的一只小木筏一样，左右搖摆，当我閉上眼睛时，我觉得自己很象一个划船的奴隶。在車子每次轉弯时——我从前沒有想到在到边角堡的路上要轉这么許多弯——我全身的肌肉都紧张起来，用尽力气使自己不被拥到車子的那一边去。

这还不算。各种能飞、能咬人和使人发痒的昆虫在这車子里都有，它們很快就发现我无能为力，不能把它們从我暴露在外面的身体上打掉。我想看守人一定为我难过，因为在路上的一个地方，

車子停住了，有一个押送人给我一包巧克力糖。由于我在离开阿克拉以前拒绝吃任何东西，我对此很感谢，这个人的好心肠使我觉得愉快一些。

一群严肃的、满脸流泪的人已经聚集在边角堡监狱门口的周围，看到他们使我深为感动。车子一到门口，我下车时又表演一次马戏团的技艺，接着就被赶到监狱里。我盖起一床毯子睡在地板上，这次只有我一个人，我享受了一次许多晚上以来最熟最香的睡眠。

第二天早上，被带到法庭去，由阿契·凯斯利—海福特（现任交通部长）替我辩护。但是，在这里，辩护同样是多余的，因为辩护终究是没有用的。我又被判一年徒刑，总共三年，连续服刑。

审判完后，我又作了一次恶梦般的旅行回到阿克拉，在那里，他们把我稳妥地移交给詹姆士堡监狱当局。我被押到第十一号牢房，那里已经有我的十位同志，我不能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上三年的前景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虽然我沒有期望在詹姆士堡会过一种安适的生活，但是当我发现，作为一个政治犯，我却受到刑事犯的待遇时，我多少有点激动了。有时我往往沉思，当我成为一个长期囚犯时我的命运会变成怎样。如果想要保持犯人最低限度的健康和清醒的头脑的话，那就很难想象会有比这个更坏的待遇了。

我们十一个人非常拥挤地住在这个牢房里，房的一角只放着一个桶子作为厕所。几个星期后，我们大部分人才设法习惯了使用这样公共厕所的可怕的不体面的事。如果准许我们只用薄蓆子把这东西遮起来，那末，这至少是一种顾全体面的办法，但是，看来我们是象囚在籠中的野兽一样，只有忍气吞声地忍受一切。我们

总是每天輪流洗刷这个便桶，并尽可能做好这件骯髒工作。但是，这是最不愉快的事，特别是我們吃着那样恶劣的食物，常常使我們鬧肚子。这些都是最令人为难的和最使人感到耻辱的事。

伙食数量很少，質量也很坏。我們的早点只有一杯沒有糖的玉米粥，我們的午餐和在下午四时开的一頓晚飯，不是吃非洲薯粉、麦片，就是吃紅胡椒拌薯粉。星期天和星期三，我們吃到一碗放进一块小得可怜的肉和摻水很多的湯。这純粹是摆摆样子而已，因为这块肉比子弹还要硬。有时我們会吃到一块胡椒熏魚。大米飯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經過医生証明身体不舒服的人才能享受。

我們初到时，和我在一起的人中，有些人由于非常討厭这种伙食而絕食。我反对这样做，因为我認为这不解决問題；相反地，必須吃我們所能吃的东西，以保持我們的精力。當我們最后获释时，我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如果把身体搞垮，这对任何人都沒有好处。經過我反复的劝說后，絕食的人才表示讓步。

我經常在一个星期中絕食一两天，因为这是我的一个老习惯。但是，除了从絕食中所得到的精神价值以外，在獄期間它也帮助我把胃口改过来。我在任何情况下对伙食从来不大在乎，因此我也許比其他坐牢的人幸运一些。

早上七时至十一时，看守人把我們帶出牢房去上操和工作，不是織魚网，就是刮編筐子用的藤条，以后直到下午一时以前，我們都被关在牢房里，下午四时晚飯后，他們又把我們鎖进牢房去过夜。我們三頓飯都在牢房里吃，这很可能加深我們对于伙食的不愉快。

他們当然禁止我攜帶鉛筆和紙張或者閱讀任何报纸，我那时最担心的是在我离开以后我們的党怎样进行工作。我們每月只准

給父母或近亲写一封信，但是，看守人經常站在你的前面而且寄出的信須經過監獄當局的檢查，因此除了描述一番關於我們健康的狀況（這種信會獲得通過）以外，其他能說的就沒有了。

很幸運，在我剛要被鎖進牢房以前，我能有一個很珍貴的幾分鐘的機會和伯德馬在一起，他是為了“刊登假消息”而入獄的，現在刑滿快出獄了。在那幾分鐘里，我把出版“晚報”和我們黨的工作全部交給他來負責。

我偷偷地向他說，“我無論如何將盡我的最大力量和你們取得聯繫，儘管只有老天爺才知道怎麼去聯繫！”

我感覺到，只有一個方法能同白牆外面的黨取得聯繫——那就是用寫條子的辦法。我全身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找到一枝鉛筆和一些紙。不久我設法拾到一個鉛筆頭，我把它安全地收藏在我的褲腿的帶子里。紙張看來象是很成問題，後來才想出了辦法。我們每天拿到幾張大便紙。我想出竊取大便紙的妙計，多多益善。當我告訴其他犯人我急迫需要更多的大便紙時，我不知他們會以為我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們很願意把節省下來的紙和我交換一點食物和其他我所能給的東西。我很小心地把這些珍貴的紙張放在我睡覺用的草墊子下面。

每當夜幕降臨別人都以為我們睡熟了的時候，我就象無數在監房里到處亂爬的螞蟻一樣，也開始工作了。在牢房里寫字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唯一的燈光是靠一盞路燈從牆頂上鐵欄杆的空隙中射進來的光綫，一半射在地上，一半射在對面的牆上。我經常躺在這一小塊燈光里，能寫多長就寫多長，等到感覺混身麻木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時，我就站起來，利用牆上的一點燈光來寫。記得有一次我潦草地寫了五十張。我把寫好的紙仔細地迭起來包在另外



一张大便紙里面，这个小紙包终于設法落到了在監獄外的伯德馬的手里。这些紙張怎样送出去，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由于用同样的方法，伯德馬也能随时送給我关于外面活动情况的完整报告。

伯德馬要把我們的党團結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么許多黨員互相爭奪領導权的时候，这就尤其困难。但是，伯德馬宣讀我从獄中写出的信时，設法使我的名字在人民的脑海中活着，并鼓励他們，在我再能領導他們之前，在他的指导下繼續进行斗争。我每星期有一两次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成功的消息，因为在監獄外面的群众常常唱着党歌和贊美歌。我特別記得有一首是借用“約翰·布朗的身体”的歌曲的調子唱着“牢房正在損害着克瓦米·恩克魯瑪的身体”。听到了这些声音并知道我没有被人們遺弃或忘掉时，我的精神非常振奋。

当我发现在我們之間要共用一张刀片和一把刮鬍刀时，我决定把鬍子留起来。尽管我很快地体会到更快地失去我的自尊心，就能更快地在这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随境而安，但是我怎么也不能适应于合用一把刮鬍刀和合用一块刮鬍鬚的肥皂的习惯。我不願意去冒皮肤传染病的危險，而宁願讓鬍鬚长起来。

我常常渴望着星期天，因为那天不参加劳动。在洗了我的牢衣后，我經常在監獄的院子里找一个安静的牆角，以便能靜坐深思。有一个星期天早晨，我把獄中的党里同志集合在一起并組成一个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以便拟出計劃，讓我們在獄外的党去执行。同时，我們选出了两个小組委员会，一个由退伍軍人組成，一个由科佐·博齐約担任主席。此后我們定期开会討論我們的共同問題。这些是看守人所不知道的。

每逢星期天，当局还准许我们在监狱里参加任何一种礼拜，其中参加的人最多的是使徒派的(Apostolic) 礼拜。在这种特殊的礼拜仪式中，大家经常拍手和活动。所有犯人，不论老少、基督教徒和无神论者，都乐于参加；事实上，我们都盼望着这一天，因为我们不仅设法来呼吸新鲜空气，而且在无聊之中也能得到一些活动和轻松。在做礼拜的时候，有一些犯人受到这样的感动，以致象小孩一样地流起泪来，想起了并供认了他们过去的罪行，恳求上帝宽宥。事实上他们之中的一些供认罪恶的人忏悔到这种程度，他们发誓在出狱后永不再犯了。但是，尽管他们有这些善良的意图，我常常注意到，这些人在几个星期后又犯了同样的罪回到监狱来了。

一两个月以后，艰苦和单调的狱中生活使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忍受不了，我们开始吵起来，并为已经发生的事互相埋怨。有一些人不能了解我们为什么被迫受苦，于是吵闹起来。我只好多次充当调解人，而且往往要苦苦哀求他们保持我们这个小牢房范围内的安静。这种普遍的不安和不舒服的情绪引起了刻薄、自私和报复的心情。我记得有一次我设法弄到了一份“晚报”。当我被锁进牢房时，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在看到我阅读这份珍贵的报纸时非常怨恨，以致把这事向看守人告发。我们整个牢房遭到搜查，那份报纸被搜出没收了。我的铅笔头没有被发现，大便纸也没有被怀疑有别的用途，我松了一口气，高兴地接受了降低粮食定量的处罚。平时的定量仅仅是以使人不致饿死而已，这个数量还要加以降低，当然不是开玩笑的，但是我忍受了。

除了星期天做礼拜外，还有两件事对于这种痛苦生活给了一些慰藉。一件是偶然会有犯人举办的音乐会，尽管这种表演生硬不堪，但是和牢房的黑暗墙壁比较起来，那是个盛大的娱乐。另外

一个我們所能享受的消遣就是賭博。在監獄里有三種值錢的東西：大便紙、堅果仁和肥皂。這些東西是這樣珍貴，需要量這樣大，因此它們常被用作我們的賭注，因為錢對於我們是十分無用的。說到大便紙，我就成了一個熱衷的賭徒，因為我怎麼也不能找到足夠的紙張來寫出我要說的話。堅果仁一般是被犯人們用來塗抹他們的身體的，由於伙食和肥皂的質量這樣低，皮膚都發生脫皮和干裂現象。把堅果仁嚼爛搽抹在身上，就能擠出足夠的油把脫裂最嚴重的地方滋潤一下。

我在獄中所經驗到的最令人沮喪的事，是有一個犯人被判處絞刑。這些不幸的人帶着鎖鏈被押進單間牢房，和普通犯人分開。當執行絞刑的一天來臨的時候我們大家都知道，因為我們要比平時提前起床，看守人在早上六時前把我們從牢房帶到樓上的一個房間，并把房門鎖上。有些人常常想從窗縫偷偷地張望，看看他們能否瞥見外面是怎麼一回事，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大約在十時前後，他們把我們帶出來，這件可怕的事的唯一痕迹，只是在靠近我們去沐浴的地方的地面上偶爾會找到一些血迹，因為絞架就在洗澡間的附近。眼看一個人前幾天被押進來，而幾天以後完全不見了，這真是使其他犯人感到難過的事。我在坐牢期間，平均每月底有一次絞刑，其中大多數是犯了殺妻罪，或者是犯了殺死奸夫的罪而被判處絞刑的。

在這些觸目驚心的事件以後，我往往沉思一番，我懷疑拘禁這一類處罰是否真能达到改造犯人的目的，我還懷疑死刑是否解決謀殺案件的辦法。犯人究竟還是人。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是犯人；社會把他造成這樣，要想改變這種現象，唯一方法就是改變社會狀況！只有從社會的觀點來看，犯罪和處罰才能有效地結合起來。我

一向是反对死刑的，甚至在我过獄中生活使我这样具体了解它的意义之前，我就有这种主张。我相信死刑是野蛮和残暴的遺物，它同道德和基督教义是不相符合的。处罰的目的应当是讓人們理解和改正。

我回忆到我自己的童年时代。我是在一个特別原始的社会里长大的，但是在恩济馬的十八年左右的整个童年时代的生活中，我只能記起一件謀杀案，那是关于一个性欲疯狂的人的案子。原始社会的禁律一般而言抑制了犯罪行为。西方文化对非洲人思想上的影响，带来了好的东西，也带来了坏的东西。譬如，象伪造、賄賂和貪污等违法行为在早期的社会里簡直是沒有听見过的。

此外，一年零两个月的獄中生活使我深信，犯人在很短的时间內就失去了他們的个性和品格！他們在他們自己的不愉快的世界里变成了一种死板的型象。他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并且对接触外面的世界却毫无准备，难怪他們在获釋后还留恋牢房中的凄惨而无聊的生活，把牢房看成保护他們的沮丧而破碎的灵魂的地方。

虽然我也感到极端苦悶，但是，幸而我是非常积极地忙于为我們在外面的党进行計划工作，不使自己觉得无事可做。不久，大选的时间来到了，它将在1951年2月8日举行。这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为这是我們党在新的立法議會中贏得多数席位的关键。我对外面的党的組織人已經指示得很清楚，要他們在选举中用尽一切力量来竞争每一个席位，而且我已經收到伯德馬的回信說，他們准备这样做。

我本来沒有意思参加竞选，后来改变主张，因为我感到除非参加竞选，否則难望在刑滿以前获得释放；而且我知道，如果我在竞选中获得胜利，当局就很难坚持把我关在監獄里。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坚持用我的名字办理选民登記。在这件事上我遇到很多反对，但我是非常坚决的，而且由于我这样做是在法律范围内，任何人不能加以制止，尽管我不一定期望能够去投票。很少人了解，根据我們的法律，任何被判处不超过一年徒刑的人都有权在选举人名单上登記。虽然我的总刑期是三年，但它是由三个一年的单独刑期加起来的。

我的名字經過斗争而列入了选举人名单以后，我就去告訴監獄当局說，我决定参加竞选。他們无須企图告訴我說我没有資格这样做，因为我已經取得选民登記的資格，这个事实就足以打消他們的企图。

奇怪得很，外面有些党员对于我决定参加竞选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認為如果我以后被宣布沒有資格的話，我們就会喪失議会的席位。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告訴他們，我将代替伯德馬参加阿克拉中央选区的竞选，而他則同意参加基塔选区的竞选。这个突然而来的改变使組織方面有些困难，但是我們是能够克服的。

我正式通过監獄監督来进行竞选，我安排好由外面的人替我付了保証金，在有关表格上替我签字，并由他們組成一个竞选运动委员会。我在登記時間截止前的几分鐘填好了我的表格，送交監獄当局，而竞选运动委员会就代表我去进行工作。

我忙于改写我們党的宣言，因为偷送給我的那一份从內容來說不是一个宣言。不久，我就改写好了。当我要参加竞选的消息公布后，全国出現了热烈的欢呼，因为一般人的感觉是，如果我当选，那么政府受到这个压力就会把我和我的同事释放。

在大选这天的晚上，有謠言說，整个阿克拉的人准备游行到監獄把我拯救出来，因此監獄当局进行了特別戒备。但是，这晚一直

平靜無事，只是我整夜不能入眠。我又興奮又擔憂。我開始懷疑是否這事已經全部失敗了，人民是否仍然支持我們的黨並給我一個機會來完成這件工作。但是，在我內心的深處，我知道我勝利的時間已經來到了；我完全信任我的人民並對他們有完全的信心，我知道他們不會把我忘掉的。

監獄監督安排好每小時告訴我一次關於選舉結果的進行情況。在清晨四時，我得到消息說我已經在阿克拉中央選區當選，不僅如此，我還獲得了黃金海岸有史以來最高的個人票數——在總數 23,122 票中獲得了 22,780 票。我沒有時間去深思，因為這個消息遍傳整個監獄，而在幾秒鐘的時間內這個地方充滿着活躍和歡呼。我相信甚至連看守人也是高興的。在整個阿克拉，群眾的興奮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伯德馬很難阻止數以百計的群眾向着詹姆士堡行進，他們想把門衝破並把我從監獄中搶救出來。這樣的行動，雖出自好心腸，但是一定會葬送我們成功的機會。

隨着時間的消逝，過去發生的事的真正重大意義對我是越來越清楚了，在我的情緒中，謙虛、感謝人民和平靜的心情混合在一起。很長時間以來，我已經忘記了平靜心情的存在。有人帶給我的一封信使我清醒過來，信中說有很多外籍記者吵鬧着要我發表談話，這又使我不能平靜下來。我立即拒絕同他們進行任何接觸，因為我長久以來發現這些人很少逐個字來記載你的談話；他們加上自己的解釋，他們越解說得危言聳聽，他們就越高興。

宣布選舉結果的次日，人民大會黨執行委員會為了要討論釋放我的問題請問總督是否願意接見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團，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政府授命該黨組閣，我作為該黨領袖就不可能在監獄內進行組閣。總督同意接見代表團，並在接見之后就着手進行關

于释放我的安排。这些做法是严守秘密的，因为政府不想把消息传到国外。

1951年2月12日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之间，监狱监督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准备在一小时后出狱。我把我自己的周围看了一下，但是我唯一所有的东西只是一根铅笔头和几张大便纸，而这些东西现在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告诉他，我已经准备好，随时都可以走。看来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关于我获得释放的消息显然已在城里泄露出来。下午一时，当我走出监狱的大门后，我才理解政府为什么力图要严密地使这个消息不泄漏出去。我想我一生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拥挤的人群。我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干什么好，只有站在那里凝视着。我的任何一种表情都完全受到了注意。

我记得当时有一种熟悉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我从恍惚的梦境中醒过来，看到伯德马就在我的身边。我们彼此祝贺了一番，在我被群众高举到肩上、抬到停靠在附近的一辆敞篷汽车时，我的理智才清醒过来。我甚至在现在也很难描写我当时的体会，因为汽车象蜗牛般地蠕动，象在大海中滚滚的巨浪把船拖着走一样。看看这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斗争着的人民群众和听听他们高喊着震耳欲聋的欢呼的声音，真使我眼花潦乱。我能把自己镇静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我的视线转移到茫茫的大海和辽阔的天空，直至我能够控制自己并能回答人民的致敬时才把视线转回来。

当我逐渐地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的新生命。这是我一生以来最伟大的一天，我的胜利的一天，并且也是我的战友的伟大和胜利的日子。没有一个将军能比我更为他的队伍感到自豪，也没有士兵们比我的拥护者更能热爱他们的领袖。

我们的队伍从詹姆士堡向阿伦纳广场出发，这一段原需要十

五分鐘的路程却走了兩小時。在阿倫納廣場——我們黨的出生地點，他們按習俗為我宰了一頭羊，舉行消災的儀式，我要赤足在羊血中踏七次，意思是洗淨監獄里的毒害。群眾一直和我在一起，陪同我列隊走到我們的黨部，我一到那里，就倒在離我最近的一張椅子上，實在是精疲力盡了。



---

## 第十二章 政府事务领导人

在我获得释放后的第二天，总督邀请我在上午九时和他见面。当我走进总督的官邸——克里斯兴斯博格城堡的院子时，忽然感觉到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雉堞上灿烂夺目的白石，令人难忘的前院和这座富丽堂皇的、墙基被澎湃的波浪冲击着的大厦，对我来说，象是一个新的世界。虽然查尔斯·阿登—克拉克爵士和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互相斗争过，可是我并不晓得他相貌怎样，因为我们从未见过面。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待我。假如我以前认识这个人，我就不会怀疑他将用礼节来对待我了。

一个身材很高、双肩宽阔、皮肤晒成黄褐色的人，带着坚忍、严肃的表情，闪烁着和善的眼光，伸出手走向我这边来；我注意到这只手很大，看来很有力。他对我表示欢迎并问我好。在我们两人坐下来的时候，我意识到他一定对我有所警惕和怀疑，象我对他一样。但是，我们很快就谈到当前的工作。我尽量向他说明清楚，我准备随时把牌摊开在桌面上，因为只有双方真诚坦白才能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在这点上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而我立刻意识到他说的是真话。我想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正派人物，我能够很容易地和他交朋友，虽然我认为是英帝国主义在黄金海岸的象征。

尽管我刚从监狱出来，很可能有种种理由怀恨在心，但我抑制着自己，忘掉在殖民政府的手里所遭受的痛苦和屈辱，因为我知道报复是痛苦的，而且也是同我的性格不相容的。我出狱后不久就真诚地发表声明说，“我从监狱出来，走入议会，丝毫没有痛恨英国的心情。我主张对任何种族和个人都不应该歧视，但是我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

我带着总督授命组织政府的命令离开了克里斯兴斯博格城堡。当我走下台阶时，整个事情犹如一场春梦，我感到仿佛从空中走下来，可能不久我就会从梦中惊醒，发觉自己蹲在监狱的地上吃着一碗玉米粥。

我必须在这里稍为谈一下当时实行的宪法。同伯恩斯宪法的条文相反，柯赛委员会拟定的宪法建议新的立法议会由议长一人（由议员中或议会外的人员中选出）和选出的议员八十四人组成。五席分配给几个大城市，阿克拉二席，边角堡、塞康第一塔科拉第和库马西各一席；三十三个乡村议员分两个阶段选出，第一阶段是直接投票的预选，第二阶段通过选举团选出；十九个北部领土地区居民的代表由黄金海岸殖民地、阿散蒂地区和外沃尔特多哥地区的地区委员会选出；六个特别议员按同等比例制由商会和矿业公会选出；三个当然议员由总督指定。他们是国防兼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选举的结果表明，人民大会党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可能取得的三十八个选举议席中赢得了三十四个席位，而且人民大会党在立法议会中和指定的候选人相比也占有大多数。

离开克里斯兴斯博格城堡后，我立刻召集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同委员们讨论我所拟定的新政府的部长人选。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在我和总督商讨时，我已经同意，既然人民大会党只在立

法議會的選舉席位中贏得大多數，因而僅從我們黨員中挑選我的部長可能會使我和立法議會中的地區議員和其他無黨派議員發生衝突。因此，我向中央委員會建議，在七個部長中，應有五個人民大會黨的黨員，北部領土地區和阿散蒂地區應各有一人當部長。開始時，中央委員們反對這個建議，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所有的部長都應由支持黨的人員中挑選。但是，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他們接受了我的建議，隨後我就把名單送交總督。屬於我黨的五個部長如下：

科佐·博齊約——教育和社會福利部長

科·阿·伯德馬——衛生和勞工部長

阿·凱斯利—海福特——農業和資源部長

德·赫頓—米爾斯——商業、工業和礦業部長

安薩·科伊博士——交通和工程部長

我任命伊·奧·阿薩富—阿德賈伊擔任地方政府部長，代表阿散蒂地區，最後，我挑選卡巴契沃拉·季·埃·布賴馬擔任不管部長代表北部領土地區。根據憲法，我以立法議會中多數黨領袖的身份擔任了政府事務領導人。

人民大會黨贏得這樣一個勢如破竹的勝利，是事先想象不到的，而且一定使很多人感到吃驚和不愉快。比如，政府事務領導人這個職位是預定由首席檢察官擔任的，而首席檢察官的職位當時是由海外官員擔任的。反對人民大會黨的許多其他議員們都想望着當部長，並為此在事先作了很多準備，他們相信如果總督根據柯賽憲法任命行政委員會的委員時，他們被選上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他們已經定制了新裝以便走馬上任，並派了他們的妻子到歐洲去學習招待高級客人的藝術。但是，結果是人民大會黨戰勝

了它的政敌的联合力量，对他們的这些計劃泼上了冷水。

为了使人民大会党的議員們熟悉党的政策和了解他們参加立法議會后所面临的危險和困难，我准备在阿倫納廣場向他們講一次話。由于这次講話很重要，我把講話稿印了出来，使他們能够长期保存。

在这次講話中，我指出人民大会党虽然警惕到在現行宪法下設法进行工作的种种危險，但是我們必須为“現在实行完全自治”而繼續奋斗。我說，我們加入立法議會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爭取“現在实行自治”从議會內外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手段。我們的党是全国抱有这种目的的唯一政党，因此，若要我們和那些持有不同見解的人在一起工作，那是办不到的。

我解释說，在民主的社会里，如果一个政党获得少数議席，它就成为反对党；如果它获得多数議席，那么它就組織政府，至于談到我們，在这点上不應該妥协。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同国内其他政治集团进行联合，那将是很危險的。

如果人民大会党参加組織新政府，它会要求全部八个部长职位都由自己黨員担任，但是，行政委员会可以容納一个或二个地区議員作为讓步。我指出，殖民政府除非受到形势的逼迫，是不会允許殖民地实行自治的；我們只有下定决心，为着一个目的，有效地、坚忍地进行鼓动和組織工作，不怕牺牲、迫害和坐牢，才能达到我們的目的。

議員們不应忽視这个事实：即要求成立民主政府的任何建議的实質都在于希望創造为維持人民富裕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政治、經濟、社会 and 文化的条件。

我并且告誡他們，根据現行宪法担任职务有着一种很大的危



險；那就是可能受誘惑去把自己和這樣的一個憲法視為一體，並且可能因為考慮到暫時的個人利益而動搖，而不去尋求人民的利益。已成為殖民地機構重要部份的賄賂和貪污之風必須鏟除。我們被選入議會，這說明公眾對我們黨的廉潔是有信心的。人民給予人民大會黨的信任是我們所擁有的最寶貴的東西，只要我們繼續保持這種信任，勝利將是屬於我們的。

全國人民需要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的政治權力，但是我們不應受到象在新憲法下讓非洲人當部長等一類事情所欺騙，因為這些部長很容易會變成英國殖民統治者手里的工具和傀儡。因此，重要的是，今後在新的立法議會內應建立政黨制度，以便使部長們集體地對他們所代表的人民負責，而不是對官員負責。

我還告訴他們說，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隨時記住作為立法議員，我們不是孤立的；作為議員，我們就是議會以外的人民群众的領袖，並且必須隨時意識到這種關係，避免脫離人民群众而使自己孤立。我們必須保持我們同那些促進我們黨的誕生以及養育我們黨的人們之間的聯繫。可以用召集會議、同人民商量以及在議會中提出人民的需要等辦法來達到這一點。只要人民大會黨繼續保持和人民的聯繫，它完全可以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議員們應當有遠見，並且要具備有效地處理事務的能力，但是，每當一種新的局勢發生時，都應向人民解釋我們黨的政策。

我繼續說，有一件必須要做的重要事情，那就是鏟除限制出版、集會和言論自由的一切殖民地法律。我特別提出必須修改工會法律、危害治安法和其他旨在妨礙人民進步的法律。此外，在一切刑事案件中，公民應受陪審團審理，而不受推事的不可靠的審理。

我們覺得，如果我們不是依靠在立法議會中獲得多數而擔任政府職務，而僅僅從事不合作運動，繼續處於反對黨的地位，那末，我們只不過是採取了一種消極的行動方針而已。我們黨執行委員會更認為，我們參加到新政府中，最低限度可以防止“幫兇和反動派”利用這個障地。政府官職也能幫助我們在繼續為完全自治而進行的鬥爭中取得主動權。如果英國官僚機構阻礙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並不排除進一步採取積極行動的可能性。

我說，在議員和歐籍官員之間，除了嚴格的公務關係外，不應有任何親密關係；帝國主義者用暴力方法達不到的目的，他們可能希望用雞尾酒會來達到。但是，我強調說，我們不是向種族或者膚色進行鬥爭，而是向一種制度進行鬥爭。為了證明我們並不是為追求任何個人名位而領導這次鬥爭，我們同意我們在行政委員會里的黨員們都不要搬到特別為部長們修建的宮殿式的洋房里去住。

此外，我接着說，在沒有實行完全自治以前，我極力主張我們所有擔任議員和部長的黨員應把他們的薪水交給黨，而另從黨的經費中支取一筆規定的報酬。這可以防止追求個人名利，並引導那些職位高的人過着簡單朴素的生活，這樣來保持和普通人民的聯繫。

由於在前一年發動了積極的行動，我們已向人民證明我們不顧一切履行了我們的諾言。我聲明說，“有了積極行動的精神，我們黨才有今天，我們必須用積極行動來維護我們的黨。”

我最後說：“事情已經決定了。殖民地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民正在從我們身上尋找希望和鼓舞。英國和世界各國的進步人民也在堅決地支持我們。解放運動的火炬已經在

加納為着整個西非洲高舉起來了，它將對其他被壓迫的屬地照亮一條自由之路。

“人民大會黨萬歲！全世界解放運動萬歲！”

立法議會在1951年2月20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由議員舉行忠誠宣誓並選出議長一人。使人民十分驚奇的是，我提出的議長人選是與我們黨沒有絲毫關係並且對人民大會黨的政策從不感到興趣的人。他是伊·克·吉斯特先生（現在是伊曼紐爾爵士），是一個著名的律師，前任立法委員會主席。他的提名和推薦菲亞沃為副議長的提名獲得了一致通過。立法議會隨即休會，至2月26日再開會選舉各部部長。除了我自己提名的人選之外，總督指定了幾個當然部長，由魯·赫·薩洛韋先生任國防兼外交部長、由爾·阿米塔季先生任財政部長、由普·布蘭尼根任司法部長兼首席檢察官。所有被提名為部長的議員都經議會秘密投票通過。

立法議會正式開始工作，人民大會黨的由議員中挑選出的部長們和三個當然部長組成行政委員會，由總督擔任主席。在這兩者之間，有來自地區委員會的某些獨立議員，他們不受任何一方政黨的議會領袖的控制，而按照他們自己的良心去投票，有時投政府的票，有時投反對黨的票。我黨在議會的七十四席中雖然只占三十四席，但是我們經常能夠從獨立議員中得到足夠的支持，使我們獲得堅定的、合理的多數來執行我們在立法工作上的政策。

在1951年初的那些日子裡，需要處理的事情是這麼多，現在回憶起來，我不知道當時我究竟是怎么處理完的。首先，要組織和安排議會的工作，諸如法案的程序、問題的处理、議事規則的準備、以及規定一些正確報道議會進程的辦法等；其次，我還計劃議長的辦公室。與此同時，由於我被任命為政府事務領導人是事先意料不

到的，所以沒有为我准备任何办公室，因为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发展，那末这个职位是由首席检察官担任的。他們从政府大厦的主楼中給我一个房間，靠近輔政司的办公室，并有一位来自农业部的英籍第一部长助理充当我的助手。我們在一起为我的办公室作了一些基本规划。

此外我还要考虑党的事务。党总部里每天都挤满了許多党员，他們为了紧急問題、个人問題、或者只是想和我握握手而来見我，我應該到那边和他們見面，这是很重要的。我每天的日常事务是很使人劳累的。我經常每天清早四时起床，在書房里花上两小时准备我的案卷、演說詞、或其他在这一天中需要处理的事。随后人們就开始到我的住宅里来，而且常常早在我沒有做完工作之前就来了，我就再花两个小时和他們談話，設法解决他們向我提出的許許多多的問題。如果有時間我就喝杯茶，但这往往是擱涼了的。

我八时到达办公室，并处理桌上摆着的各种文件。如果議會正在开会，我就先到議會，然后再到党总部。否則我就先到党总部停留几小时。在中午时我很少吃东西，經常是下午很晚回家时家里給我什么我就吃什么。有时，我刚吃上飯，人們就来到我家，又带来了他們感觉到連五分鐘也不能等待的問題。我一面吃，他們就坐下来对我談。

晚上和白天同样忙——党的會議，接見，人們、人們、絡繹不絕的人們。我很少在午夜以前睡覺，平均每晚睡四小时。

过了一些时候，心怀不滿的反对党党员，渡过了被迫放弃他們在新政府中的高官厚祿的震惊之后，已經开始使用他們老一套的手法，攻击我和拥护我的人們。他們宣称“这些国内的流浪人和花花公子”为他們自己找到了好差事，因此他們已經把“現在实行自



治”的政策置之脑后了，企图以此来引起人民的不滿和世界輿論的誤会。

为了对这种批評进行辯护，我在10月初在庫馬西普倫佩紀念堂中在广大群众面前公开向他們提出挑战。我叙述我們党的历史，并向人民重申我們的政策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依然坚决主张“現在实行自治”。我警告群众不要陷入我們党的敌人的圈套，我們的敌人正在誣蔑我和人民大会党向帝国主义者妥协了、抛弃了我們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想和簽訂了秘密条約。

我說，“我們不是走向胜利，就是承担失败的后果。”

我接着說，“这些政治騙子和吹牛大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現在該是他們清醒的时候了，我要帮助他們这样做。”

“他們到底認為我應該怎么做呢？請他們出来公开說說。如果人民大会党在选举中取得了这样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而不接受部长职位的話，那末，同样的一些人又会說我們怕負責任，而同时他們又会用尽一切手段去窃取权力。”

我提醒人民說，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和一些酋长們曾譴責我們拒絕接受柯賽宪法，但是他們在庫馬西的地区联合大会上已經同意这个宪法应加以試驗。

我問道，“他們是不是想立即——今天就要实行自治呢？他們是否已准备現在就采取积极行动呢？”

我說，一旦为議會一致通过的、要求立即实行自治的議案被英国政府所拒絕，我怀疑这一帮人是否会同我們在一起举行另一次积极行动。

我宣称，“在这个問題上，我現在要向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和其他一切政治对手提出挑战。我們人民大会党人已經說得很清

楚，我們是按照計劃办事的，但尽管如此，如果我們的誹謗者和对手們接受这个挑战，同意和我們一同宣告为立即实行自治而采取积极行动，那末，我們准备重新調整我們的策略和战略；如果这些所謂站在反对党地位的党派和公开或秘密的集团走出陰謀的巢穴，而同我和我的党一起为立即实行完全自治而采取积极行动，那末，我的同事和我准备立刻辞去政府的职务。”

我繼續說，“为了促成這項挑战，我們邀請丹凱博士、奧布澤比·兰普泰先生和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执行委員；沃倫紐先生、博斯曼先生和国家民主党的执行委員；阿散蒂人委員會的會長們；各省會長聯合會議主席納訥·奧弗里·阿塔和該委員會的會長們；科比納·塞基伊和保障土著居民权利協會的执行委員等从今天起在十四天內（到1951年10月14日深夜截止）通知人民大会党总書記：他們是否准备同人民大会党的代表舉行會議，以便商談关于一旦英政府拒絕接受立即实行自治的議案时，計劃全国性的积极行动的运动。”

我詳細敘述了这个“联合政党”同英政府交涉时所应根据的条件，并在結束我的演說时声明說，全国人民現在能够判断我們政治对手的勇气。当然，他們之中沒有一人出来应战。这样，空气就又一次被澄清了。

---

### 第十三章 策略行动

我一向坚信，在任何政治革命（不管是暴力的或非暴力的）之后，掌握政权的新政府应立即在行政机关中清除所有旧的负责人。据我自己的经验教训，不这样做，一个革命政府就会有遭到毁灭的危险。但是，拿我的例子来说，这样一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当时的行政人员中百分之八十是英国人，并且是由英国殖民大臣派来的。事实上，我很清楚，当时行政人员中有一种双重忠诚的态度——一方面要效忠于我们的政府，另一方面也要效忠于以殖民大臣为代表的殖民部。

行政、警察、司法、国防和外交大权都掌握在总督一人手中，而由于国家安全的权力不在民选政府的部长们的手里，有关这些方面的事情必须由英国政府来决定。因此，民选政府的部长们常常同总督和官方任命的部长们发生公开冲突。我尽一切力量保证这种冲突不要公开起来，因为我恐怕这可能会使政府垮台，还可能使柯赛宪法停止生效。事实上，假如没有总督和我之间迅速地发展了无比良好的关系和谅解，这就会变成结束这种双重政治制度的唯一途径。

为了要达到全部国内自治和实现我国积极的五年发展计划，我不得不倚靠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依靠那些曾这样或那样参与

逮捕和监禁我的原有的行政、警察和司法人员。不论从我这方面和从他们那方面，每个人都很难知道究竟应该信任谁和效忠谁，以及这种信任和忠顺所应达到的程度。例如，曾在控告我作为“加纳晚报”发行人的诽谤案中取得胜利的警察局长仍然在职；在审判我的时候曾这样愉快地领导对我进行起诉的检察官；审判我的首席推事；充当王室见证人的辅政司和他在政府中数以百计的曾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对我进行迫害的同僚——所有这些人都是反对我的。

我很早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从任何观点来看，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不能肯定将来同我在一起工作的那些人是否认为可以象我这样的做。我发觉有些人在这方面处理得很成功，但有少数人对于过去的事总是念念不忘。

1951年，占百分之二十的非洲籍政府人员主要是低级官员。不过事物是在进展的，除非非洲化运动迅速实现，据我看来，还需要经过许多年，我国人民才能有充分的资格和足够的经验来接管行政部门中的负责职位。而另一方面，如果英国殖民地官员感觉到非洲人正在受训，以便接管他们的工作，他们在这里的日子就有限了，因而全体提出辞职，那末我们就会面临着一个更严重得多的问题。那时有些欧洲人很多是属于旧的殖民类型，只要看见一个非洲人担任比信使和雇员更高的职位，就会使他忍受不下，他们就会坚持把这人撤换，或者他们自己当时就辞职不干。很不幸，我们没有能力向他们说一声“再见”，我感觉到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智慧。

从英国殖民地官员的观点来看，我很难理解他要考虑他的工作。他是在某种情况下加入殖民地工作的，当我想对现行制度予



以修改时，我可以看出，一个处在独立边缘的国家是不能使他保持旧殖民政权所给予他的地位的。他将面临一种抉择：离开这个国家，或者放弃他在殖民地任用章程下所享有的现行的工作条件而参加黄金海岸工作并完全接受当地约束。

因此，我着手计划一种黄金海岸当地文官制度，如果这些英国殖民地官员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选择参加。同时我知道光是这样还不够。这就必须具有一些劝诱力使他们感到值得留下来，否则他们来一个总撤退，这对我国是未必有利的。因此我建议拟出一个工作损失赔偿办法，目的是要保证有关官员的利益，并在我们能够提出非洲化计划之前，尽量长久地把他们留在这里服务。

我和殖民大臣商谈了这件事，他清楚地指出他特别关心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如何根据黄金海岸政府的要求继续提供英国驻外工作人员来帮助这个国家顺利发展，并按照工作需要鼓励这些人员留下来；第二，对于那些由殖民大臣任命的官员，他很想履行他所负的义务。我也同样地渴望对于那些由殖民大臣任命的官员应当尽量负责，并且我觉得我们必须有一个有效的行政机构来执行政府的政策。我们的处境不同于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因为它们获得独立时，这三个国家的公务人员大部分是由当地人充任的。

1953年7月8日，我在议会发表一个关于英国殖民地官员地位的声明。我指出，虽然在非洲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并奠定了将来非洲文官制度的基础，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即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还要继续倚靠英国海外官员的服务。我说，“因此，我们对这一类官员的态度应该搞得清清楚楚，这些官员本身也应该知道他们的地位，这是非常必要的。我知道在修改根本宪法的前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改变他们服务的条件，这些官员对他们的

前途有一种不安定的情绪。我要消除这种不安定的情绪，就向他们保证：一个完全自治的黄金海岸将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的利益会得到充分保护。”

接着，我提出我的政府准备采取的一般原则。“最初阶段，我认为主要考虑之一是提供一个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尽可能顺利地过渡到黄金海岸本地的文官制度。我们要想办法避免英国海外官员任何突然的撤走，并用保护他们的前途来诱导他们留下来。政府一方面感到加速非洲化的需要，但并不主张应该牺牲行政效能来达到这个目的，也不主张文官的升迁应以肤色为基础。同时，实行赔偿计划后，将可以看出文官制度改变的情况。”

受到影响的将近有八百名官员，由于当时这些人之中大多数都是行政部门的骨干，因此应尽力、越多越好地把他们挽留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为了更确切地肯定不会发生集体撤退现象，我拟出一个以四年为期的所谓“冻结”时期，作为我们的准备时间。这意味着有关人员可以选择在黄金海岸居留四年，四年后他们可以取得赔偿，离开这里。

修改宪法时，许多人情愿留下来。我们只失去了一百四十名官员，后来又失去了八十三名。从文官制度的观点来看，这件事进行得很顺利，这应归功于政府。在实行非洲化计划时，情愿留下来的英国海外官员，大多使他们自己适应于新的环境，并使他们在思想上适应于在非洲官员领导之下或者和非洲官员在一起进行工作。在他们之间，友好合作建立起来了，政府机构进行得相当顺利。

但是我还必须不要使人们有一个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印象。除了那些把事情办得很好并且不久就发现他们真正是心安理得的人以外，另外还有这种人，他们存心不离开这个国家，而用种

种理由故意留下来繼續斗争，因而使他們自己过着悲惨的生活，并使接触他們的人觉得他們很讨厌。比如，就行政工作來說，我就注意到，如果官員們不同意政府对他們所制定的政策，他們就千方百计利用种种推托来破坏这个政策。在另外一些时候，我发现我要加以紧急处理的事被他們无期限地攔延起来（因为这些官員中一些人不贊成这样办），直到我不得不加以过問时，他們才照办。

在某些情况中，尽管很难拿出証据来加以証实，但是如果說文官制度沒有政治上偏見，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只要政府政策将要付诸实施时，这些官員不是敷衍塞責就是根本不去实行，这种現象很經常发生而不是巧合。另外，我在一个时候几乎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发生了一个反对政府的运动，文官方面无不推波助瀾，来加强这个运动。这是不是英国人对失敗者固有的同情心的一个例子，那就不清楚了，但这是易于引起猜忌的。

关于外地的首席專員和区域專員方面，也产生了某些困难。在我党执政之前，首席專員和他們的随从——区域專員，实际上就是他們所控制的农村地区的小总督。我在旅行全国时，我知道人民痛恨这些官員，因为他們实际上代表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他們的存在对国家是有害的。在实行这种試驗性的宪法时，我不能罢免他們，但是無論如何某些地区管理措施还是必要的。为了要进行局部的补救，我决定把他們的官銜改变为比較迎合人民口味的东西。我建議将来把首席專員改称地方官，区域專員則改称政府代理人。我这样做是要尽量使人民感觉到旧的秩序已經改变了，首席專員和区域專員自己再也不是一种法律，也不是“英国殖民部和英国政府头等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而是黄金海岸政府真正的代理人了。

为了使人民和議會对此事得到印象，我成立了一个首席地方官會議，每月举行一次。通过这些會議我能够接触到地方上发生的事，听取他們陈述各种問題，并对要采取的行动提出意見。整个說来，我想这些首席地方官比大多数其他遣散人員更难于接受这种新秩序。

另外一件需要慎重处理而須坚决行动的事，就是那种正在侵袭我国可可树的芽肿病。这种病是由一种叫做水腊虫的虫类，从一棵树带到另一棵树，并正在威胁着我国最貴重的輸出品可可的收获前途。有关这事的調查結果証实了我过去的忧虑，据說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砍倒那些受害的树。我知道农民会反对这样做，因为感染这种病的树表面上还可能生产健壮的可可莢。要使他們相信几年內他們的可可树会全部丧失，那是很困难的。

我們建立了一个以科尔薩法官（現在是黄金海岸首席法官阿尔丘·科尔薩爵士）为首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些病树，該委员会主张应停止过去强迫砍掉病树的方法，并应取得农民的同意和合作。政府同意这一点，并且把可可工业的管理权从过去的可可复兴部轉移到农业部。为了要把农村人民組織起来，并使他們觉悟到培育健全丰产的可可树的重要性以及培育的最好方法，我們建議成立一个中央顧問局、一个农民协会和一个可可农民地区委员会。

在努力制止这种病害的时候，我发动一种运动，把它叫做可可“新政”。我向全国广播解释說，这将要采取七年計劃的形式，“这个計劃会再一次使黄金海岸置身于世界的可可地图上，并把它永远保留在它应有的地位。”我說，凡拥有病树的农民应和附近的农业部外勤官員取得联系，他会对病树进行检查，并会告訴农民最好的方法。如果他認為这棵树應該砍掉而农民又同意的話，那末，在



砍除病树和保护健康的树方面应给予他一切可能的协助。作为对农民的补偿，政府将向可可销售局建议由它付给有关农民每人四先令作为被砍下的每一棵活着的大树的第一次补偿款项，并每年付给二先令共付三年作为补植款项。补植款项的发给，将从病树已被砍除、烧毁并在原地上种植新树时开始发放。

我呼吁说：“因此，和我一同实行可可新政吧。自觉自愿地实行吧，不用政府或昧于当前需要的人来强制执行，我们是能够找到方法来战胜这次病虫害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经济遗产保存在人民的手里。在重建我们的可可业时，我们不仅帮助了我们自己，而且将向全世界、向吹毛求疵的人、并向购买我们的可可的厂商证明我们是有能力管理我们自己的大企业的。”我最后说，“如果真要考验我们是否适宜于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就是一次考验。”

为了向可可受灾地区农民详细解释新政，我们组织了一次八周宣传运动。整个说来，一般反应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不理解问题的严重性的人却不允许把病树砍下来。可可企业的前途非常重要，不能因为一些人的顽固而受到影响。次年10月，我又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一次广播，强调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

我说，“凡种有可可树的人都有义务使他的农场不受虫害侵袭。这对他自己和他的家属都是一种义务，因为如果他不砍掉病树，他的整个农场将会同归于尽，而他也就会失去他的生计。左邻右舍也有这个义务，因为病虫害是不分农场边界的。国家也有义务要消灭病虫害，因为没有可可就谈不到繁荣和进步了。”

在结尾时我说，拒绝合作的极少数人现在不得不站到我们这边来，我警告他们说，那些拒绝协助的人就是破坏法律，除非他们改变态度，而同政府合作，否则法律是会加以制裁的。鉴于这些

少数人繼續表現頑固并危及我的政治威信，我把砍树的措施改为强制执行。由于加納农民委员会的合作，我順利地安排把这个不受欢迎的但是很有必要的措施付诸实行了。

在我党执政以前，地方政府是由区域专员和土邦会议领导的。我感觉到人民应该积极参与他们各自地区的事务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我着手进行建立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在地方政府的部长向议会提出的新法令的规定下，将建立三种类型的地方委员会——行政区、市镇和地方；行政区委员会将在相当广阔的农村地区进行工作，其余两种的工作地区比较小些。酋长们虽能以纯粹官方身份被邀请参加委员会，但没有投票权，而且在委员会内也没有正式的地位。过去对他们各自地区一切事务都有决定权的区域专员不能担任委员会委员。他们的新任务是充当政府和地方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员以及适当地解释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这些委员会将来可以用征收费用和税款来充当经费，而且也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费。

由于1952年选举第一个地方政府委员会的结果，人民大会党在新建立的二百七十个委员会的席位中取得了百分之九十的席位。这使我们获得强有力的地位。我认为民主现在已经真正地克服了封建主义这个根深蒂固的毒瘤。

另外是外国投资这个重要问题。为了弄清我们的立场，1954年3月1日我在立法议会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除了建议在沃尔特河建立水力发电站和设立一家炼铝厂以外（这是一个当时需要详细审查的计划），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国的经济应向其他方向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我国大有建立新企业的可能，但是我深知要实行这样的计划，需要各方面的援助。我感觉到黄金海岸需要许多年才能在自己的人员中找到在发展和管理新工业方面善于经

营的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必須倚靠外国企业。我在議会的声明中把这点說得很清楚，并进一步說，外国投資家会要求我們对那些适用于他們的投資的条件提出保証，那是可以想象的。

我指出，对我国政府至关重要的一种情况是，一方面我們体会到工业中好坏的标准要看工业管理的效能，另一方面我們欢迎国营和私营企业的热誠，将按照这些企业对于訓練非洲籍工作人員最后能担任高級技术、专业和管理等职务所提供的机会的程度来决定。我坚决表示，将来应大大增加有資格担任負責的和有职权的职位的非洲人。

我說，由于注意到这个关系重大的事实，政府将尽量鼓励外国資本向黄金海岸投資。黄金海岸已經拥有准备金可以用来投資到大規模的企业中去，如果企业方面有此要求时，政府願意参加那些能够証明經濟上可靠的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参加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須保留坚持合伙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說，外国資本应直接投到公用事业，而是除此以外，外国資本應該可以自由地对任何一种新工业企业进行投資。有关部门将在寻觅适当的厂址、办公室和職員住所方面給予种种协助，关于在主要城市中心建立厂址方面已在进行調查中，特別注意形成一些工业区。

我說，工商部已增設一个工业科，目的是要对这些新的投資中的国内外資本进行指导，在寻找适宜的厂址方面予以协助，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給予优先权，以及在解决一切困难方面予以一般协助。新的工业在某些原料方面也可能享受免除入口稅的优待。

最后我說，我的政府竭誠希望那些有資本投資的人将利用黄金海岸目前的好机会，并可以充分相信在发展我国資源时我們会把他們当作合伙人来看待。

## 第十四章 美国之行

正当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的新生活的特点似乎就是忙乱——一个无法施行的宪法，一个令人厌烦的反对党，一个雏型的政府机构和使人放心不下的文职官员们——），忽然有一件事使我非常高兴。我接到林肯大学校长寄来的一封信，他通知我说，评选委员会已经同意在那一年（1951年）6月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把法学博士的学位授给我。我离开美国才六年多，很难相信这么快就会给我这种荣誉。我感到还不配取得博士学位，起初曾想谢绝。我还感到那时太忙，没有时间去访问美国。但是我的朋友们都坚持认为，我应该接受这个学位，并认为到国外去旅行一次对我有很大好处，因此我就写信给校长——霍勒斯·邦德博士，接受了他的建议。

5月30日，在当时的教育部长科佐·博齐约的陪同下，我从阿克拉的机场出发到伦敦去。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机场给我们送行，而警察却在防止人们跟随我登上飞机。这是我的首次长途飞行。除了起飞和降落使我很不舒服以外，这次旅行使我感到极为愉快，但是我很难相信我们会在十八或十九小时之内到达伦敦。我用了不少的时间来回忆上次我从阿克拉到伦敦时的情况。我怀疑，难道这是同一个克瓦米·恩克鲁玛吗？科佐·博齐



約打斷了我的回想，最后一次提醒我，要我系上安全帶，我对他的提醒表示感謝。我們在一个明朗的早晨在倫敦機場的上空盘旋着，然后就降落了。我的双脚站在坚硬的柏油路面上感到从未有过的舒适。

在宴会厅里，有一个模样很熟的人向我们走来——这不是乔治·帕德莫嗎？这次重逢是令人愉快的，特别是因为我们这样突然地相遇。我們一同到了乔治的住所，围着旧日的厨房里的桌子談起了上次会見以来我們所进行的各种活动。过了几小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談完了各种情况时，我們就靠在椅子背上休息了。能够再回到倫敦是很好的，換一換地方的确对我有好处。过去几个月內我所遇到的各种問題和各种难办的事現在似乎已經成为瑣碎的小事了。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參觀了倫敦塔、肯辛頓宮、白金汗宮和圣·詹姆斯宮。过去，我曾經在比較激烈的演說里把所有这些建筑物都攻击为帝国主义的象征！

两天以后，我們登上了一架去美国的飞机，第二天一早就到达了紐約。科佐还是第一次訪問美国，我热心地把我以前經常到的地方指給他看。但是，我忘記了，这一次我已經不是一个貧苦的大学生，为了找一間房子，到处奔波。找到了，住一个星期，由于付不出房錢，又被赶走。

当一群人向我们走过来时，我低声向科佐說道：“这些人打算做什么？”科佐回答說，他們一定是准备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可不是嗎！前面是华盛顿国务院的典礼官，跟在后面的是由校长和院长率領的林肯大学的代表团，还有林肯大学的校友、黄金海岸学生的联络員和一大群学生。他們都在那里向我表示最热誠的欢迎。我的确感到很光荣。

在四周的镁光灯的照耀下，我們被带进了一輛汽車，然后在警察的护送下来到了旅館。一到旅館我就举行了一个記者招待会。我向記者解释說，我这次訪問具有双重目的：我不仅要接受母校授給我的名誉学位，而且急于探詢美国是否可能給予技术援助来发展我們的国家。

在我們到达后的第一天，科佐和我同一个黄金海岸的商人在一起进了餐，然后我們就到丹尼尔·查普曼的寓所（他当时在联合国非自治領土部里工作，現在任加納內閣秘書）。在那里，我們遇到了一群黄金海岸的学生和商人。我們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每一个人都急于知道有关黄金海岸的最新消息。我尽量簡短地把我們所記得的关于教育和經濟发展的計劃告訴他們，并且向他們着重指出，他們在美国受高等教育将来可以作为技术人員和顧問为国家服务的重要意义。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聚会，不仅对科佐和我，就是对所有离开祖国暫時住在美国的人說来，这次聚会都好象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我还記得，丹尼尔的妻子伊富阿曾經递給我一碗大米烧花生，我坐在厨房門口的一只木箱上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晚上，来了好几个黑人記者，向我要求作一次非正式的談話。他們非常关心我发出的希望給予黄金海岸技术援助和补助的呼吁，并且答应用宣传的方法尽量給予帮助。

第二天我到了費城，見到了市长，他把这个城市的鑰匙献給了我。費城使我联想起許多事情，有好的也有坏的。当市长把自由出入这个城市的权利授給我时，这对我說来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时刻。警察現在还会說什么呢？当我回想起以前在費城火車站上睡覺被警察弄醒的事，不禁暗自笑了起来。遺憾的是，他决不会想起我就是那个打瞌睡的狼狽不堪的大学生，因此也就不会觉得好

笑。

在献鑰匙的仪式結束了以后，我被送到貝萊孚—斯特腊特福德飯店，在那里作了一次簡短的广播录音，我对博齐約先生和我所受到的热誠欢迎表示感謝，并且向美国人民保証，黄金海岸决心在。英国和美国朋友們的援助下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然后，我到自己的房間里去洗了澡，准备参加“世界事务协会”和林肯大学評选委员会在这个飯店里举行的宴会。当我走进房間以后，就到处寻找我的皮箱。显眼的地方都沒有，我就在床底、碗厨里和所有最不可能放箱子的地方找。完全白費力气。我問科佐，我的皮箱是否弄錯了，被搬进了他的房間，后来我又問了茶房。但是，任何人都沒有見過我的皮箱。我是否确实带来了一只箱子呢？有人这样問过我。我一直沒有发现箱子到那里去了，但是几星期以后，这个箱子完整无缺地回到了黄金海岸。我的朋友們曾經打趣說，我的行李可能遭到联邦調查局的检查，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件事当时的确使我感到很不方便。

科佐和我都在宴会上講了話。我相当詳細地叙述了我們党的历史和爭取自治的斗争，以及我最初反对依据柯賽宪法組織政府，后来又同意根据这个宪法組織政府的理由。我表示希望最近将来在宪法問題上所取得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完全的自治。我又一次強調指出，我們需要美国和英国的技术人員幫助我們实现发展計劃。此后，有很多人到我这里来，他們答应今后在我所呼吁的問題上同我保持联系。

宴会以后，我参观了邓波大学的集邮展覽館。我很欣賞这个展覽，因为我不仅对集邮有兴趣，而且非常喜欢参观各种各样的博物館。不知不觉地，一天就过去了。我必須用一些時間来准备第

二天举行的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因此我悄悄地溜进了旅馆的房间来写讲话稿。当我写完讲话稿以后，我交给科佐唸了一遍，让他提一些意见。当科佐很敏感地建议睡觉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左右了，我们两人都累了，而第二天又是比任何一天都紧张的日子。

“科佐，”我突然说道，“我必须去访问两个人。只有这一个机会了。一个是我的亲爱的老房东博鲁姆太太，另一个是波霞。”

科佐笑了。他问道：“如果我同你一起去，你不在意吗？”

“你难道认为我打算把你留在后面吗？”

当我走到我以前的住所门前，我感到好象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除了我已经没有大门钥匙以外，甚么也没有改变。我突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博鲁姆太太可能已经不在了吧。我从来也没有写信给她，而她在六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我敲了敲门。等了几分钟，然后我听到有人慢吞吞地拖着步子从走廊里走过来。门慢慢地打开了，一个睡眼惺忪的人出来了。一直到我问她是不是能够进来的时候，她才认出我来，因为她立刻听出了我的声音。

“是克瓦米呀！”她高兴地喊道。“克瓦米，我的孩子！”我们拥抱在一起了。她是我的美国母亲，对我们俩人说来，我来访问她就如同回老家一样。

我们走进了屋子，但是我告诉她，我们不会停留很久，因为时间已经晚了，而我也知道她是很早就休息的。我们谈了一会我们共同的朋友们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就起身向她说明，我们必须走了。当我快离开的时候，我把一百美元的钞票塞到她的手中。

“对于您在我穷困的时候给予我的关心和照顾，我是永远也报



答不完的，這只是一點小意思。”我輕輕對着她的耳朵說道。她正想說話，可是眼淚已奪眶而出。我熱烈地擁抱她，並且告訴她有一天我可能會再來看她。

當我們向她揮手表示再見時，她說道：“我知道你总有一天還會來的，我的孩子。”

那時已是午夜或午夜以後了，科佐看了一眼表，焦急地問道：“我們下一次再去訪問不好嗎？”我回答說，“絕對不！這是美國。你多晚去訪問人都沒有關係。”

我找到了波霞的家，敲了敲門，門幾乎立刻就打開了。

“哈囉！”我笑容可掬地說道。

波霞看到我以後，惊奇得兩隻眼睛幾乎要瞪出來了，然後她伸開雙手擁抱我，表示歡迎。她聽說我在這個城里，可是我在這個時間來訪問却使她吃惊。她請我們進屋去，我們於是坐在一起談話了。

我這次訪問除了想再見見她以外，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因為我曾經把我的一些珍貴的書籍托她保管。我故意不去看那些書，因為我覺得這樣做顯得有禮貌，可是她很快就体会到我的意思，揮了一下手，指着書櫥說道：

“這是你的書，你看，我一直為你保管得很好。你什麼時候需要這些書，就告訴我好了。”

“這是我的書啊！”我喊道，裝成好像完全把書的事忘了的樣子看了看那些書。我立刻走近書櫥，親熱地撫弄着每一本書，同時回想起我為了獲得這些書而進行的鬥爭。我回想起這裡的每一本書都說明我作了某種犧牲，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犧牲一餐飯或一夜的睡眠。我這麼注意這些書，而波霞和科佐却靜靜地坐在那里瞧

着我，这使我突然感到很不好意思。

“談談你自己吧，”我向波霞說道。

从她的談話里我知道她已經結了婚，她的丈夫是在夜間工作的。

“你一定知道，”她頑皮地眨眨眼說道，“你是在半夜里訪問朋友啊！”

我于是建議我們三人一同出去，到过去波霞和我常去的一家館子里去吃一頓飯。我向波霞說：“不过这次，你可用不着带荷包了，波霞！今天晚上我們可以不必湊錢來吃飯！”

几小时以后，无忧无虑的政府領袖和他的教育部长已經疲倦，但是心里很高兴，他們来不及脫下衣服就倒在各自的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对我說來是一个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清早第一件事是出席林肯大学教职員的正式早餐，然后同这个大学中的大約三十位西非的大学生一起参加了早晨討論会。中午我出席了这个大学的評选委员会所举行的午宴，然后准备参加两点鐘举行的毕业典礼。由于我丢失了皮箱，虽然买了几件衬衫，我仍然感到缺少一件配得上在我一生的这么重大的場合中穿用的干净的衬衫。我到邦德博士那里向他說明了我的情况。他立刻答应帮助我，借給我一件衬衫。

我仍然象在梦中一般。在我的学生时代，我曾經数次参加过林肯大学的毕业典礼，但是这一次的气氛同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心情是如此激动，这使我不能相信只有我是这样的。当我穿着借来的衬衫走在穿着礼服的大学生的行列中时，我突然感到我好象是一个騙子。我作了些什么能够配得上这种荣誉呢？站在这里的就是1935年的那个克瓦米·恩克魯瑪，他那时甚至沒有錢交这个大

学的一学期的学費，可是他却有胆量說服院长讓他試一試。而現在，經過了十六年，还是那个青年，却挂着“政府事务领导人”的牌子将要接受母校給与他的崇高的荣誉了。“其实”，我心里想，“重要的問題不是一个人爬到多么高的地位，而是他的学識是否很淵博”。这正象一个小乡村的教員带着他的三本宝贵的書——聖經、莎士比亚的作品和阿耳科克語法——去上課一样！

我突然从白日梦中惊醒过来，发现自己站在荣誉的講台上，前面有一大群听众，其中有我以前的助教、同事和过去的同班同学。教务长——希耳教授在演講中告訴他們，我做了一些什么事使我能够获得这个学位。他在演講結束时說道：“我記得，当恩克魯瑪先生申請在这所大学里求学时，他曾在信中摘引了坦尼逊的‘回忆’中的一句話：‘……需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完成的事情却如此之少……’。我想最后說这么一句話：我感到如果談到他，这句話應該改成‘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中，却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

接着校长邦德博士就把法学博士的学位授給了我，并請我講話。

我一开始先简单地談了一下我在美国和倫敦求学时的情况，介紹了我在倫敦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和西非国民大会秘書处这个組織，以及編輯“新非洲人报”和随后放弃学业而被邀請担任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总書記等情况。接着我又談到了在組織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我被捕和被監禁在北部領土地区的情况。我还談到了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分裂和我的政党——人民大会党的建立。这个党的箴言是：“我們宁願冒着危险取得自治，而不願平靜无事地受人奴役”；它的政策是：“首

先要争取政治独立，然后一切好事就会接踵而来。”这几句话博得了听众的热烈欢呼。

我接着介绍了人民大会党如何组织群众向英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由于对柯赛宪法普遍不满，我如何采取积极行动迫使英国政府给予我们更广泛的自治权，以及结果我和许多其他的人又如何被加上危害治安的罪名而被逮捕和监禁起来。我谈到了最近举行的大选和我党所取得的重大的胜利，以及我如何被释放出狱。我还谈到，尽管宪法是“虚伪而骗人的”，我仍然决定组织政府，因为我感到经过一段时间和耐心的等待，宪法可以加以修改，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会在英国联邦内取得正式的自治领的地位。我解释说，我们对英国并不怀有恶感，我们反对种族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

我接着谈到了我对将来的希望。“我们的目标是按照英国和美国目前所实行的民主原则来进行工作。即使自治得不好，我们也要求自治的权利。”我还谈到黄金海岸需要技术人员、机器和资金来开发它的富饶的自然资源，我首先向英国和美国等民主国家呼吁，要求取得这种援助，但是如果得不到援助，我就不得不另想办法了。我说，美国的黑人在现在和将来都可以为他们的祖国做许多事情。我还谈到，在黄金海岸取得独立时，我的党打算把这个国家改名为加纳。講演结束时，我谈到了刚才授给我的法学博士的学位。我说道：“这个荣誉与其说是给我所作的微不足道的工作的奖励，还不如说是给黄金海岸和非洲人民的礼物。正是因为他们具有深切的责任心和自尊心，才使我有完成我的工作。我回国以后，仍然要牢牢地记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最后，在邦德博士公馆的园子里举行茶会作为毕业典礼的结



東。为了响应我的呼吁，許多黑人毕业生走到我的跟前，表示他們願意到黄金海岸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請他們在我回国以后写信給我。我向他們解释說，由于我們的国家还是一个殖民地，因此我們在目前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只要我們获得独立，我們就能够伸出手来欢迎一切願意来我国工作的人。

然后，我回到了紐約。第二天，我正式訪問了英国駐联合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爵士和紐約市长。快到晌午的时候，我举行了一个記者招待会。我在前一天所发表的演說使人們感到很大的兴趣，記者向我提出了一大串問題，例如黄金海岸需要多少美元的援助来发展它的国家、技术人員服务的条件如何、以及我的演說所涉及的其他有关事項。对于这一点我很滿意，因此尽力做到在問題一提出来就很快答复。在举行記者招待会以后，科佐和我还作了一次电视講話。

在联合国总部进了午餐以后，我出席了托管理事会的會議，当时理事会的主席是黄金海岸的前总督艾倫·伯恩斯爵士。当我开始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时，他已經离开了黄金海岸，不过所有这些情况他当然全会听到的，因而我們就有許多話可談。在这以后，我还同特里格夫·賴伊先生、腊耳夫·本奇博士和韦尔弗雷德·本逊先生以及同支援沃尔特河計劃、建立黄金海岸大学生奖学金和一般的技术援助有关的其他官員进行了談話。这些談話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第二天，科佐和我乘火車到了华盛顿，受到了国务院的四位官員的欢迎。我們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很短促，但是訪問日程却安排得很紧凑。我同国务院和政府其他各部的官員們进行了談話，了解了一下美国政府組織是怎样进行工作的，向亚伯拉罕·林肯的

紀念碑献了花圈，參觀了杰弗逊的紀念館，还出席了两个招待会。一个招待会是在英国大使館举行的，另一个是紧接着在国务院里举行的。

次日，我回到了紐約，准备起程。晚上，紐約市长为科佐和我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所有的黑人显要人物和官員們都出席了这个宴会，我发表了一篇講演，論述黄金海岸的政治发展，并且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实行自治。我表示，在独立以后，对于所有願意回来帮助建設国家的人，我們都非常欢迎，到那时我們就可以伸出手来欢迎我們所喜欢的任何人。我談到，我能够来美国作这次意想不到的訪問是多么高兴，感到每一个人是多么热情地欢迎我。我将带着許多愉快的記憶回国去。

当我坐到位子上时，我回想起在費城长老会的教堂中作我在美国最后一次講道那一天的情景。当时我的講題是：“我見到了新的天堂和新的人間”，我曾告訴人們历史是如何重演的。正如埃及人的时代一样，今天上帝已經命令某些非洲人到西方去求知識和經驗，以便在一旦需要他們的时候能够回到祖国用他們所学到的东西来帮助改进他們同胞的命运。我告訴人們，他們不應該灰心，也不要急躁，因为他們的机会現在随时都会来到。我告誡他們：“把自己准备好，等待祖国的召唤，因为那个时候是很快就要到来的。”我当时沒有想到，对于实现这个預言，我会起这么重大的作用。

6月10日，科佐和我向聚集在机場上为我們送行的一群官員、学生和其他关心我們的人告別了。我們俩人都很高兴，我們所进行的各次会談使我們的心中充滿了信心。但是我們都精疲力尽了。

“能說我們在美国睡了覺嗎？”我打着呵欠說。我的朋友沒有回答，因为他已經睡着了，安全帶仍然緊緊地縛在他的腰上。

我們到达倫敦時晚了几小時，雖然如此，喬治·帕德莫和几个非洲的大学生仍在等着迎接我們。我的运气很好，在这么短促的逗留時間內还能够會見艾德禮先生和英国工党的許多領導人。我向他們強調說，黃金海岸迫切要求取得完全的自治。我一面承認不要把事情办得太匆忙是很重要的，一面敦促他們尽量把事情办得快一点。我应邀参加了保守党議員倫諾克斯·波伊德先生的招待會。他使我感到极为可亲，我告訴他的有关黃金海岸的所有的事情，他都感到浓厚的兴趣。当时我那里会知道这个人在五年以后将以殖民大臣的身份作为我的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之間商談獨立問題的桥梁。另一家邀請我訪問而又使我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是駐节緬甸的蒙巴頓勳爵夫婦。他們所了解的印度情况和那里移交权力的情况是我們大家都感兴趣的談話內容。

很幸运，請假离开黃金海岸的查爾斯·阿登—克拉克爵士当时也在倫敦，这样我就能夠同他、殖民大臣和殖民部的官員們进行許多有益的討論。我訪問了下院，同两位議員在一起用餐，还旁听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一段通宵辯論。

我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做了許多事。当我登上倫敦機場上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时，我真好象被解放了一样。当飞机的四架引擎发动了起来，我們都在跑道的一端等候起飞时，我算了一下飞机将在那几个地方停留，“的黎波里、卡諾、拉各斯、阿克拉”。我真不知道在我离开期間，阿克拉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我似乎离开了很久。我感到有点焦虑不安。

翌晨，当飞机在卡諾加油时，我在機場上受到了人民大会党卡

諾支部代表團和尼日利亞的其他政治擁護者的歡迎，他們贈給我一把當地製造的寶劍作為紀念。幾小時以後當我們在阿克拉上空盤旋準備降落時，整個機場地區從灰色轉變為黑褐色和黑色。成千上萬的人齊聲歡呼，嗓子都喊啞了。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一切情況都很好。不管今後其他事情對我怎樣，真正起作用的人民是堅決支持我和我黨的。

當我把頭伸出機艙門沿着扶梯走下來時，人群沖破了柵欄，瘋狂般地涌過來圍繞在我的四周。一霎時，我的雙腿被抬起來了，被抬到肩膀上，這時人群高聲歡呼，唱黨歌，並且向恩克魯瑪“博士”祝賀。這次難忘的旅行這樣結束多麼使人高興啊！

為了從美國回來以後向人民群眾問好，我打算當天晚一些時候在奧伍蘇紀念公園里向他們講一次話。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穿上了軍裝。當我到達時，人群密集，幾乎無法通行。因為人們已經擠得很緊，即使作了各種努力想擠得更緊一些也不能為我們讓出一條道路，結果我們用了一個多小時才一步一步地擠到講台。當人們互相擠壓時，他們喘着氣，發出“哎喲哎喲”的呻吟聲，到處我都看到有人被擠暈倒了。當我最後走上講台時，我意識到，向他們演講和告訴他們下星期日在阿倫納廣場集會根本沒有用處。我靜靜地站着，凝視着人群最密的地方，我看到了一個巨人，任何痛苦和不舒服都不能使他離開自己的目標，這是人們團結的最具體的表現。當我想到領導這些人的光榮屬於我時，我被深深地感動了。



---

## 第十五章 总理和宪法改革

立法議會議員是根据毫不符合我党政治願望的“虛伪和欺騙性的”宪法选举出来的，作为这样一个議會內的多數党領袖，我的任务并不是一項令人羨慕的任务。柯賽宪法并不是根据要在國內发展政党制度的思想而制訂的。政府事务領導人的职位不是按照由非洲人接管政府的精神来設置的，而且事实上由于我党在1951年选举中贏得多數并組成了政府，政府事务領導人的职位已經成为多余的了。甚至“泰晤士报”早在1951年2月17日就曾指出設立总理职位的必要性，該报在評論政府事务領導人的称号时認為，柯賽宪法“里面沒有关于設立总理职位的規定。这个崇高的职位只有当最高的部长职务与立法机关內最大政党的領導相結合的时候才存在。”

我党黨員都竭力主张我的官銜应改成总理。关于这点有很多人提出批評，因为一般人感觉到將現在的政府事务領導人的职位改称为总理是不会改变宪法的實質的。然而我認為，不同的名称中間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作为一个总理，就必须遵守那些关于設置一个总理职位的規定，同时因为我在議會內作为政府領導人的地位是由于我是多數党領導人，所以肯定需要設立总理的职位。

終於我們胜利了。1952年3月5日下午总督在立法議會的

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如下的讲话：

“议长先生，尊敬的议员们，我今天下午应你们的邀请，到这里来向你们转达殖民大臣刚刚在下院发表的关于进一步修改黄金海岸宪法的声明。声明如下：

“根据现行宪法的执行情况和总督的意见，女王陛下政府决定宪法上关于立法议会内政府事务领导人的规定应该取消，而总理的职务应予以正式承认。总督将和总理商谈，然后向议会提出他建议任命的行政委员会或内阁成员名单，并给他们分配部长职位。在内阁中，总理的职位仅次于总督或政府行政长官（依情况而言），而高于三个当然部长，这些部长的地位在其他方面都保持不变。”

“对于为实行上述变动及随之而产生的其他变动而必需作的宪法修改将在短期内进行”。声明至此结束。

这个消息获得了热烈的欢呼和喝采。我的办公室、党总部和议会都不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祝贺。当我能脱身的时候，我就立即回家，以便同我的母亲一起享受这个令人欢欣的消息。

“做一个第一任非洲总理的母亲有什么感觉啊？”我逗她说。

她望着我，哼了一声，似乎说“下一步你将怎么办呢？”但是她并没有隐藏她那骄傲的神情，这种神情突然间使她那双劳累过度的眼睛发亮了。

宣布任命我为总理后，行政委员会就辞职了，经过与总督商谈后，我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今后称为内阁。这个建议提交到立法议会去批准。

3月21日立法议会批准任命我为总理，同时批准了下列内阁部长的任命：

科佐·博齊約——教育和社会福利部长

克·阿·伯德馬——商业和工业部长

阿·凱斯利—海福特——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长

伊·奧·阿薩福—阿德賈伊——地方政府部长

雅·阿·布萊瑪——交通和工程部长

特·赫頓—米尔斯——卫生和劳动部长

安沙·柯依——房屋部长

我除了担任总理以外还被选为建設部长。

現在我們面臨的任務是為爭取完全的獨立而進行最後的鬥爭，並為達到這個目的制定議會內外的行動政策。同時必須對憲法進行某些修改，這種修改將適合我國在達到完全自治前必須經過的過渡時期的情況。我們可以說，這就是一個試驗時期，我們必須在這個試驗時期中證明和顯示我們具有管理自己事務的能力。

我着手與總督討論有關憲法修改的問題，那年（1952年）6月當時的殖民大臣奧立佛·李特爾頓來我國訪問時，我進一步與他討論了這個問題。我指出，我們希望得到完全的自治，同時為了在我們達到目的以前的過渡時期中滿意地進行工作，有必要對憲法進行某些修改。李特爾頓先生同意，由黃金海岸政府提出各項建議，經過與本國酋長和人民協商後，將由女王陛下政府和黃金海岸政府加以審核和討論。這清楚地說明，為了取得我國的獨立，黃金海岸政府必須採取主動。換言之，政府應該主動與黃金海岸的酋長和人民協商有關對柯賽憲法作必要修改的問題。

關於這種協商，我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10月間在立法議會上發表了一項聲明。我開始談到現行憲法的主要特徵，根據過去二十一個月實施中所獲得的經驗，證明現行憲法應予重新審核和修

改。我說，有必要全面考查這一問題，這樣，以後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就永遠不會有人說我們準備最後將向英國政府提出的那些建議，在我們這方面，不是在充分理解這個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協商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我國政府與英國政府之間進行商討，而我們提出的建議應該清楚地表明我們認為我們現在還應該進一步擔當起哪些職務和責任。我竭力促請那些參加協商的人們無論他們是代表那一種利益或者那一個黨派或團體都必須充分地認識到所涉及問題的嚴重性。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以高級的政治家風度進行討論，而且無論是口頭或書面應避免使用任何無用的或考慮不周的字眼。

我首先談到當然部長的問題。我說，我們應該考慮一下；這三個部長是否應該保留在內閣裏面，還是應該讓由議員中選任的部長來代替他們。如果當然的財政部長由一個從議員中選任的部長來代替的話，政府就應該保證它能夠繼續听取財政專家的意見。這個問題最好用為政府委任一個財政和經濟顧問的辦法來解決，這個顧問在必要時可以參加內閣會議，但是沒有表決權，同時他既不是內閣閣員也不是議會議員。

現任當然的司法部長是兼任首席檢察官即政府法律顧問的。可以這樣做：選任一位司法部長；同時另外任命一位首席檢察官，并由他繼續擔任政府的法律顧問，他在必要時可以參加內閣會議，但沒有表決權，而且他既不是內閣閣員也不是議會議員。

關於當然的國防和外交部長，如果由一個從議員中選任的部長來代替他的話，其含義之一就是說黃金海岸準備立即將國防的全部責任接受過來，我指出，國防的主要擔子，過去一直是由英聯邦的海陸空武裝部隊擔負的。我們只有一支很小的軍隊，并只承



担它的一部分費用。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們对外貿易关系的維持和保护将不再是英国的直接責任，而成为我們自己的事务。我們必須在与我們有貿易关系的外国直接派駐代表，并且要負責保护我們的对外貿易，使其免受歧視。

我說：“記住了这些含义后，我国會長和人民，現在應該来考虑是否全部当然部长或其中任何一个應該由議員中选任的部长来代替。”

我指出，目前总理和他的由議員中选任的部长的任命最后是由議会的決議决定的，总理是由总督提名的，由議員中选任的部长是由总督同总理商議后提名的。我說：“如果总理不用遵照議会的決議而可以自由选择由議員中选任的部长的話，总督是无权拒絕总理所选择的人的。这样就更符合英国宪法性的慣例。”我并且說明，根据英国慣例，总理的任命不應該决定于議会的決議，而應該决定于他接受总督邀請組織多数党政府的意願和能力。如果这种改变實現了的話，必要时总理就有权决定免去任何一个由議員中选任的部长的职务。

我宣布說：“現在要由會長和人民来考虑，任命总理和其他由議員中选任的部长的程序是否應該作任何修改，如果應該修改的話，又應該作哪些修改。”

关于部长职位的任命問題显然是一个應該根据宪法的修改来进行考慮的問題，而这种宪法的修改可能牽涉到当然部长的繼續存在問題和任命由議員中选任的部长的問題。

然后我就把話題轉到立法議会的組成問題。我指出議會由三位当然部长、六名特別議員（其中只有兩名有表決權）和七十五名

其他議員組成。五十六名代表黃金海岸殖民地、阿散蒂和南多哥的議員中有十八名或三分之一是代表酋長和傳統行政當局的，他們不是根據普選選舉出來的，而是由各省酋長聯合會議、阿散蒂人委員會和外沃尔特南多哥選舉團選出的。代表北部領土的十九個議員是根據北部領土特有的制度選出來的。選區大小不一，它們在議會內的代表也是不相等的。

我說：“現在要由酋長和人民來考慮，現在組成的議會在我們是否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是否有必要建立議會第二院；如果有必要的話，它的結構和權力又應該怎麼樣？”

顯然，有必要建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來研究代表制度和選舉制度的改革。現在要由酋長和人民來考慮這個委員會的組成和職權範圍。

憲法勅令第五部分是關於議會中的立法和程序問題，其中規定，對於那些議長或首席檢察官認為總督不能按照自己意見處理的當地憲法問題，授權總督控制對這些問題作出最後決定的法案和提案的提出。

我說：“現在要由酋長和人民來考慮，憲法勅令中關於這部分的規定，即關於那些不由總督決定的下列各種當地憲法問題的法案和提案的規定，是否應作任何修改：

“甲、關於酋長的選舉、任命、罷免和辭職的問題，以及關於參加這類選舉、任命或罷免的人的權利問題。

“乙、與這類選舉、任命、罷免或辭職有關的酋長‘寶座’的收回或移交問題。

“丙、關於根據當地習慣法各酋長之間的政治或組織關係問題。”

我接着說，憲法勅令第六部份規定了一些保障公務員的辦法，以便使公務員免受政治的影響和控制。公務員受總督控制，按照他的意見來處置，同時規定建立一個獨立的公務員委員會向總督提供諮詢意見。憲法勅令並不排斥議會對公務員制度的監督。我們應該牢牢記住，公務員是執行政府政策的工具，沒有他們，政府的政策就無法實現。雖然政治上的進展已經超過非洲化的進展，但是我們必須記住，旨在使英國最好的傳統延續下去的文官制度必須保持免受政治影響。使公務員保持較高的水平，這是一個行政問題。同時，必須首先對下列事項進行仔細研究，否則就不可能對憲法條款的修改提出中肯的意見：

1、如何按照將來需要逐步實現非洲化的問題；

2、有多少英國海外軍官必須在今後一定時期繼續存在的問題；

3、現役軍官及日後召募的軍人在目前的保障辦法有修改時將受到什麼影響的問題，以及如果英國政府接受對目前的保障辦法所作的任何物質的削減，是不是有可能規定對現役軍官的職業損失給予補償金的問題。

我說：“會長和人民在考慮到所有這一切因素之後，應該來考慮憲法有關公務員的規定是否應加以修改，如果應該修改，應該作哪一方面的修改。”

我接着說，如果會長和人民對其他問題願意發表意見的話，也是歡迎的。政府對於我上面所提出的各種問題將給予進行充分協商的机会，並將對所提出的意見進行研究，然後才制定有關的政策。為了使初步討論不致受到政府的政策聲明的影響，我已決定在進行協商以前不發表政府的政策聲明。

我提議將我的聲明印發給全國各地的議會、政党和有代表性的團體，並請它們在3月底以前將意見交給我的辦公室。這些書面意見將經過校閱並予以公布；然後政府將擬定它的意見，並將這些意見歸納在一件白皮書內，提交議會6月的會議進行辯論。

我最後說：“議長先生，最後，我要提醒可敬的議員們和每一個閱讀這篇聲明的人，為了響應殖民大臣根據我們大家的要求對我們所提出的請求，我們正在從事一種事業，這種事業使得所有參加的人負有十分重大的責任。政府所負的責任則尤其重大，因為政府必須根據全國充分考慮後提出的意見，最後決定將向英國政府提出的建議。不論是抱着批評態度和抱着同情態度的全世界人士都將密切注視我們如何對待這個問題。我要求會長和人民儘可能把他們的最好的建議提供給政府。”

到3月底已有一百三十一個組織提出了它們的意見。地區委員會、加納大會黨、加納國民黨和黃金海岸工會大會都是不贊成與會長和人民就憲法的修改進行磋商的。然而，我不能不按照這樣的程序辦事，因為根據柯賽憲法組成的立法議會並不是全部經過選舉而產生的議會。

上述討論和磋商成為1953年政府關於憲法改革的白皮書的基礎。而這個白皮書，經過與殖民大臣幾個月的協商後，又成為現行憲法的基礎。這個現行憲法就是一般所說的“恩克魯瑪憲法”，但是我寧可把它稱做“恩克魯瑪—阿登·克拉克憲法”。現行憲法是在白皮書公布後一年才產生出來的，在這一年中，我以最大的努力不斷進行鬥爭。

上述10月聲明發表以後不久，我作了一次全國旅行，以便了解黨組織的進展情況。我十分歡欣鼓舞地看到了群眾熱情地、團結



一致地支持党的情况。我強調新的地方和城市委員會必須同选举它們的人民密切合作的重要性，我指出因为独立和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自由、民主的自治政府的唯一的支持力量，因此我們的目的是要促使这些組織成长。凡是我經過的城市和乡村，我就把这些地方人民的最迫切的要求記錄下来。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带回来关于这些要求的一份很长的清单，这些要求包括对道路、学校、医院、葯房、自来水、邮局、电话和住房等等要求。

当我在11月回到阿拉克时，我召开了一次人民大会党紧急代表大会，討論影响到党的团結的重要事項。我向大会作了关于我不久以前旅行全国結果的报告，并使代表們注意到，我們的主要口号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應該是：“組織起来”，因为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指出，尽管我們目前取得了一些政治上的成就，但是为了順利地渡过下一阶段，我們一定要保證好好地組織起来，并使我們坚强壮大起来。我并警告大家說：“我們在政治上前进的道路上的下一个阶段中可能需要举行大选，因此我們不能够由于目前的成就而停止前进。”

国内存在着两个工会大会，这是我們的不幸。任何分裂的和自相残杀的軍隊都不能进行有效的战斗。即使两个工会大会都是百分之一百地拥护人民大会党，我仍然坚持只能由一个工会大会来領導工会运动。我告訴他們，我曾經建議建立一个“工业組織委員會”，以促进国内的工会运动。

然后我讀了一下最近我在議會內发表的关于宪法改革的声明。我告訴他們，当时我是以总理和政府領導人的身份发表这个声明的，而現在我是以人民大会党終身主席和領袖的身份向他們講話。我現在代表党的全国执行委員會向大家提出下列建議，这

同我代表政府所提出的保証并不矛盾，这个保証就是說政府在拟訂出最后的建議以前，将充分考虑酋长、人民和其他政党的意見。我接着說，全国执行委员会已經决定这个代表大会應該建議黄金海岸政府通过殖民大臣向女王表明，黄金海岸的酋长和人民要求立即实行自治，并要求英国議会和黄金海岸立法議会同时通过一項独立法，宣布黄金海岸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改名为加納，并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为国家元首。

这个建議被大家热情地接受了。我觉得刀枪不磨練就要生銹。經驗告訴我，我們要化多么长的時間才能完成一件事情，特别是当这件事情涉及到一些革命思想的时候，但是只要我們經常进行鼓动，我認为我們沒有理由达不到独立的目的。

## 第十六章 对利比里亚的国事访问

1952年底，杜伯曼总统邀请我到利比里亚作国事访问。他很客气，表示愿意派他的“爱德华·罗伊总统号”游艇接送我。

因为要等到次年4月各组织的意见才能提出来，因而当时宪法改革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我很想在这个时候换一换环境，呼吸一下海上的新鲜空气，因此我对这项邀请很感兴趣。我的部长们和党的执行委员们一致主张我接受邀请，我随即决定同总督商量一下这件事。

“总理先生，看样子，你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了。”总督先生一面说一面仔细地端详着我。他又说：“但是我不知道你去作国事访问会有多少时间来休息？”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但是我至少可以在海上往返各三天的时间中在游艇上休息一下。而且如果我不趁这个机会去，而国内的情况又照我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的话，我再要想离开，就恐怕要好几年了。所以我决定接受邀请。

1953年1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出发到塔科拉第，总统的游艇就在那里等候我。我不知到底有多少人随我去访问，但可以肯定，我的随行人员足足坐满了一船，而且还有很多人自费坐飞机到利比里亚去迎接我并参加访问。

在塔科拉第的郊外，成大群的人等候在那里欢送我。我的汽车不得不停下来。他们又跳舞又唱歌，指着孩子的母亲，按照鼓声的节奏摆动着她们的身体，儿童们出神地学着大人跳舞唱歌。男女老少都盛装列队敲锣打鼓，又笑又唱。等我们最后到了码头，还有更多的节目。有的致欢送词，祝我一路平安，有的洒酒祝福，有的同我握手。当我登上游艇时，一个荷兰籍艇长来迎接我，并向我介绍他的全体船员，他们全都是荷兰人。他们把我引到总统专用的房间，我和科佐·博齐约就住在这套房间。

等大家都离去后，我们四周打量了一下，我问科佐：“你见过这样豪华的船吗？”于是我叹了一口气，很高兴地躺在一个床上。我想，给我准备这样舒适的床恐怕是个错误，我想，在到达蒙罗维亚之前我一定不想起来。

游艇上恐怕只有我一个人感到需要这样的休息，因为当我的随行人员熟悉了游艇的地理环境以后，一个接一个地跑来打开我的门来看望我。当他们看见我躺在床上昏睡，都很担心，问我是不是不舒服了。他们不相信我只是疲乏，因为没有人似乎想到我会疲乏。我好象一个机器人，早晨把发条上足后，就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睡觉。等发条松了，我再把它上紧就是了！

于是我又把发条紧了一下，我起来走出去，同大家见面。他们看来都感到十分舒服自在。他们喝酒，高声谈笑，以便使他们的声音高过无线电收音机的声音。不知是谁发现了无线电收音机的声音，一路上它一直没停。

我对于船只一向很感兴趣，不久我就去找船长，询问他“爱德华·罗伊总统号”的情况。这只游艇是根据1870年当选的利比里亚第一位纯黑人血统总统的名字而命名的。这只游艇重四百六十



三吨，是在几年前从荷兰买来的。当时，敢想敢干的杜伯曼总统感到有必要沿海岸旅行，不仅仅依靠土路，而利比里亚的公路大部分是土路。在阴雨的季节，这种路简直无法通行。

船长一面笑着，一面给我敬个礼说：“总理先生，说实在的，这就是总统的海军！”

我说：“我巴不得立刻建立这样的海军，目下我的海军是一支很英勇的、但设备不大好的渔船队”。我考虑到游艇和荷兰，并在沉思片刻之后给我心目中的船只想出了一个适当的名称。

虽然游艇上吵吵闹闹甚为活跃，等我们到达蒙罗维亚港时，我还是感到休息得很好。真是幸运，因为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给我安排这样盛大的接待。总统、副总统和他们的夫人、参众两院议员、政府高级官员、酋长，还有很多看热闹的、兴高采烈的群众，都等候在港口来迎接我。我同他们一一握手以后，盛大的行列就出发沿着蒙罗维亚的街道行进。

当我向四周观望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这个城市同我1947年来访问时大不相同了。我把我的感觉告诉坐在旁边的杜伯曼总统，并祝贺在他任期内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在他当选总统以前，利比里亚远不能给争取独立的国家什么鼓励和刺激。就是在今天，如果要成为西非独立国家的一个典范，这个共和国还得要作很多事情，因为这里的道路差不多是我所见到的所有国家中最坏的了，而没有良好的道路，内地和沿海就要被隔断。有很多的情况表明这里的老百姓还很贫困，即使在蒙罗维亚也是如此。但是无论有多么大的决心，改善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时间的。当我看到在这短短的五年当中取得了这么多的成绩时，我感到，如果杜伯曼总统再领导这个国家五年或十年，利比里亚可以解决它的很多困难。当时

有一种想法强烈地浮在我的心里，那就是，如果当时每年只有区区两百万英镑收入的利比里亚能够实行自治，那末每年有三千六百万英镑以上的收入的黄金海岸，的确是大有可为了。

我的节目安排得满满的，计划得很仔细，使我能看到利比里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在参众两院发表了演说，访问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并参观这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参观了铁矿；访问了黄金海岸侨民的家庭，并出席了招待会、游园会和几个晚会。招待我的节目排得很密，在每一个空隙，我都感到象刚从转盘木马上走下来一样。

一天，总统邀请我到他的乡村别墅去作客，该地名为托托塔，距蒙罗维亚六十英里。别墅和附近的环境很优美，虽然从蒙罗维亚到这里的路坎坷不平，尘土飞扬，但来到这样优美的地方是完全值得的。幸亏那天没有下雨，否则恐怕很难通行。在那里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午宴，全体酋长都应邀参加。我看参加宴会的人总得有一千人左右。杜伯曼夫人是一位娴静而没有架子的夫人，她招待客人非常殷勤，对每一个客人都招待得很周到，似乎没有一点失礼的地方。这次招待会使人感到非常满意。

英国大使馆和黄金海岸侨民都为我举行了招待会。我作了好几次演说。最令人难忘和最使我高兴的一次演说是在蒙罗维亚百周年纪念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作的，这次演说我既无演说稿事前也毫无准备。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只要一看见在我面前的广大群众，我的话语就会涌出来；我知道，这样的演说应该是我内心发出来的并且是群众喜欢听和愿意记住的话。

在我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我意识到群众的紧张情绪。在这一刹那，我好象一个催眠家一样，似乎只要一招手就能控制住在我面

前的群众的全部行动和情緒。这是我到利比里亚旅行当中令人最难忘的事。那天我講的是：“我所看到的景象”。

我首先說感激利比里亚人民对我的盛情接待，并轉达黄金海岸酋长和人民对他們的問候。我告訴他們，我訪問了利比里亚的国务院、財政部及其他政府部門，并參觀了这些部門的工作情况。我說：“如果你們允許我談一談我參觀的感想的話，那就是：能够有管理自己的事务的自由，無論管理得好或不好，总要比沒有这种自由强得多。”这番話博得热烈的掌声。“1949年当我們在黄金海岸全力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时，正是这种精神鼓舞了我，当时我創辦了一种报纸，該报名为‘阿克拉晚报’。我現在請大家听一听該报的口号：‘我們宁願冒危险去爭取自治，而不願在平靜中受奴役！’”

我說，利比里亚过去和現在的成就，都强有力地証明非洲人有能力管理自己。我评价利比里亚，不是根据它今天已达到的水平，而是根据它过去原来的水平。我在群众欢呼鼓掌声中宣布說：“那些想奴役利比里亚的人，奴役了他們自己！”

我指出，在黑人背乡离井在美国和西印度群島遭受磨难的岁月里，黑人仍能活下来，这是上帝的旨意。在很多世紀以前，当摩西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也是由于上帝的保佑。我說：“規模更大的解放今天正在降临到非洲，在出現一个統一、自由和独立的西非洲的时候，这种解放将成为一件确定不移的事实。……請看一看今日的整个非洲！除了利比里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以外，整个非洲大陆被一再分裂，被一再瓜分，請看一看非洲的地图！”我憤慨地說，整个非洲大陆活象用杂色布拼凑成的被子，每一种顏色代表一个外国的利益。

我越講越有劲，我从情緒热烈的群众中所汲取到的鼓舞力量，正如同我在阿克拉的阿倫納廣場从我本国人民中所得到的的一样。

我高呼：“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但不是馬庫斯·加尔維的哲学所指的那种非洲人的非洲。决不是！我們正在建立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非洲人的非洲。那末这种概念是什么呢？”我停了一停說：“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非洲国家。我們要在我們自己的国家中自己管理自己，而不受外来的干涉——我們正在促其实现！”群众欢呼雷动，打断了我的話，过了好几分钟才靜下来使我能繼續講下去。

我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沒有自己的政府，那是“愚蠢而荒謬的事”。所以，努力前进，使我們各自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能得到发展是很重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要取得比我們祖先的国家古加納所取得的更加光荣、更加輝煌的成就。我向大家解释：远在贩卖黑奴和帝国主义开始在非洲角逐以前，加納帝国的文化就已存在。当时，在古老的廷巴克图城，精通科学、艺术的博学的非洲人，把他們的著作譯成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同时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大学交換教师。我驕傲地說：“这些人都是有智慧的人！而今天却有人来告訴我們說我們不行。我們曾被迫相信我們自己不行。但是，难道你們忘記了嗎？你們同其他人一样有感情；你們同其他人一样有知覺；你們同其他人一样怀抱着希望——并且你們还有理想。因此，不要讓別人来欺騙我們，說非洲人不能管理自己！”

在已經向世界表現了自己的才能的非洲人的例子中，我举出了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安东尼·威廉·阿穆<sup>Θ</sup>，还有戰場上的英雄



图散·路韋屠尔。

“我們相信种族平等。我們相信所有各种族人民都应有自由。我們相信合作。事实上我一向認為，在我們当前的斗争中，在我們拯救非洲的斗争中，我們并不是在反对任何种族、肤色和宗教。我們是为反对一种可耻的剝削制度而斗争。無論在什么地方存在着这种制度，都必須废除。是的，我們相信所有国家間的和平和合作，但是我們也憎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憎恶人对人的残酷行为。”

“我們必須学会怎样共处。貴族政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还了。上帝使我們都是平等的。……如果你們能够为你們本国人民建立起国家和政府，那末国家就有責任为本国人民謀福利。你們利比亚的领导人已經为本国人民做了很多事。”

接着我又說明我們黄金海岸人为什么覺得，我們在創造我国历史中已起了我們应起的作用。我提到使英国在黄金海岸取得政治立足点的 1844 年条約，以及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而組織的芳蒂邦联。我問道：“結果怎样呢？他們被捕了，并被加以叛逆的罪名。”

后来人們又組織了保障土著居民权利协会，为反对剝夺他們的土地而斗争。結果今天土地是屬於黄金海岸的酋长和人民的。以后还組織了英屬西非国民大会，但由于某些成員的阴谋活动这个組織被弄得声誉扫地。二十年前一个名叫阿格雷的人来到黄金海岸，他說：“不要泄气，不必在乎目前或是过去的情况，非洲青年

⊖ 我在美国发现，黄金海岸阿克西姆地方的恩济馬人阿穆曾經写过一篇論文，名为“Tractatus de arte Sobrie et accurate philosophandi”。該文于 1738 年在哈雷发表。同时，我听说該文的一个副本存于大英博物館，我曾打算出版一本有关这位从黄金海岸去的第一位学者的著作的小册子。当我到倫敦时，我急切地訪問了大英博物館。天哪！阿穆的这篇論文在 1941 年 5 月德国飞机的一次轟炸中被毀坏了。

觉醒的新日子就要到来，而那种觉醒将促进文明的发展。”

我又谈到我怎样回到黄金海岸担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书记，整个国家怎样在几个月当中就在政治上觉醒起来，以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接着，我谈到目前的情况。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已经再度向英国提出我们的问题。在我党上次会议中，全体黄金海岸人民一致地要求实现黄金海岸的主权和独立。黄金海岸将不再称为‘黄金海岸’，因为这个名字会使我们想起过去；我们将要另起一个新的国名，我们将称为新的‘加纳’。请注意，这是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但仍留在英联邦范围以内，因为我们仍然没有忘记英国所做的工作。我们不是忘恩负义的野兽。……只要而且当我们管理或者错误地管理自己的事务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同英国做朋友。”

我告诉他们，西非合众国的运动已经开始，非洲西海岸所有属地现在都应该具有彼此联合和团结的想法。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世界上保持我们的地位，因为我们有了这种力量的支持，我们就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我简短地把我的话总结了一下，并说感谢他们的盛意。我高呼：“利比里亚共和国万岁！”

两个星期的盛大欢迎节目结束了。当我在码头同欢送我们的人一起跳舞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代表黄金海岸人民）和利比里亚人民之间的了解已经大大加强了。虽然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他们受的是美国教育，我们受的是英国教育，而在地理上处在我们两国之间的人又受到法国的影响，但是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都属于一个大家庭，而我们都迫切希望这个大家庭能够大团圆。

“爱德华·罗伊总统号”的机器开动了。我们作了最后一分钟

的告別。海岸離我們越來越遠，利比里亞和利比里亞熱情的人民終於離開了我們的視線。

我們回到了塔科拉第。我國人民群眾對我的迎接也是令人難忘的。我從未見過這樣多的人。群眾情緒熱烈萬分，真是如醉如狂，他們揮動著手臂，揮動著旗子和衣裳，他們跳舞唱歌，歡呼，敲鑼打鼓。一眼望下去，真是使我眼花瞭亂。群眾按照鼓聲的節奏擺動著身體，使我感到好象我們就要下船登上在洶涌的浪潮中擺動的木筏一樣。從塔科拉第到阿克拉的一百六十五英里的路途上，一路受到群眾的歡迎，歡迎的旗幟和標語比比皆是，村民盛裝出迎，他們高呼：“自由！”、“歡迎！”和“阿克瓦巴！(Akwaaba)”（群眾對恩克魯瑪的親熱稱呼。——譯者）

---

## 第十七章 决定国家命运的提案

在1958年4月到6月这段期间，我会见了全国许多团体和组织，考查了它们对宪法改革的意见。同年7月，政府公布了白皮书，在1958年7月10日，我提出了关于宪法改革的提案，这就是我的要求独立的提案，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提案称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提案”。

在1958年7月10日那天，立法议会里座无虚席，成群的人站在议会的外面，急于参加议会里面的活动。当时四周充满着一种欢乐的气氛，仿佛黄金海岸的独立已经取得了。当我走进议会，坐到自己席位上去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一阵欢呼声，在我站起来提出独立提案时，又是一阵欢呼声，接着就是一片沉寂。

我开始说：“议长先生，请允许我建议，本届立法议会在通过政府关于宪法改革的白皮书时，授权政府请求英国女王政府，本议会一经作出关于独立的必要宪法和行政安排时，女王政府就应立即向英国议会提出一个独立法案，宣布黄金海岸是英联邦内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且我还建议，本届立法议会授权政府要求英国女王政府，不要对上述请求抱有偏见，作为一项紧急任务修改1950年的黄金海岸宪法法令，在修改时尤其应该规定，立法议会必须由无记名方式投票直接选举出来的议员们组成，所有内阁成



員必須是立法議員，他們應該對立法議會直接負責。

“議長先生，我帶着異常謙遜的心情，站在我的同胞和英國代表們的面前，要求本屆立法議會同意這個提案。在這個莊嚴的時刻里，我深刻地認識到我們將要考慮的問題所包含的重大意義，既然提出這個提案的巨大榮譽是屬於我的，我祈求上帝賦予我智慧、力量和忍耐以盡到我應盡的義務。

“我們要運用高度的政治家風度，如果可以的話，我要重復在10月間提出來的警告，‘每一個無聊的和不適當的字句都會妨礙我們大家心目中所嚮往的事業。’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說過的一樣（下面我引用他的話）：

‘我們的事業使我們天性中所固有的每一種寬大和誠摯的感情在我們的心灵中精心地培植起來，並使它達到最完美有力和成熟的境地。我們要運用私生活中高尚的品德來為國家服務和處理國家的事務，我們既然是愛國者，但是也決不應該忘記我們是高尚的人物。’

“在開始的時候，我願意提醒可敬的議員先生們政府所發表的白皮書中的一段話，‘只有經立法議會辯論以後，政府的建議才能最後定案，並送交英國政府。’因此，大家的辯論應該是強有力的和建設性的。這次辯論的範圍必須是全國性的，而不應該是區域性的；愛國主義的，而不是黨派性的；因此，我現在要求在這場辯論中要充滿合作和友愛的精神。亞里斯多德大師洞悉這一點，他曾經說過：

‘在实际事務中，目標不僅僅是在思想上知道應該做些什麼，而是去做。僅僅知道美德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擁有美德，而且使它見之于行動……。’

“就美德来说是如此，就自治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竭力设法拥有它，运用它。我所草拟的提案就是获得自治的手段。

“现在，我请求你们给予我命令，要求你们给予我的政府以权力来实现我国的酋长和人民长期以来的迫切希望、热诚的梦想和热烈的愿望。在外国人统治一百年以后，我国人民越来越向往光明和光荣的日子，那时他们将重新获得他们悠久的遗产，再度取得他们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成为自由的人。

“议长先生，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在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历史上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时刻，由于殖民地人民有决心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他们一定勇敢地坚持他们摆脱外国统治者的神圣权利。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求我们这种独立的权利。

“议长先生，我的提案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不仅说明了我们的目的，而且还向英国女王政府提出那个在政府所发表的白皮书中更为全面地陈述的问题。黄金海岸人民普遍要求在英联邦范围内自治，我们应该把这种要求告知英国政府，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宣言承认这种要求的存在并表示女王政府准备提出独立法案。这就是我们要求女王政府明确答复的问题。我们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独立宣言。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获得我国的自治；我们要求一个独立法案。

“提案的第二部分以坦率的态度要求立法议会授权我向女王政府提出我们主张立即进行宪法改革的详细建议。我们要求，这些建议可以按照它们的优缺点加以考虑，而不要对这个提案第一部分所提出的要求怀有偏见。我们要求，立法议会的成分必须加以改变，所有议员必须由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同样，我们还进一步要求，整个内阁应由议员中产生的部长们组成。我们还提

出了其他一些迫切和非常重要的建議，我相信本屆立法議會將給予這個提案以一致的贊成和支持。

“去年，我曾使本議會的組織發生改變，當時這被認為是不重要的事。實際上，還有人指責我有個人野心，想取得總理的職銜。議長先生，現在我們可以親眼看到這個結果了。的確，在黃金海岸以外，沒有人不根據總理職銜的意義來看待我的地位的。這種改變實際上提高了黃金海岸政府在海外的聲譽。這種地位的提高甚至使我的同事們在工作的配合上都更為順利了。我相信，作為內閣來說，我們的活動將比以前更具有決定性而且我們有更好的條件去完成任务。我們所要求的自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自由，我們要求自由是為了我們的子孫，為了我們尚未出生的後代，使他們能夠見到陽光，象所有有權利掌握自己國家命運的男男女女一樣地生活。

“議長先生，我們關於自治的要求是正義的要求。對於這種要求是不允許妥協的。一個國家的人民管理自己的權利是一個基本原則，在這個原則上作出讓步就是違反這個原則。我在這裡引証一位偉大的政治和社會科學家的一段話。

‘向敵視原則問題的勢力讓步就是犧牲原則本身。原則是不可分割的。不是完全遵守原則，就是完全放棄原則。在原則問題上，最小的讓步也意味着放棄原則。’

“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自由地決定自己所走的道路的權利是不能以膚色或社會發展的程度來衡量的。這是人民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但是當比人民強大的勢力不擇手段地利用各種借口從人民手裡奪去這種權利時，人民就無力去行使這種權利。如果說有一個標準來衡量人民是否有準備來實行自治的話，那末我就要說

这种标准就是，人民是否准备承担管理自己事务的职责。除了人民自己而外，又有誰能够說，他們在什么时候已經准备好实行自治呢？其他的人又怎能判定，那个决定附屬国人民命运的时刻何时到来呢？除此而外，还能有什么标准呢？

“議長先生，在历史上从来沒有一个外国統治者曾經自願地給予人民自治。因此，議長先生，我認为，人民准备并且願意承担自治的責任就是衡量他們是否作好承担这些責任的准备的唯一标准。

“我曾在本立法議會前次會議上談到，哪些考虑促使我同意我的党参加 1951 年的大选并从而根据 1950 年宪法勅令参加黃金海岸政府。我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承担了这个任务，即向全世界証明，我們准备負責地执行我們的任务，实行我国人民所需要的許多改革，而且在政府和議會內部，也就是采取合于宪法的方法，来实现自治这个迫切的目的。我們执政只有两年半時間，議長先生，但是我們始終記住这些目的。不容怀疑，我們同样地下定决心不达到这个目的决不会罢休。在我們作出努力时，有一种思想鼓舞着我們，那就是，我們这样做可以向世界表明，我們是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的，从而粉碎了那种神話，即縱然非洲人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机会也不能管理自己的事务。我們絕不能滿足于我們迄今为止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当然，政府并非如此。我們的国家已經証明，它已經完全准备好了。因为，虽然我們受过一百年的殖民統治，但是在短短时期以內，自从各位从議員中选出的部长就任以来，我們已經勇敢地从事于奠定健全的經濟和社会基础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我們亲爱的祖国可以建立一个巩固的民主社会。責任感和事业心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曾經鼓舞着我們的行动，今后將繼續引导我



們前進，因為，我們將始終不渝地遵守我黨的箴言，‘勇往直前，絕不退後。’因為，我們知道，政治的真蒂就是實現一切可能實現的事。

“議長先生，現在，我們已經進入我們憲法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階段；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幾年來我們所經歷的幾個階段：首先，我們和殖民大臣的商談產生了去年的改革；以後，10月宣言中提出的問題，得到所有對這一重大事件有關的政黨、團體和委員會的答復；同各地區委員會、政黨以及工會大會舉行了商談。我們一直是循序漸進和謹慎小心地向前進展的，而且我看到，全國都在響應我的號召。我對我們收到的每一份意見書都給予仔細的考慮（我們收到的意見書是非常多的）。我和各政黨、工會大會、阿散蒂人委員會和各省酋長聯合會議舉行的多次會談都是坦率 and 友好的。

“此外，我還接到過一個特別邀請，參加在塔美利召開的有北部領土委員會、傳統的統治者和立法議會議員們參加的會議。當然，我接受了這一邀請，因為事情很清楚，如果我不和北部領土地區進行商談的話，黃金海岸的統一可能會受到危險，而且我們走向自治的進程也會推遲。情況恰巧相反。我們修改了某些我們的建議以適應北部領土地區的願望，從而能夠使這一地區的人在某些對他們和整個黃金海岸最重要的問題上心平氣靜。議長先生，忘記我們北部領土地區和托管地的兄弟們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有人對政府對這些會談保守秘密提出批評，而我願意告訴全國保守秘密為什麼是必要的。當然，在政府代表們去參加會談時，我們心中有數，對某些問題已具有了共同的看法。但是，我們仔細地說明，我們的意見還沒有最後決定，而且除非我們進一步地听取了上述團體對它們提出的備忘錄可能作的某些補充意見後，我們

的意見是不会最后决定的。在我們听取了这些意見之后，我們对所碰到的某些具体問題也征詢了意見。但是，为了使我們的討論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能够做到坦率和毫无保留，我在会談的最初阶段就声明說，如果这些会談能够保守絕對秘密的話，我将感到高兴。我很高兴，把我們所举行的討論的价值和我完成我所負义务的程度記載下来。我希望，参加会談的其他团体也能感到，这种討論是有价值的。

“議長先生，我充份地認識到我們所代表的會長和人民的意願，因而我深信，在本屆立法議會的支持下，英国女王政府将毫无犹豫地接受我們合法和正义的要求，使黄金海岸成为一个英联邦內的自治国家。

“我深信，英国女王政府是会自願接受这一要求的，因为这个要求和历届英国政府所公开申明的政策是一致的。事实上，从殖民地責任政府的阶段最后过渡到一个掌握自己政策的独立主权国家是英国对它的各个附屬国所执行的同样政策中所崇奉的原則。

“議長先生，請允許我引用英国大臣的談話。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殖民大臣克里奇·琼斯先生曾說过，‘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中心目标是很單純的。英国的殖民政策是引导殖民地走向英联邦內的負責自治，只要負責自治能保証有关人民得到很好的生活水平和不遭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压迫。’

“同样，在1950年7月12日，繼克里奇·琼斯先生之后担任英国殖民大臣的詹姆斯·格里菲斯先生再度談到这个原則說，‘英国殖民政策的宗旨和目的是，引导殖民地走向英联邦內的負責自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物力来帮助它們建立起那些可以作为自治的健全基础的經濟和社会条件’。

“最后，我向你們介紹今天英国女王保守党政府的殖民大臣奧利佛·李特尔頓爵士所講的話：‘我們整个的目的是帮助殖民地实現在英联邦內的自治。’

“在英国殖民史上，这种政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殖民地附屬國的自治权起源于1867年的英国北美法案，这个法案給予加拿大各省完全自治。繼其他白人自治領澳大利亞和新西兰独立后南非也取得了自由。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我們在亞洲的有色弟兄已經取得了独立，而我們現在可以驕傲地承認印度、巴基斯坦、錫兰和緬甸这些主权国家。

“我認为，我們的要求和英国所有政党和历届政府所公开宣布的政策是毫不矛盾的。在我們的国家里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我們的經濟是健康的，和任何同我国面积相同的国家是同样健康的。在許多方面，我們比許多主权国家还好得多。我們国家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我国人民基本上是同一种族的，而且我們也不存在宗教和部落方面的难以解决的問題。此外，最重要的是，我国几乎沒有任何种族隔离。事实上，我国社会的整个民主传统杜絕了統治民族的学說。在我国，这种学說的残余現在已变成一种过时的东西，而且它的寿命也是屈指可数了。

“議長先生，从我們祖先受外国人征服到目前为止，我們已經经历了漫长的路程。今天，我們正处在取得自治的前夕，我們决不应该动摇。道路是曲折的，充滿着危险的，但是我們所采取的积极和巧妙的行动正引导着我們走向新的耶路撒冷：我們所响往的黄金城市！因此，我深信，我表达了黄金海岸的酋长和人民的願望和感情，我希望能够根据和睦和友好的精神把政权最后移交給你們的部长們，这样在和平地取得了我們的自由之后，我們两国的人民（英

国和黄金海岸)就可以在互相尊重、互相信赖和友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这样以来,威斯敏斯特法所指的新的合伙关系就有了一种新的内容。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会成为‘英帝国内许多具有平等地位的自治社会其中的一个成员,这些成员在内政和外交方面互相间绝没有从属关系,虽然共同对英国女王的忠顺把它们联合起来’,但根据1926年巴尔福宣言‘是自由结合成英联邦的成员国’。这个宣言体现在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之中。

“今天,英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需要有更多‘自由结合的自治社会’。因为,自由结合的自治社会要比靠征服而结成的社会能产生更为友好的关系。议长先生,我们今天看到,英国和它以前的附属国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之间的关系是多么更为融洽和友好。自由结合的自治社会所形成的新的友好关系建立起更好的感情,这种感情的医治力量消除了毒化英国和它的这些以前的殖民地的关系中的仇恨。

“我深信,上述以及其他重要原因,加上英国殖民政策所明白表示的目的,将促使英国再一次向这个患病和疲惫的世界表明它遵守它公开宣布的目的的责任。一个自由和独立的黄金海岸,取得在其他自治领中的和平和友好的应有地位,会提供一个有效的证据,证明自由是可以在一种良好愿望的气氛中取得的,因而使英联邦的内在力量增加。陈旧的关于帝国、征服、统治和剥削的概念在觉醒了的世界面前正在迅速地死亡。殖民地人民对于英国怀有大量的和平和善意,只要英国能放弃两百年前的那种过时和蛀蚀的装饰,穿上一种新的和光采的服装出现在殖民地人民的面前,给予我们和平和友爱的橄榄枝,在我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给予指导。

“在纪元开始不久,远在英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以前,甚至远



在英国人民統一成为一个民族以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建成了一個偉大的帝國。一直到十一世紀北部的摩爾人侵入以後，帝國才滅亡。帝國在它的黃金時代，版圖從廷巴克圖一直延伸到巴馬科，甚至延伸到大西洋。據說，在那個帝國里，律師和學者很受尊敬，加納的居民穿的衣服是羊毛的、布的、絲的，還有天鵝絨的。貿易品有銅、金和紡織品，經常攜帶的是珠寶和金銀制成的武器。

“因此，我們可以為加納這個名稱而自豪，這不是出於浪漫主義，而是作為一種為未來而努力的鼓舞力量。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的過去，這點是正確和適當的，因為，實際上，未來是現在的繼續向前發展，同樣現在是從過去發展出來的。我們不必要為我們過去的历史而感到羞恥。在我們過去的历史中光榮的業迹是很多的。我們的祖先在他們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所取得的成就給了我們信心，我們能夠在光榮的過去之外，創造出一個光輝燦爛的未來，這種未來並不在於戰爭和顯赫的軍事力量，而在於社會進步和和平。我們拋棄戰爭和暴力。我們戰鬥是反對那些使人陷於貪婪之中的舊思想，反對那些滋生仇恨、恐懼和不人道的極端愚蠢行動。我們未來的英雄人物將是那些能夠領導我國人民擺脫奴隸制度所造成的令人窒息的崩潰瓦解的局面而走向光明境域的人們，在那里，目標、努力和決心將創造基督在兩千年以前宣布的大同世界。關於這點，人們說得太多，但是做得太少了。

“議長先生，在這樣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上，回憶我們過去的历史，是為了對那些奠定我國民族傳統的祖先以及為我們今天這樣偉大時刻的到來而開辟道路的先人們表示敬意。正象在我國漫長曲折的历史當中我們那些被奴役的從我國海岸被強迫送到美國和西印度群島的兄弟們一樣，我們在征服者的鐵蹄下並不是很馴

服的。我們从自己的传统經驗中知道必須團結起来和組織政府，于是我們不断地把自己組織成許多強固的集团来反抗在我国境內的外國势力。因而，我們今天可以通过奥考姆福·阿諾凱和俄賽·屠士<sup>⊖</sup>以及金凳子长期所表現的象征来回想阿散蒂王国的誕生；回想英勇的反英战争；納納·普賴姆佩一世<sup>⊖</sup>被放逐到塞舌耳群島；阿散蒂国家暂时瓦解以及随后的重新統一。我們現在来談一談1844年条約。繼我国和早期来到黄金海岸的冒险商人进行貿易之后，有名的1844年条約确定了我国和英国之間第一次正式的关系，这一条約給予英国在我国的貿易权。但是，也就是从这些小的貿易和友好的开端，英国取得了对黄金海岸的政治控制。但是，我們的不可剝夺的权利仍然存在，正如我的朋友乔治·帕德莫在他最近所写的‘黄金海岸的革命’一書中所写的那樣，我現在引証他的一段話，‘当今天黄金海岸的非洲人要求自治的时候，他們实际上不过是自己从来没有交給英国人的固有的权利，英国人背弃了他們在1844年条約中所應該承担的义务，逐步地篡夺了黄金海岸的全部主权’。

“接着就是芳蒂邦联，它是黄金海岸最早期的民族主义的表現，出現于1868年，当时芳蒂族的酋长們企图組織芳蒂邦联来保卫自己以抵抗阿散蒂的势力和英国商人們最初的政治侵略。芳蒂邦联也是一个由沿海国家为了共同的經濟和社会发展而組織的联盟。这个組織被宣布为一个危险的阴谋，随后該邦联的領袖們也遭到了逮捕。

---

⊖ 屠士是十七——十八世紀間阿散蒂人庫馬西土邦的最高酋长和阿散蒂土邦联盟的盟主；阿諾凱是屠士的大祭司。——譯者

⊖ 十九世紀末阿散蒂土邦联盟的最高酋长和盟主。——譯者

“保障土著居民权利协会是繼芳蒂邦联之后的一个有着崇高目的的民族主义的运动，由于它进行了至今我們仍然感激不尽的伟大的斗争，它形成一个令人难忘的堡垒以保卫上帝賜与我們的国土并因而保持了我們天赋的自由权利。門薩赫—薩尔巴赫、阿塔·阿休馬、西伊、伍德等人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都尽了他們的責任。

“以后就是英屬西非国民大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果带来了战争的过度紧张和苦难以及协約国的口号的反响，‘为自由而战’这一口号受到凱斯利·海福德、赫頓—米尔斯以及其他民族坚强战士的重视！这些人都是英屬西非国民大会中一些令人感动的人物。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很快就扼杀了西非人民的梦想，但是随着非洲籍法官的任命和国家生活中的其他改进，今天西非人民的目的已經大大地得到滿足。

“和英屬西非国民大会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組織了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以表达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願望。英国政府看到它在这一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逮捕了黄金海岸統一大会党的六名領袖，把他們扣押了好几个星期，直到华森調查委员会来到时才释放了他們。工会大会、全国农民、全国学生和妇女所采取的立場是我国民族解放斗争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1949年6月，人民大会党坚持它的不妥协原則，引导着覺醒了的群众有效地要求收回他們长期以来失去了的遺產。今天，整个国家稳步地向着它引以自豪的目标前进。

“当我们回溯到我国宪法发展的最初年代时，我們发现，管理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立法委员会是在1850年建立的；在这个委员会建立了三十八年以后，第一个非洲人約翰·薩尔巴赫进入了这个

委员会。直到1916年，克利福德宪法才把委员会中的非洲人的数目，从1910年的四人增加到六人。但是，它们主要是官员们的委员会。

“1925年的格吉斯堡宪法把委员会中的非官方代表人数增加到和官员们的数目几乎相等。1946年的伯恩斯宪法改变了这一情况，它建立了一种非官方代表的多数。流产的1944年殖民地—阿散蒂的合作纲领就是1946年的改变的序幕。

“1951年的柯赛宪法使代表的基础进一步民主化，而今天，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正建议建立一个完全选举出来的立法议会，政府的部长们向立法议会直接负责。

“我们经历过间接统治，我们不得不在自己不团结的扼制下受苦受难，而这种不团结是由于那些比不太幸运的同胞享有较好境遇的人们的傲慢自大造成的；我们经历过宪法改革的缓慢而痛苦的进程。本届议会是从过去的各委员会（在其中不是没有非洲人就是只有被指派的非洲人）演变出来的，经过有选举权的人民对他们自己的事务行使表示意见的民主权利而成立的。人民在行使上述权利的时候，表示了对自己同胞的信任，把管理国家的责任交给了我们。

“因此，在这些年中，由于民族斗争的艰苦和危险，许多人已经死去，而且有许多人就像我们的反对派中的有名的朋友们在我们总的斗争中也尽了一份力量，尽管事实上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我们希望，无论我们有什么分歧，今天在要求我国自由的题目上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正如我先前所说的，我们所要求的并不是仅仅为了立法议会中我们这派人，而是为了这个国家中所有的酋长和人民——作为



一个自由人生活在国际友好大家庭中的权利。在白人来到我們的海岸以前，我們的祖先不是自己管理自己嗎？我在前面已經談到我們加納祖先的历史。硬說某些人能够管理自己，然而另一些人仍未‘作好准备’（这是一种流行的說法），我認为，这种說法有很多的帝国主义气味，而是不合乎理智的。有声誉的生物学家一直認为，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謂‘优等’民族。男人女人是他們所处的环境（地理、气候、倫理、文化和社会环境）同样也是本能以及体質遺传的产物。我們有决心改变我們的环境，而且同样大踏步地前进。

“按照勇敢的‘阿克拉晚报’所提出的口号来說，‘我們宁願冒危險去爭取自治，而不願在平靜中受奴役’。毫無疑問，我們也会犯錯誤，正如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我們是人，因而难免犯錯誤。但是，我們也可以从旁人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从而可以使我們免于犯別人所犯的最严重的錯誤。此外，我們所犯的錯誤是我們自己的过失，因而我們有責任糾正这些錯誤。只要別人管理着我們的时候，我們就会把錯誤記在別人的賬上，而我們自己的責任感将仍然是很迟鈍的。自由带来了責任，而我們的經驗也只有从接受这些責任中才能丰富起来。

“从代議制政府实行两年以来，我們曾經最深刻地意識到自治將給我們带来的責任，但是，我們在這些責任面前并不畏縮，而是比以前更加渴望負起完全自治的責任。議長先生，这就是加納所有酋长和人民今天的心情，在保持殖民地地位和实行自治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抉择上，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立法議會对我的提案即将举行的投票，將把这一点宣布于全世界。

“可敬的議員先生們，由于历史的无情浪潮（正如尼米賽斯所說的）的結果，我在此时此地請求你們完成一項神圣的任务，因为你

們大家掌握着我国人民的命运。世界人民的耳目集中在你們的身上，整个非洲大陆和美洲的被压迫的弟兄們正殷切地注視着你們，把你們看作是鼓舞他們与残暴进行严酷的斗争的力量，而这种残暴是我們身居非洲这一角落的人們从来不知道的，这种残暴是对人类的污辱，也是对白种人竭力教导我們的那种文明的污辱。現在，我們正在創造历史，非洲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已經第一次提出明确的独立要求。一个非洲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宣布，他們准备取得自由人身份，而且向全世界証明他們是值得信賴的。

“我知道，你們是不会使那些听候着你們給你們的部长們所下的命令的人們感到失望的。我們取得自由的条件已經成熟，我們的人民不應該受到拒絕。人民知道，这种权利是他們的，他們也知道，自由并不是一国人民可以当作礼物送給別国人民的。他們認為自由是他們自己的，任何人不得剝夺他們的这种权利。

“議長先生，當我們提出自治要求的时候，我要強調指出，自治本身不是目的。它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是为了建設对大家——不分部落、信仰、肤色和地位——都有利益的美好生活。我們的目的是要变加納为我国人民的乐园，是要把这个国家变成整个非洲大陆上的曙光，要把它的鼓舞力量伸展到国界之外。我們可以通过致力于对人类无私的貢獻来完成这个任务。我們必須从別人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以致我們可以尽可能地避免重演其他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悲剧。

“我們决不盲从，而要努力創造。我們一定要在和平艺术方面起带头作用。我国外交政策必須致力于和平和友好。我們抛弃部落沙文主义、种族偏見和民族仇恨的罪恶学說。我們抛弃这些邪恶的思想，因为在建立我們所殷切盼望的兄弟般关系方面，我們希

望在我們这样一个小小国家之内能够实现所有那些崇高的理想，而人們認為那些理想形成一条无形的紐帶，把我們希望参加的英联邦的各国联系在一起。我們抛弃种族偏見和民族仇恨，因為我們不希望那些崇高的理想受到玷污。

“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二世陛下刚刚加冕，这不过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对于这一切我們記憶犹新；女王自己并没有忘記当她第一次带上王冠时在她心中所引起的种种情緒；倫敦街上的节日裝飾几乎还没有取下；关于加冕典礼及其意义的大量文章会持續几百年；千百万人的祈祷依然縈迴耳边；女王就位时所作的尽忠职务的誓言表示出整个英联邦所負的責任。因此，我們弃絕那些我們知道正在世界其他地方广为宣揚并被当作真理而接受的罪恶学說。

“对英国來說，这是一个英国对非洲关系的最重大考驗的时刻。當我們看到在南非、中非和东非所发生的令人遺憾的不幸事件时，當我們听到关于怯尼亚和中非联邦的不快消息时，我們對我們和英国之間的比較友好的关系感到很高兴。我們現在要求英国使我們之間的关系能够成熟为一种更为可貴的平等、自由和友爱的联盟，毫不遲疑地应允我們的自治要求。我們深信，英国政府会表明它对黄金海岸人民的善意，給予我們以我們迫切希望的自治。我們要求英国人民和所有的政党對我們的要求給以热烈的支持。

“因此，我們所要求的自治是一种工具，我們要利用这一工具創造出这样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我国人民可以发展他們的特性和尽量發揮他們的潜力。只要我們繼續处在外国人的統治下，我們的很大部分精力就不能从事建設事业。压迫力量带来挫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一种双重的罪恶。下面的一句話說明了这一

点，‘压迫别人的民族本身不可能是自由的’。因此，我们大家看到，这种罪恶不仅伤害了被征服的人民，就是统治的民族也付出了代价，它由骄傲和贪欲而使它的良好感情变成邪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真正的友谊的障碍。在过去不长的时期内，自从我们非洲人在我们自己的事务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之后，我们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是显著地改善了。今天，在我们和女王陛下的总督查尔斯·阿登·克拉克爵士所指派的当然的国防和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之间存在着真正友谊的基础。我们对他们在帮助我们我们在政治进步上取得成就方面所提供的可贵的合作表示感谢。我认为，他们做到了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作为英国殖民部的官员，根据英国殖民政策的明确目的引导属地取得自治是他们的职责，还因为我们在管理好我们自己的事务中取得了他们的尊敬，而且他们认识到我们的愿望是正当的。

“请准许我引用伟大的凯斯利—海福德在 1925 年说过的一段话：

‘必须承认，合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名词。我们利用合作就可以取得和平、善意和协调。如果没有合作，我们就会陷于混乱、纠纷和毁灭。但是，在下等人和上等人之间是不可能合作的。即使他们想这样做，总会有这么一天，上等人将要发号施令，而下等人却将对这种行为感到愤懑。因而，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除非我们认真努力把下等人提高到上等人的荣誉地位而且上等人能够容许我们这样做，否则我们关于合作的谈论完全是一些空话……’

“因此，除非我们对独立的要求现在得到满足，否则现今存在于我国和英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会变得紧张起来。我国的酋长和



人民是不会允許推迟的。但是，我相信，由于我們上面提出的原因，我們的独立要求会被接受，因而我們对英国的友好将由于这种新关系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历史的繩索把我們两个国家結合在一起。我們对英国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物質利益，而英国人反过来也教給了我們許多有益的东西。我們願意繼續不断地学习英国人民能够給予我們的最好的东西，我們也同样希望他們能在我們当中找到值得取得的品質。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还缺少那些現代世界标准認為必要的物質享受，因为我們很多財富还没有开发；但是我們具有欢笑和愉快的天性，爱好音乐，沒有恶意，不打算对我們所受到的虐待进行报复，我們具有这个充滿不公正、报复、恐惧和貧困的世界中的一切真正的美德。

“我們認為，世界可以从我們这些屬於所謂技术不发达社会的人中学习很多的东西。这些美德是非常寶貴的，我們絕不要为了追求物質进步而毫不經心地失去它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說实行自治本身并不是目的。

“我們必須艰苦奋斗发展新形态、新的社会习俗和新的生活态度，因而在我們謀求我国物質、文化和經濟的发展以及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时，我們將不会損害他們的根本幸福。議長先生，我應該說，那就是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世界最大的悲剧。

“在駕御自然力当中，人变成了机器和他們自己的貪欲的奴隶。如果我們重复这些錯誤，遭受到制造机器的那些人所食的恶果，那末我們將是无可饒恕的。这个問題就是那些正在学校和高等院校中学习的青年男女、社会学家和經濟学家、医生和社会福利工作者、工程师和城市設計師以及我国所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必

須探討的問題。

“議長先生，當我們這些政界人物死去很久，並且被人遺忘之後，他們有責任肩負起，發展新型式的社會機構、發展新的經濟工具以有助於在我們富饒的國家中建立起一個新社會。在那個社會中，男男女女將和平地生活，在那裡，仇恨、飢餓、嫉妒和貪欲將無立錐之地。

“議長先生，我們只有以自由人的身份才能迎接我們的時代的挑戰。因此，我們要求我們的自由，因為只有自由人民才能決定他們自己未來的命運。

“議長先生，可敬的議員們，我們面臨着巨大的任務。我鄭重地宣布，人們有這樣一個可以為他們自己同胞服務的好機會是千載難逢的。

“議長先生，就我來說，我只能重復一個偉大的人物所說過的一些話：‘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是應該這樣渡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臨死時候，他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类的解放而鬥爭。’

“議長先生，‘我們現在感謝上帝，上帝使我們生在這個偉大時刻！’我現在提出我的提案。”

人們立刻發出一陣歡呼聲，使人感到屋頂和牆壁都要倒塌下來。站在立法議會外面的那些人聽到了這種歡呼聲之後，也接着歡呼起來。議會里兩方面的議員們都走過來向我祝賀。議長以正式立法議會辯論時的語氣說，“議會暫時休會十五分鐘”。

交通和工程部長雅·阿·布萊瑪隨即表示支持這個提案，這

个提案經過了几天討論之后一致通过。

宪法經過这次修改后，柯賽宪法中的矛盾消除了一些，但是为了使它生效，必須举行一次大选。

現在，我比以前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內，我們党的組織和紀律是多么重要，因而在同年8月在北部領土地区塔美利召开的代表年会上，我特別強調这一点而且告訴人民選擇候选人的重要性。我警告他們說，必須防止再度发生黨員同正式候选人竞选的事情，象不久以前在补缺选举中至少在四个选区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除非我們执行紀律并在一种公認的民主形式下把自己組織起来，我們就会有发生分裂和在最后不能达到目的的危险。我告訴他們說，我們下一个阶段的斗争的胜利大部份取决于我們派到下届立法議會中的男女議員的忠实和誠懇。我說，每一个选区要通过党的区执行委員會提出一个候选人，由中央委員會审查和批准，中央委員會代表全国执行委員會在挑选候选人方面有最后决定权。这种办法会保証只有尊重党的政策和領導并証明自己忠于党的人才能参加竞选。

同时，我还警告他們不要低估敌人。“不要靠运气办事，也不要自滿。”

---

## 第十八章 1954年的大选

柯赛宪法将给予黄金海岸以更大程度的内部自治。根据这个宪法的形式，必须增加立法议会的议员人数，改变立法议会的成分。为了进行这些改革，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主席是法官伍·布·范·累耳先生，专门研究代表权和选举改革问题。结果，全国被划分为一百零四个选区。在1954年的大选中，人民大会党争取每一个席位。

我想，在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在一个月內发表过这么多次数的演说！当时，我走遍了全国，访问了每一个选区。每到一個选区，都要发表一篇激烈的演说。“这是你们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一直计划、受苦受难拚命工作以争取的时刻！实现我们的‘立刻取得自由’的希望的机会就在眼前！”有些时候，到一天終了的时刻，过度疲倦开始从我说话的声音里表现出来，但从来没有使我屈服。除了公开演说以外，我的空闲时间全被党内的一些同志占据了，他们来征求我对某些事的意见，或者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句鼓励的话。

当时发生了一次不幸的意外事件。我在以前曾告诫一些候选人说，千万不要自己出来竞选而与党所指定的正式候选人对立，如在以前一些补缺选举中所发生过的情况一样。然而令人感到失望和气愤的是，我发现有八十一个党员径自参加竞选而与党所指定



的候选人对立。我把这些人叫做“叛徒”。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决不允許党瓦解，也决不容許党为这种活动必然造成的分裂所削弱，这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在庫馬西召集了一个會議，我觉得自己很象一个死刑执行人，为了責任和正义而不得不进行他的討厌的工作。我把这八十一名“叛徒”全部开除出党。我不听他們的申訴和借口。他們明明知道竞选的規則，却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他們缺乏集体主义的精神，應該用他們作例子，懲一警百。

我懂得这件事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也就是說在这些不忠实于人民大会党的“叛徒們”当中，絕大部分人是会去支持任何一个給他們竞选机会的党派。在我回到阿克拉的时候，我听說在北部領土地区内成立了一个新党，名叫北部人民党。我馬上赶到那里，但是，已經太迟了，不能起很大的作用。在北部二十一个选区里，北部人民党的候选人(其中之一是我的前任交通和工程部部长)都已經提出来了。

同时，人們对选举的結果猜測很多，欧洲人还有些担心，怕发生暴行、騷动和普遍的动乱。北部人民党的出現受到許多欧洲人的欢迎，他們認為这是对人民大会党的挑战。在选举日临近的时候，軍隊和警察都作好了准备，以防万一。但是，什么事情也沒有发生。

1954年6月15日那一天，阿克拉比以前更加安靜和有秩序。人們耐心地在投票站的門前排着队；商人和工人以及头上頂着貨物背上时常背着嬰兒的小販站在一起。商店的店員和職員也在行列里，实际上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都排在行列里。他們一个一个地去投票，把选票投入刻有他們所选择的政党的标记的票箱里。用来代表人民大会党的标记是一只紅色的小公鷄。一点騷动也沒有，

实际上全体人民是非常关心这次选举的，所以，比较起来，早晨公共汽车站排队的情况倒可以算是一种骚动。

在城市中心旧马球场的台子上竖立了一块木板，以便迅速地公布每一个竞选结果。傍晚，阿克拉的非洲人几乎都陆续去到那里，准备整夜等在那里，以便候选人被宣布当选时，就向他们欢呼。

当夜晚降临的时候，我渐渐不安起来。象往常一样，许多人来访问我，电话也响个不停。我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那只焦急的斑猫跟着我，它看我还不到餐室去吃饭开始有些失望，每天在这时候它总对我表示强烈的爱慕。

“这样跟着我没有好处，”我在差点儿踩着它的时候说道，“我现在还不想吃饭。”

我忽然觉得我需要同伴。时间过得真慢，我也怀疑我是否能和往常一样，头一碰着枕头就睡着了。于是，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

“我正准备吃晚饭，而且打开了收音机收听投票的结果。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呢？”我的朋友在电话那头说道。

因此，我就到他那里去了。和别人共同分享不安、共同消磨等待的时刻、在党的候选人宣布当选时共同庆祝的确要好得多。在每次宣布当选者以后，我们就可以听到等候的人群的欢唱、叫喊和嬉笑声。

“那里必定有好几千人，”我说，“我多么希望我是正常的人！”

“总理先生，你指的是什么？”我的同伴问道。

“我是指我的头！”我叹息说，“我从来不能隐藏我自己。即使在漆黑的夜晚，我的高大的前额也会把我暴露出来，要是人们看见我的话……”

我的朋友的一陣欢笑打断了我的話。

“我領你去，保證沒有人會認出你來。你可以戴上我一頂紅色的帽子把頭蓋上，我的汽車很小而且里面很黑，即使在大白天也沒有人看得見是誰坐在里面！”

我戴上那頂帽子，對着鏡子照了照。那樣子使我吃了一驚！但是，事情真的這樣。我戴上那頂很滑稽的帽子，人們就不會很容易地認出我就是克瓦米·恩克魯瑪。

“行，我們走吧！”我說。

我把那頂紅帽子拉得很低，幾乎蓋住了我的眼睛，躲在那輛小型的菲亞特牌汽車里，我們出發混到激動的人群中去。在離馬球場很遠的地方。我們就不得不放慢車子的速度，因為幾百輛汽車正朝着同一方向駛去，人是那樣多，那樣激動，簡直就不理睬汽車的行列。按喇叭是毫無用處的，因為人群的嘈雜聲淹沒了喇叭的聲音。

當我的司機希望把車子停下讓我看得更清楚一些的時候，一個警察喊道，“對不起，這裡不許停車！”不過，我已經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一切，我很高興我已經成為群眾當中的一員，和群眾分享選舉夜的歡樂。我現在十分愉快地回家睡覺，在選舉結果公布以前爭取休息幾小時。

似乎在我剛要入睡的時候，我就被歡樂的叫喊聲和砰砰敲門的聲音驚醒了。人群突然擁進房間出現在我的面前。

“你當選了！你當選了！”他們高聲叫喊說。經過好幾分鐘，我才完全醒過來，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接着，我發現自己被急急忙忙地擁到馬球場——這次沒有偽裝——人們告訴我，群眾正在那裡為我歡呼。在一片响亮的歡呼聲中，我走上台子。強烈的沉

光灯使人感到这次集会好象是不真实的，我几乎要捏自己来弄清楚这是不是一场令人兴奋的幻梦。和我站在一起的有科佐·博齐约、克·伯德马，以及当选的其他许多人。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

当全部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我发现，尽管我不得不“开除”八十一名党员出党，在国民议会的一百零四个席位中我们还是取得了七十二个席位。尽管在最后的时刻出现了北部人民党，在北部领土地区的二十一个席位中我们还是获得了九个席位。

第二天，总督邀我去见他，并要求我（新立法议会的多数党领袖）出来组织政府。我把这次会见和在 1951 年选举后第一次谒见总督时比较一下，那次我是政府事务领导人，这次是总理了。

我和总督彼此是相当了解的，我们两个人都经历过强烈的风暴，但是我们却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来度过风暴。

这次我提名的部长，除了阿萨富—阿德贾伊先生以外，全都是人民大会党的党员。这些部长是：

科佐·博齐约	国务部长(不管部长)
克·阿·伯德马	财政部长
艾·伊加拉	卫生部长
约·赫·阿拉沙尼	教育部长
阿·凯斯利—海福特	内务部长
阿·伊·阿·奥弗里—阿塔	交通部长
阿科·阿杰伊	工商部长
纳·阿·卫尔貝克	工程部长
季·伊·江土阿	农业部长
伊·奥·阿萨富—阿德贾伊	地方政府部长



7月28日，全体部长在新的議會中举行宣誓，議會議长伊曼紐尔·吉斯特爵士再度当选为議長。

次日，立法議會由总督閣下主持隆重地开幕。議院里挤满了人，由于大家都穿着民族服装，更显出五光十色，景象万千。我們在議院里等候的时候，听到院外一陣喇叭声音，接着是总督的副官的声音，他宣布总督进入議院。以执权杖者和議長为首的行列进来走向特設的座位时，我們大家都站了起来，总督穿着深兰色的礼服，显得很体面。他在宝座上坐下。这时候，我的任务是把我們替他准备的講演稿交給他。

查尔斯爵士在演說以前，先向議院宣讀了两份电报，一份是英国女王陛下的，一份是殖民大臣的。英国女王在电报中說道，部长們和立法議會能够这样忠誠地履行了在三年前所承担的职务，現在黄金海岸有可能在英联邦內进一步承担起全部责任，她深为滿意。这次立法議會（它的議員全部由人民自由选出）的开幕，預計是走向目的地的最后一步。女王陛下表示深信，这次立法議会的全体議員将会以充沛的精力和智慧来完成他們所担負的更重大的責任。

英国殖民大臣在电报中表示，他很滿意自从两国政府进行磋商以来所取得的进展。他非常滿意地注意到总督和議員部长們之間相互信任的关系已經增长，他認為在这种可靠的基础上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他希望，随着我国新宪法的制定，联合王国人民和黄金海岸人民还会更加紧密地合作。

总督代表英国女王发表了演說以后，就离开了議院，立法議會休会到第二天。

人民大会党在立法議會中拥有七十二个席位，它組織政府。在議會中，最大的反对党是北部人民党，有十二个席位。其余的二十

个席位大部分是无党派人士。然而，这些无党派人士不久就开始依附这个党或那个党，到了1956年年中，人民大会党的力量增加到七十九个席位。

当北部人民党的領袖站起来介绍反对党的議員时，我宣布說，作为政府的領袖，我要对这件事发表一些意見。我說，我深信，在議會民主中，一种所謂“非正式的反对党”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存在的，正如上届立法議會的情况一样；不过，我認为一般人对議會中的反对党的解释是，如果政府被击败，这个党应该能够毫不延迟地組織下一届政府。然而，以目前所謂的反反对党的組織來說，是不能完成这种工作的。我說，应当給政府時間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发言。第二天我就作了进一步的发言。我一开始就反复說明，政府将欢迎正式的反对党，我們充分意識到有見識的和建設性的批評的价值，而且下定决心尽一切可能在立法議會中建立起議會民主制的各項議事程序和慣例，其中总是要包括一个組織完善的反对党。

我說，现实的情况是不能使政府把坐在議院那一边的議員們看作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反对党。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其中沒有一个派別可以組織另一个政府。此外，政府也不認为，把在一个地区建立起来的政党看作正式的反对党是适宜的。但是，政府准备承認并且支持反对党領袖适当的薪金支出，只要这个反对党是有組織的，而且是被公認在全国建立起来的。在这样一个組織产生以前，政府感到遺憾的是，它只能把議院中的反对派議員看作是一个非正式的反对党——一个批評政府的非正式团体——而且也只能給予他們类似本政府早期給予反对派的那种承認。

和人們可能預料的一样，这个宪法上的問題引起了极大的兴

趣。我的政敌立刻抓住了这一点，把它当作进一步的证据，证明我是一个独裁者。他们宣称，“克瓦米·恩克魯瑪不要任何反对党！”他们不能够理解，我是在为一个原则进行斗争。

当时，所有反对人民大会党的政党在全国都被称为“杜莫”(Domo)。这个名词的起源是由于在这些反对党当中最初有一个自称为民主党，而许多人在“民主”(democracy)一字的发音上感到困难。其实，“杜莫”这个名词在描写这些党派突然出现的情况时倒是很恰当的，因为在特威族的语言中，“杜莫”这个字从字义上解释正好是“菌类”之意。反对党的另一个绰号是GOPA，它是“加纳混合反对党”(Ghana Opposition Parties Amalgamated)的缩写。这些反对党的领导人经常相互争夺领导权，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全国出现了这么多的政党。但是，这些政党感到不能单独地同有严格纪律的人民大会党对抗，于是就合并起来。以后，他们又发现，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个人的领导，于是这种合并逐渐削弱。这种病症也折磨着其他殖民地国家。一小批的中产阶级人物，如果没有不识字广大群众来冲锋陷阵，就永远不能够粉碎殖民主义势力。要想打垮殖民主义势力，人们只有联合起来，组织在一纪律严明的政党里面，并且接受这个政党的领导。

在殖民地国家中，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利用部落关系成功地分裂了民族主义运动，那末，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削弱，而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统一和团结，也会牺牲在部落主义的祭坛上。尼日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在1951年以前，那里还有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为尼日利亚的统一和独立而斗争。部落主义的出现破坏了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统一，随后便使国家陷于分裂。

## 第十九章 阿散蒂問題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清楚地看出，必須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來控制付給本地可可種植者的價格，否則，我們不久就會面臨通貨膨脹。在世界市場上，可可的需求量遠遠地超過了供應量，因而可可的價格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我們付給本地農民相應的高價，就會立即引起消費品的價格上漲，接着就會發生要求增加工資和薪金的事。

可可，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在1955年，可可占我國全部輸出的百分之六十八。可可是屬於國家的，影響着每一個人，因此我們必須既為種植可可的農民着想，也為一般公眾着想。我認為，聽任當地付給農民的價格不斷發生相當大的波動是不符合國家最高利益的，況且目前付給農民的價格是既公平又合理的，對可可的增產是有鼓勵作用的。另一方面，如果種植可可的農民在今後幾年內獲得固定的收入，這對他們也是有利的。

因此，立法議會在1954年8月10日提出了可可稅和可可發展基金（修正）案，並在三天後通過，反對派議員們也贊成這個議案。這個議案規定，付給種植可可的農民的價格在今後四年內——也就是說，在本屆立法議會的任期內，每担（六十磅）為七十二先令。政府保證，在上述期限以內，無論世界市場的可可價格降得多



么低，仍旧按照这个价格付給农民，而且政府所得到的基金将用来发展整个国民經济，尤其着重发展农业。重要的是保証我們的后代不再象我們这样一直单单依靠可可作为生活的唯一来源。同时，用可可基金来发展生产和办理福利事业，还有可能尽早地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

种植可可的农民們表示拥护这个法案，因为他們看到人民大会党政府在对可可問題施行“新政”以来一直信守諾言，他們相信，这一回它也会信守諾言。

但是，国内那些蓄意俟机攻击政府的份子却把这个可可法案当作天賜良机，又来进行煽动。于是，在这个法案通过一个月以后，那些在不同时期組織的反对人民大会党的各种政党的余孽汇聚在一起，成立了“爭取提高可可价格委员会”。

这个“爭取提高可可价格委员会”的寿命并不长久，繼之而起的是民族解放运动党，它提出組織一个联邦政府的要求，作为建党理由。起初，这个党的支持者們竭力在整个阿散蒂地区散布不滿意政府的情緒，硬說可可議案对阿散蒂农民是不公正的，他們并且企图使人們相信，如果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那末他們所有的人都会变得多么富裕。在这个时候，他們制造了各种濫言說，可可种植者們上繳政府国庫的那些款項正被用去发展沿海地区或者殖民地地区了，而原来應該从这笔款項中得到最多好处的阿散蒂地区却被忽視了。既有这类的謠言，就必須指出在庫馬西修建的規模巨大的医院，以及在这段时期内在阿散蒂地区涌現出来的新的圖書館、宏伟的国家銀行和許許多多其他的現代化建筑物。这里面似乎还不包括那条从庫馬西筑起的第一流的公路，現在人們到阿克拉或其他地方去旅行只要很舒適地花几个小时的時間，而

过去总要花一天一夜到两天两夜的时间。此外，民族解放运动党似乎还不了解，如果没有主要来自北部领土的劳工，如果没有在南方进行的向外输出，那么它们觉得就是属于它们所有的那些可可将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民族解放运动党和阿散提恩<sup>⊖</sup>所领导的阿散蒂人委员会联合起来组成反对党。据我看来，这个反对党仍然是一个非正式的反对党，因为政府一旦下台，它不能够顺利地接掌政权；我认为，它不过是阿散蒂人委员会方面的一种运动，为的是使他们自己和那些拥护他们的阿散蒂人摆脱人民大会党所代表的那种民主力量的影响。

后来，随着一次纯粹政治性的运动的失败，在阿散蒂地区发展起一种暴力运动，那里的情势变得如此险恶，以致在那里的人民大会党的几百名男女党员被迫离乡背井，到本国其他地区去避难。

当时，我最大的困难是阻止人民大会党的党员们还击。代表团每天连续不断地向我请求准许让他们到库马西去进行反击，但是我不允许他们去。“我们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我说，“再忍耐一会儿，一切都将过去的。”但是，在克罗博·伊杜塞（当时是人民大会党的全国宣传部长）的一个姐妹在库马西遭到残酷的枪杀以后，他们变得几乎不服从命令，这时任何人都无法责难他们，他们坚持说，他们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我并不是没有同情心，但是我深信，只有严格的纪律才能保证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进行反击会在国内引起严重的骚乱，甚至可能引起内战，这样一来，势必要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种情况还会招致英国的干涉，同时，在全

⊖ 阿散提恩(Asanteene)即阿散蒂酋长。——译者

世界人們的心目中毫無疑問會認為，一個處於內戰邊緣的國家是不適于管理自己的事務的。在這個過渡時期中，我們還沒有完全控制我國的防務。如果我的政府掌握了警察和軍隊，那末，在阿散蒂地區的叛亂及不服從和無視法律、命令和正義的行動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後來，我很失望地發現，全英國的報刊顯然都支持反對黨和他們在庫馬西所採取的立場。大約就在這個時期，倫敦一家報紙發表了一封信，它預測規模廣泛的流血事件即將發生，而且譴責我擁有一支私人軍隊！由於這封信和其他類似的出版物，英國和其它地方的成千上萬的讀者對黃金海岸的內部糾紛得到了一個完全錯誤的看法。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最後的時刻，帝國主義敵人仍然試圖挫敗我謀取獨立的努力，是不足為怪的。

庫馬西的貝奇姆恩 (Bechemhene)、朱阿叟恩 (Juasohene)、朱阿班汗馬 (Juabenhemaa)、尼姆弗恩 (Nimfuhene) 和巴繆恩 (Bamuhene) 都是支持政府的，全被阿散蒂人委員會罷免了，於是阿散蒂地區又發生一個騷亂的因素。根據當時的規定，一個酋長被土邦會議罷免以後，是無權進行上訴的。我認識到，必須採取某種措施來阻止這種做法，於是在 1955 年 11 月提出了一個對土邦會議 (阿散蒂) 條例的修正案，修正案准許那些被罷免的酋長有權向總督上訴。

在這個月當中，暴亂變成了對個人的襲擊。11 月 10 日，我得了一場特別重的感冒。我由於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並想在第二天完成，就請了我的秘書、私人會計以及其他幾個人，在晚間到我家里來。在我們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之後，我們四個人就坐在平台上聊天。將近八點鐘的時候，我們聞到一股強烈的硫磺味。當時，有一

陣我們都沒有說話，以為有人正在下面院子冒烟的地方燒垃圾。過了一會兒，我的秘書說，“你們注意，這股味道和烟火的味道一樣。這使我想起在家里過蓋·福克斯日<sup>⊖</sup>之夜的情景——這也不過是五天以前的事！”

忽然間，我的會計員跳了起來。“烟火！”他叫道。“是，你說得對！”於是，沒有再說一句話，他同一位和我們在一起談話的黨員跳起來就跑下樓梯去了。樓下亂得很厲害，我聽到他們在要水桶。這時候烟已經很濃了，和倫敦的霧一樣。

“你想這是怎麼回事呢？”我的秘書問我。

“我不知道”，我說，“但是這烟使我的感冒更重了。”

我們仍然坐在椅子上，忽然間一種耀眼的橘黃色的光照亮了整個房子的後面，接着就是一聲猛烈的爆炸，幾秒鐘以後又爆炸了一次。房子震動了，窗戶裂開了，我們能聽到婦女和孩子們的喊叫聲。我下樓去看我的母親，她的臥室離爆炸地點很近。可憐的老人家這時吓得話都說不出來了，她緊緊抓住我的膀臂，眼睛里充滿着淚水。“啊！你平安無事！”她帶着寬慰的心情說道。我走進她的房間。窗戶已經不翼而飛，碎玻璃片滿地都是，連她的床上都有。在我走出房間的時候，我發現我的部長們全都來了，他們都急得直喘氣。接着，我聽到一種激動的噦噦喳喳的人聲，而且愈來愈大。

---

⊖ 蓋·福克斯(Guy Fawkes)是英國人，生于1570年，死于1606年1月31日。他原信奉新教，後改信羅馬天主教，年輕時當過兵。英王詹姆士一世宣布要實行反羅馬天主教法律以後，倫敦狂熱的天主教徒企圖在1605年11月5日用火藥炸死英王，炸毀議會，便雇用福克斯來執行這一任務。1605年11月4—5日夜間，福克斯被發現，遭到逮捕，後被處死。至今，在英國境內，人們在11月5日這天燃放烟火，來紀念這次“火藥陰謀”(Gunpowder plot)的被破獲，故這一天被視為“福克斯日”。——譯者



“这是什么声音？”我問博齊約。

“老百姓，”他說，“外面的路已經不通了。”

成百人集聚在一起，大声喊我的名字，想看看我，好知道我并没有受到伤害。每个人都感到激动、震惊和厌恶。第二天，以及以后的几个星期，大批的电报、海底电报和信件涌到我的办公室，祝賀我幸免于难，并且譴責这种怯懦的行动。

几天以后，关于地区委员会的議案第二讀通过，两天以后，这个議案就成为法律。阿散蒂地区的騷动仍然繼續着。

在这次騷乱期間，我經常想到阿散蒂地区的悲慘的历史和人們对它的象征封建权力的“金凳子”(Golden Stool)的神秘看法，使得黄金海岸这一地区在接受和实行民主方面比全国其他地区要困难得多。

克·阿·布西亚博士<sup>⊖</sup>曾指出他在那里看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里是絕對不能存在的：

“1942年，当我在庫馬西开始調查工作的时候，最引起我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对邦联會議 (Confederacy Council) 中关于宪法問題的爭論所进行的大阴谋。在所有这种情况下，賄賂公行。賄賂之风是那样普遍，以致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在談論。

“只要一发生关于宪法問題的爭論，有关酋长和他的对手(他們被称为“不滿分子”)双方都对和邦联會議有关系的酋长們、登記員、秘書、发言人和其他同邦联會議有联系的人行賄，以取得他們的支持。这笔錢叫做‘礼金’。

---

⊖ “在阿散蒂地区現代政治制度中酋长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he Chief in the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of Ashanti), 牛津大学版, 1951年, 第189、190、193、194頁。

“除了正式和法院有关系的那些人以外，庫馬西还有一些居民专门向宪法争论中的当事人收集金钱，他们答应把这笔金钱送给审理这个案件的酋长，或者送给阿散提恩。这些人就是靠做这样的事维持生活，他们替别人收集金钱，自己的服务也收到一定的报酬……。有些有势力的酋长拥有一些‘代理人’，他们能和酋长接触，用这种方式为酋长收集‘礼金’。

“我曾经得到并核实过关于这种事的一些情报。

“……酋长和长老们并不和平民商量，平民没有机会对讨论中的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那些受过教育的平民认为，邦联会议中应该有他们的代表。他们中间有一位庫馬西的生意人，曾这样谈到群众的想法：‘每天我们看到酋长们去开邦联会议。我们对他们讨论的问题没有发言权。他们走出邦联会议时，就交给我们必须遵守的法律。这些法律绝大部分只对他们自己有利。’……”

“不只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平民认为邦联会议没有充分的代表性，离庫馬西六十英里的一个不识字的可可种植者以最明确的话表达了一般人的批评，他说：‘关于邦联会议，我们知道的只是，每次酋长从庫馬西回来，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法律。我们不得举行丧礼。我们不得种植可可。我们必须纳税。如果你问为什么，他们就說，“邦联会议这么說的”，或者說“阿散提恩規定的。”现在我们的主人太多了。县里的委员、酋长和阿散提恩，他们都在为我们制定法律。……’”

如情况果真如此，那就根本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酋长——敢于对一个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假使他们的意见同

阿散提恩和庫馬西氏族酋長的願望和想法相反的話。如果一個酋長這樣做，他就可能被廢黜，而在1956年土邦會議案通過以前，被廢黜的酋長是無權上訴反對的。

人民大會黨在阿散蒂地區出現了，它公開揭露這種做法，自然那些靠這種做法來維持生活的人就把人民大會黨當作最大的敵人了。但是，也正是因为阿散蒂在這種專制政權統治下受到很大的損害，人民大會黨開始在這裡創辦的時候，就建立了非常穩固的基礎。現在，在全黃金海岸如果有一個人懂得“自由”兩字的含義，那麼這個人一定是阿散蒂人。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我在阿散蒂召開的群眾大會上所發生的一個極令人感動的情景。當我相當詳細地說明了新法令以後，有一位老人向我走來，他臉上現出一付吃驚的神氣，眼睛里流露出詫異的表情。

“你是指我嗎？”他問道，“你是不是說，我願意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我可以站在庫馬西，談論你剛才告訴我們的那些事情嗎？談這些——在阿散蒂地區？”

“當然可以，”我把手放在他彎曲的背上，向他保證說，“為什麼不可以呢？你和我們大家是一樣的。如果你信仰自由，你就說你信仰自由！”

“如果人民大會黨能夠為我做到這一點，那就——自由啦！”他興高采烈地叫喊着，一面慢吞吞地走回人群中去。

---

## 第二十章 寻求休息

将近午夜的时候，我才结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种会每星期二晚间在我家里举行，讨论党内事务和党的政策。我的那条黑色的长耳狗托普赛，一年来它一直是我的伴侣，这时候也睡醒了，浑身抖动了几下，就去执行它所担当的保卫和警戒的任务了。它站在台阶的最高一级上，注视着每一个人都走下了台阶。在它视为满意以后，就很快地挤进了我正要关上的大门，接着它在每个房间里嗅了一嗅，看是不是真的除我自己以外，再没有别的人了。随后，它走进餐室，我很想找杯水喝，也跟着走进去。这时候，我发现，晚餐仍旧摆在桌上，等我去吃。

我打开盘子，吃了一些已经冷却而且不太好吃的燉鱼。我发现现在给我留的那几片面包上已经鑽进了蚂蚁，我坐下来，一面吃，一面看着蚂蚁。当我看到这些渺小的生物有计划地朝着面包跑来跑去的时候，我想到，“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它们，它们必然会达到目的，因为它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是一懒汉。

托普赛把它的身子移动了一下，要我注意它。我低头看看它那双圆睁着的有些悲哀的眼睛，微笑了。我打破常规，从盘子里拿了一块燉鱼递给它，它象吞药丸似的，一口吞了下去。



我坐着，回想这一天的事，我发现二十四小时里我已经“活动”二十小时。在这二十小时中，我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一次主要地区负责长官会议，在办公室里正式接见了许多人，处理了一些日常事务。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我向那些在党部或我家里等着我的男男女女提出建议，而且在这天结尾的时候，还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而这样的日子并不是个别的；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有时候还更忙一些。

我慢慢地站起来，感谢上帝，现在我可以去睡觉了。突然，托普赛朝着前门跑去，狂吠着，想要冲出大门。怎么回事，我倒并不感到奇怪。它听到一种陌生的脚步声，我敢断定，附近一定有个女人。由于某种原因；除非是它很熟悉的女人，否则它是不肯让任何一个女人进入我的房子的。这时候，有人敲门。

“这样深更半夜，有谁来访问我呢？”我一面开门，一面很惊奇地想。来访的客人听到托普赛对他的敲门声狂吠，已经退到台阶当中了，但是我终于使托普赛安静下来。那人走上前来，脱下拖鞋，忽然跪在我面前。

“穿上鞋子，”我温和地对他说，“进来，在这里坐坐，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指着一张椅子让他坐下，我自己就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坐下。

“我到这里，是为了我的妻子，克瓦米·恩克鲁玛，”<sup>①</sup>他开始说，“为了来找你，我们走了一百二十英里，恐怕到明天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连夜到你这里来。”

“你的妻子呢？她在哪里？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他。

<sup>①</sup> 青年人和老年人都叫我克瓦米·恩克鲁玛。“先生”和“博士”这类称呼并不和我的名字连在一处——我喜欢这样，因为这使我和他们站在平等的地位。

“她在下面的院子里。”他告訴我說，他的妻子有孕，产期已經过了好几个礼拜。他向我說，他們走了这么多路来看我，因為他們知道只有我才能帮助他的妻子。

我弄不清究竟要我做些什么，我叫他把他的妻子領进来。

“不要担心，”我向她說，并把我的手輕輕地放在她身上，“你的孩子很快就会出生，你也不会遇到什么不幸，要有信心。”

他們夫妻俩高高兴兴地走了。第二天，那个人告訴我說，他的妻子当天清早生了个男孩，而且他們要給这孩子取名叫克瓦米·恩克魯瑪。

我自己感到很奇怪，在这个国家里，名叫克瓦米·恩克魯瑪的人究竟有多少？他們当中沒有一个人和我是亲戚，絕大多数人我从来沒有看見过。如果黄金海岸的历史不很快写成的話，我担心，我会被写成一个子女最多的人！

那天夜里，我非常想睡觉，甚至还没有脫好衣服，就睡着了。两小时以后，我醒了，直打噴嚏。在衣服脫了一半的情况下睡熟以后，我又感冒了。除了在美国得过一次肺炎外，我記得我沒害过一天病，但是我是极其容易感冒的。

在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我旁边的电话机的鈴声把我弄醒了。我的一位部长有急事要見我。

“好吧，”我告訴他，“你現在就可以来，我去給你开门。”

他走的时候，已将近五点钟了，我正准备看完我从办公室带回来的那些文件，又听說有人坐在外面等着要見我。我走出去，看見一对青年男女彼此隔得很远地坐着，显然是在鬧别扭。这一次是件婚姻糾紛。男女双方都有一肚子埋怨对方的話要說，而且两个人同时說着。我抬起手来要他們俩不要說了，我就憑一个单身汉

对这类問題所能知道的一点，給了他們一些最中肯最理智的劝告。他們俩立刻心平气和了，表示願望重新言归于好。

接着，在楼梯上面出現了另一个人，一个中年妇人。她說，“克瓦米·恩克魯瑪，我把我自己交給你，身躯和灵魂，只請你給我点錢买吃的(食物)。”我笑了。“你想想，我要你干什么呢？”我斥責她說。“你瞧，这就是我所有的錢。”

我回到書房，一直工作到七点半鐘，接着就去洗澡，准备到办公室去。当我还坐在浴盆里擦洗的时候，浴室門外忽然有人說道：“請原諒……請原諒……。”

我簡直大吃一惊。“难道說一个人就沒有一个隱避的地方，甚至在他的浴室里也沒有嗎？”我想。但是，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激动。

“你能不能在外面等我洗完了澡再說呢？”我問道——显得有点太和善了。

“事情是非常紧急的，克瓦米·恩克魯瑪。”那个男人並沒有被打发走。他还是站在那里——虽然我看不見他，但是能感觉到——而且伴着水的飞溅声，傾訴着他的不幸。我告訴他我認為最好是怎么做以后，他就走了。然而，我听到在旁边有人噉噉的談話声以后，就叫那个人，請他随手关上大門，并且告訴別的等着要見我的人，十分鐘以后，我就出来。

在听完了各式各样的問題以后，最后总算脫了身，到办公室去赴正式的約会。在路上我才想起来，我还没有吃早餐。我到了办公室以后，就問我的私人秘書埃里卡·鮑威尔，她能不能給我找杯水喝。

“你又沒有吃早餐嗎，总理？”她問道。

“沒有，我太忙了。我忘了吃。”

“那么，我给你拿点咖啡和饼干来吧，”她在又一次提醒我食物对于保持健康的重大作用以后，又说道，“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的精神哩。”

近来，我有点感到身体不如以前了。我经常感到疲倦，体力上到并不怎么，精神上感到特别疲惫。我吃饭不定时和缺乏充分的营养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些因素，此外我感到几乎是迫切需要逃避一下，摆脱我这种生活情况，能经常有几小时的空闲时间进行思考才好。

内阁将在9月份开始休假，有几位部长已经因为各种不同的使命出国到海外去了，或者正在选择休假的地点。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不休假一个时期呢？”。这种想法在不同的时候出现过好几次，但是我从没有使它成为事实。然而，正好这时候，内阁秘书丹尼尔·查普曼到我的办公室来了。

“我刚才正在想，”我说，“我为什么不休假呢？”

丹尼尔对这个计划极为热心。他准备了铅笔和本子；只要我决定好要去的地方，他将立即作必要的安排。我建议作一次航海旅行，我说，沿着海岸作为期两周的漫游是很有趣的事。

“这个主意妙极了！”丹尼尔一面说，一面记下来。“我立刻到几个航运公司去打听一下，看看是否有一条船在9月初作一次往返的航行。”当他冲出房间以后，我把他叫了回来。我说，“附带说一下，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而这些工作要求平静的环境。我需要你和埃里卡俩人都能参加这次旅行，而且我建议你带着伊富阿（查普曼太太）一起去。如果她能设法把孩子們留下，这次旅行对她来说将是一个很好的调剂。”



我看到丹尼尔非常高兴，好象他已经到了船上。我还注意到，他走进埃里卡的办公室，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然后出去安排。

事情就按着这种安排进行了。我们四个人，加上我的侄儿奈姆基（这几年他已经是我家必不可少的一个成员了），在塔科拉第搭乘荷兰商船“奈格斯特娄姆号”，航行到法属喀麦隆的杜阿拉，然后折回来。这趟旅行的时间约为两周到三周。

我原来打算一声不响地溜开，但是有人告诉我，内阁总理不可以不预先声明就突然失踪。他们又提起一年前所发生的那件事，那次我“失踪了”一个星期，跑到离阿克拉一百英里左右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去思考问题了。这是个人私事，我从中得益不少，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向全世界宣布我到哪里去了。我通知的人只有英国总督和警察总监。但是，英国报纸却发布了这样一些报道，如黄金海岸的总理失踪了，克瓦米·恩克鲁玛不见了等等，而且它们甚至作出许多荒唐无稽的叙述，说我可能在拜访一位巫师。

“好吧，”我同意说，“你们可以发布新闻公报，但是公报必须在我已经乘船离开以后才公布出去，而且不须宣布我所乘的那条船的名字以及它的目的地。你们只可以说，总理作一个短期的海上旅行去了。”

我时常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们不怕花费时间向报界发布措词慎重的申明。不久，遍及各地的“小广播”系统就宣布了我这次旅行的详细情况，而且在我抵达塔科拉第的时候，“奈格斯特娄姆号”开船的日期和时间已经成为黄金海岸人民所关心的大事了。因为有大批想挤进停船地方的人耐心地站立在码头上，于是安排我乘坐港口对岸的一艘汽艇上船。我说，我将在开船前一天傍晚八点半上船。

在塔科拉第，有許多黨員來看望我，希望送我上船，船長看到有近三十個人隨我走出汽艇登上船舷，一定感到驚奇了。為了解除船長的疑慮，我告訴他說，我的一些朋友表示願意送我上船，還想要看看我的房間。

“這是當然的事，先生，”他微笑着說，一面同我握手；歡迎我上船。接着，他叫來了招待組長，讓他領着我的朋友們去看我的房間。

他們列隊沿着長長的走廊走到最後一個船艙。當他們進入我的房間以後，我聽到有幾個人發出驚奇的贊美聲。雖然這房間設備齊全，而且很寬敞，我還是奇怪他們怎麼那樣興高采烈。我向房間里多走幾步以後，才弄清楚他們贊嘆的是什麼。原來梳妝台上放着很大一束艷麗的花朵，上面系着一張字條，寫着荷蘭西非利金航運公司向我表示歡迎並祝我一路平安。

看完以後，我們大家都聚集在休息室喝茶飲酒，我們坐在那里閑談，一直到客人們必須離船的時候。

次日清晨五點鐘左右，機器剛一開動，我就起床梳洗，然後到甲板上散步了。我聽見有人在高處向我說：“總理先生，如果你樂意，請到這上面來，你可以從這裡看到塔科拉第海港的全景，還能夠看到我們如何把這船駛到海中。”說話的人是船長。幾秒鐘以後，我和船長一同站在船樓上，學習一個新手所應該知道的關於駕駛和領航的知識。船進入航綫以後，船長把我帶到他的房間，我們就坐下來談論關於船隻的事，直到鈴響。

“這是作什麼？”我聽到鈴聲時問道。

“這是早餐鈴，先生。很抱歉，在早晨我往往不是一個好旅伴，因為我已經養成了這樣一個習慣，要人把早餐放在托盤里送到這兒來吃，”船長有點抱歉地說道。

“你很幸运！”我說，“我很少吃早餐。当总理必須艰苦地工作。我現在才体会到，这是我第一次休假。”

船长皺起了眉头。“唔，你在我的船上，必須生活得很安閑，”他說。接着，他的眼睛閃动了一下，帶着一種命令式的語氣向我說，“作为这条船的船长，我肯定你会过得很安閑！”

侍者送来了船长的早餐，于是我站起来，到大伙兒那里去了。餐室紧挨着我的房間。丹尼尔、伊富阿、埃里卡几个人围着桌子坐着，上面摆滿了食物。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我問道，一面指向一只盘子，那里面盛着熏肉、一些奇形怪狀的魚、和各种各样其他不常看見的食物。“奈姆基到哪兒去了呢？”

“他在船上发现有一个黄金海岸的小男孩，他要同他在別的地方一起吃飯。”丹尼尔告訴我說。

这頓早餐实在太丰富了，我想，吃了这一頓后，旅途中的其他日子都无需再吃东西了。幸好船樓上的新鮮空气和海风使我的食欲增加了一些。我注意到，伊富阿很沉默，我問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微笑了一下，这不是一种愉快的笑，而是勉强的笑，随后，她突然从餐桌旁站起来，跑回她的房間。

“可怜的伊富阿！”我們异口同声地說道。

“但是，現在这船是多么平穩啊！”我惊奇地說道。然而，我們知道，就在船刚刚离开碼頭的那會兒，不管当时海面是多么平靜，伊富阿还是有些暈船，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愛莫能助的。

早飯以后，我又到甲板上去散步。我不能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想法，即整日无事可做，沒有人来麻煩我，向我提出問題，也沒有電話鈴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带来了两本書，我还打算写写这本書，但

是我又認為，讀書和写作的事都可以等一等。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設法享受我曾經听得很多的这种休息办法。我圍繞甲板走了五、六圈以后，倚在栏杆上注視着海洋，向地平綫眺望我的祖国，我好奇地窺視着甲板上那一端的許多房門，每个房間似乎都住着船上的職員，我必須說，我覺得我已經完全做了我在“奈格斯特娄姆号”船上所能做的一切事，于是我开始怀疑，在今后的十四天左右的时间里，我是否能够使自己过得很愉快。忽然，埃里卡在轉角的地方出現了，象是在找什么，我想，她似乎也感到很无聊。

“喂，总理，我們正感到奇怪，不知你上哪兒去了。”

“我一直围着甲板散步，我想回房間躺着看書了。”

“你現在最好不去，”她說，“因为他們正在打扫房間。你为什么不在這兒或到休息室里去看書呢？”

她去替我拿書，我自己动手去搬椅子。早晨过去了，快到中午的时候，船长来了。他問我，“休息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船长，我不习惯于整天这样躺着。我想，在这次旅行結束以前，你得給我找一点事情作。”

“你会玩投假标枪游戏嗎？”他問道。

“我还从来沒玩过。”

“那麽好吧，你跟我来，我們去玩一会。在午飯以前，我总要跟大副比賽一次，这是我每天的运动。”

以后每天中午的时候，船长、我、大副、駐尼日利亚的荷兰領事（他是荷兰当局派来陪伴我旅行的人），丹尼尔或埃里卡，或者任何一个当我們正是三缺一的时候刚好在附近的人，我們于是分成两对，进行比賽。

“誰輸了請喝啤酒！”船长总是宣布說。



每天午飯時間，我們在投擲遊戲桌旁的聚會，是我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時刻。

第二天清晨，船在拉各斯停泊。我又登上船樓，我注意地看着領港員在港口的入口登上船來引導着船安全地通過泥濘難行的沙洲和淺水。

在船停泊之後不久，尼日利亞總督的副官和首席部長上船來，代表詹姆士·羅伯遜爵士表示歡迎，並且約我在當天下午到政府大廈參加茶會。我接受了這個邀請，而且在我旅行回來經過拉各斯的時候，還到政府大廈進過午餐，同總督就當前有關雙方利益的事務進行了長時間的有益的交談。每一次接送我的都是政府大廈的汽艇。

不久，消息傳開了，說我在船上，於是人們白天黑夜地列隊站在碼頭上等待我登岸。因為有那麼多的人想到船上來和我談話，不得不在跳板的頂端安置一名警察。我很想上岸去，對這些等候我的人說幾句話，但是我認識到，因為我這次是非正式的訪問，這樣做可能會使尼日利亞政府感到為難。我希望人們了解到這一點，我還要求當地報紙向他們解釋這個事實。

然而，我必須想辦法去拜訪伍·拜尼先生，約二十年前他幫了我許多忙，資助我赴美的旅費。因此，一天晚上，他的兒子到船上來。他找到了我們四個人並把我們帶到亞巴，拜尼先生就住在這裡。拜尼先生現在年齡很大了，身體也不太好，但他非常高興又見到我，我們在一起談了很久。他的花園里有一個私人的動物園，我最感興趣的是看見一個巨大的黑猩猩坐在房子里，象老人那樣在吸煙，每吸一口，都覺得很愜意。在我返回拉各斯的時候，又到他的家裡拜訪了一次，這一次，我所認識的拜尼先生的一些朋友都被

邀請來了。這是一次愉快的聚會，當老人家看到我們大家隨着無線電留聲機的音樂跳起黃金海岸的“紳士舞”的時候，他似乎也充滿了新的生命。

尼日利亞港務局的代表們領着我巡視了一下碼頭和倉庫以後，我們就坐汽艇在港口附近觀看疏浚船工作，並且觀看了干船塢。當時，我看到港口里停放着一艘日本船，我表示希望上去看看。日本人非常高兴地領我到船上四處觀看，在這只船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五英尺九英寸的身材突然變得太高大了，使我很不舒服。我每經過一道門，如果忘記彎腰幾乎就要把頭碰破。

當然，在“奈格斯特委姆號”船上，活動也是很多的，我用很多的時間看起重機從船艙里吊出貨物。它用了五天的時間才把船上的貨物卸完。下午五點鐘，我們啟程前往杜阿拉。成群的人在碼頭上向我們揮手送別，而且有許多人高呼“自由！”，也有許多支手舉起來作人民大會黨的“自由”敬禮姿勢。毫無疑問，人群中有許多黃金海岸人。

在我們到達杜阿拉以前，收到總督來的一份電報，他邀請我和我的同行者吃午飯。我答復說，我們高兴地接受他的邀請，同意在第二天去。9月12日清晨，我們經過了斐南多島。

“這個島對我們非常重要，”我向船長說。

“斐南多島？但是，它是西班牙的！”他反駁說。

“我倒並不在意這一點。它是我們的可可發源地。”

“真的嗎？”船長很感興趣地說。

“真的，在1879年，有一個黃金海岸人，原籍在阿克拉的克里斯興斯博格，名叫特特赫·奎爾希伊，他從斐南多島的聖多美帶回一粒可可種子，把它種在馬姆頗格，從那粒種子中我們的可可

种植业发展起来了，現在已經成为我們最重要的出口品”。我又說，“我希望，我沒有使人听起来好象我是一本活的‘大英百科全書’，但是，事实确是这样。”

两个小时後，我們抵达杜阿拉，我最感兴趣的是看那些用来卸貨的机械操作的空中吊車和起重機。当天傍晚，一位法国港务官員用汽艇載着我們參觀港口，我和他談起了这一点。这个法国人帶着驕傲的口吻說道，杜阿拉感到自豪的是，它的利用率是非洲西海岸各港口中最大的。我也相信这一点，因为只要船一靠岸，它們就立即轉动起来，而且似乎整天整夜都在紧张地轉动着。事实上，人們很难不注意它們，因为引擎的呼呼声和齒輪的嗒嗒声使人不能不注意它們。

英国領事上船来表示他的敬意，我非常机智地向他打听了那里的政治情况，因为我經常接到关于法屬喀麦隆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令人不安的陈述和請願。他說，他不能告訴我很多情况，因为他在那个国家的時間不很长。我从法国港务官員（他与这个問題是沒有关系的）那里打听到那里存在着强烈的部落感情。他說，部落感情是这样地普遍，前几天有一个碼頭工人失足掉到水里，不会游泳。他高声呼救，但是其他的人，由于不是他那个部落的，竟不同情他，不肯費一点力气去救他。最后，那个法国人强迫一个人跳下水去救了他。我認为，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最令人痛心和不滿的，我希望在午餐的时候能从总督那里知道更多一些情况。

当两輛滿載着护送我去总督官邸的法国官員的汽車到达碼頭的时候，天正在降着傾盆大雨。我們那輛汽車的司机以极其危險的速度駕駛着，在他差点兒闖着几个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的时候，

我感到实在忍不住了，我喊道，“司机，不要开得这么快。”他一点也没有注意，我以为他可能有一点聋，就喊得更响些。这一次，他转过头来，瞪着眼睛望着我，然后又把他那惊奇的目光转到公路上面去了。

丹尼尔笑了。“当然，他听不懂你的话。他是法国人！”

当我们想好了我们打算说的话，以及怎样用法文来说的时候，车赛已经结束。当我们进入总督官邸大门的时候，汽车的轮胎又发出急剧摩擦的声音。虽然当时大雨如注，大门里面还是排列着仪仗队，我们缓缓地驶过向他们还礼。这一点很使我感动。

总督和他的夫人站在门前台阶上迎接我们，他们很和善殷勤。幸喜总督夫妇都说得一口漂亮的英语，我设法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显得很喜歡人民并且关心他们的问题，但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回答我所提出的任何有关政治形势的问题。这时候，我感觉到，政治形势问题简直是一个不应谈论的问题。

这顿午餐可以说第一流的。在“奈格斯特娄姆号”船上一个多月，由于船长和侍者组长的鼓励，我吃了所有美味可口的荷兰大菜，我的胃口变得很好，吃饭已经变成一种享受。在午餐中，有一道菜是一种味道鲜美的鱼，我从来没有吃过。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虽然摆着许多刀叉，我只吃了两份食品，只要我吃得下，菜是会跟着上的。

那天晚上，有两个新闻记者设法上了船。他们首先到埃里卡那儿，埃里卡告诉他们说我没有空，但是却把他们俩交给查普曼。丹尼尔很为他们感到不安，把他们领到休息室，请他们喝点酒。同时，埃里卡来告诉我，这两个记者在休息室。她设法使我混过休息室的门口，把我送到甲板上。我得留在甲板上，一直到他们离开为



止。即使我很願意會見他們——其實，我想見他們，因為我知道，我可以從他們那里知道這個國度里正在發生的事情——然而，任何時候，我必須記住，我是這個國家的非正式的訪問者，因而必須小心謹慎。如果當地報紙報導說我向記者發表我的民主觀點的話，那就會使我感到為難，因為這可能引起英國和法國政府的誤解。

第二天早晨，我領着船長、总工程师和荷蘭領事上岸去參觀一座正在建造中的水力發電站。由於我國制定了沃尔特河水利計劃，我對於這座水電站特別感到興趣。這次旅行經過共四小時。那天天氣特別潮濕，時有陣雨，而法國人卻不厭其煩地領我們去參觀所有的地方。我們跟着他們沿着發電站走了一圈，爬到水壩頂上，走過新工程正在施工的凹凸不平的地面。這確實是件非常有趣的事，但是當我們大家走得越來越熱，口越來越渴的時候，我意識到我的同伴們有些已經不太耐煩了。隨後，我聽見船長向別人說，“我自己肯定是受得了的。”說着還看看自己的表。

“船長，我和你一樣，”我笑着說。

以後，還是那位最善於外交又能說一口地道法國話的荷蘭領事招待我們參觀的主人當中的一個人，能不能買到一點啤酒讓大家解解渴。那位法國人顯得有些吃驚的樣子，他說在附近恐怕買不到啤酒。當我發現我的又累又渴的同伴們對技術問題的兴趣越來越小的時候，我說，我們最好還是前進吧，因為前面要走的路還很長。

關於這次參觀，有一件事我記得非常清楚——也許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殖民地看到的事——那就是，當中午放工的汽笛鳴叫的時候，所有的工人，不分歐洲人和非洲人，都同時登上等候他們的

卡車。歐洲籍工人們對於膚色差別毫不介意的情况使我大为感动。

看起来在我們启程返回塔科拉第之前，時間一點都沒有了。湊巧，在阿克拉有大批可可需要裝運，所以我有機會看到我的同胞怎樣划着小船把大袋的可可裝上停泊在阿克拉港外的船隻，距離約有一英里，浪濤汹涌小船極難行駛。有時候，袋子會掉到海里，我擔心我國的收入受到損失，但是船長馬上安慰我說，碎浪艇會把每一袋都拾起來，後來果然如此。每個小船上都有一個人攀着大船旁邊的一條繩子爬上大船，讓監視裝卸的人在他的發貨通知書上簽字。他們敏捷的動作使人感到驚奇，然而，使人更驚奇的是看到他們吃的那麼少，僅僅一小把米飯或幾片赤色的魚。他們竟然有氣力做這樣艱巨的工作，這實在是一個奇蹟。

我向也倚在欄杆旁觀看的丹尼爾說，“應該發給他們一些維他命。”

“你說得很對，”他說，“據我的一位作醫生的朋友告訴我，雖然這些人有這麼大的氣力，顯得很健壯和有生氣，但是沒有一點抵抗疾病的能力。”

“必須立即採取措施，愈快愈好，”我說。學校、醫院、兒童福利、圖書館——這一切無疑都是極為重要的，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曾經替這些人設想過，肩上的重荷和同海浪的搏鬥使他們的肌肉發達，外表上看起來他們都是健康強壯的人。然而，只要疾病一侵襲到他們，他們就會年紀輕輕地死去，而由別人接替他們的工作。這種情況就這樣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有沒有人想過一下這個問題呢？我再一次感覺到，執行我們黨的社会政策和改進這些人的經濟水平和工作條件是迫切需要的。

如果一切事都按着時間表進行，在我生日那天我們應該抵達

塔科拉第。然而，在阿克拉我們多耽擱了一天多，因為當時下着雨，而且風浪顯然太大，那些小船無法向“奈格斯特姿姆號”上裝可可。差不多在正午的時光，漁船出動了，這真是一付最為動人和引人入勝的圖畫，一支支白帆閃耀在金光燦爛的陽光下。這些漁船徹夜不歸，留在深水處捕魚。

“瞧，恩克魯瑪的艦隊，”船長走到我的身旁，他一定已經看出了我的心思。

“是的，這就是我的艦隊，”我驕傲地回答說，“祝他們幸運！”

“你知道，這就是一支海軍的基礎，”當我們看着這些漁船消失在地平綫上的時候，船長向我說。

第二天，碎浪艇又進行工作了，船長告訴我，一切情況良好，我們將在當晚開往塔科拉第。由於這天是我的生日，在中午吃飯以前，我請船長和他的職員們喝香檳酒。那天，在休息室里的聚會有一種傷感情緒，甚至香檳酒也不能驅除這種情緒。我帶着頗為沉重的心情玩了最後一次的投假標槍遊戲。

到了吃晚飯的時候，因為那天是我的生日，又是我的假日最後的一個晚上，我決定穿上晚禮服。這差不多是最後一分鐘才想起的，當我探頭到丹尼爾的房間告訴他這件事時，他的臉色沉下來了，他說他已經把他的禮服包裝起來了。我預先根本沒有想到我會遇到什麼事，不過，根據後來的情況來看，我很高興我倒底決定這次穿上了禮服。

在我走進餐室的時候，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平時吃飯的那張桌子已經不見了。隨後我看見房間里只有一張桌子，一張長桌子放在房間正中央，裝飾得極為漂亮。那位一向富於機智和風趣的侍者組長在我進門時就來迎接我，把我引到長桌一端的

上席，另一端是船长的席位。菜餚是异常精美的，每一盘菜都是那样光彩夺目，摆得那样好看，把它攪乱似乎都是一种罪过。最使我感到高兴的食品是一块巨大的寿糕，必须由我切开它。

在这頓晚飯結束的时候，船长站起来，說他想說几句话。“总理先生，”他开始說，“老实跟您說，当我们听说有一位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員将搭乘我們这条船的时候，我們是不太高兴的！我們一点也不高兴！但是，我現在可以說，恩克魯瑪博士，我們大家，我們每一个人，都因为你和我們在一起而感到真正的高兴；我們因为和您会面并且結識了您而感到高兴和荣幸，我們希望，今后您作另一次航海旅行的时候，也搭乘‘奈格斯特姿姆号’，和我們一起旅行。現在，为你的成功和我們下次的相会而干杯！”他一面說，一面举起了酒杯。

这些話是真誠的。他們每个人对我們都非常好，而我也非常体会到这一事实，因此我打算送給他們每人一件紀念品。当我們在拉各斯的时候，我曾請伊富阿和埃里卡两人去購買礼品，她俩給他們每个人买了一个銀質的大啤酒杯。我認為，要我自己去挑选，不一定能挑选得更好，因为在午餐前玩投假标枪游戏的愉快时刻里，他們可以用这个喝啤酒，而我也會喜欢这一时刻。所以，在船长講完話以后，我也站起来說了一些感謝的話，接着就把一只啤酒杯交給船长，并且給他的所有職員每人一只。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由于時間短促，酒杯沒有能够刻上題詞。

清晨两点鐘，我們抵达了塔科拉第，我們和船长一道站在船楼上，直到“奈格斯特姿姆号”安全地在港口外下了錨。

同日，我巡視了一下港口以后，就向船长和他的職員們告別，接着登上送我上岸的汽艇。我的体重确实比我在两周前上船时增



加了几磅！当我们离去并且很伤感地向“奈格斯特娄姆号”和它的全体船员们挥手告别时，船上鸣放了三声汽笛。我深为感动，于是我把头转向岸上。

整个码头都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才在从汽艇登陆的石阶上端找到一个立足之地。我终于坐上了汽车，汽车几乎象是被人们抬着在塔科拉第大街上走，人们同汽车靠得非常紧密。随后，人们争着挤上前来看我，因此，我决定走出这辆车子，站在一辆敞篷的吉普车上继续前进。站在吉普车上，我可以更容易答谢群众的欢迎。人们曾组织了欢迎委员会，而且在下午的群众大会以后，晚上还开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但是由于我急于在当天赶回阿克拉，我在平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我向他们解释，我因事不能出席他们为我举行的所有庆祝活动而感到遗憾。随后，中午刚过，我就去阿克拉了。我和科佐·博齐约一同返回阿克拉，他特地赶来迎接我，在路上他告诉我在我走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自己感到先后是多么地不同啊！我原有的那种热情又恢复了，我的精力更加充沛，我不知道怎样地使用它。

“你知道，科佐，”我一面打断他的谈话，一面说，“我们必须设法弄一只游艇。”

---

## 第二十一章 “联邦”問題

1954年的大选刚刚結束，反对党派就开始鼓动要举行另一次选举。当可可的价格被固定下来的时候，他們真正認為，他們得到了进行批評的具体材料，便开始发动一个要求組織联邦形式的政府的运动。这个問題他們实在并没有仔細研究过，因为如果他們有所研究的話，就一定会首先站出来反对在不足九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和五百万人口的国度里实行这种制度所需的那笔費用。然而，“联邦”两字几乎使他們着迷了。

为了把問題解释清楚和消除已有的某些分歧，立法議會中四名政府方面的代表(其中两人来自庫馬西选区)邀請民族解放运动党的領袖們举行圓桌會議。这些領袖們回答說，他們不能接受这样的邀請，因为不是直接由政府提出的。所以，我就亲自以政府的名义向他們发出另一份邀請。当这次邀請被拒絕时，我发出另一次邀請。結果，又被拒絕了。

为了进一步取得諒解，同时向民族解放运动党的領袖們証明政府有誠意充分考虑他們关于組織联邦政府的要求，我在1955年4月5日在立法議會中提出建議，要求議會批准指派一个特別委員會，“来研究某些地区提出来的在黄金海岸成立联邦制政府和第二院的問題，并且在和有关的团体或个人商討以后，提出建議請立法議會考虑”。在一长篇演說中，我向立法議會指出，我的任务在

于引导“黄金海岸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人民将团结一致，亲密无间”，而且特别是在刚独立之后的这段时期中，我必须保证有一个巩固的有效率的政府。

以前，我曾经安排和反对党的领袖会面，而他通知我说，他打算对我的建议提出一个修正案以支持“成立一个制宪大会的普遍要求”。虽然，根据现行的议事规则，反对党在这个特别委员会中不能占两个席位，而政府方面却能占七个座位，但是，我在这次会议中同意允许反对党的领袖再指定五名代表。

在我的提議被采纳以后，反对党领袖撤消了他的修正案，使立法议会大为惊奇，他还说由于反对党支持成立制宪议会的普遍要求，他们认为，“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有责任不参加这次即将上演的滑稽戏。”

反对党领袖说完了这些话以后，他和他的二十名支持者就站起身来，在立法议会其他代表们的喝采和嘲笑声中，走出议会大厅。几分钟后，当反对党领袖突然回到大厅来取他在匆忙和混乱中忘记带走的那捆文件时，大厅里爆发出了一阵更大的嘲笑声。政府派的后席议员们迅即坐满了反对党议员们所留下的空位，由于拥有法定人数，辩论继续进行，而且根据我的提議的内容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当议长在次日宣布那些被派参加特别委员会的议员名单时，他说道，由于原来提出的五个人是不同意这个提議的反对党议员，他认为没有必要在违反他们意志的情况下来任命他们。接着，他就宣布了十二位议员的姓名，其中包括会议主席、副议长克·赫·查普曼先生。

这个特别委员会，在举行了二十二次会议，考虑了二百七十九

件备忘录和六十件其他書面意見以后，于1955年7月26日提出了它的报告，在报告中它宣布，决定不建議組織联邦形式的政府。这个报告建議說，應該成立地区委员会(Regional Council)，并且把中央政府的某些权力和职能交給地区委员会，“以确保在拟定发展計劃时，中央政府和各不同地区可以取得充分的协商和合作。”关于成立第二院的問題，委员会認為在将来取得独立以后再进行研究。

民族解放运动党和它的同盟者借口他們認為特別委员会沒有資格討論全国性的問題，抵制特別委员会，然而事实上特別委员会完全是由全国立法議会的議員們組成的。殖民大臣曾发表过一个声明，說在黄金海岸沒有一种更为稳定的气氛时，政权的移交将要推迟。反对党不适当地解释这个声明，死抓住这一点，認為只要他們不同意政府提出的所有建議，就一定会使独立无限期地延迟下去。每当宪法問題在我們的新立法會議中提出的时候，反对党的議員們就收拾东西，走出議會大厅。暴行和恐吓在庫馬西仍然非常盛行，而且这种情况还正在向全国其他地区蔓延。

英国政府是唯一能够迫使这些阻挠分子清醒过来的。但是它一直是袖手旁觀，我們姑且不談英国政府曾在議会的上下两院中和报纸上公布阿散蒂的局势。英国这样的行动实际上鼓励了庫馬西的騷乱。那些不法之徒若不是充分感觉到有这样一个靠山，他們决不敢坚持他們的行动。

尽管如此，而且說起来令人感到煩惱，但是，我并没有低头。一个月以后，我請求議會給我一个訓令，請求英国女王政府派遣一个制宪顧問到黄金海岸来，帮助这个国家制定一部可以接受的宪法，并且就权力和职能下放到各区域問題提供意見。

因此，同年9月26日，弗雷德里克·鮑恩爵士就为了这个目



的来到黄金海岸，各有关政党和組織都被邀請協助鮑恩爵士的工作。弗雷德里克爵士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有过許多年的制宪工作經驗。由于他和巴基斯坦有关系，起初，有些人有点顧慮，怕他会主张分裂黄金海岸。但是后来发现他們是不必担忧的，因为他不仅有高度的智慧，而且对于他所負的任务抱着正直和誠懇的态度。他在黄金海岸住了不长一段时期以后，就对黄金海岸人民产生真实的感情并了解他們，深切关心他們的事业。他訪問了所有地区，会見了許多团体和个人，并和他們进行了討論。然而，当他到庫馬西去会見民族解放运动党的領袖和它的同盟者的时候，他們却不愿接待他，借口政府通过的土邦會議(阿散蒂)修正法案“損害了弗雷德里克爵士的工作并且表明政府对待弗雷德里克爵士的态度既不真誠又不認真”。由于这个修正法案的通过，反对党不愿意参加任何关于未来的制宪工作的討論。

弗雷德里克爵士和其他一些人認為，土邦會議條例是不适时的，因而它必須过一些时候再实施。但是，應該重視的是，当时有許多酋长由于不支持建立联邦的想法而被廢黜，当时国内的情况要求把具有那种性質的条例变成法律。酋长們沒有上訴权，因而政府采取措施使他們不致遭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非常适时的。如果撤消这个修正法案，就会削弱立法議會，而且这个法案所要保护的那些酋长也就要受到那些专门从事賄賂、暴行和不公正行为的人們的危害。

制宪顧問完成了他的工作，在12月17日向总督提出报告。他在报告中建議，把某些权力和职能下放給地区議會(Regional Assembly)，授权地区議會拟定各該地区的发展計劃并請求政府給予補貼。这些地区議會是諮詢和審議的机构，一切法律由中央立

法机关制定。地区議會无权征收捐稅，关于宪法問題和涉及某一特定地区的传统問題，将与传统的會議和地区議會进行磋商。

当我在将近9月底从海上旅行返回阿克拉的时候，英国政府殖民大臣艾倫·倫諾克斯—波伊德通过总督邀請我去倫敦和他商討黄金海岸的問題，特别是討論关于給予黄金海岸独立的时间問題。1951年当我从美国回国，路經倫敦时，曾經会見过倫諾克斯—波伊德先生，我非常高兴能够再会見他，并且有机会制定出一个双方同意的計劃，由英国政府把政权轉交給黄金海岸的政府、酋长和人民。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簡單。这个国家的人民普遍認為1956年是独立年；整个国家，其中包括立法議會和立法議會中的阿散蒂議員們，在这一要求上都坚决支持我和我的政府。目前的过渡时期已經引起了許多困难；高級的权力机构是分裂的，文官們效忠于不同的机构，有人批評政府沒有做这些事，其实那些事是做不到的，有些人还認為政府已沒有任何权力，因而可以忽視。过渡时期的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对商业也发生了影响，它阻碍了貿易和外国投資，甚至在联合国里也发生了影响，因为有些代表曾表示害怕英国政府会立即提出合并多哥托管地的要求，这一問題已經在联合国中提出。如果英国政府确定了移交政权的具体日期，反对党派的領袖們就会采取一种較為負責和合作的态度。

虽然政府和党現在已經决定把某些权力下放給地区議會，虽然我們永远不能同意那些說“非实行联邦制政府不可”的人的意見，但是我認為，这种意見分歧不應該阻碍或延迟确定黄金海岸独立的日期；而今后到底組成那种形式的政府的问题，應該交給人民去决定。

因此，我答复殖民大臣說，虽然我非常願意接受他的邀請，也

希望自己能够接受这次邀请，但是如果我們举行这样的初步討論，那么，我就必須能够在我回到黄金海岸的时候，肯定地告訴我的人民最后移交政权的日期。如果这一点不能得到保証的話，我們在倫敦举行的任何會議將只能在这个国家里造成混乱、苦难和敌对情緒。

人民肯定是希望我去倫敦的，但是他們相信我在回来的时候在我的公文包里会装着有关独立的文件。我不能，也不應該使他們失望。

殖民大臣通知我說，在黄金海岸絕大多数人民都表示他們需要在最近的将来取得獨立，并且一致同意这个国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宪法以前，英国政府不願意立即給予黄金海岸獨立。如果制宪顧問成功地提出了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建議的話，那当然很好。如果他失敗了，那么除了举行一次大选以征求人民的意見外，沒有其他办法。

我同样希望，由于弗雷德里克·鮑恩爵士的工作，黄金海岸政府能够提出它对独立以后的宪法形式的建議，而这些建議确实得到黄金海岸絕大多数人的支持。

“我希望着重說明的是，”我在回信中說，“絕不要由于过份重視少数反对立法議會決議的人的話而貶低我們自由选举出来的立法議會的地位，以致削弱民主的事业，如果情况需要，我准备举行大选。”

1956年2月，总督請假走了，在他离开黄金海岸以前，我曾和他举行过几次商談。在商談中，我提出我的看法和建議，希望他轉告殖民大臣。

我告訴他說，为了尽力滿足殖民大臣所提出的两个条件——

絕大多數人表示他們願意在最近的将来取得独立，并同意一个既符合他們的需要又是切实可行的宪法——我已經召集黄金海岸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团体和組織举行會議，在會議主席斯·伍·塔奇伊—曼森先生(黄金海岸社会服务委员会的成員)的主持下，不仅討論弗雷德里克·鮑恩爵士的报告，而且还討論其他有关宪法形式的問題。

如果在这次會議上就宪法形式的問題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見，那么政府将准备发表白皮書，陈述它根据这种一致的意見所提出的一些有关宪法的建議，并且在全国对这个文件作出了适当的考虑之后，政府将在那时举行的立法議会的預算會議上提出一个決議案来采納这些建議。如果會議通过了这个決議案，那么我就要請求英国政府制定必要的立法，根据立法議会所通过的宪法給予黄金海岸独立。

如果在这次會議上不能就宪法的形式問題取得一致的意見，那么我将准备发表白皮書陈述我自己对宪法的建議，交給立法議会的預算會議进行辯論。如果那时候需要举行一次大选，我将請求人民作出他們的决定。

“但是，”我接着說，“如果我举行大选来要求人民表示我的宪法建議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人民希望在那种宪法的形式下立即取得独立，如果我根据人民的命令重新掌握政权——即令我是以极微弱的多数重掌政权，也不管胜利的政党在黄金海岸的一个地区或一个以上的地区內居于少数地位——我要求保証，英国政府将在新立法議會正式通过決議以后，宣布独立的确定日期，而且立即采取步驟制定必要的立法，以便把政权交給黄金海岸政府。”

我曾經邀請弗雷德里克·鮑恩爵士回到黄金海岸来，担任我



所召集的會議的制憲顧問。這次會議在2月16日開幕，出席會議有來自布姿恩格—克晏彭委員會 (Brong-Kyempem Council)、人民大會黨、退伍軍人聯盟、穆斯林委員會、各省酋長聯合會議、工會大會、外沃尔特多哥會議以及北部領土地區的各地方政府委員會的代表團。正如我們事先所估計的一樣，民族解放運動黨和它的同盟者們拒絕參加這次會議。在第二次會議上，各省酋長聯合會議的代表們要求准許他們採用一切可能的辦法，說服阿散蒂人委員會、民族解放運動黨及其同盟者們改變態度，並試探他們是否會派遣代表出席會議。於是，大會休會一個星期，以便各省酋長聯合會議的代表們可以和這些團體進行接觸。但是，一切都白費力氣，他們的使命沒有成功。

在3月8日，各省酋長聯合會議的四位代表中的兩位又作了一次努力，代表這次大會去勸說這些阻撓份子來參加大會，但是經過了四天的努力，仍然沒有成功。

大會在3月16日閉幕，立刻提出了報告。弗雷德里克·鮑恩爵士的各項建議幾乎都被接受，此外，大會還建議在每一地區內建立一個酋長院 (House of Chiefs) 來討論有關社會和文化的立法。

這次大會由於民族解放運動黨始終沒有來參加，因而不符合殖民大臣所提出來的要求。所以，我着手擬定我自己的爭取黃金海岸獨立的憲法建議，以便在5月中旬立法議會的預算會議上我提出根據上述建議而制定的關於白皮書的提案以前，先發給大家傳閱。

然而，我是很不愉快的。除了民族解放運動黨和它的支持者不斷地蓄意拒絕進行任何方式的合作以外，暴亂在庫馬西地區仍

然很普遍，而且似乎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那时在双方帐幕里发现了武器和弹药，对于拥有武器和弹药一事负责的人被逮捕到法院。由于这一点，我感觉到，如果在最近的将来举行大选，看来在大选的进行当中不发生暴乱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到底有什么保证，可以使民族解放运动党——它从一开始就知道，它不可能在一次大选中赢得多数——在大选举行以后改变他们现在的态度呢？我的党的执行委员们差不多一致投票反对举行大选，甚至认为提及大选问题也象是在公牛面前摇红布。

因此，我要求戈登·哈多爵士——总督离职期间掌管政府行政事务的官员——把我反对举行大选和我所以这样决定的理由转告总督，以便总督在即将和殖民大臣进行的讨论中向殖民大臣提出这一问题。

从宪法和政治角度来看，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取得独立以前举行一次大选。我想，英国政府会在我们所盼望的日期允许我们自治，而不必要这个国家进行一次大选，因为我担心竞选运动在某些地区内可能被人利用来制造暴动、流血和全国性的大混乱。

殖民大臣对我的看法虽然表示同情，却通知我说，既然阿契莫塔会议未能取得他们所要求的意见一致，在他看来，除了举行大选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派人去找科佐·博齐约。

“我派人找你来只为一件事，”我向他说道，“你要代表我飞往伦敦，把我的看法详细地告诉殖民大臣和总督。我希望我能够亲自去一趟，但是你和我一样地知道，现在这是不可能的。”

科佐点头同意。我派人找丹尼尔·查普曼来，告诉他去预订一张次日飞往伦敦的飞机票。在丹尼尔刚跨过门槛时，我又叫住

他說，“告訴埃里卡，在這兩個小時以內，我不希望任何人來打擾我。”

我又轉過來對博齊約說，“這是一樁非常重要的任務，科佐，你一定要把全部事實說清楚。从一开始就說清楚，我、我的黨、以及黃金海岸的絕大多數人民都不能接受在獨立之前舉行大選的建議。要說清楚，這樣做會怎樣導致混亂，並且會怎樣破壞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這樣做會完全抹煞過去幾年的進展，會使歷史倒退。

“我使我的黨掌握政權時，人民會命令我們為‘立刻實現自治’進行談判；我們在立法議會中仍然占有極大的日益增加的多數，在投信任票方面，政府從未失敗過，人民期望我實現向全國作的諾言。科佐，必須向他們指出，今天沒有任何必要重新向全國人民取得命令，因為這項命令是最近在1954年6月才再度給予的。我強烈地感覺到，無視黃金海岸人民要求自治的堅定不移的意志，在目前的最後階段上還把一些新條件強加在他們頭上，就將破壞議會民主的本意。

“我認為，”我接着說，“目前，在英國政府和我們之間所存在的基本分歧是確定獨立的確實日期的問題。從憲法方面來說，我不能同意以舉行另一次大選作為獨立的先決條件。英國政府硬要把這一點強加於我們，只會給人們這樣的印象，那就是他們容忍民族解放運動黨的反對憲法的態度，從而破壞英國議會制度的基本原則。我認為——不要忘記這一點，科佐——殖民大臣是想利用民族解放運動黨和它的同盟者拒絕參加討論鮑恩爵士的報告作為理由，來迫使我們舉行另一次大選。作出這樣的先例是非常危險的。

“我認為，在阿散蒂地區目前的情況下，舉行大選而不引起暴動、流血、威脅和混亂，是不可能的。硬要我們舉行大選作為移交

政权的先决条件，只会給民族解放运动党提供机会，利用目前的局势来制造普遍暴动和不安，而这就又会給女王政府提供进行干涉的机会。那时，全世界人民会怎样看待英国的誠意呢？对那些也正在希望取得独立的屬地以及联合国的會員国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这时候，丹尼尔·查普曼在房間的門口出現了，他打断我的話。

“最近三天去倫敦的飞机票都預訂完了，”他告訴我們說。

“什么？”我几乎向他叫喊起来，“你沒有說，一位部长有急事要去倫敦，这张飞机票是要优先卖給的嗎？”

“說过了，但他們說，他們实在沒有座位了。”

“你还是亲自去机場一趟，”我向科佐說，“找飞机場长，請他給你想办法，赶快回来。”

科佐費了好大一番口舌，才在两天以后起飞的班机上弄到一个座位。“他們只能做到这样了，”他說。

我就回到方才的話題。“你要着重說明这个事实，黄金海岸的絕大多数人要求立即实现自治，而不是另一次大选。而且，还要說清楚这一点，科佐，告訴殖民部的人們，我反对举行大选，并不是因为害怕我們在大选中会失敗，远非如此。我唯一关心的是避免混乱和流血。向民族解放运动党讓步只会促使它更加放肆地藐視宪法，而这是违背絕大多数人的意志的。上帝知道，我一直主张必須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而且我認为，在議會民主制度之下，政見分歧原是应有的現象。

“你还要說，科佐，据我所知，殖民大臣在議會內外还一直沒有公开发言，譴責正在阿散蒂地区进行的暴行；事实上，殖民大臣曾說在授与自治以前，必須取得‘意見一致’，不論是什么样的意見，



这一声明给了民族解放运动党再好不过的鼓励。你还可以说，在庫馬西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党的成员曾用石头袭击总督的汽车，但没有要求民族解放运动党道歉，这使我感到很惊讶。”

接着，我详细地说明了我的计划，在即将召开的立法议会的预算会议上提出我的白皮书，还提出一份第二白皮书，指出应对我国现行的各宪法文件作的修正，从而使黄金海岸成为英联邦内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在这两个白皮书经过辩论以后，就提出正式的关于独立的提案。我希望在那时候，英国政府着手制定必要的立法给予我国独立。我强调说明，这个过渡时期的不稳定情况正在黄金海岸产生许多坏影响，最后我说，我已下定决心，决不容许任何人蔑视宪法的规定和我们立法议会的权力来削弱黄金海岸的民主事业。

3月23日，科佐·博齐约从阿克拉机场飞往伦敦了。我不愿为了给他送行而引起议论，只好在那架飞机飞过我的住房上空时，向它挥手致意。对他来说，这确实是件艰巨的任务，我知道，他能深刻地认识到他所负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我认为，在详细阐述我的论点方面，没有比他再合适的人了。

一个星期以后，总督和博齐约先生都回到了阿克拉。这天正好是礼拜五（耶稣受难日），我原先安排这天去视察阿克拉的三所医院。在我作这样安排的时候，还不知道科佐会在这天回来，因为除了他打回来的一份电报说已经平安到达伦敦外，以后就没有收到他的信息。不过，在我动身以前，我们还是设法作了一次简短的交谈。他告诉我，情况很好，虽然也许并不完全象我预计的那样。他说，伦诺克斯—波伊德先生的诚恳态度使他感动，他觉得可以肯定，波伊德先生是真正竭力帮助黄金海岸谋取独立的。“但是，

看起来，唯一的办法似乎是要举行一次大选，”他說。

第二天，我会見总督。在我同他并同科佐·博齐約討論而且研究了在几天后收到的殖民大臣的信中所談到的看法以后，我体会到我可以采取三种可能的行动方針。第一，单方面地宣布独立，这是一种革命的办法，除非在被迫的情况下，我是不願意采取这种办法的；第二，讓現行宪法一直实行到1958年期滿时为止，这种办法意味着要推迟实行自治，而把黄金海岸置于一种混乱、不信任和不滿意的状态之中；第三，在最近的时期举行一次大选。

我所顧虑的主要是，举行大选可能会在阿散蒂地区引起更严重的暴力行为。然而，总督向我担保說，他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确保这次大选将在一种自由和公正的状况下进行，而且殖民大臣在給我的信中也担保說，女王政府将全力支持总督的这一行动。鉴于这种情况，我說，我同意在立法議會即将召开的會議上宣布举行一次大选，举行选举的日期大致是在7月中旬。

5月11日，殖民大臣在英国下議院发表演說。他宣布說，黄金海岸应该在英联邦之內获得独立，这一直是英国女王政府的願望。現行的宪法标志着黄金海岸承担起它自己事务的全部責任的最后阶段，但是自从这个宪法实施以来，在这个国家中，关于黄金海岸独立以后应该采用什么形式的宪法的問題，发生了爭論。到目前为止，促使各主要政党和解的一切努力都未获得成效。

“在这些問題上，我一直和黄金海岸的总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說。“他的政府認為，黄金海岸国家在英联邦之內担負起管理內部事务的全部職責的时机已經成熟。我已經向这位总理清楚地說明了我的看法，由于宪法問題上的爭論沒有得到解决，因而我們使黄金海岸在英联邦之內取得独立的共同願望只能用一个办法

去實現，而且這是唯一的辦法；那就是要向全世界表明，黃金海岸的人民有充分自由的機會去考慮他們的憲法，而且在大選中去表示他們對憲法的意見。

“我已經告訴恩克魯瑪博士，如果舉行了大選，在新選出來的立法議會中有合乎法定的多數的議員通過主張獨立的議案，那麼女王政府將準備接受這一議案，然後宣布給予黃金海岸獨立的確定日期。

“當然，要成為英聯邦之內的一個完全成員國又是另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要同英聯邦現有各成員國磋商。”

兩天以後，我召開了我的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會議。委員們同意了殖民大臣關於舉行一次大選的要求，同時也提出了一些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並且要求我把這些問題向總督提出來。委員們認為，總督應該和各個政黨的領袖們進行接觸，包括阿散提恩，並且告誡人民提防暴行事件。同時，總督還應該表明，他個人對安全和國防部隊負責，而在大選期間國防部隊將被用來維持法律和秩序；如果在大選期間發生暴行事件，英國政府不會利用它作為借口來延緩給予黃金海岸的獨立，還應當要求法國總領事警告所有法國居民，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大選。

現在決定已經作出來了，人民大會黨的支持者們全心全意地迎接這一次挑戰。民族解放運動黨的支持者們和同盟者們要求舉行大選的叫喊現在已經得到答复，他們却弄得很狼狽，甚至根本不提大選的事情了。實際上，從庫馬西傳來的消息說，他們最不希望和最不需要的就是舉行大選。

---

## 第二十二章 調查委員會

在我們置身于世界上自由國家的行列之前，應該將“可可收購公司”事件弄個水落石出，因為我堅持主張在我國實行獨立的時候，我們黨應該是清白的，並且應該公開澄清各種污蔑我黨的謠言。

1948年，當我第一次開始從事全國性的政治組織工作的时候，我就發現，那么多種植可可的農民由於欠了外國的可可收購商行、非洲的中間人和掮客的許多債，以致弄得田莊被沒收了。這種情況使我感到驚奇，也引起我的關心。那些農民經常向我訴苦，要我針對這種情況採取措施。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想採取措施是不容易的。絕大部分零售業，和我國工業企業一樣，都操縱在外國人手里。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非洲人自己缺乏足夠的資本，其次是因為非洲人沒有機會訓練成爲一個真正能干的商人。誠然，這個國家各式各樣的商店在這幾年來也吸收了一大批年輕的非洲人，其中有些人也曾經對僱主們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服務，可是他們所受到的訓練或他們所賺到的錢，都還不足以舉辦私人企業。

我決不懷疑，如果弄得到資金的話，許多非洲人將會很快地取得必要的經驗，好好地管理大型商業公司。但是，我也認識到，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非洲人缺乏足夠的抵押品和適當的保證人，向銀行貸款是不容易的；要想使農民們擺脫債務，要想鼓勵非洲人自



已經營商業，那麼關於資金問題就必須由政府設法解決。

看到這個國家這種不健康情況的還不只我一個人，各種委員會時常提出報告，談到這個國家的農民負債問題。早在1938年，謝發德教授就在一篇報告里堅決地建議成立一個農民組織，來管理可可市場和發放貸款，以解決農民負債累累的情況。然而，在黃金海岸的具體條件下，我也清楚地知道，這種農貸應該通過組織發放，而不應該直接發給農民，因為在這個國家中，要想找到作為發放貸款的基礎的、可以接受的抵押品是很困難的。我認為，如果貸款是通過一些組織發放的話，那麼這些組織（它們對自己的成員總能有一定的約束力）在保證收回貸款方面就會比那些直接向個別農民發放貸款的人們要靠得住一些。見于以上情況，“可可收購公司”就建立了起來，作為可可銷售局的一個附屬機構。

可可收購公司成立不到一年，成千上萬的田莊被原主贖回來了，而且在三年以內，可可收購公司就成為這個國家的本國主要可購買主——當然可可收購公司是受到長期以來開設在黃金海岸從事可可商業的外國商行劇烈競爭的。

然而，不久以後，關於這個公司的流言蜚語就傳開了。1953年，當時的可可銷售局的主席向該委員會提出一個報告，指出可可收購公司有某些不法行為。我收到這份報告以後，就同黨中央委員會進行討論，并向負責可可銷售局一般政策的那位部長提起這件事。在可可銷售局對它的主席的報告沒有採取行動時，我決定，我必須親自處理這件事，設法（通過可可銷售局）使可可收購公司的工作正常化起來。我對這事不能袖手旁觀，不能眼看著我所建立起來的、並且很快取得發展的**可可收購公司**，由於某些人存心破壞而忽然垮台。

1955年年底，我命令警察調查可可收購公司的情况。这以后，呼吁書一封接一封地涌到政府大厦，要求轉給英国殖民大臣，呼吁書要求成立一个調查委員會来調查可可收購公司的情况。政府为了弄清楚这些流言蜚語的真实性，着令警方进行調查，以便交付法庭审理，但是却找不出一項証据可以用来控訴任何一个負責人。

最后我任命一个两人委員會来調查可可收購公司的情况，后来內閣接受了該委員會主席建議，决定成立一个調查委員會，因为这样就可以傳訊証人宣誓作証。

1956年8月底，調查委員會发表了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議，其中有一条就是建議可可收購公司重新改組，而由一个董事会負責管理；这个董事会将由七人組成，三人由反对党派提名，三人由政府方面任命，董事长由总督任命。实际上，这正是政府不能接受的唯一建議，因为在这个基础上組成的董事会就会削弱政府对这个董事会的控制，会使政府連根据現有法令所承担的一些有限的直接义务都无力順利地实现。

該調查委員會根据它的調查結果，硬說可可收購公司是由人民大会党控制的，作为这种論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們的党中央委員會曾經討論过可可收購公司的情况。依我看，黨員們在他們的党中央委員會上討論同他們党显然有关的問題是十分正常的事。

調查委員會还說，政府对可可收購公司的一切流弊是完全知道的，尽管如此，它並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糾正。这些人說这种話时，忽視了这个事实：下命令要警察調查可可收購公司的情况的是我这个总理，而且任命組成調查委員會的也是政府。政府发言人無論在議會里面或在議會外面都曾經表示过，所有有关可可收購公司的不法行为的检举材料，都應該交送警察当局，就刑事訴訟

法來說，這完全是首席檢察官職責範圍內的事，政府對他是無權過問的。

調查委員會報告說，在經營可可收購公司當中產生了許許多多流弊，其主要原因是立法議會或政府沒有對該公司當局採取有效的控制。按照憲法規定，當時政府應該對公共基金的處理和管理這個公共基金的法定機構負有最後的政治責任。

由於這個報告的提出，我不僅建議變更可可收購公司的組織和行政管理工作，而且決定重新審查所有法定的委員會和公司的情況，我的目的是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擴大人們對所有法定委員會的公共責任感。

委員會的這個報告使我想起了1953年12月舉行的那次調查，當時就有人想用賄賂和貪污的罪名來詆毀我個人和政府。

我也不是看不到，在我們國家里，歐洲人和非洲人當中都可能有的、實際也是有賄賂和貪污行為。形勢發展得太快，行使政權還沒有經驗。汽車、洋房和其他物品向來被黃金海岸的歐洲人看作生活必需品，占有這些東西的欲望對某些人來說並不是不自然的，如果突然有人使他們感覺到他們正準備從歐洲人那裡接受這些東西的話；而金錢，獲得這些奢侈品的的手段，是誘人的。

這次調查集中在雅·阿·布萊瑪先生身上，當時他是我的交通和工程部長。據他說，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個亞美尼亞承包商答應在簽訂關於在北部領土地區建築一所學院的工程合同以後，可以送給他二千英鎊作為礼金。據布萊瑪先生說，最後他接受了這筆礼金，是分四次收到的，每次是五百英鎊，每張鈔票都是一英鎊。他說，在幾個月以前，他聽到關於賄賂和舞弊的事情，忽然意識到他接受這些黃紙包裝的英鎊是犯了嚴重的罪行。也正在

这时候，調查委員會認為他接受这二千英鎊是犯罪行为。根据黄金海岸的宪法，起訴与否是完全由总檢察官决定的。布萊瑪先生沒有被起訴。

調查委員會毫不怀疑这个承包商給布萊瑪先生二千英鎊的目的是要使布萊瑪先生利用自己的职位来为他做事。他以舞弊的罪名被审讯，并且定了罪，但是他請求上訴却被批准了。

我感觉到，在这个案件的幕后显然有一个企图，那就是要把我牽連进去。当調查委員會着手調查的时候，我正忙于筹备即将到来的选举，当时正在多哥地区进行竞选活动。有一天早上，我在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說，布萊瑪在向調查委員會申述情况时，曾提到我的名字，把它和有关賄賂的謠言联系起来。我当时真是大吃一惊，立刻在那家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予以否認。

然而，回到阿克拉以后，我却断定这种誣蔑我的謠言的性質是极其严重的，不能单靠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否認就能了事。因此我就到調查委員會去申述，調查委員會認定我是完全无罪。这里节录当时調查委員會的正式报告中的一段話：

“在政府簽訂的四項合同中，有流言說恩克魯瑪总理曾經接受賄賂，或有过不适当的行为。我們經過調查以后，認為这种流言是沒有根据的。”

这就是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但是，这整个案件对我來說却有更深远的意义。在我看来，布萊瑪只不过是一个容易上当的人，我深信，这件事是一个圈套；是想暗示說賄賂和舞弊的事在掌握政权的那些人当中十分盛行，借此来損害我的政府的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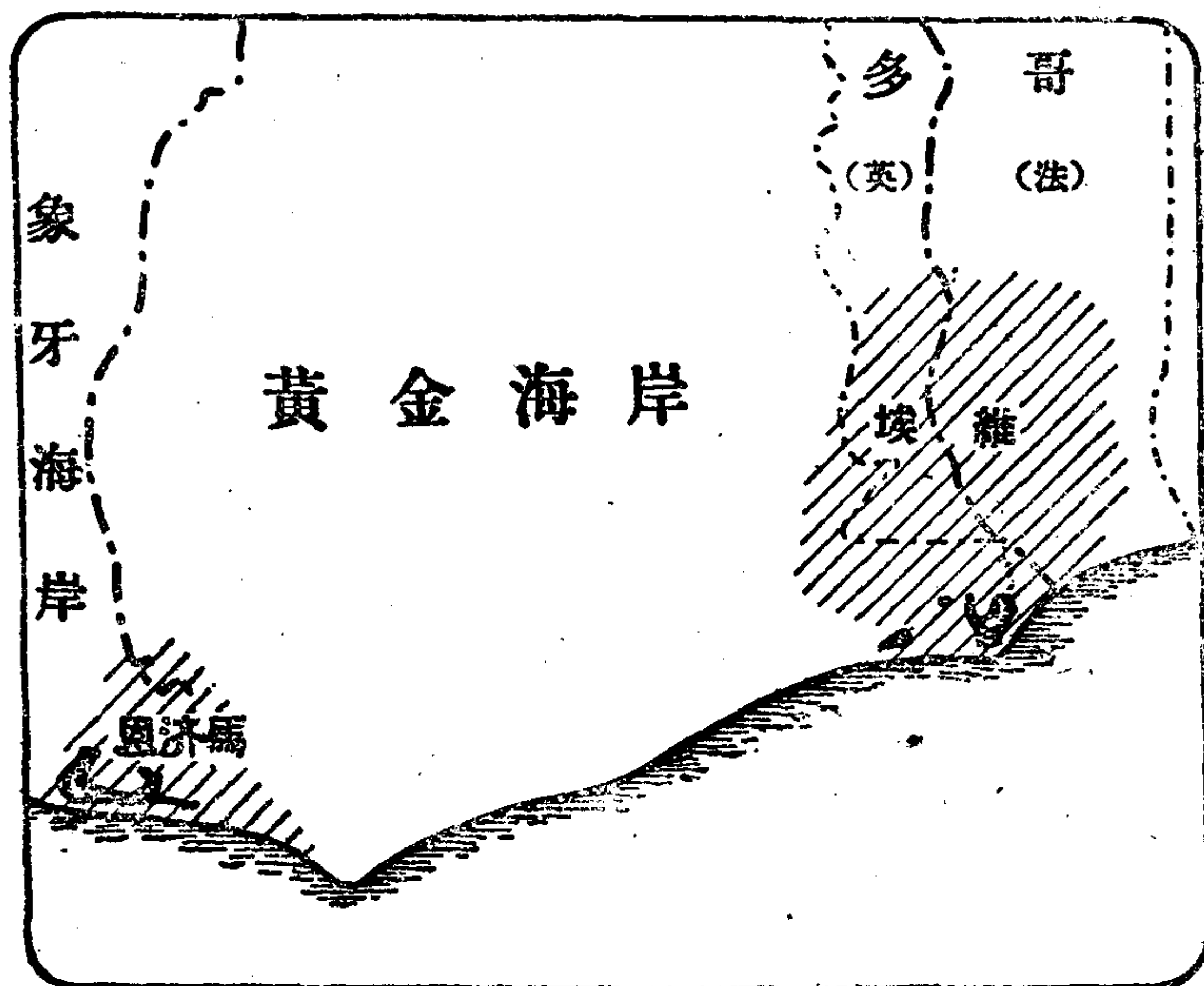


## 第二十三章 托管下的多哥

然而，当时我所关心的問題并不限于竞选和調查委员会。在联合王国政府統治下的多哥人民已經到了决定他們的前途的时候了，他們要表示是願意同独立的黄金海岸合并，还是繼續受英国政府統治，直到他們的政治命运到了可以决定的时候再說。

这块土地有一万三千零四十一平方英里，位于黄金海岸和法屬多哥之間。从1884年开始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以前，这整个地区和法屬多哥是德国的一个保护国。在此后六年中，这个保护国的西部地区，其中包括現在形成南部法屬多哥的埃維地区的大部分，就受英国政府的統治。如果长此以往，会不会发生这个多哥問題，是可怀疑的。然而，在1920年，英国和它的邻近的殖民者法国瓜分了这个战利品，而且不顧这个事实，便划分这些疆界——法屬多哥和英屬多哥之間的疆界及英屬多哥和黄金海岸之間的疆界（虽然只要黄金海岸仍然是一个附屬国，后一疆界就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划分。）——把这个地区的各部族分割开了。

实际上，开始鼓动不安的是住在多哥南部的埃維族人。他們处于一种非常不幸的地位，被分裂成黄金海岸、英屬多哥、法屬多哥三个部份。因此，他們組織了“全埃維族會議”，目的是要倡議取消所有分裂埃維族人的国际分界綫。



政治疆界分离了恩济馬人民和埃維人民

当埃維族問題被提交联合国的时候，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都承認，“全埃維會議所表示的目的和見解就是所有受过教育或沒受过教育的埃維人的目的和見解，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英国代表团却在联合国宣布說，英国不能允許把黄金海岸的埃維人問題和托管地的埃維人問題合在一起討論，原因是黄金海岸并不是一个托管地，这种說法使埃維人的統一事业遭到严重的打击。

埃維人要求本族人民的統一，純粹是有关的非洲人和殖民国家之間的問題。全世界都必須知道，誰也不能希望用国际分界綫的办法把同一种族的部族分裂开来，会得到成功，得到別人的同意，好象一个人切蛋糕一样。联合国的大多数會員国，包括某些殖民主义国家，都同情埃維人的事业；显得忐忑不安的只有英国和法

国，它們两国都是首先与这个特別問題有关系的。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单独就埃維人問題举行公民投票，人們将会坚决投票贊成同英屬多哥和英国政府統治下的黄金海岸境內的同胞联合在一起。但是，这会使法国人恼火，使英国人尷尬，一定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英法两国反对埃維族人联合，而且采用一切手段来阻挠在这个問題上作出决定。

拒絕允許埃維人举行公民投票以解决他們自己的問題，就可以爭取時間，等待反对党派的出現和情况的复杂化。

这时候，我对多哥問題的兴趣开始增加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要把英国政府統治下的那部分多哥地区从我的黄金海岸的政治組織中排挤出去，因为我的目的是要組織一个統一的国家，它要包括这四个地区：北部領土、阿散蒂、殖民地、以及外沃尔特多哥地区。我体会到，在这个关头，无论如何必須強調独立，而且應該从黄金海岸和英屬多哥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角度来考虑整个問題。

所以，我要求英国政府必須在联合国内发表声明說，黄金海岸馬上就要独立了，多哥問題也应当按照这个办法解决。当这个事实說明白以后，許多反殖民主义的代表的态度改变了，他們不再支持那些反对殖民国家和主张两个多哥統一（即主张重新建立从前的德屬多哥）的非洲民族主义者，这些代表觉得，既然黄金海岸即将取得独立，那么英屬多哥也有很大的机会在相同的时候取得独立。

1954年，英国向联合国托管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英屬多哥未来地位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英国政府指出，在黄金海岸取得独立以后，联合王国統治下的多哥将成为黄金海岸的一个組成部分，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再进行統治。的确，英国政府曾經表示过，如果多哥取得自治，成为独立的黄金海岸的一个組成部分的話，那么托

管協定的目的就達到了。

由於英國發表了聲明，結果聯合國決定在1955年8月派遣一個訪問團去英屬多哥，了解當地人民對他們未來命運的願望，以便能更適當地提出建議。

訪問團的報告在聯合國引起了許多爭論，其中有些爭論是非常劇烈的。聯合國最後決定，應該在英國統治下的多哥儘快地舉行公民投票，以便那里的人民自己決定，他們是願意在黃金海岸取得獨立的時候同它合併，還是不同黃金海岸合併而繼續受托管。

聯合國指定普里托先生(Senor Eduardo Espinoza y Prieto)為公民投票事務專員，還從不同的國家代表中選出一隊聯合國觀察員來協助工作，英國殖民部則任命約翰·德林爵士為公民投票負責人。不僅在籌備公民投票方面，而且在動員人們，使他們確實懂得有關問題方面，都需要進行很多的組織工作。因此，我諄諄告誡在多哥地區的黨組織工作人員說，公民投票並不象大選那樣只是暫時的事情，而是具有創造歷史的任務，投票的結果將會決定他們子子孫孫的命運。

在公民投票問題上，存在着兩派相反的意見：我的人民大會黨主張托管地和獨立的黃金海岸合併，另一派是“多哥大會黨”，它受到所有反對人民大會黨政府的政黨的支持，主張英屬多哥不同黃金海岸合併。在舉行公民投票期間，我並沒有到英屬多哥進行訪問，因為我不希望人家說我利用個人威望影響人們投票，從而使他們不能完全表達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

儘管某些地方非常害怕發生暴力和恐嚇事件，但是，在1956年5月9日公民投票日，一切都表現得非常平靜。經過登記的選民有百分之八十二參加了投票，投票贊成同黃金海岸合併的有百



分之五十八。結果是，贊成合并的有九萬三千零九十五票，贊成不合并的有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二票。

這實在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想這樣說，我認為印度政府是值得最高稱譽的。當時，許多請願的人就埃維族和多哥問題對聯合國代表們發表了許多矛盾的意見，使代表們莫衷一是。由於印度政府的幫助才得以解決，看來，印度代表團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任何一個殖民地取得真正獨立的机会都絲毫也不能放過。因此，印度代表團極力支持1954年英國聲明中所說的，應該儘早地給予黃金海岸和英屬多哥以獨立。

對其他代表團，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亞洲某些國家的代表團來說，重要的事情是維持托管地單獨存在的狀態。在這方面，它們似乎忽視了這樣的事實，那就是英屬多哥人和黃金海岸人本來是親戚有血統關係的，是被一條國際疆界綫專橫地拆開的，正如法屬多哥人被專橫地同他們的在英屬多哥和黃金海岸的同胞分開一樣。這些代表簡直不懂得：要想在沃尔特河和莫諾河之間划上一條令人滿意的界綫而又不致分割住在這一區域內的部族，這是不可能的事。英屬多哥成為黃金海岸的一個組成部分過去被共同疆界分裂開來的部族就會重新統一起來。因此，英屬多哥和黃金海岸的緊密聯合是不允許破壞的。

但是，現在等着要解決的真正問題是，現有的英法疆界從海岸起划開了法屬多哥和黃金海岸，又從極北部起划開了法屬多哥和英屬多哥，把多哥人民分裂為兩部分，我們對這些人民應該怎麼辦？同樣地，居住在黃金海岸西邊的恩濟馬部族被法屬象牙海岸和黃金海岸之間的疆界分裂成了兩部分，我們對他們又應該怎麼辦呢？

---

##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考驗

英屬多哥舉行公民投票以後六天，立法議會開幕式就在5月15日舉行了。總督在代表女王所作的演說中談到了兩年前牠向立法議會宣讀的女王的詔書。女王陛下在詔書里對以下事實表示深為滿意，即黃金海岸完成了達到獨立的目标以前所應該完成的最後一個步驟。總督向議會解釋說，當女王的詔書發出的時候，還看不出關於黃金海岸獨立所應依據的憲法的根本形式問題會在國內引起分歧意見。他進而列舉出為解決這些分歧所作的各種努力，這些努力沒有成功。他然後談到上星期殖民大臣在下院所作的聲明。因為政府認為企圖另外安排憲法問題會議是沒有什麼好處的，為了使黃金海岸儘速達到獨立，政府將對黃金海岸獨立問題提出有關憲法的建議，以便在立法議會目前的會議上討論，當這些建議經過討論了以後，政府將向全國提出。

總督說：“政府將征求人民的意見，即他們是否想立刻獲得獨立，是否希望這些建議在這個議會最後批准的形式上成為自治的憲法的基础。”總督告訴議會，他建議在適當的時候解散立法議會，然後舉行大選。

三天以後，我提議立法議會採納政府的白皮書，這個白皮書包括政府關於獨立自主的黃金海岸的憲法的建議、政府關於制憲願

間報告和阿契莫塔會議的報告的聲明。

白皮書建議：這個國家在獨立時應該改名為加納，並且應該是英聯邦的一個成員國。儘管各反對黨的許多黨員很多年來把他們自己同加納這個名字聯繫在一起，儘管其中有許多壽命不長的政黨把這個名字用在這些政黨的名稱中，近來他們卻攻擊這個名字。我在演說中向議會指出，加納這個名稱在古代非洲的歷史中，特別是在被稱為西蘇丹的非洲西部的歷史中有着深遠的根源。我告訴他們，加納這個名稱使現代西非青年聯想起偉大的中世紀文明的光輝和成就，在歐洲人侵入非洲並進行統治以前許多世紀，我們的祖先就已經發展了這個文明。根據歷史來說，黃金海岸各部族人民本來都是這個大帝國的組成部分。

我提醒他們，由於加納這個名稱有着豐富的歷史背景，所以才建議用它作為黃金海岸獲得獨立以後的新的國名，我們對這個名稱感到自豪，這並不是出於感情作用，而是把它作為對我國前途的鼓舞。

白皮書還提出其他幾點建議：應該有一個經加納政府同意而由女王任命的總督；應該授與加納國會以最高立法權，國會所通過的法律應該是“國會法案”；雖然目前立法議會的任期是四年，國會的任期則應為五年；加納將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並且對國防和外交負有完全責任。建議成立以下各地區：東部地區、西部地區、阿散蒂地區、布萊恩格地區、北部地區和外沃爾特多哥地區，還有一個獨立的阿克拉—鐵馬地區。在任何地區，如各區都設立區委員會(District Council)，大多數區委員會要求成立地區議會，而在其他任何地區，如有大多數地方委員會(Local Council)要求成立地區議會，都可以經國會通過法案來建立地區議會。除非三分

之二的国会議員同意，不得取消地区議會或停止其工作，不得改变地区議会的組成和权限。

我的动議被討論通过了。6月5日总督发表了两个通告，一个是关于解散立法議會，另一个是宣布7月12日和17日在北部領土举行大选（由于有些地区偏僻，需要两天的時間），并訂于7月17日在全国其他地方举行大选。

現在，以大选的形式出現的最后考驗即将得出結果，我深感滿意和愉快。我多年来长期进行的斗争总算快要結束了。我感到，为了引导这个国家获得自由（我一直相信它需要这种自由），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現在該是會長們和人民决定他們是否需要这种自由的时候了。

我所发表的宣言是簡短的。我在序言里指出，这个宣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因为历史的成敗将取决于这个国家在选举中所决定的道路。我說，只有两个問題需要大家自己回答：“在我的一生中，願意获得独立嗎？”“我是否願意恢复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我决定不讓竞选运动脱离它所引起的这个問題：即需要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政府，还是一个联邦制的政府。这次选举对我们为加納最后获得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点必須向人民交代清楚。殖民大臣的保証既然是这样肯定，他就无法走回头路，同时我也毫不怀疑这个保証是出自誠意的。

尽管即将到来的大选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人民大会党內部迫切需要紀律、合作精神和热情，可是我仍然遇到以前那个麻煩問題，那就是黨員們反对党提出的正式候选人。但是，我开始感到这种混乱情况大都出于誤会，因为我发现只要我亲自同那些有关的人談話，他們就会立刻表示願意支持正式的候选人。麻煩的是要从



事許多額外的旅行。特別是有兩次我在四十八小時內完全沒有睡覺，我開始懷疑一個四十六歲的人到底有多少精力可以使用。當時我的頭開始痛得象要裂開一樣，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我的胃也不舒服了。我曾在許多群眾集會上發表講演，嗓子都變啞了。但是，後來太陽出來了（正象它終歸要出來一樣），在6月20日，即候選人登記的最後日期，為了爭取得到下屆立法議會全部一百零四個議席，黨員們被提名競選每個席位。到7月2日，我們沒有遭到反對就已經取得了五個席位。

人民大會黨興高采烈地投入了競選運動，競選的指導機構很快就有效地活動了起來。唯有在阿克拉的阿倫納廣場，我們才能展開這次重大的競選運動，因為我們的黨就是在这里誕生的，在我們艱苦的長期鬥爭中，有許多重大的會議都是在这里舉行的。當我的車子還離阿倫納廣場很遠時，密集的人群就已經把車子攔住了。他們一認出我來，就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呼聲：“自由”！同時每一個人的手臂都舉起來作表示“自由”的敬禮姿勢。當我還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的時候，我已經被舉起來了，就象一面旗子在凱旋時被舉起來穿過情緒激昂的人群。最後人們把我放到講台上，同我的部長們和其他黨派的同伴們在一起。

我在演說中強調指出了這次選舉所涉及的一個明確的問題，同時警告人們不要被反對黨的競選花招引入歧途，或被這些花招吓住了。我特別提到最近從阿散蒂傳來的謠言，說什麼這次投票不是真正秘密的，所有敢于把自己的選票投入紅色小公鷄（人民大會黨黨徵）票箱的人都會被照相機拍下來。

“你們是聰明的人，”我在暴风雨般的怒吼聲中大聲說道，“散布這種荒謬謊言是對你們的智慧的一種侮辱。”

我于是要求所有从阿散蒂逃出来的願意支持人民大会党的人不要怕回到阿散蒂去投票。我提醒他們說，总督在最近一次广播演說中曾經向全国明确地說过，在选举期間他負有維護法律和秩序的責任，他相信在这个时期一切暴力和威吓的做法都会受到制止。

我最后說：“路快走完了，我們將通过胜利之門走向自由呢，还是留在后面，这个問題現在應該由你們作出决定。你們，你們和你們。”我一边指着各个角落的人群，一边呼喊著。

手臂突然都举起来了，人群发出了吼声，瞬息間我被抬下了講台而被放在一个轎子上。这个轎子是临时准备的，有很舒适的座墊和一把大盖伞。当我被抬下講台的时候，我感到胃里有一点不舒服，但是轎子一悬空，我就发现这是我所經歷过的最舒适的交通方式。然而，有一两次，当抬我的人想要小跑步或合着舞蹈的拍子蹦跳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有一条安全带系一下才好。

在此后的几星期中，全国各地都忙于竞选活动。每当我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区参加了一次广泛的竞选活动以后回到阿克拉时，我就会被迫不急待地叫到另一个地区去支持我的候选人。有些人画掉了党的正式候选人而想写上他們所选择的其他人。我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人指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选举，当国家的整个利益处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不可以就个人是否喜欢另一个人的問題进行爭吵。

大选的結果成了全国鷄尾酒会和社交場合的談論主題。虽然我沒有時間亲自出席这些場合，我却听到这些半官方人士所提到的数字：人民大会党五十六席；民族解放运动党四十八席。然而，随着時間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在全国各地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不会不

对那些投机的人发生影响。一天晚上，我的一个朋友在参加了一个大规模鸡尾酒会以后前来看我。他告诉我說，有一个过去曾經預言人民大会党的选票将大为减少的人，現在却相信我的党至少能够获得同我們在上届立法議會中一样多的选票。

在此以前，我們的竞选运动主要集中在我們認為我們得到最大的支持的那些地区里。現在，十分必要的是，我們應該把自己的力量打进阿散蒂地区。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地区的暴力行为和其他各种恐吓手段实际上已使人民大会党变成了一种地下运动。由于人民大会党的党员和党的拥护者曾在庫馬西受到攻击，大家一直認為，党的领导人訪問这个城市不是一个好办法。这并不是因為我們担心个人的安全，而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做任何可能引起更大的騷乱和流血的事情，或是任何可能造成帝国主义干涉的事情，而这种干涉只能使我們国家的独立延期实现。但是在大选期間，却不能繼續忍受这种情况。

我通知我的党的执行委员会說：“現在訂于星期日，即7月1日，我們将在庫馬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我的話被一片欢呼声盖住了，他們喊道：“终于有了这一天！我們到底可以給他們一点顏色看看了。”

全国的其他地区都以无限的热情来欢迎我所宣布的这件事情。还在这次集会召开以前两天，我就接到报告說，一車一車的人拥进了庫馬西。这时我才怀疑我个人在这种时候出現在阿散蒂的首府是不是一种聪明的作法。我很知道我将受到怎样的接待。人們将会疯狂地激动起来，并且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表現他們的喜悦，这样一来，就会引起我們同拥护反对党的人們之間的摩擦。我同我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討論了这件事，經過一番理智和感情的剧烈斗

爭以后，終于決定我不應該前往庫馬西。

我們包租了一架飛機準備把其餘的中央委員送去開大會，他們原訂上午十時從阿克拉起飛。大約在上午十時三十分，他們都氣沖沖地回到了我的住處。

“航空公司拒絕我們搭乘飛機！他們說有一個油箱漏了！”

“那麼，是不是只有一架飛機能夠飛行？”我很失望地問道。

“他們是這樣說的。”

“這麼說，你們必須由陸路去了。如果你們現在就出發，那麼，在今天下午兩點半或三點就可以到了。”

他們不再說什麼話，就登上了兩輛車子出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並且禱告，希望他們不要在路上出事，因為他們都急于準時趕到庫馬西，我想他們會把車子開得飛快的。

當天晚上九點三十分左右他們回來了，激動地說，這次集會顯然是十分成功的。成千上萬的人參加了大會，事態的發展使他們每個人都相信我們的黨在那里仍然受到擁護。

第二天，參加這次大會的克羅博·伊杜塞（他是目前政府的不管部部長之一）到人民大會黨的總部來訪問我，他說：“告訴我，克瓦米，你是怎樣一個人呀？”

我有点莫名其妙，就問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認為，”他說，“在庫馬西召開的這次大會很成功，但是，同時也感到缺少什麼，十分遺憾。如果你在場，對於群眾和我們說來，都會大為不同的。”

他的話以及他說這話時的誠懇態度深深地感動了我。

“不過，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他以更輕快的語調又說，“因為，歸根到底，克瓦米·恩克魯瑪就是人民大會黨，人民大會黨也就



是克瓦米·恩克魯瑪！”

我一直懷疑，我沒有到庫馬西去是否實際上影响了那里的选举結果。举例來說，我如果去了，是否可以為我的上屆政府中的农业部长江土阿这个有前途的年輕人获得一个議席呢？然而，总的說來，我覺得冒險前往庫馬西去是不适当的。因为那天在警察和反对党的无賴党徒之間发生了許多次小冲突，早晨曾有过两次爆炸和几响枪声，这些都說明庫馬西的气氛是很紧张的。

当竞选运动达到高潮时，反对党在他們的声明中越来越沒有顧慮地表示相信他們将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同时竭力使他們的听众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人民大会党的失敗已經是肯定的了。在布西亚博士写給总督的一封信里（这封信是在选举的那天发表的，并在选举的次日刊登在报上），一开头，他就詳細地列举了加入民族解放运动党的各組織的名称，它的同盟者的名称和十七位无党派候选人的名字，据他說，这些无党派候选人已經同意支持这些組織，并且同意由他担任他們的議會領袖。他于是接着說：“根据联合王国宪法的慣例，如果民族解放运动党和它的同盟者（連同支持他們的无党派人士）在选举中获得五十二个以上的議席，他們将希望閣下提名他們的議會領袖布西亚博士組織政府。”7月18日，当这封信在报上登出来时，从宣布了的选举結果中已經可以看得很明显，反对党已在选举中失敗了。从来也沒有一个巧妙設計的阴谋活动使它的制訂者感到如此的悲伤。

我向我周围坐在走廊上的一些黨員大声說道：“好呀！你們讀过这篇东西嗎？这是一个好消息！正如我經常說的：只要这些人同意支持我們，他們会永远支持我們的。”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呢，克瓦米？”有些人問道。

“你們自己讀吧。布西亞博士說，只要他獲得稍微超過五十二個的議席他就準備組織政府。你們注意，那就是說他已經承認這一點：只要取得全體議席的簡單多數，那怕是多一個議席，那就是一項民主的裁決。”

人們大聲地歡呼起來了。我繼續說道：“如果他是誠心誠意的，那麼我們就不用再擔憂了，今后的進展會順利的，因為我們畢竟都是用同一種語言說話的。”

選舉結果：人民大會黨獲得七十個議席，後來又有一個無黨派人士支持我們，這就使我們在立法議會全部一百零四個議席中佔了七十二席，比反對黨多四十席。這種情況當然符合於殖民大臣提出的關於我們應該擁有合理多數的要求。

雖然我的黨失去了阿散蒂地區的某些議席，可是在其他的地區取得了成績，暫且不說我們在議會中有很大的代表性，單以支持我的黨的人遍布全國這一點來說，就使我們能夠要求成為一個能代表全國說話的唯一政黨了。我們在這個殖民地的兩個地區和阿克拉自治市取得了所有的議席，獲得了佔投票總數百分之八十二的選票。在外沃爾特多哥地區，我們得到了十三個議席中的八個議席，同時也獲得了投票總數中的顯著的多數。在北部領土地區，我們得到了二十個議席中的十個議席（我們的代表性擴大了，但不幸我的前任衛生部長艾莫魯·伊加拉並沒有當選）。即使在民族解放運動黨預計要獲得絕對勝利的阿散蒂地區，我們也得到了二十一個議席中的八個議席，獲得了總票數的百分之四十三，同上次選舉相比我們的選票實際上增加了。

第二天，總督提名要我組織政府。由於我的兩位上屆的部長沒有當選，同時還因為商業和勞工部長伊·奧·阿薩富—阿德賈

伊先生辞去了职务，我用了三天的時間才滿意地选出了能够担負起我們所面临的任务的人。具体來說，我試圖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地区来选择我的部长們。我最后选定的部长名单如下：

阿·凱斯利—海福德	交通部长
科佐·博齐約	商业和劳工部长
克·阿·伯德馬	財政部长
阿·伊·因丘馬沙	房屋部长
阿·伊·阿·奧弗里—阿塔	地方政府部长
約·赫·阿拉薩尼	卫生部长
阿科·阿杰伊	內政部长
納·阿·卫尔貝克	工程部长
約·巴·厄祖阿	教育部长
布·耶博赫—阿法里	农业部长
克罗博·伊杜塞	不管部长
勒·尔·阿巴伐納	不管部长

科非·巴科再度担任我的部长級秘書和政府党議會領袖。

无疑地，我們以显著的多数贏得了这次选举，但是，即使是这些不容爭辯的数字也沒有使反对党表示甘心。最后的情况一发表，布西亚博士就在庫馬西举行了一个記者招待会，发表了一个使人惊异的声明，他認為选举結果使反对党有机会組織联邦制政府。他承認在这个問題上竞选已經有了結果，但是他坚持認為，因为人民大会党在阿散蒂和北部領土所得选票沒有超过全部选票的半数，这就証明有必要实行联邦制。他发现了另外一个地区，他把这个地区称为“南部多哥托管地”，企图为这种特殊情况辯护。他說，在这个地区的六个議席中，人民大会党只取得了三个議席，按照他

的各項事務的準備。然而，當我們進入最後階段時，我說道：“國內出現了一種頑固的主張，認為我們將來的法治發展應該基於聯邦制政府而不應基於中央集權制政府，我總覺得這種主張是超越了合法的政治活動範圍。”我指出，政府已經盡了一切可能來解決這些分歧，但是當所有的努力都失敗時，殖民大臣就表示了他的意見：向世界表明，我們有充分的自由來考慮我們的憲法，並且通過一次大選來表達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夠獲得獨立。我繼續說道：“殖民大臣於是給了我們以下的諾言：

“如果舉行了大選，女王政府隨時準備接受一項由新選舉出來的立法機關以合理的多數通過的要求在聯邦內獨立的議案，然後就可以宣布達到這個目的的確定期日。”

大選舉行過了，結果已經宣布，依我看來，現在沒有任何東西妨礙我們完成殖民大臣在聲明中提出的最後的各項條件。也沒有理由說，殖民大臣會不情願實現他自己的諾言。

于是我詳細地談到了反對黨打算把國家分割成若干小的自治區的想法，我說道：“在現代世界的情况下，要設想這種前途是太不現實了。”不論怎樣，這種主張已經在最近舉行的選舉中提出來了，而且遭到了否決。

“在選舉中遭到失敗並不是可恥的，”我繼續說道，“做一個惡劣的失敗者才是可恥的。”我又說，少數人拒絕多數人所作出的決議等於表演一幕議會政治的滑稽戲。我接着說道，正如去年5月在政府的立憲建議中所提出來的，我每時每刻都承認，應該有一項把中央政府的權力移交給各地區的措施。我斷定說，弗雷德里克·鮑恩爵士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所提出的並經過阿契莫塔會議



總督演說的主要內容是：政府將于這個星期提出一項動議，請英國政府通過一項議案，宣布黃金海岸是英聯邦內的獨立的主權國家。第二天，反對黨提出了一個修正案，批評這個建議。他們的理由是，只有實現了下列幾點，這項建議才算成熟，那就是：經過進一步努力制訂出他們所謂“大家同意的憲法”；發表調查委員會關於可可收購公司情況的報告；取締他們認為在公共團體中“廣泛存在的貪污現象”。反對黨在隨後發表的演說里，提不出任何能夠支持這些言論的證據，於是立法議會就以三十七票的多數否決了這個修正案。在遭到這次失敗的那天晚上，反對黨又向報界發表了另一個聲明，表示在“獨立議案”提交立法議會審議以前，他們將不出席立法議會的會議。

我為這種態度深深感到惋惜。這種態度是同立法議會的尊嚴不相稱的，是我國爭取民族獨立鬥爭歷史中的污點。這個時候正是我國許多人為了我們的事業作出忘我犧牲的艱苦歲月的緊要關頭，正是充滿了偉大的動人事件的時期，所有的人都應該感到歷史責任的重大，而把自己貢獻給這個事業。

在我介紹獨立議案的演說中，我試圖說明這件事所具有的某種重大的意義。雖然我必須詳細地談談反對黨所提出的挑戰，但是我仍然試圖避免引起憎恨，并把問題提高到超出黨派政治衝突範圍的民族問題的水平。與此同時，我還必須記住，我的演說實際上說明了我的政府支持這項議案的立場。

我又一次提到了在爭取獨立的道路上我們所忍受的痛苦和犧牲，接着我就提請議會注意：當立法議會同意我提出的關於採納白皮書的議案時（白皮書載有關於黃金海岸在1956年5月22日獨立的憲法建議），我們的國家甚至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接管自己

的各項事務的準備。然而，當我們進入最後階段時，我說道：“國內出現了一種頑固的主張，認為我們將來的法治發展應該基於聯邦制政府而不應基於中央集權制政府，我總覺得這種主張是超越了合法的政治活動範圍。”我指出，政府已經盡了一切可能來解決這些分歧，但是當所有的努力都失敗時，殖民大臣就表示了他的意見：向世界表明，我們有充分的自由來考慮我們的憲法，並且通過一次大選來表達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够獲得獨立。我繼續說道：“殖民大臣於是給了我們以下的諾言：

“如果舉行了大選，女王政府隨時準備接受一項由新選舉出來的立法機關以合理的多數通過的要求在聯邦內獨立的議案，然後就可以宣布達到這個目的的確定期限。”

大選舉行過了，結果已經宣布，依我看來，現在沒有任何東西妨礙我們完成殖民大臣在聲明中提出的最後的各項條件。也沒有理由說，殖民大臣會不情願實現他自己的諾言。

于是我詳細地談到了反對黨打算把國家分割成若干小的自治區的想法，我說道：“在現代世界的情况下，要設想這種前途是太不現實了。”不論怎樣，這種主張已經在最近舉行的選舉中提出來了，而且遭到了否決。

“在選舉中遭到失敗並不是可恥的，”我繼續說道，“做一個惡劣的失敗者才是可恥的。”我又說，少數人拒絕多數人所作出的決議等於表演一幕議會政治的滑稽戲。我接着說道，正如去年5月在政府的立憲建議中所提出來的，我每時每刻都承認，應該有一項把中央政府的權力移交給各地區的措施。我斷定說，弗雷德里克·鮑恩爵士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所提出的並經過阿契莫塔會議

修改过的建議，政府是大致可以接受的。我強調說：“但是，如果这个国家企图朝着联邦制度的道路繼續前进，政府認為这是不能实行的，而且也的确是危险的。”

接着，我向議會指出这种联邦可能給我們这个小国家带来沉重的行政負擔，人們可以考虑一下，在我們目前各式各样的問題都存在的情况下，我們能不能肩負起这样一个更重的担子。“我們將如何在財政上維持这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呢？”我問道。“我們是不是为了这个政府本身的緣故，就要牺牲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来維持这个机构重叠的政府呢？我国人民刚刚开始为摆脱凄惨的穷困状况而进行艰苦的斗争，是不是再要把他們推回去，讓他們維持一个累贅的行政机构呢？这个行政机构会耗尽我国的財源，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供它支配呢？”我重申了去年8月我在議會里所說的話，即我的决定是：我們應該在获得独立时，建立一个我們所能設想出的可行而简单的政府制度。

这样，我就談到了議案的中心問題：

“我現在正式征詢黄金海岸人民的意見，这就等于要求联合王国政府滿足我国要求独立的願望。我們已經准备好来担負这个責任——重大的責任，并且还准备好来享有这个权利——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公民处理自己事务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議長先生，我希望这里沒有一个非常怯懦以致拒絕加入这个崇高事业的人。讓我把这件事說得清清楚楚吧。为了使我們国家的独立事业取得胜利，要求每一个男子、妇女和兒童都努力工作，帮助国家并且忠实于它。我們應該認識到这一点，當我們認識到了以后，我們还要認識到我們不能讓这个事业遭到失敗。

“我們有殖民大臣的諾言，如果要求在英联邦內独立的議案由

新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以合理的多数通过，他将宣布达到这个目的的确切日期。議長先生，殖民大臣在他的諾言中所指的新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就是目前在这里召开的議會，而我們都是議員。我們今天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合理的多数通过摆在我們面前的議案，然后联合王国政府将会宣布我們独立的确定日期。全世界的公正輿論从我們最近的大选結果中已經断定，我們在这个立法議會中拥有这个合理的多数；但是我們必須在全世界面前亲自宣布我們的决定。

“对每一个人和国家來說，只有一个机会来作出自己的决定……”这句话說得很对。黄金海岸的人民、英国政府以至于全世界今天都在傾听我們的决定。决定将是怎样的呢？就我这方面來說，我的立場是明确的。我决心为我的国家服务到底，并且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为我的国家服务。我决心这样做，是为了要看到在我国人民和独立之間再也沒有任何障碍。我同样决心担保，独立的确定日期将会毫不延迟地宣布。我投票贊成独立。我同时恳求可敬的議員們也这样做……”。

当我結束演說时，从会场各处响起的欢呼声使我感到，这是人民的真正的声音，是那些意識到我們正在走进胜利的大門，体会到这个凱旋的时刻从而內心充滿愉快和驕傲的人們所发出的真正的声音。

遺憾的是，反对党的議員們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心里並沒有这种感觉。他們仍然决心想對我們的胜利泼冷水。布西亚博士和他的拥护者們宣称，他們所要进行的斗争的中心已不再是黄金海岸，而是倫敦。他們立刻着手准备派一个代表团到英国去。

反对党所公認的領袖布西亚博士宣布，他将离开这个国家到




歐洲去作一次演說旅行，這次旅行是他早先就為自己安排好的。在這以後他還要率領反對黨的代表團去訪問英國政府。甚至當有影響的“曼徹斯特衛報”發表社論警告他說，他派遣代表團是徒勞無益的，是不負責任的，他仍然未能看出他是處於逆風之中。保守黨的“每日電訊報”以超過十三英寸的版面刊載了他吁請英國政府不要給黃金海岸獨立的聲明，因為黃金海岸還沒有作好實行議會民主的準備。他說：“我們還需要你們（英國人）留在黃金海岸，你們在那裡的實驗還沒有完成。有時我感到奇怪，為什麼你們似乎那麼迫不急待地要同我們分手。”

當殖民大臣在倫敦會見反對黨領袖們時，他以為他已經能夠說服他們對黃金海岸的憲法問題要採取更為合理的看法。但是，不幸的是，反對黨在倫敦所說的話和他們在黃金海岸公开发表的言論，似乎有很大的區別。因為，當反對黨的領袖和他的擁護者們為了鼓動不給予黃金海岸獨立而在倫敦稱贊英國人在黃金海岸的統治是有益的時候，他們在黃金海岸的另一些擁護者却同時要求罷免總督。

同樣不幸的是，聯合王國的某些主要報刊對我國政治局勢的複雜情況並沒有充分的了解，却發表許多文章，批評我的政府的政策，而繼續支持和煽動各種誤解。

世界上很少有這樣的政府（如果確實有的話）象這幾年我的政府所作的那樣，能夠表現出如此容忍和用那麼多寶貴的時間，來考慮這樣一個不合作的少數黨所提出的各種離奇想法。



## 第二十五章 胜利的时刻

现在，大选已经举行了，我所提出的关于独立的议案已经由“新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以合理的多数票”通过了，殖民大臣 5 月 11 日在向下院所作的声明中提出的那些条件都已经履行了。此后，即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要求联合王国政府宣布黄金海岸获得独立的确定日期。因此，我就在 8 月 23 日正式请总督向殖民大臣转达我的关于宣布这件事的请求。

可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等待一件你所希望取得的东西和等待一件你有把握取得的东西，这中间还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我的头脑里，对殖民大臣会实现他的诺言这一件事是不存在任何怀疑的：这只是一件需要等待的事。

那是 9 月 17 日，星期一。整个早晨我都有事，当时我正在翻阅我的约会记事本。突然电话铃响了，我和总督直接通话了。

“早安，总理，”查尔斯爵士说，“我想告诉您，我接到了给您的好消息。我想知道，您有空的时候能不能抽几分钟到我这里来一趟。”

“当然能够，查尔斯爵士，”我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查看我的约会记事本。“今天早晨恐怕太紧了——今天下午三点钟怎么样？”

我迅速到达了总督的住宅。如果说在我的脑子里对于等待着我的消息的内容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当我走进总督的办公室

时，总督脸上的愉快表情就会立刻把这种怀疑一扫而光。他紧紧地热情地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递给我一份殖民大臣发来的电报。象电报里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份电报也有若干段很长的电文。然而，当我读到第五段时，高兴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把电文的后半部分都润湿了。过了几分钟，我才抬起眼睛来看总督。这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有说什么话。可能我们两人都在回顾我们认识以来的七年时间，开始的时候我们互相怀疑、猜测和误会，后来是互相信任，诚恳相待，友谊日益加深，而现在，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个时刻是无法形容的，也是今后决不会再体验到的。

“总理，”总督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手伸给我，“今天对你说来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是你们斗争的结果。”

“这是我们斗争的结果，查尔斯爵士，”我改正他的话说，“在这个问题上您的贡献很大；实际上，如果没有您的帮助和合作，我也许不会成功的。这对我们两人说来都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日子！”

我同总督安排好了，我将于第二天上午到他那里去取电报，然后立刻向立法议会宣读。

“这是一场民族斗争，”我说道，“在宣布独立日期的时候，只有这样做才对。”那就是要让全国人民从我的口中得知这件事。

总督点头表示同意。他说道：“在您走以前，总理，我愿意在这个伟大的日子向您表示我的衷心的祝贺，同时祝您、您的同事和加纳的人民前途无量”。当他同我走到门口时，他又说：“您知道，总理，只要我在这里当总督，我将继续做我能够做到的一切来帮助你们。”

“谢谢您，查尔斯爵士，”我说道，“您的帮助，我一向是深为感激的。”

当我无数次从总督的办公室走出来沿着克里斯兴斯博格城堡白石台阶走下来的时候，心中总是万感交集，但是只有在那一天，我才体验到在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当那些好象在托着我的云朵轻轻地把我放在我的汽车的座位上时，当发动机的嘟嘟声把我慢慢地带到尘世上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我的司机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吩咐。

“噢，开回家去。”我说道。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我真不知道，我是怎样使自己胸膛里的炸药没有爆炸。人们还是象往常一样到这里来，他们还是象以往那样谈着话，可是我一刻也不能忘记那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平时什么事都不会妨碍我入睡；当我在生命的非常危急的关头，我也能设法摆脱现实生活中各种事情而不知不觉地深深地进入梦乡。但是，这天晚上，我很久不能入睡，我的一生经历象走马灯一样在我的面前重演着。我回忆到，在恩济马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在阿契莫塔时我成了一个骄傲的奖学金获得者，在林肯大学时我又成了一个勤奋的大学生；我回忆到自己在伦敦如何由学习转而从事政治活动；后来我回到了黄金海岸；接着来到的是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斗争；拘留，积极行动，然后入狱；最后被承认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这些事件只不过是许多更大的斗争和计划的开端而已。然后，这样几乎经过了漫长的十年，终于出现了电报上的那几句话，这些话象征着一条道路的终点，象征着有时看来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斗争的结局；把电报纸上的那几句话从容地交给我的既是监禁过我又释放过我的人。从那时起，当我遇到艰巨的任务时，他每次都鼓励我。“3月6日”；我自言自语地说，“3月6日，3月6日……”



我接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正是我四十七岁生日。虽然一夜沒有休息好，我仍然很早就醒了。我照照鏡子，并向自己的像問道：“所有的人过四十七岁生日的时候，是不是都象我一样感到自己还这么年輕呢？”

我穿好了衣服，就下楼去向母亲問候。不知怎么，在这些日子里，我似乎很少有时间来看她。虽然她了解我，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声，可是这种情况仍然使我不安。她注意到我没有睡好，神色紧张，可是她没有說什么。

我心里想：“她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妇女呵！沉默寡言，心地純良，从不猜疑！”

我来到了办公室，然后就到議会去。十时四十五分左右我到了政府大楼，总督把殖民大臣的电报交給我。当我接到电报时，我的双手不停地顫抖。

我凝視着总督，我的嘴唇在动，可是并没有声音发出来。查尔斯爵士替我解了围，他說他知道我想立刻向人民宣布这个好消息。

我打算在正午，也就是这个消息在联合王国广播的同一时间，向議会宣布。我事先同議長安排好了，因为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所以請他允許我，当我一起立时就讓我发言。我焦急地等待着从十一时三十分到正午这段时间一分鐘一分鐘地过去，而对进行中的討論一点也沒有注意。我的心情紧张得使我簡直不知如何抑制自己。

时針一指到十二点时，我就站起来了。議長打断了討論。会场里立刻寂靜得連一点声音也沒有了，議員們都望着我，以为我要請議長来維持秩序，或是对正在討論的事情发表什么意見。我在說話以前看了一下手表。十二点过三分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准备迎接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我说道：“议长先生，请允许我，我想发表一个声明。从今天正午起生效，我受权公布两个对我国将来极为重要的电报。”我停了一下，等欢呼声平息下去以后接着说道，“这两份电报是：总督根据我国政府的请求，发给殖民大臣请他宣布黄金海岸取得独立的确定日期的电报和殖民大臣的复电。这两份电报的复本将在闭会时分发给诸位议员。”

我接着宣读了殖民大臣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殖民大臣提到5月11日他在下院所作的声明，他指出，普选已经举行过了，人民大会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被授权组织政府，独立议案在七十二票赞成和没有一票反对的情况下由新选出的议会通过了，当时反对党的议员没有出席辩论。

电报接着谈到：“由于要求在联邦内独立的议案已经在新选出的立法议会中以显著的合理的多数票通过了，我现在荣幸地通知你们，女王陛下政府将利用第一个有效的机会向联合王国的议会提出一项关于允许黄金海岸独立的议案，并提请议会批准，女王陛下政府确定，完全的独立始于1957年3月6日。”

有几秒钟，整个的议会会场寂然无声。然后，这种几乎是神圣的沉寂突然被议会中从未有过的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打破了。有些人感动得几乎淌下了眼泪，其中有一些是我的最亲密的同事，他们曾经真正地体验过斗争，因而可能会更深刻地认识“胜利”这个字的真正含义。

于是我接着向议会宣读殖民大臣的一段话，这段话谈到了多哥托管地区和在那里举行的公民投票，投票的结果是，赞成同独立的黄金海岸合并的票数占了显著的多数。“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在

7月間通過了一項決議，該決議指出，大多數居民願意同獨立的黃金海岸合併，決議並且建議採取一些措施在黃金海岸取得獨立時結束托管協定。如果該項決議獲得聯合國大會的贊同，就可以採取適當的行動把英屬多哥的領土併入獨立的黃金海岸。”

女王陛下政府已經注意到我們希望在取得獨立時把黃金海岸改名為“加納”，為了實現這個願望，就要採取必要的立法步驟。

殖民大臣的電報最後是這樣說的：“在黃金海岸歷史的轉折時刻，女王陛下政府真誠地希望黃金海岸社會各階層將能夠為了總的利益而共同工作。我以女王陛下政府的名義向黃金海岸的政府和人民表示，我們衷心希望這個國家將來取得成就。”

在長時間的歡呼以後，我說道，對於殖民大臣的電報我沒有什麼更多的話可說，他在電報中已經正確地把這個時刻稱為我們歷史中的轉折點。這是一個需要鄭重考慮的時刻，我說道，我希望在明天議會復會時，我能夠發表進一步的聲明。

當反對黨的議會領袖站起來代表反對黨歡迎我所作的聲明時，會場上響起了歡呼聲。

接着整個議會里的人們都歡欣若狂地激動起來。人們突然把我的腿抬了起來放在肩上走出大街。街上的人群正在按着黨歌“這是我們的勝利”的旋律喜洋洋地歌唱跳舞。

祝賀的電話、電報和信件源源而來，登門祝賀的人更是不計其數。當我們知道世界各個角落的成千上萬的人都為我們偉大的勝利而感到高興時，這種心情是難以描寫的。

我想到總督曾經盡了很多的力量幫助我們取得勝利，如果我和我的部長們能夠到他那里作一次非正式的訪問，這將是一個很好的表示。因此，那天下午五時三十分，我們全體都到了克里斯興

斯博格城堡；总督已在那里准备接待我们了。这是一次非常令人高兴的访问。

全国各处都在举行庆祝活动。那天晚上我的一个朋友从库马西来，他很激动地告诉我那里的人们是怎样得到这个消息的。

他说道：“克瓦米，你要是真在那里就好了！那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党的人比人民大会党的拥护者更加激动，更加高兴，克瓦米，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对于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简单的表示‘自由’的敬礼已经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要把双手举起来高呼‘自由’”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日子啊！谁还能够找到比这更好的办法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呢？

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我又向议会作了一个声明。我指出，由于女王陛下政府同意我国在1957年3月6日独立，我们已经达到了最后的斗争阶段。

我说道：“议长先生，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终于发表了，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也有理由表示感谢。我很高兴听到反对党的议会领袖昨天作出的关于反对党欢迎殖民大臣的声明的保证。”

在1844年条约（该条约使英国取得了黄金海岸的政治统治权）签订一百一十三年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将要获得自由。当我在1947年回国时，我决心献身于争取独立的斗争，并且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从那时以来，人民无限的忠诚的支持一直鼓舞着我，人民大会党的坚忍不拔的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始终在激励着我。正如殖民大臣所说的，我们正处在“黄金海岸的历史转折点”。我向议会说，我知道议会想了解在这个转折点的时刻，政府的意图是什么。



“我們決定盡我們的力量來起草一個憲法，這個憲法將滿足每一個愛好自由的人的真正的願望。

“政府建議本屆議會廣泛地討論我們的憲法，並且作出決定。為了這個目的，政府將尽早地公布一個白皮書，提出詳細的憲法草案。除了要把憲法提交本屆議會最後決定外（這個程序是不能取消的），政府願意同反對黨的代表們討論憲法問題，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可以在議會辯論以前在議會外進行討論。”我的這一段話受到了議會中雙方議員的歡呼。

我繼續說道，“議長先生，在這個偉大的時刻，我們的心中都充滿了喜悅。我們都在想着標志我國獨立的壯麗的慶祝典禮和活動。可是，讓我們靜一靜。讓我們想一想我們面前的任務，讓我們想一想當加納變成一個自由、獨立的主權國家時，我們將要肩負起什麼新的職責。讓我們以上帝賜給我們的全部力量、知識和智慧來為這個國家——我們自己的國家——服務。讓我們再一次宣誓，我們將大公無私地為我們的國家服務，保護它的權利和利益，並且在世界各國中為促進人類的和平、幸福和進步而作出我們的一份貢獻。”

反對黨對於他們有機會在議會以外討論憲法表示滿意，他們並且希望取得某種協議。

我於是作了這樣的安排：邀請議會中反對黨的代表同政府代表逐條研究憲法草案。當任何修改或補充為雙方所同意時，政府就進行修改。我建議議會在11月的第一個星期開始討論憲法草案，那個時候，如果有什麼分歧意見還沒有得到解決，可以在議會中進行辯論和表決後作出決定。憲法草案只包括各地区的定義和各地區議會的權限等十分概括的條款。因為這是一件特別容易引

起爭論的特殊事情，我感到應該用更多的時間來詳細考慮必須考慮的問題。因此，我決定在明年年初以前不進行必要的立法手續。

我決定在9月20日向全國廣播。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於是就派人把丹尼爾·查普曼請了來。

我問他：“丹尼爾，我想在明天廣播以前為阿克拉的兒童們組織一個茶會。”

查普曼聽了我的這個臨時建議並不感到什麼奇怪，他同我一樣對這個計劃很熱心。因此，第二天下午有幾百個不同國籍的兒童到我辦公室外面的空地上參加大型的茶會。黃金海岸警察局的樂隊一開始奏樂，這一群有幾分胆怯的看來很有禮貌的孩子們便從拘謹的等候中活躍起來了，他們開始象人們希望的那樣行動了起來；喝檸檬水，吃夾心麵包、甜麵包和蛋糕；弄破其他小孩的气球，還激動地大聲叫喊，他們就這樣都漸漸地變得很自在了。在五點三十分左右，總督來了。他同孩子們一起過了一小時的時間或者更長一點。但是，我認為對於大多數孩子們來說，那天下午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我所宣布的下星期一學校里放假的事。那天下午我過得十分痛快，當我不得不離開他們趕到廣播電台去的時候還戀戀不舍。

我在向全國發表的文告中談到，宣布取得獨立的確定日期這一件事標志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它還結束了政治不穩定的時期。在籌備我國獨立的慶祝活動時，我們應該保證使這些慶祝活動同我們的國家相稱，同我們在世界各國中新取得的地位相稱。

我宣布說，絕大多數人民很聰明地選擇了中央集權制政府。我感到滿意的是，在中央集權制的憲法體制中能夠載有保證滿足各

地区合法願望的条款。最后完成我国宪法的工作需要很快进行，为了不浪费任何时间，我已经取消了内阁的休假。我答应在可能范围内尽早地公布白皮书。我们急于制订一个能够满足酋长和人民的真正願望的宪法，我们要根据国家最重大的利益来从事这一项任务。

我说道，尽管独立日期的确定使我們的心中充滿了喜悅，但是我們还應該想到我們面临的任務。随着独立的到来，我的政府将要对加納的外交政策、国防、法律和秩序的維護以及我們貨幣的穩定負有完全責任。

在胜利的时刻，我們應該回顧过去，并且感謝在这些年代里，为了取得我国的独立而工作和奋斗的所有的政治家，还應該感謝那些在最近一个时期为了結束我們的斗争曾經或多或少地貢獻了自己力量的人。

“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最后我說，“讓我們不要因為我們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一味欢喜，讓我們不要因為我們最寶貴的願望已經實現而一味作乐。讓我們首先想到我們國家的最重大的利益。讓我們把微不足道的政治上的爭論和权謀摆在一边，讓我們为加納的政治体制提供一个坚固而穩定的基础。願你們的思想、行为和祈祷都能够加强和維系我們國家的政治家的風度。”

当我乘車回家时，虽然身体和精神都疲倦了，但却感到說不出的愉快和滿意，我回想为了取得独立而走过的漫长和艰难的道路。非洲的民族主义并不局限于黄金海岸——新的加納。从現在起，它必須是泛非洲的民族主义。非洲政治覺悟和政治解放的思想必須传播到整个大陆，传播到它的每一个角落。

我从沒有把爭取黄金海岸独立的斗争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

业，我一直把它看成是整个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辽阔的大陆上，每个地区的非洲人都已经觉醒起来，争取自由的斗争将继续发展。我们的责任是作为一支先锋力量，尽我们的可能去帮助那些现在正在进行着我们自己从事过的并且取得了胜利的斗争的人们。在殖民主义的最后痕迹在非洲消灭以前，我们的任务没有结束，我们自己的安全也没有保障。

象一艘刚下水的船一样，我们孤单地应付着汪洋大海的各种危险。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人，依靠船长和他的航海术。当这艘孤单的船满怀信心地扬帆启程时，我自豪地站在船桥上，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遮挡耀眼的非洲太阳的光芒，仔细眺望着水平线。水平线外还有非常辽阔的天地。



# 附 录 一

## 人民大会党党章<sup>⊖</sup>

箴言：永远前进，绝不后退

### 第一部分

#### 名 称

本党定名为“人民大会党”

#### 目标和宗旨

##### 国内方面

一、为加纳（黄金海岸）人民和他们的酋长取得并保持独立而进行无情的斗争。

二、为废除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而发挥强有力的、自觉的政治先锋队作用。

三、使殖民地地区、阿散蒂地区、北部领土地区和外沃尔特多哥地区取得并保持完全的统一。

四、在符合本党党章和议事规程的情况下，在联合的政治行动和其他行动中，同工会运动和其他类似的组织合作，并为它们的利益而工作。

五、为迅速地把加纳（黄金海岸）改建成一个美好的国家而努力

---

⊖ 1959年8月人民大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已通过新党章。——译者

力,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和他們的酋长們将有权作为自由的人民生活和管理他們自己。

六、为促进人民在政治、社会和經濟上的解放而努力,特別要使那些直接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謀生的人获得解放。

### 国际方面

一、同非洲和其他大陆上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合作,以求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部族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和种族压迫,消灭各民族、各种族和人民之間的經濟不平等,并且支持爭取世界和平的一切行动。

二、以促进非洲和非洲人血統的各族人民行动一致的办法,来支持成立西非联邦和实现泛非主义的要求。

### 党 員

本党的党员有以下两类:

一、个人党员

二、加入本党的团体

一、个人党员 凡年滿十八岁的男子或女子,願意接受本党宗旨、政策、綱領和紀律,并具备下列条件者,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

(一)不拥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部族制度和种族主义;

(二)不屬於同本党政策相抵触的其他政党或团体;

(三)不屬於本党所反对的工会、农民組織或其他正式組織。

个人申請入党者一般均須填写正式規定的申請書,并把申請

書交給支部書記，以便支部委員會考慮是否接受為黨員。入黨時，每一個黨員都必須領取黨證和黨費卡片。

**入黨費：**每一個黨員在入黨時必須交納二先令的入黨費。

**黨費：**每一個黨員每年應向所屬支部交納三先令的黨費，或按照本黨在特殊時期所規定的黨費金額交納。

**二、集體黨員** 包括下列各組織：

(一) 工會

(二) 退伍軍人組織

(三) 農民組織

(四) 合作性質的社團、協會和聯合會

(五) 自由業者、手工業者和技术人員的組織

(六) 青年和體育組織

(七) 文化組織

(八) 婦女組織

(九) 由本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同意接納的其他組織。

甲、所有這些組織都必須承認本黨的目標、宗旨、政策和綱領。

乙、這些組織必須是本黨全國執行委員會認為真正的民主的組織。

丙、希望加入本黨的組織必須把經該組織正式通過并經其主席和書記簽署的關於加入本黨的決議交給人民大會黨的總書記，再由他提交本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決定是否接納。

丁、每一個組織在加入本黨時必須交納一英鎊一先令入黨費。

戊、加入本黨的組織必須每年交納黨費，其數目由本黨決定。

注意：鑒於團體入黨容易使忠誠于誰的問題發生矛盾，應該儘可能鼓勵以個人的身份入黨，儘管本黨應該同各組織保持最切的

关系。

### 本党的經費

本党一般的經費来源是：各种活动的收入（舞会、足球比賽等）、自願捐款、募捐、贈款、轉讓的遺產、出售本党出版物和徽章所得的收入、个人和团体的入党費、党費以及經本党同意的其他經費来源。

除了經過批准即将支出的款項外，所有經費必須存入銀行，提取款項时应由本党主席或書記或司庫簽署。

注意：給本党全国总部的所有汇款應該寄交阿克拉第八二一号邮箱人民大会党全国总部司庫。支票、邮政汇票和銀行汇票应开人民大会党的抬头并且划双綫。

### 党 旗

本党党旗的正式顏色是：紅、白、綠。党旗上的这三种顏色是橫列的，紅色在上端。

### 全 国 年 会

本党全国年会应于每年8月間召开，日期和地点由全国执行委员会确定。当全国执行委员会認為必要时，可以召集全国特別紧急會議，但是至少要在两个星期以前发出通知。至于全国年会，則至少要在會議召开前两个月发出通知。

### 年会的組成

出席全国年会的人員如下：



- 一、每个选区正式选出的六名代表
- 二、人民大会党妇女組織选出的六名代表
- 三、人民大会党青年联盟选出的六名代表
- 四、加入本党的各組織所正式选举和委任的代表(每五千人产生两名代表)
- 五、当然代表,包括下列人員:
  - (一)在本党全国性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
  - (二)本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員
  - (三)中央委员会委員
  - (四)立法議會議員。

注意:出席年会的当然代表沒有投票权,除非他們同时是所屬选区妇女組織、青年联盟或加入本党的組織正式选出的代表。

### 本党年会代表的选举

代表当选的条件如下:

- 一、每一个代表都必須承認和遵守本党的章程、綱領、原則和政策。
- 二、出席會議的各代表必須是选举他們的各組織的真正成員或担任职务的人員。
- 三、任何人不得代表一个以上的組織出席會議。
- 四、沒有交够党費的人或者沒有向所屬工会或其他加入本党的組織交納会費的人不得成为代表。

### 全国代表年会的职权

全国代表年会具有下列各項权力:

一、制定本党下年度的基本政策和计划。全国代表年会所作出的决议对本党所有党员和加入本党的各组织的一切成员都有约束力。

二、审查总干事代表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和财务决算。

三、处理有关本党和国家的其他事务。

### 章程的修改

根据全国代表年会的多数票所通过的决议，可以对现行的章程或其任何部分，进行订正、删除、修改或补充。有关修改章程的任何建议至少要在全国代表年会召开前两个月向总书记提出，以便列入议程。有关这种议案的通告和年会的议程至少要在全国代表年会召开前一个月用书面通知所有的选区。

只有党的组织，即支部、选区、地方组织和加入党的团体才可以全国代表年会上提出议案请求决定，党员个人不得提出议案。

### 全国执行委员会

组成：全国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主席

二、总干事

三、常务、财务和人事委员会主席

四、常务、财务和人事委员会书记

五、中央委员会委员

六、由各选区在选区年会上选出的代表(每一个选区产生一名代表)。

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有表决权。

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由主席主持(如主席缺席,由副主席主持)。如主席和副主席均缺席,则由会议选出的某一委员主持。

### 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职责

- 一、执行全国代表年会所制定的政策和纲领;
- 二、协助组织党的各地区会议、选区和支部并且对这些组织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 三、实施党的章程、规则、条例、议事规程和各项细则并为达到这种目的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措施,包括:勒令加入本党的组织退党、解散党的某一个支部或停止它的活动、停止某一个党员的工作或把他开除党籍。全国执行委员会所采取的任何这类措施都必须向党的下一届全国代表年会报告,并附上有关组织、支部和党员的申诉;
- 四、负责党的财务工作向全国代表年会报告账目,并且加以说明;
- 五、指出并从事一切有利于实现党的目标和宗旨的活动;
- 六、批准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选举的候选人。候选人名单由各地区和各选区执行委员会或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式授权的其他机构准备并提出;
- 七、全国执行委员会应授权中央委员会建立全国书记处所属的各专业部门和其他咨询机关,以便实现党的目标和宗旨;
- 八、在一年的期间内,如果全国执行委员会有了缺额,应根据本党章的规定补足。
- 九、全国执行委员会至少每六个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来听取

关于党内的情况和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十、在党的终身主席认为合适时或选区十二名执行委员签署决议案提出要求时，将召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法定人数，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选区代表出席会议。

### 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

#### 组 成

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应由下列人员组成：

- 一、党的领袖
- 二、由党的领袖选出并经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意的其他八名委员
- 三、经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意的其他特别委员。

#### 职 权

一、中央委员会作为全国执行委员会的“管理处”，应促使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和政策得到充分的贯彻；

二、监督党的各级管理机关（全国的、地区的和支部的执行机构），并且在它认为必要时采取一些措施来实施全国执行委员会所作出的党的各项决议和计划；

三、在一般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委员应常驻在首都阿克拉，至少每星期召开一次常务会议，如遇紧急事情，则应每日研究主要事态的发展，为实现全国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而制定战略和策略，并且在情况特别紧急时，担负起捍卫党的基本纲领、安全和防卫的完全责任并且向全国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



四、党的領袖應該从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中任命一名書記，來負責召集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保存檔案并草拟向全国执行委員會所作的各項報告；

五、中央委員會應該同全国立法議會中的本黨議員保持最密切的合作并且應該特別注意促使議會委員會正当地进行工作；

六、作为全国执行委員會的主要“管理处”，中央委員會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和措施都必須向每半年举行一次的下一屆全国执行委員會的全体會議報告，并請求批准。

## 紀 律

应設立三個人或更多的人組成的紀律执行机构，它的組成人員由全国执行委員會任命。

該机构的判決必須向全国执行委員會的下一屆會議報告，并由其決定是否批准。上訴应向全国代表年会提出。該机构的組成人員每年任命一次，但是可以連任。

只有全国执行委員會能够开除黨員，然后報告全国代表年会請求批准。各支部、选区和各地区黨組織以及中央委員會只能暫時停止违反紀律的黨員的黨籍，然后報告全国执行委員會請求作出決定。

任何黨員，如以候选人身份或者支持一个候选人來反对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选举中正式宣布的黨的候选人，都必須被开除出黨。

## 黨的地方組織

### 黨的地区代表會議

黨的地区代表會議根据全国書記处的指示由黨的地区委員會

每年召开一次。根据阿克拉全国总部書記处发出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或者根据該地区三分之一以上的选区的要求,可以由党的地区委员会召集該地区党的特別代表會議。党的地区代表會議由該地区的选区各派两名代表参加。

### 地区干部

地区干部包括下列人員:

- 一、由年会选出的地区組織的主席
- 二、由年会选出的地区組織的副主席
- 三、由年会选出的地区組織的司庫

上述干部每年选举一次,但可以連任。

四、地区組織的宣传書記

五、地区組織的書記

六、地区組織的其他干部。

以上三类干部是由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的专职干部。

由地区选出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員仍然是原地区的地区代表會議的当然代表,并且享有充分的权利。

### 地区代表會議的权力

地区代表會議具有下列权力:

一、制定每年地区党組織的政策和計劃,但是这些政策和計劃必須同全国代表年会所制定的基本政策和計劃一致;

二、审查地区組織的書記代表地区組織提出的政治和組織报告以及关于帳目的說明;

三、在有关地区执行能够促进党的工作的各項事务。

### 地区委员会的組成

地区委员会由下列人員組成：

- 一、該地区选出的所有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員
- 二、該地区选出的所有立法議会的議員
- 三、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的六名委員
- 四、地区組織的書記
- 五、地区組織的宣传書記
- 六、全国执行委员会在每个不同的时期任命的地区組織的其他干部
- 七、地区組織的主席、副主席和司庫。

### 地区委员会的職責

地区委员会的職責如下：

- 一、协助組織本地区各城鎮和农村中的选区和支部并且使这些組織的活动和工作互相配合；
- 二、协助执行党的政策和計劃以及全国总部書記处发出的指示和命令。各地区委员会應該有权向全国書記处提出有关下列問題的建議；要求加入本地区黨組織的某些团体退党、解散本地区黨的某些支部或开除本地区黨組織中的某些黨員；
- 三、向党的地区代表會議提出工作报告和財務报告，并且通过全国書記处向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这种报告；
- 四、在全国总部書記处总的监督下，协助办理、监督和指导党在地方政府和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
- 五、采取能够促进本地区黨的工作的一切措施和行动。

## 地区党组织的经费

地区党组织的任何经费都应该按照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正式记在账上。

## 选区党组织

### 年 会

选区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选区中持有特許证明的每个支部各派两名代表参加。开会的地点应由选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如果选区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该选区所属的三分之一的支部要求，应该举行选区非常紧急会议。

## 选区执行委员会的组成

选区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

副主席

财务书记

司库

在全国代表年会上选出的八名委员（退职的委员可以重新当选。）

选区的书记

由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的选区的宣传书记。

选区书记和宣传书记应该是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的专职干部。其他在编制内的干部应该每隔一定时期任命一次。

选区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是八人。



### 選區執行委員會的職責

選區執行委員會應該執行選區年會的政策和決議，這些政策和決議必須同全國代表年會所制定的以及黨章、規定和條例所載的基本政策和綱領符合。

### 黨的基層組織

支部是黨的基層組織。黨應該在所有的城鎮和鄉村中建立支部。支部由支部大會每年選出的支部執行委員會領導。在經費允許的範圍內，支部可以任命專職幹部。

在那些為了進行地方選舉而劃有選舉地段的大城市中，應該相應地建立黨的選舉地段組織。所有黨的選舉地段組織都應該在這些城市中的它們各自的支部內進行活動，但是每一個黨的選舉地段組織應該有一個黨的選舉地段執行委員會，而且各選舉地段組織的代表應該是支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如果認為市鎮太大，可以象在大城市里那樣在市鎮中劃分選舉地段。

農村選區中各支部應直接同它們各自的選區總部建立關係。

由於庫馬西、阿克拉、塞康第一塔科拉第和邊角堡本身就構成選區，因此它們應該直接同全國總部建立關係。

### 支部大會

支部大會每月召集一次。

### 支部执行委员会

支部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副主席、书记、助理书记、司库、财务书记、宣传书记和五名执行委员。

#### 支部执行委员会的职责

一、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让他们了解党的立场观点；

二、经常注意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意见并且向阿克拉的全国总部书记处报告；

三、注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在支部进行活动的地区带头组织人民，以便通过发扬群众主动精神的办法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四、发展新党员和收集党费；

五、调查和核对党员的历史，向阿克拉全国总部书记处报告任何有损党的威望和名誉的违反纪律和法律的事情；

六、对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和一般教育。

支部执行委员会没有权力开除任何党员。如遇违反纪律，可以暂时停止有关党员的党籍并将此事报告总书记以便采取措施。

#### 党的议会委员会

一、党的议会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立法议会中的所有党员。

(二)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的人员。

二、議會委員會受黨的領袖的直接指導和監督，黨的領袖向全國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報告立法議會中所有黨員的工作、活動和一般的表現。

三、議會委員會主席由黨的領袖任命，議會委員會主席必須每天同黨的領袖或其副職保持聯繫。

在黨的每一個組織的法定人數中都必須包括各該組織執行委員會（即：黨的支部委員會、選區委員會、地區委員會和全國執行委員會）的三分之一的委員。

## 第二部分

### 黨的內部組織

#### 全國書記處

一、黨的中央行政機關是全國書記處。全國書記處由副主席、總書記、助理總書記、總司庫和總宣傳書記組成。這些人員都由全國執行委員會任命。如果黨的工作需要，全國執行委員會還可以任命其他的職員。

二、全國書記處在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所屬中央委員會的直接指導和監督下進行工作。

三、中央委員會的書記應該成為全國書記處和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之間的聯絡人。他有責任向全國執行委員會的各次全體會議報告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和活動。

四、全國書記處的主要職務是向黨的各地區執行委員會、各選區執行委員會和各支部傳達全國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並且行使同黨內行政有關的其他職責。全國書記處應該同各

支部、各选区和各地区党组织的書記保持密切的联系。

### 人民大会党妇女联盟

妇女党员应该組成妇女組織。可以在支部和城市选举地段的基础上建立妇女組織。应该建立妇女組織的总理事会，以便使党內的妇女活动能够相互协调一致。每一个妇女支部和妇女选举地段組織所委任的领导人应该負責使支部和选举地段組織的妇女工作取得协调一致。

党內的妇女不应该有单独的身份。一个妇女成为一个党员也就成了她所屬支部妇女組織的一个成员。妇女可以通过妇女組織加入党。

妇女組織在全年內都要組織集会、舞会、郊游和其他社会活动。每年在复活节时举行一次加納妇女特别的节日。

每一个党支部都应该有一个妇女組織来照顾妇女的特殊利益，但是妇女組織应该是支部的組成部分。每一个支部，包括妇女組織在內，只可以有一个执行委员会。

### 人民大会党青年联盟

全国青年(从十五岁到三十岁)都应该組織到人民大会党青年联盟之中。中央委员会应该指定一个委員在党的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中担任工作，每一个党支部也应该指定当地支部的一个党员到同該支部相应的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中担任工作。

### 出 版 物

在必要时党应该出版自己的讀物、期刊、杂志、小册子和書籍



等等。

### 党的宣言

在每次大选和地方政府选举前，全国执行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应该包括党纲中的哪些条款，由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

### 党的全国性节日

一、独立日	1月8日
二、青年节	2月21日
三、妇女节	复活节日
四、反帝国主义日	5月24日
五、建党纪念日	7月12日
六、年会	8月份银行的假日
七、终身主席的生日	9月18日

## 附录二

### “圈子”章程

名称：圈子

箴言：服务、牺牲、忍受痛苦。

目标：一、使我们自己和“圈子”成为争取西非团结和民族独立斗争中的革命先锋。

二、支持“全西非国民大会”创立和拥护“非洲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斗争的目标和要求。

### 序言

由于任何一种运动，除非有一个由可靠的、经过训练和精选的人组成的坚强的组织来维持它，使它继续进行下去，并胜利地实现它的纲领，否则，这种运动是不能继续发展下去的。

由于非洲各族人民群众越来越广泛地投入争取本国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所以就越来越需要建立一个象“圈子”这样的组织来加强这一斗争，而使煽动分子、通敌分子、卖国贼、贪生怕死的人和自私自利的人不可能或不容易把任何一部分非洲人民群众引入歧途。

由于西非洲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专制政府，这就更需要参加“圈子”的人必须是训练有素的以革命活动作为职业的人，他们还必须善于同各种政治阴谋和迫害进行斗争，从而使任何人都难于破坏民族解放运动。

因此，我承認并決定遵守“圈子”的下述規章：

- 一、我願意堅決服從并執行“圈子”大會的規定、命令、教導和指示；
- 二、我願意永遠為“圈子”的事業而“服務、犧牲、忍受痛苦”，并且隨時隨刻都願意執行這個組織交給我的任何任務；
- 三、我永遠願意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事情和困難中幫助“圈子”里的兄弟會員；
- 四、除非萬不得已，我決不使用強力手段；
- 五、在我可能加入的任何組織中，我願意把促進“圈子”的事業看成是自己的目標和職責；
- 六、我願意在每月 21 日從日出到日沒齋戒并且每天都為“圈子”的事業默思片刻；
- 七、我接受克瓦米·恩克魯瑪的領導。

### 忠誠宣誓

我以我的生命、榮譽和命運莊嚴地宣誓：我永遠為“圈子”的目標和願望而奮鬥，在任何情況下決不洩漏“圈子”的任何秘密、計劃或活動，也決不出賣“圈子”里的任何兄弟會員；如果我竟敢洩漏“圈子”的任何秘密、計劃和活動，或出賣兄弟會員，出賣我們的事業、或利用“圈子”的影響來達到個人利益或宣傳的目的，那麼，對於因此而引起的危險後果，我要自行負責。

### “圈子”會員的職責

每一個“圈子”的會員都應該加入一個組織并且應該採取以下兩種行動方法：

一、宣传那个組織的要求和需要并且为这种要求和需要而工作。

二、把民族团結、西非民族独立以及創立和維護非洲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精神灌輸到那个組織中去。

### “圈子”的經費

每一个“圈子”支部的會員都要以自願捐獻的方式負責一項經費，該項經費只能用来促进“圈子”的事业。

### “圈子”的會議

“圈子”大会至少每年召集一次，它决定总的政策和給予各地区和各地方的“圈子”支部以指示。每一个“圈子”支部的會員在每月的 21 日，或會員認為适当的其他時間集会。

### “圈子”的通訊聯絡方法

“圈子”大会在任何时候都必須同各地区和各地方的“圈子”支部保持密切的联系。一切联系都應該尽可能通过个人接触、信差和通訊員来进行。信件、电报、电话和海底电报只應該用来任命人員。禁止在公开的場合討論“圈子”的事情。

### 辨認“圈子”會員身份的方式

握手时大姆指用力按。

### “圈子”的目的

在适当的时候，“圈子”将作为整个西非洲的政党而公开活动，到那时，这个政党的政策就是維護非洲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